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許俊雅博士、丁鳳珍博士

Hông Kìm-siann ê Tâi-uân ì-sik: Tâi-gí Bûn-hák ê Huat-tián,

Sú-lûn Kiàn-kò kap Bîn-tsòk Sióng-siōng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

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The Silenced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The Development,
Construction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and Nationalist Imagina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研究生：鄭清鴻

2013 年 7 月

本論文獲得

2012 年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學位論文獎助金

2013 年建成台文扶輪基金

謹此特致謝忱

誌謝

口考後，故意把論文放了一些時日再完稿，對於一個「準」畢業生而言，這或許有點一反常態。但想起碩班這四年，尤其是後兩年寫論文期間所經歷的點點滴滴，終於還是要隨著論文的完成而封存於某種形式之中，有那麼一瞬間覺得好想重頭再來過……雖然這種衝動並沒有維持超過一分鐘以上就清醒了，但是，在那瞬間卻也慶幸、確信著自己這四年的思考與實踐，在人生的每個階段都值得一再重播，細細回味。

最初思索研究主題時，總是試圖在文學史的縫隙中再挖掘出什麼，但或許是機緣，也可能是台「語」系學生的宿命，2011年爆發了「蔣黃事件」，徹底鬆動了自己對「台灣文學」的期待、想像與信仰。也讓我發現，一旦把視角拉遠，在文學史的縫隙之外，其實還有一片被遮蔽的天空，儘管那片蒼穹之下佈滿了太多矛盾的荊棘。而台灣人們赤足在認同道路上的斑斑血跡，竟吊詭地被清洗掉。

面對更換論文主題的不情之請，俊雅老師仍以最寬容的支持，陪我走這一段陌生而冒險的旅程，一起思考文學史的可能性，關心白話字史料。大學時啟發我研究台語文學的鳳珍恩師雖然希望我「廣結善緣」，但師生之間的默契，卻是這份論文得以放手完成的關鍵。向陽老師於計畫與學位考試時的精準提問，點破了我挑戰這個題目的許多不足之處，更同在民族主義的研究基礎上，深化了我的思維。而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李勤岸老師將論文讀入肌理，最後關頭提醒了我理論關懷的漂移。有兩位指導老師「三代同堂」的關懷與鼓勵，兩位身兼台語詩人與研究者的口試老師的指教與肯定，以及修課期間台文系老師們的教導，特別是芳玫老師的民族主義課堂上對蔣黃事件、台語文學的討論與研究方法的啟發，佳穎老師社會學的理论訓練與導師的關心，慧如老師跨領域的大力支持，這本倔強的論文最後才能完成。

從碩一、碩四到碩士一路走來，實在有太多朋友相伴。從中教大一起來師大打拼，但不確定到底正式出道了沒的 Triple Back 團員淑如與家和；共同經歷過這四年酸甜苦辣的 98 級好同學；薈雯學姐、怡君學姐、三進學長，諸位對我們照顧有加的學長姐們及系辦毓凌學姐和孟珈學姐；一期一會卻情誼長存的 1107 寢室友們，TWLS 讀書會的學友和夥伴，在街頭上相識的每個新朋友、老前輩。如果沒有你們，碩班生活和學術生涯會是怎樣，我真的無法想像。

感謝士博和俐茹，每一次的晚餐邀請都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和士博的恩師淑媛老師相識，擔任教學助理期間，往返於新豐與台北的那些夜晚，以及淑媛老師慷慨出借的《笠》詩刊省去許多奔波之苦，情誼永誌。也因為士博，和瑜庭、永

婷一起完成了思想地下室，更和許多夥伴參與了太多精彩的計畫，認識你（們）真好。除此之外，幸獲李敏勇老師推薦建成扶輪社獎學金，還有太多太多曾經以不同的形式與距離參與這個過程的貴人，在此由衷感謝。

最後，對於不問一個文學研究生花了四年到底在追求什麼，而始終堅信我確實走在自己道路上的家人：在北部的阿媽和姑姑總是擔心我沒吃飽穿暖，遠在南部的阿爸、阿母和小弟也總是在等我難得一通的電話或返家，一直陪在我身邊的饅頭，謝謝你們，讓我有相信自己信念的勇氣。

2013/8/17 台北

Tiah-iāu (Tâi-lô Tâi-gí -bûn)

1980 nî-tâi tshoo-kî, siū-tiòh Tóng-guā huán-tui ūn-tōng sóo kik-huat ê “Tâi-uân ì-sik”, tàuh-tàuh-á tsiann-tsò Tai-uân siā-huē tshui-sak “Pún-thóo-huà” ê ki-tshóo. Tī Tâi-uân tsit ê tó-sū tīng-bīn sòo sán-sing ê bûn-hák, iā tsóng-shng kin-tuè Tâi-uân bīn-tsók tsú-gī ê huat-tián, tui “Hiong-thóo bûn-hák” ê tsiann-sin “Tsiann-miā” tsò “Tâi-uân bûn-hák”. Tsù Jit-tī sí-kî khai-sí, gí-giân tī Tâi-uân bīn-tsók jīn-tōng hīng-sīng ê kuè-thīng tang-tiong tsiann-tsò tsit hāng tshiong-hūn tiâu-kiānn, sú-tit Tâi-uân ê bûn-hák kap bûn-huà sīt-tsiàn bô-huat-tōo tsham “Tâi-gí”, “Tâi-uân-uē” thuat-lī kuan-hē. Tān-sī tsin kuài-kí ê sóo-tsāi sī, bô-lūn sī tsiàn-tsīng ê POJ bûn-hák, Tâi-uân uē-bûn ūn-tōng, hik-tsiá sī tsiàn-āu king-kuè nīng-tsīng kik-bīng, it-tít kàu 1980 nî-tâi tshiah ū-huat-tōo huat-siann ê Tâi-gí bûn-hák, tī í Tâi-uân úi tiong-sim ê Tâi-uân bûn-hák-sú lāi-té, suah tsha-put-to lóng hông hut-liók, buah-siau.

Kiù-king hōo tsiàn-āu Kok-bīn-tóng kuann-hong sóo kái-tshing ê “Bân-lâm-gí”, hik-tsiá sī Kheh-ka tsók-kūn sóo tshing-hoo ê Hok-ló-uē, Hō-ló-uē, Hô-lók-uē, sī àn-tsuánn tuí Jit-pún sí-tâi í-lâi ê Tâi-uân līk-sú tang-tiong tsiann-tsò “Tâi-gí”, “Tâi-uân-uē” ? In-hô tī Tâi-uân bûn-hák-sú lāi-té, pau-kuat Tâi-gí tsāi-lāi ê pún-thóo gí-giân bûn-hák hông “siau-im”, suah koh in-ūi “Tâi-gí” ê tīng-gī lāi ín-khí kuan-hē tsók-kūn, bīn-tsók jīn-tōng ê mâu-tún kap tsing-lūn, jī-tsiánn kàu tann lóng iáu bô-huat-tōo kái-kuat? Pún gián-kiù í āu-siat līk-sú-hák ê kuan-tiám, kiát-háp bīn-tsók tsú-gī gián-kiù tui bīn-tsók jīn-tōng, gí-giân kap tsók-kūn bûn-huà tīng-tīng piàn-hāng ê kuan-tshat, khai-tián tui Tâi-uân bûn-hák sú-lūn ê kái-kòo, hun-sik kap pí-kàu, se-luáh Tâi-uân bûn-hák ê huat-tián kap Tâi-uân bīn-tsók tsú-gī ê khí-hing, àn-tsuánn bīn-tui pún-thóo gí-giân kap bûn-huà king-kuè tsiàn-tsīng, tsiàn-āu kok-gí ūn-tōng ê tshò-siong? Līng-guā, Tâi-gí bûn-hák tui “Hong-gāin bûn-hák” tsáu-thuat--tshut-lâi, koh tui Tâi-uân-lâng tui-kiù tsú-thé-sing, tsū-tsú-sing ê bīn-tsók jīn-tōng, thê-tshut siánn-mih khuánn ê huán-sing kap tián-bōng?

Pún-bûn siú-sian iōng “Tsiàn-tsiang Tâi-gí bûn-hák” ê gán-kài, tiōng-sin kiám-sī Tâi-uân tī Tsuân-kiû-huà ê tsīng-kíng tang-tiong, tsū 17 sí-kí í-lâi tuí se-hong Hiān-tâi-sing ê siū-iōng, thàu-lām kap sīt-tsiàn, pīng-tsiánn tshim-jīp thóo-lūn “Tâi-uân-uē” ê bûn-hák kha-jiah, àn-tsuánn tī Tsiàn-āu Kok-bīn-tóng Tiong-kok bīn-tsók tsú-gī tsi ha ê gí-giân tsing-tī kap bûn-hák-sú sū-sū lāi-té tsiām-tsiām hông buah-tú. Tsāi tòk-tsun “kok-gí”, pián-kē “hong-giân” ê gí-giân tsing-tī tang-tiong, “Hiong-thóo bûn-hák” thàu-lām, siu-pian hong-giân ê bûn-lūi sīng-kui, tsóo-gāi Tâi-uân tsok-ka tuí pún-thóo gí-giân ê Āu-sīt-bīn síong-siōng, tī tsit-khuán tiâu-kiānn tsi hā sóo phū-hiān ê “Tâi-uân ì-sik”, sīng-jīn Huā-gí bûn-hák thé-tsè ê háp-huat-sing, iân-siòk sīt-bīn-tsiá ap-pik, siu-pian pún-thóo gí-giân ê gí-tsè

kuan-hē, suah lâi hîng-sîng Tâi-uân tsòk-kûn kap bîn-tsòk jīn-tông ê m̄u-tún. Tâi-gí bîn-hák iā in-uī àn-ne, tī Tsiàn-tsîng, Tsiàn-āu tīng-liat ê l̄ik-sú khang-phāng tsi tiong tiông-kiàn tsú-thé-sing, iā tui Tai-uân bîn-hák huat-tshut “tsài”-tsiann-miâ ê hoo-siann, thè Tâi-uân bîn-hák kap Tâi-uân Bîn-tsòk jīn-tông khak-l̄ip to-guân bîn-huà, hoo-siong tsiann-tsò tsú-thé ê luē-hâm kap kè-tát.

Kuan-kiàn-jī: Tâi-uân bîn-hák-sú, Peh-oē-jī(POJ), Tâi-gí bîn-hák, Tâi-uân ì-sik, jīn-tông

摘要（漢羅台語文）

1980 年代初期，受著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 ê「台灣意識」，沓沓仔(tauh-tauh-á) 成做台灣社會推揀「本土化」ê 基礎。Tī 台灣這 ê 島嶼頂面所產生 ê 文學，也總算跟綴台灣民族主義 ê 發展，對「鄉土文學」ê 前身「正名」做「台灣文學」。對日治時期開始，「語言」tī 台灣民族認同形成 ê 過程當中成做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 ê 文學 kap 文化實踐無法度參「台語」、「台灣話」脫離關係。但是真怪奇 ê 所在是，無論是戰前 ê 白話字文學、台灣話文運動，或者是戰後經過寧靜革命，直到 1980 年代才有法度發聲 ê 台語文學，tī「以台灣為中心」ê 台灣文學史內底，suah 差不多攏 hōng 忽略、抹消。

究竟予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 ê 閩南語，或者是客家族群所稱呼 ê 福佬／鶴佬／河洛話，是按怎對日本時代以來 ê 台灣歷史當中成做「台語」、「台灣話」？因何 tī 台灣文學史內底，包括台語在內 ê 本土語言文學 hōng「消音」，suah koh 因為「台語」ê 定義引起關係族群、民族認同 ê 矛盾 kap 爭論，而且到今攏猶無法度解決？本研究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 ê 觀點，結合民族主義研究對民族認同、語言 kap 族群文化等等變項 ê 觀察，開展對台灣文學史論 ê 解構、分析 kap 比較，梳捋台灣文學 ê 發展 kap 台灣民族主義 ê 起興，按怎面對本土語言 kap 文化經過戰前、戰後國語運動 ê 挫傷？另外，台語文學對「方言文學」走脫出來，koh 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 ê 民族認同，提出啥物款 ê 反省 kap 展望？

本文首先用「戰前台語文學」ê 眼界，重新檢視台灣 tī 全球化 ê 情境當中，自 17 世紀以來對西方現代性 ê 受容、透濫 kap 實踐，並且深入討論「台灣話」ê 文學蹤跡，按怎 tī 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之下 ê 語言政治 kap 文學史敘事內底漸漸 hōng 抹除。在獨尊「國語」、貶低「方言」ê 語言政治當中，「鄉土文學」透濫、收編方言 ê 文類成規，阻礙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 ê 後殖民想像，tī 這條款條件之下所浮現 ê「台灣意識」，承認華語文學體制 ê 合法性，延續殖民者壓逼、收編本土語言 ê 語際關係，suah 來形成台灣族群 kap 民族認同 ê 矛盾。台語文學也因為按呢，tī 戰前、後斷裂 ê 歷史空縫之中重建主體性，也對台灣文學發出「再正名」ê 呼聲，替台灣文學 kap 台灣民族認同確立多元文化、互相成做主體 ê 內涵 kap 價值。

關鍵字：台灣文學史、白話字、台語文學、台灣意識、認同

摘要（華文）

1980 年代初期，受著黨外反對運動所激發的「台灣意識」，逐漸成為台灣社會推動「本土化」的基礎。在台灣這塊島嶼上所產生的文學，也終於隨著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自「鄉土文學」的前身「正名」為「台灣文學」。從日治時期開始，「語言」在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過程中成為一項充分條件，使得台灣的文學與文化實踐無不與「台語」、「台灣話」息息相關。但吊詭的是，無論是戰前的白話字文學、台灣話文運動，或是戰後經過寧靜革命，直到 1980 年代才得以發聲的台語文學，在「以台灣為中心」的台灣文學史當中，卻幾乎都被忽略、消抹。

究竟被戰後國民黨官方所改稱的閩南語，或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如何在日治以來的台灣歷史當中成為「台語」、「台灣話」？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包括台語在內的本土語言文學反而被「消音」，卻又因為「台語」的定義引發了關於族群、民族認同的矛盾與爭論，迄今仍懸而未解？本研究以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觀點，結合民族主義研究對民族認同、語言及族群文化等變項的觀察，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解構、分析與比較，梳理台灣文學的發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興起，如何面對本土語言與文化經歷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之後的挫傷？而台語文學掙脫「方言文學」以來的發展，又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的民族認同，提出了什麼樣的反省與展望？

本文首先以「戰前台語文學」的視野，重新檢視台灣在全球化的情境當中，自 17 世紀以來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揉雜與實踐，並深入探討「台灣話」的文學軌跡，如何在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下的語言政治與文學史敘事內逐漸被抹除。在獨尊「國語」、貶抑「方言」的語言政治當中，「鄉土文學」混雜、收編方言的文類成規，阻礙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的後殖民想像，在這樣的條件下所浮現的「台灣意識」，承認華語文學體制的合法性，延續了殖民者壓抑、收編本土語言的語際關係，形成台灣族群與民族認同的矛盾。台語文學亦因此在戰前、後斷裂的歷史縫隙中重建主體性，亦對台灣文學發出「再」正名的呼聲，為台灣文學與台灣民族認同確立多元文化、互為主體的內涵與價值。

關鍵字：台灣文學史、白話字、台語文學、台灣意識、認同

Abstract

In early 1980s, th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came from Tang-Wai movements had become the basis of Taiwanization in Taiwan’s society. In the narrative of Taiwanese Nationalism, the “Hsiang-tu Literature” had also been renamed as “Taiwan Literature”. All of the practices and movements about Taiwanese Literature wer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identity closely since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but the definition of languages of Taiwan Literature is still a controversial issue until nowadays. The “Taiwanese Literature” written by Chinese character and Roman alphabet was also absen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try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nd probe into Taiwan Literature by the views of Metahistory and Nationalis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Taiwanese Nationalism had grown up from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beforewar and postwar Taiwan made in Taiwan Literature differ from that made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the view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Before war”, I reflect on the acceptance, hybridity and practice of modernity with globalization of Taiwan from 17th century were absent in Taiwan literary history under KMT’s Chinese Nationalism in Post-war period. Becaus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agree with the Mandarin Movement, obstruct the development of Mother Tongue Literature. Taiwanese Literature is to try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itself, and make a multi-center for Taiwan Literature and Taiwanese Nationalism.

Keywords: History of Taiwan Literature, Church Romanization, Taiwanese Literature, Taiwanese Consciousness, Identity

被噤聲的台灣意識：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想像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一、研究動機：台灣意識的內部齟齬.....	1
二、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4
第二節 名詞界定與研究範圍	7
一、名詞界定.....	7
二、研究範圍.....	9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11
一、白話字文學研究.....	11
二、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	13
三、1980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	16
四、台語文學史的論述與建構.....	18
五、台語文學論戰研究.....	22
第四節 研究方法	24
一、後設歷史學.....	24
二、民族主義.....	27
第五節 撰寫說明	30
第二章 全球化下的台灣在地現代性：戰前台語文運動的發展	32
第一節 來自西方的曙光：清領時期白話字運動的歷史意義與文學成就 ... 34	
一、《聖經》義理跨域流動、多語譯介的語言書面化效應.....	34
二、長老教會的白話字運動與台灣社會的「前」現代經驗.....	37
三、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對話、交混與生成：清領時期白話字詩與散文....	42
第二節 被「遺忘」的傳統：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再詮釋	51
一、「等待」一個民族的誕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開展.....	51
二、各自表述下的「鄉土」：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的思索與嘗試.....	56
第三節 文學史的「新」思考：戰前台語文學的文學史意義	63

第三章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68
第一節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70
一、總督府的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化人的「方言觀」.....	70
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新、舊國語的鬥爭與本土語言的「方言」烙印.....	73
三、在有聲無聲之間：語言政治中的「雜訊」.....	77
四、在政治屋頂下建構「中國」文學：「鄉土文學」不是「方言文學」.....	80
第二節 行向「本土」：《笠》kap《台灣文藝》ê台語文學討論.....	83
一、對「台灣」文學走揣政治厝頂：《笠》kap《台灣文藝》ê本土想像.....	84
二、對「詩ê語言」發見「母語ê詩」：林宗源kap「笠」ê對話.....	87
三、「方言文學」ê命定時機：《台灣文藝》ê「前」鄉土文學到《浪淘沙》.....	93
第三節 鄉土ê侷限kap本土ê自限：若是「方言文學」成立？.....	99
第四章 差異，對立kap對話：台語文學史論ê建構kap民族想像.....	104
第一節 遺誤「鄉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ê再／誤現kap接合..	106
一、1970年代以前對「新」文學ê回顧.....	107
二、1970年代ê「鄉土文學」論述到《台灣文學史綱》.....	112
第二節 （民族）意識v.s.「民族意識」：台灣文學kap台灣民族文學...	117
一、葉石濤、陳芳明kap彭瑞金ê台灣文學論.....	117
二、胡民祥、宋澤萊kap林央敏ê台灣民族文學論.....	121
三、對台語文學論戰看1990年代ê台灣文學爭論.....	125
第三節 對噤聲到發聲：台語文學史論ê建構.....	140
一、眾聲喧嘩ê基石：台灣文學「語言」史.....	141
二、Tī「左翼」精神以外：戰前、後「台灣話」文學經驗ê重建.....	143
三、有唐山內公，koh有西洋外媽：白話字文學ê眼界.....	147
四、見證如喙ê健筆掘紙生花：台語文學史ê豐收.....	150
第四節 「台語」成做認同ê方法：台語文學史論ê民族想像.....	155
第五章 結論.....	160
參考資料.....	164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一、研究動機：台灣意識的內部齟齬

1979年12月，「美麗島事件」在台灣知識份子的心中投下了震撼彈，「台灣結」與「中國結」的拉扯，也終於揭開了1980年代初期台灣社會「本土化」運動的序幕，讓台灣這塊島嶼所孕育的文學得以在「台灣意識」的基礎上，自「鄉土文學」的前身「正名」為「台灣文學」。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作為一種晚進的概念、學科與學術體制，「台灣文學」的遲到與追認，無非是台灣曲折的歷史經驗與認同困境的體現，但「台灣文學」經歷數次論戰，時至今日仍近乎於「一個台灣，各自表述」的曖昧狀態，似乎也暗示著長久以來「定義」台灣文學背後的「認同」爭議，並沒有隨著「台灣意識」的提出而得到解決，甚至於今尚未塵埃落定。例如最近（2011年）因為作家黃春明於「百年小說研討會」中受邀以「台語文書寫與教育的商榷」為題進行演講，但內容卻引起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蔣為文高舉「台灣作家不用台灣語文卻用中國語創作，可恥！」的抗議標語爆發嚴重衝突¹，一連串關於「台灣文學是什麼？」、「用何種語言書寫的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等關於不／認同焦慮的問題，在學界與社會輿論未必能掌握問題意識與歷史脈絡，又多流於情緒的謾罵與批判之下，被粗暴地從斷裂、空白的歷史縫隙，以及族群、民族的認同夾縫中拖出來。

事實上，台灣文學的「語言」宿題自日治時期以來淵源已久，但是為什麼「台語文學」所直指的「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至今仍是台灣文學的「阿基里斯之踵」？假如台灣文學是「台灣這個島嶼所產生的文學。由出生或曾經居住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以台灣地區使用的語文來創作的文學。」²那麼「台語」的文學實踐為什麼會一再被「商榷」，甚而誘發劇烈的認同焦慮與攻訐？

這些問題，也許必須從台語文學的發展開始談起。台語文學的起源，可追溯至明鄭、清領時期古典文學的引進，以及民間文學如神話、傳說、寓言、笑話、俗諺、褒歌、童謠等諸多原為口頭流傳，後以漢字書寫、紀錄的文本；另一方面，隨著西方基督教東來，教會羅馬字／白話字(Church Romanization; Pêh-oē-jī)³書寫

¹ 目前對於此事件尚無約定俗成之定稱，筆者發表相關論述慣稱為「蔣黃事件」，於後沿用。

² 莊萬壽等編，《台灣的文學》（台北：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頁9。

³ 「白話字」是一種以24個羅馬字母輔以變音符號（調號）拼寫台語（實際上亦適用於台灣各族群語言）的書寫系統，為19世紀時基督教長老教會前往中國福建、廈門等地傳教，以閩南語、廈門話為基礎而創設、推行的拼音文字。為了與文言文書面語的「孔子字」以及中國白話文書面語的「唐人字」有所區分，並因其更接近白話口語而稱為「白話字」。參考李勤岸，台灣教會公

系統亦早已於荷西時期引進台灣，並於清領時期隨著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發展，刊行台灣最早的報紙《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台灣府城教會報），為白話字文學埋下種籽。日治時期，蔡培火大力推行白話字，並透過台灣文化協會之力，舉辦羅馬字講習會，著有《十巷管見》並寫〈白話字歌〉，致力於教育與文化的普及；面對中國白話文的「言文一致」，黃石輝以台灣的語言現實，呼籲以「台灣話」創作台灣文學，得到郭秋生的支持，與中國話文論者發生「台灣話文論戰」。⁴白話字文學的發展，則已出現如鄭溪泮、賴仁聲等白話字作家出版小說著作。然而隨著國際局勢升溫，戰間期皇民化運動的緊縮，以及戰後國民政府實施「國語政策」，台語文學陷入一段沈滯的黑暗期。直到 1960 年代，林宗源開始思索方言（母語）入詩的可能性，進一步主張以方言寫詩，1976 年向陽（林淇養）投身「方言詩」的寫作，才陸續開啟了戰後台語文學發展的契機。到 1980 年代，台語文學自依附於「國語」的「方言文學」自我正名，正式進入「台語文學」運動期，解嚴後則有更多作家、學者加入台語文學的行列，甚至引起反對台語文學的評難，於 1989 年發生「台語文學論戰」。因此，台語文學可以說是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相當重要，運動性格也相對強烈的一條脈絡。

可是，無論是戰前或戰後，這些以「台語」為之的文學創作或運動背後的語文現實，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卻幾乎都被「噤聲」。例如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是第一本台灣文學史論著，同時也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論述的階段性積累，雖然提到了台灣話文運動，但卻用「台灣重回中國版圖，此一問題也就不復有意義了。」⁵將台灣新文學的發展收編回中國五四文學的傳統當中，無意闡述台灣話文的時代意義。其後，《台灣文學史綱》於 1987 年舉起台灣意識的大旗問世，不過，面對黃石輝、郭秋生主張台灣話文、提倡鄉土文學，當時的葉石濤卻認為是「歷史性的權宜措施」⁶，又或許囿於戒嚴所限與文本所見，1980 年代篇幅不多，台語文學的缺席也自然可以想見。⁷繼葉石濤之後，曾經參與台語文學論戰的彭瑞金，雖於台語文學論戰中就台語文學論述提出許多疑慮，但彭瑞金認為「八〇年代強勢的母語文學運動實際上是應運著台灣文學的自主性、本土化之台灣意識的覺醒成長運動而產生的。」⁸並將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以降，包括 1960 年代方言文學的嘗試到 1980 年代台語文學運動，視為台灣文學語言的思考

報（1895-1969）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網址：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bout-2.htm>，使用日期：2012.02.26。

⁴ 為了與戰後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區別，後稱台灣話文論戰。

⁵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1981.11），頁 75。

⁶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7.10），頁 27。

⁷ 但這並不代表葉石濤對台語或母語文學的認識始終停滯於《史綱》的書寫階段，例如葉石濤後來認為原住民或河洛、客家母語文學，縱使在標音技術與溝通方面容易造成困難，但「創作語文在台灣，不管是中國白話文、原住民母語或台語文，應該享有平等地位才是」，並以中國白話文與古文為「公用語文」。參見〈台灣文學的多種族課題〉，收錄於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1998），頁 10。關於葉石濤「台灣意識」的精神史變遷，以及其後台灣文學史敘事的建構問題，後文將再詳細討論。

⁸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頁 221。

與實踐，實為對台語、母語文學的初步認識與肯定。最近，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⁹則結合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後設歷史學」與弗萊(Northrop Frye)的「神話原型文學批評論」，將台語作家林宗源、陳金順、方耀乾的文學成就視為台灣文學「新傳奇文學」時代的到臨，可以說是在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之後，第一部跨越語言的隔閡審視文學作品藝術性的台灣文學史論著。

乍看之下，台語文學似乎就要逐漸從被噤言的歷史中「發聲」了。但陳芳明自1998年開始於《聯合文學》連載，在「建國百年」這個頗具民族想像意義的時間點上終於集結出版的《台灣新文學史》，卻沒有延續彭瑞金對日治時期台灣話文到戰後台語文學運動的評價。其標榜將國民政府視為再殖民政權的「後殖民」史觀，雖然於連載期間引起陳映真的指控，認為其「多語言文學」包藏「台獨」禍心，但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對「再殖民」時期的反省，事實上完全忽略了1980年代台語文運動、客家族群的「還我客語」運動，以及原住民族群一系列的社會抗爭與文化復振。其「後殖民」精神，不見對華語做為國語，透過教育、文化進行內部殖民時，戕害其他族群文化造成的批判與檢討，台語、母語文學自然也被遺忘在其後殖民的反省之外，仍舊失聲於戰後邊緣聲音的合鳴當中。

至於中國學者撰寫的台灣文學史論，不出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與「祖國」之間的「五四」臍帶，以及戰後重回祖國懷抱的「中國文學在台灣」史觀，抹除台灣文學主體性，對台語文學的批判更是不遺餘力。例如劉登翰《台灣文學史》對台語文學的評價看似溫和，但卻是基於「方言詩」為詩歌加強「現實性」、並能拉近與群眾的距離而立論¹⁰；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則指摘1970年代後以「台灣意識」為基礎，由自主化、本土化到「文學台獨」的發展趨向¹¹；趙遐秋、呂正惠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和陳映真觀點相同，認為將台灣文學稱為「多語言」的文學是企圖扭曲台語，將原本屬於漢語方言的台灣話說成「獨立的民族語言」，對於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的歷史詮釋，以及戰後台語文運動均加以大肆撻伐¹²，當然，戰前白話字文學的發展於上述所有文學史中均付之闕如。

台語文學的台灣意識為中國立場的文學史敘事所不容，固然可以想像，然而我們要追問的是：儘管「台灣文學」在各種意識型態之下有不同的內涵與意義，但在「台灣意識」的基礎之上而成立的「台灣文學」當中，為何不見、不容台語，

⁹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印刻，2011.03)。

¹⁰ 該章節撰寫人為朱雙一，其對「方言詩」的說明如下：「增加作品的鄉土氣息、生活情調、時空背景的臨場感，凸顯下層社會思想感情特徵及鄉村文化靈魂方面，有獨到之處，大多具有明顯的寫實風格。」，參見劉登翰等編，《台灣文學史》下卷(中國福建：海峽文藝，1993.01)，頁620。

¹¹ 古繼堂雖未點名台語文學，但由「閩南語是中國方言的一部分，還是『獨立』的台語？」此一提問，仍可看出古對文學台獨的批判亦包括台語文學的討論。參見古繼堂，《簡明台灣文學史》(台北：人間，2003)，頁553。

¹² 趙遐秋、呂正惠，《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2002)，頁456-480。同文少許增補後收錄於曾慶瑞、趙遐秋，《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2003)，頁225-255。

甚至是客語、原住民語文學？在書面化的技術問題之外，「台語文學」幾乎被台灣文學史論「孤立」而「獨立」（或者因「獨立」而被「孤立」），卻又在「缺席」的狀態下被批判、收編的矛盾當中，是否更突顯了台灣在複雜的政治、社會與歷史情境中所產生的「台灣意識」，事實上仍存在著許多內部衝突或矛盾，而在定義「台灣」，思索文學語言「表現形式」的過程中形成當前的齟齬與困局？

本研究的動機，即是希望能深入了解這個現象，尋找問題的根源。透過梳理台語之所以為「台語」，以及台語書面化、追逐文學的歷史，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分析、比較與解構。思索這股被消抹的聲音如何隱喻台灣文學史論的敘事策略和意識型態，而台語文學真正的命題，也就是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背後所指涉的國家、民族認同，可能面對什麼樣的困境。藉此對台灣文學的主體性，以及台語／姆語文學運動的未來發展，提出反思與展望。

二、問題意識：台灣文學「再」正名

如果是單純以文學藝術的眼光，就作品的質量來評斷作家與文本的歷史地位，那麼文學史的書寫理應隨著文本、史料的出土進行考訂與增補。但台語文學並沒有伴隨著戰前、後的台語文運動、文學創作、文本出土與學術研究的積累，而在台灣文學史當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因此，台語文學的消音，顯然並不是文學「知識論」的缺陷或空白，借用帕特遜(Lee Patterson)「文學史的歷史」(History of Literary History)的觀念來看，或許這背後牽涉到的是「文學的歷史」(Literary History)如何被書寫、建構的問題。¹³面對「歷史」，詹京斯(Keith Jenkins)認為：

歷史是一種移動的、有問題的論述。表面上，他是關於世界的一個面向——過去。它是由一群具有當下心態的工作者（在我們的文化中，絕大部分的這些工作者都受薪）所創造。他們在工作中採互相可以辨認的方式——在認識論、方法論、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上都有其一定的立場。而他們的作品一旦流傳出來，便可能遭致一連串的被使用和濫用，這些使用和濫用在邏輯上是無窮的，但在實際上通常與一系列任何時刻都存在的權力基礎相對應，並且沿著一種從支配一切到無關緊要的光譜，建構並散布各種歷史的意義。¹⁴

詹京斯拋出「歷史是為了誰」的提問來定義歷史，其實已明白指出在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的過程當中，牽涉到歷史對不同群體的意義及其衍生的被／支配的衝突，而這場「追認過去」的意識形態鬥爭，又與「權力」息息相關。

¹³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 341。

¹⁴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2011.10），頁 120-121。

文史學研究者戴燕也以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概念，如是詮釋文學史的性質：

文學是文化的一部分，是民族精神的反映，當文學與一個有著地域邊界的民族國家聯繫起來，這時候，一個被賦予了民族精神和靈魂的國家形象，便在人們的想像之間清晰起來。文學史是借著科學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對民族精神的一種塑造，目的在於激發愛國情感和民族主義……¹⁵

回顧歷來台灣文學史的書寫，無論是企圖抗拒島田謹二「外地文學論」及皇民化運動收編的黃得時¹⁶，抑或是以黃得時的文學史論為底本，書史於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時下的陳少廷，以及在鄉土文學論戰之時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擅長「台灣意識」的葉石濤，都一再呈現上述所謂「文學史書寫」作為建構或追索民族身份之目的與性質。由此可見，文學史在成為一門「學科」之後，和歷史一樣，在教育體制中具備讓受教者產生歷史時間感，並激發其理解自我與他人有著共同承擔歷史記憶、文化的共同體意識與責任的功能，在國家意識與民族想像的建構工程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然而對台灣而言，台灣人由殖民經驗嫁接而成的歷史記憶，以及多元的族群文化所形構而成的「身份」本身即存在許多層次，且各種不同的身份仍有分殊、甚至衝突的可能。再加上台灣人在無論是在戰前或戰後，對認同的追索與探求都經常為國家機器所壓抑或主導，這股蟄伏於歷史經驗中尋找「台灣主體性」，甚或追問「台灣人」民族身份的焦慮與衝動，往往在政治、文化、文學各場域之中程度不一地冒現。也因此，即使在「台灣文學」的名稱普遍被接受之後，台灣人身份認同與民族想像的焦慮與衝突，並沒有隨著台灣文學的提出而被消解，「台灣文學」也因而「再次」引起台語文學運動的正名，甚至進一步提出更為尖銳的質問與挑戰。例如林宗源以「正統論」跨越時空回應 1981 年詹宏志「邊疆文學」的憂慮，認為：

台灣文學予人當作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看作是邊疆文學，甚至講是鄉土文學，深深仔想，攞是台灣作家家己惹的罪孽。(台灣作家)……講的攞是三天地外的中國遺產，寫的攞是半仿仔的北京話，莫怪予人準做是邊疆文學……

¹⁵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2.03)，頁 2。

¹⁶ 如蔡美俐所言：「黃得時在戰鼓聲中建立的以『台灣』為主體的文學史，其抗拒的對象不僅是島田謹二，也不在於島田的文學史論述是不是有提到皇民化議題，黃得時書寫台灣文學史的意義在於，他徹底翻轉了殖民者企圖將台灣文學邊緣化，並以其南方文學的特殊性貢獻中央文壇、創設新日本文化的策略。」蔡美俐，《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07)，頁 93。

現時台灣的文學，最重要的課題，是建立家己的語言及文字。咱愛知影台灣話，不管是閩南話、客話、原住民的語言，攞有家己的完整的語言結構。不是方言，及北平話平大，所以不通自卑。……

假設你用台灣北京話來寫真順手，你已經不是咧寫台灣文學了……¹⁷

亦即林宗源認為台灣文學無法脫離中國文學而具備主體性，是由於缺乏自己的「語言」與「文字」所造成。而文中對「台灣北京話」的批判，更引起廖咸浩「準民族主義」之虞，點燃台語文學論戰的狼煙。論戰過程中，林央敏以「台語文學代表台灣文學」的「代表論」，對「台灣文學」的指稱實為「台灣華文文學」的現象提出批判¹⁸，引發李喬、彭瑞金「點燃語言炸彈」的反擊，以及陳若曦「台語文學要不得」之回應。可見，從台語文學論戰至「蔣黃事件」，台語文學的正名與發展，或許並不像宋澤萊所說的「由『鄉土文學』變成『台灣文學』，再閩變做『台語文學』」那麼的「自然」。¹⁹

從文學的「歷史」、文學史的特殊性，到文學史中刻意地「被缺席」，我們可以發現：台灣文學場域頻頻出現以「語言」與「文字」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論戰傳統」，但是文學史敘事卻有意無意忽略了這些雜音，台語文學，台灣話／台語文學論述所表述的「台灣意識」強度也因此越來越高，越來越激進。如果對台灣文學而言，使用本土語言進行文學創作有完全的正當性，「台語文學是台灣文學」的說法也毋庸置疑，那麼為什麼台語、母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卻經常被忽略、消音，甚至成為相對於台灣文學的「他者」(the other)幽靈？文學史論排除了民族認同的語言條件，到底是換來了族群之間使用「共同語」的和諧？或者排除語言條件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場語言認同的收編與鬥爭，而制度的暴力與傷害至今猶存？這些問題，對於理解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語言衝突來說相當重要，但是台灣文學場域除了霸權、沙文主義的指控之外，似乎仍未見理性、縝密的深入討論。

要強調的是，筆者並不認為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就要先完全肯定或同意台語文學的運動策略，或文飾台語、母語文學在書寫技術上猶待解決的困境。但相反地，如果要討論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我們就不能不回到歷史脈絡中，重新思考台灣的族群、社會、政治與台灣文學語文爭論的關聯。尤其是戰後「國語

¹⁷ 林宗源，〈代序Ⅱ 沉思及反省（二）〉，《林宗源台語詩選》（台北：自立晚報，1988.08），頁 13。

¹⁸ 林央敏雖然提到林宗源的「正統論」惹來「大賀佬主義」、「賀佬沙文主義」，但其「代表論」基本上還是以林宗源的說法修正而來。林央敏認為，「台語文學代表台灣文學」可以成立的理由在於：「代表論」可以同時滿足廣義（台灣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的指涉，亦能兼顧自然形成、以多代全的狹義「台語」的合理性。參見林央敏，〈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前衛，1997.11），頁 125-136。

¹⁹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台灣新文化》5 期，1987.01，頁 40。

政策」對本土語言、文化造成的挫傷尚去不遠，假如論者有意無意忽略了台灣文學史上的語文論戰與文學實踐，以去歷史，甚至去政治脈絡的方式討論語文衝突，不但無法理解為什麼類似的爭論會在台灣斷裂的歷史經驗中重複上演，更無法從中借鑒，開拓台灣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視野。

是以本研究著眼於「文學『歷史』文本的書寫」，「語言與民族認同」兩大面向，以「新歷史主義」的「後設史學」觀點與「民族主義」為思考途徑，重新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就上述提問確立下列問題意識：

1. 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包括自清領時期即開始發展，但至今仍鮮少為台灣文學研究所注重的白話字文學，以及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論述與文學實踐，在台灣文學史當中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歷史意義？
2. 與戰前斷裂的戰後台語文運動，是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發生？對「台灣意識」的共時性思索與詮釋是什麼？
3. 台語文學為什麼要提出台灣文學的「再」正名，又為何引發論戰？「台語文學論戰」突顯了「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什麼樣的內部矛盾或差異？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的發想，本研究希望藉由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觀察論戰前後台灣文學史論的建構與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係，以期在文學史當中，重新安放台語，乃至於母語文學的「聲音」，找回台灣文學的「眾聲喧嘩」。

第二節 名詞界定與研究範圍

一、名詞界定

(一) 「台語」的爭議與「台語文學」的定義

1980 年代解嚴後，本土化運動激發了台灣多元族群對主體性的追求，卻也使得「台語」或「台灣話」的名稱，在客家、原住民族群之間引起緊張與焦慮，咸認為使用「台語」有壟斷「台灣語言」甚或「台灣意識」的詮釋權，成為「閩南／福佬沙文主義」之虞。事實上，日治時期「台灣話」所指稱的語言，即是以福建漳泉移民為主體而形成的本土語言，來到戰後成為官方所稱的閩南語，與客家族群所稱的福佬／鶴佬／河洛話。由於過去台語文運動所指涉的「台語」，向來有以「廣義」區分台語、客語、原住民語等本土語言，而以「狹義」專指台灣閩南語的說法。²⁰本研究則援引洪惟仁、蔣為文等對「台語」及「台灣語言」的

²⁰ 例如洪惟仁認為，「廣義」的台語應包括台灣各種語言，有 Ho-lo 話、客家話、山地話及台北國語／華語，「狹義」的台語則專指 Ho-lo 話，也提出前者為「台灣語言」(languages in Taiwan)，

界定，以「台語」稱「台灣閩南語／福佬話／河洛話」（引用其他論者的稱呼時不改動），「台灣話」則是沿用日治時期以降自然形成對「台語」的稱呼，在日治時期的討論中，二者可交互使用。過去以「廣義」台語所指稱的「台灣閩南語、台灣客家語、台灣原住民語」在此作「台灣語言」²¹，不再以廣狹區分。但如果必須沿用廣義狹義的語境討論台語時，本研究則以「Ho-lo 話／語（族）」區別。

此外，雖然台語的英譯目前仍有許多爭議，但無論以 Hokkien 或 Southern Min 稱之，都無法明確指涉台語／台灣話此一稱謂有其自然形成的歷史脈絡、主體性及約定俗成的基礎。筆者亦認為，Ho-lo 語被稱為「台語」，實是突顯在戰前、後的語言政治當中，相對於國語多數優勢與本土語言少數弱勢的「多數弱勢」狀態，這個相對位置不斷刺激文學語言議題的反抗能動性，有其積極意義。故本研究援用前行研究基礎稱為 Taiwanese Literature，台灣文學則為 Taiwan Literature。²²

由於過去對「台語」的定義有所爭議，歷史上關於「台語文學」的指稱也有些許差異。例如宋澤萊認為：「只有揭掉了壟罩在母語上頭的那層外來語的遮羞布，單純只用台語來敘述，單純只用台語來對白，單純只用台語來思考，單純只用台語來表意，完全不受外語支配，如此的文學才是台語文學。」²³，然而參其語意，宋澤萊的「台語」文學實際指涉的概念類似與「外來語」對立的「母語」、「本土語言」文學。又如方耀乾認為「用台語思考並且用台語話文書寫系統所書寫 ê 文學就是台語文學」²⁴則是明確指稱 Ho-lo 語文學而言。林央敏的定義則較嚴格，且具有民族文學的特徵，認為台語文學不包括自古至今福建人以漳泉廈等閩南語寫的作品，也不包括任何不是出自台語思考所寫的漢語文言文作品，必須是「在台灣生長的具台灣地籍的人」以台語思考，敘述也必須以台語呈現，才能視為台語小說／文學。至於日治時期對話中使用台語的小說，因為難以界定是否以台語思考，尚不能算是台語小說。²⁵可見台語文學的界定並不容易，不僅要斟酌作者的出身並確認其思考、使用的語言，就漢文言文文學而言，更難以斷定是否歸屬於台語文學。²⁶因此，本研究界定的「台語文學」是以「台灣閩南語／福佬

後者是「台灣話」(Taiwanese)的區別。洪惟仁，〈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1992.02)，頁 16-17。

²¹ 蔣為文，〈「台灣話」意識 ê 形成 kap 伊正當性 ê 辯證〉，《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2007.06)，頁 179-193。

²² 然而名稱方面目前仍相當混亂，如「國立台灣文學館」的英譯就同時有 National Museum of Taiwan/Taiwanese Literature，此種現象甚至泛見於各台文相關系所與研討會之命名。

²³ 宋澤萊，〈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台灣新文學》10 期，1998.10，頁 263。

²⁴ 方耀乾，〈Ü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頁 164；《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高雄：台灣文叢，2012.06)，頁 15。

²⁵ 林央敏，〈台語小說的發展及作品總評(一)〉，《海翁台語文學》114 期，2011.06，頁 8-11。

²⁶ 方耀乾主張從廣義的「書寫」角度看來，只要是以台語思考並用台語書寫系統創作者，漢文言文文學與白話文學應該都可視為台語文學，然而就狹義的「口語」而言，將漢文言文文學歸於台語文學過於牽強。但是洪惟仁認為，漢文言文文學並沒有一定的語音規範，各國均能以自有的漢字音

語／河洛話」之書面語文學而論，但暫不觸及漢文言文學與民間文學。除了以台語試讀之外，如果作者有相關論述或表態，亦作為判斷是否歸類為台語書寫／文學的條件。

（二）台灣意識

1980年代初，「台灣意識」儼然成為台灣社會本土化運動開展之後，輻散於文學、文化、歷史、政治場域的關鍵詞。甚早提出台灣文學「本土論」的研究者游勝冠認為，「台灣意識」是先由「社會意識」的自覺，意識到自己與所身處的「台灣」社會所產生的歷史文化傳統之一部份，並興起認同、繼承、發揚這個傳統的「歷史、文化意識形態」後，所形成的信仰與具有行動性的「民族主義、政治主張的意識型態」。²⁷或者一言以蔽之，「台灣意識」就是「感覺到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being Taiwanese)，亦即「台灣認同」或是「台灣人認同」(Taiwanese identity)的表述，但也正如施正鋒所提醒，這種集體認同其實是多面向、多層次的，也往往因為時空的推移，以及各種因素的交互作用，而產生片段的、選擇性的詮釋，可能是族群意識、(附屬於中國的)地方意識，或者與中國意識互相排斥的台灣民族意識。²⁸本研究以「台灣意識」為題，大致同意游勝冠的觀點，並將這種集體認同視為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民族」意識。

不過，針對游勝冠判定本土論「排他性」的原則對台灣各種主體性表述可能產生的影響，筆者暫持保留的態度與對話的空間。首先，游勝冠指出干擾或支配台灣文學的「中國」一詞，因國共對立而分為兩個不同的意義：對外，台灣反對中共的支配；對內，則是反對國民黨正統論與統派吸力的兩岸統一立場。但游勝冠認為，國民黨雖在政策上主張統一，卻也正視了台灣實際上無力統一中國的現實，帶領台灣往反中國統一方向前進，所以「中共政權」才是妨礙台灣獨立自主化的「中國立場」，故不能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中國立場」來確認本土論的「排他性」。同時，也因為在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下反對意見難以表達，所以唯有反中共因素左右台灣的宣示，才能被認定為是本土論的「排他性」。²⁹另外，游勝冠將解嚴後的台獨意識形態分為「台灣人論」與「台灣民族論」，咸認為前者是將國民黨的中國立場視為壟斷在台灣內部的利益而已，本質還是抗拒與中國統一，所以「台灣人論」是改革舊體制，建立相對於「中國」的獨立國家路線；「台灣

讀出，並以日人漢詩不被列為日本語文學為例。另一方面，漢文言文學在台灣亦不限定只能以台語理解，現代中文也能使用「孔子白」來讀，因此洪惟仁以「口語」要求考量，反對將漢文言文學歸入台語文學。方耀乾，《Ù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頁 172；洪惟仁，〈台語文學个分類與分期（上）（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1 期，2010.05，頁 19。

²⁷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04），頁 6。

²⁸ 施正鋒，〈台灣意識的探索〉，收錄於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1999.06），頁 58。

²⁹ 同註 27，頁 7。

民族論」則是將台灣內部的國民黨視為外敵代理人，將外在的壓迫施加在台灣內部的矛盾之上，製造了社會的緊張與對立，相對於此，「焦點擺在反中共的台灣人論則較具包容性。」³⁰

游勝冠之如此區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論」與「中國國民黨的正統論」，無非是顧慮到漢民族在移民過程中，在原鄉「中國」與異鄉「台灣」之間所產生的「中國—台灣」重疊認同，並尊重任何主體性表述與轉向的可能性，詳加界定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挪用「漢民族」作為政治與文化認同的目的。但是，在期望本土論走向「多元主體論」之前，倘若「將國民黨視為排除對象」的本土論價值觀尚未被釐清³¹，而又以「反中共的台灣人論較具包容性」一句褒貶，論者是否能深入梳理、批判國民黨威權統治對台灣意識的戕害或影響，進一步解開「台灣結」與「中國結」的認同糾葛，真正展現「後殖民」的批判力道？更何況，即使對於將國民黨視為外來政權的「再殖民」，或台灣是否已經進入「後殖民」有不同的看法，「台語文學」的爭論，以及後來和語言相關的各種認同表意，無不與台灣戰前的政治、社會發展，以及戰後國民黨實施世界上最長時間的戒嚴在台灣，甚至解嚴後經歷兩次政黨輪替的變化密切相關。

因此，本研究在游勝冠對「台灣意識」的定義及其關於台灣文學本土論的研究基礎之上，重新思索以「台灣」為主體的民族想像，在複雜的歷史、政治、族群與社會變遷當中，如何透過文學語言的選擇與實踐，以及台灣文學定義、正名的爭議表現出來，回應台灣文化遭逢壓迫、同化，甚至消滅主體性的危機，以及這些主體性論述背後真正的認同欲求、焦慮與困境。

二、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台語文學的發展分為戰前與戰後，戰前以台灣羅馬字經驗的史前史及 1885 年《TÂI-OÂN HŪ-SIÂⁿ KÀU-HOĒ-PÒ》的刊行為始，截至 1945 年殖民統治結束；戰後則以 1945 年開始，梳理各時期的台灣文學史論，並以 1980 年代迄今的台語文運動、論戰為主。整體研究進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處理戰前清領時期白話字文學文本，包括詩、散文與文化論述於台灣文學史論的空白，並加入羅馬字／白話字運動的視野，重新梳理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論戰相關史料，理解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脈絡及意義。

第二階段以戰後台灣文學發展涉及方言、台語文學的重要討論為主軸，勾勒

³⁰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236。

³¹ 例如游勝冠認為，台灣民族概念的提出是為了抵抗「統派」將台灣的漢族認同轉化為「中華民族意識」。然而從台語文學論戰的論點來看，其中不乏有「獨派」之間的爭論。同上註，頁 363。

出戰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輪廓，包括鄉土文學論戰的「方言」問題、《笠》與《台灣文藝》的「方言入詩」作品及大河小說論述等相關史料、散論與研究，釐清「台語文學論戰」發生的前脈絡。

第三階段則就戰前前後台灣文學史論對日治時期「新」文學的再／誤現與戰後經驗的接合(articulation)，探討台灣文學史建構過程中所凝聚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文學如何面對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進而引發台語文學論戰。最後，整理台語文學史論在論戰過後的建構發展，對台灣文學史論提出反思與展望。

第三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本研究欲藉由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與史論建構，進而與台灣文學史論進行比較，了解台語文學於台灣文學史中被抹消的原因，大抵觸及戰前台語文學（包括清領後期以來教會羅馬字／白話字的文學創作與文化論述、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台灣話主張）以及戰後（1980年代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與史論建構，並比較、分析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史論再現的敘事差異。因此，對前行研究的梳理可依問題意識分為「白話字文學研究」、「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1980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台語文學史論的論述與建構」與「台語文學論戰研究」等面向。

一、白話字文學研究

《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台灣府城教會報）自 1885 年開辦即持續刊行迄今，雖有兩次停刊，其「長壽」卻幾乎見證了台灣近 120 餘年，經歷清領、日治與戰後的歷史變遷，理當為台灣學研究不可忽視的重要文獻，但

《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與白話字文獻卻多因閱讀隔閡與宗教性質而常為學界所忽略。呂興昌即以〈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一文提示該報研究的意義和可能性，亦揭櫫「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似乎應該提早三十多年：它可能不是出現於二十世紀的二〇年代，而是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八〇年代。」³²的文學史觀點，開啟了戰後白話字文獻整理、研究的新頁。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則是首篇討論《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的歷史定位，並大量運用該報白話字史料進行台語文學研究的學位論文，自台灣使用白話字的歷史來證成《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的文獻意義與價值，就報中內容進行分類與整理，更以《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為台語文學的發展定錨，梳理台語白話文學比台灣話文論戰之濫觴還要更早的發展軌跡，對台灣白話文學運動的史觀提出反思。另一方面，黃佳惠也提出了白話字文學難以進入台灣新文

³² 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1995），頁 459。

學系譜的可能原因³³，在白話字文學研究的開拓之外，黃論不但有其先驅意義，亦留下可供深論的線索與空間。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 為中心》³⁴展現運用教會白話字史料，重構台灣文明觀、近代化論述的嘗試，指出《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在台灣不但嫁接了 16、17 世紀歐洲活字印刷術所引發的宗教、語文改革與知識普及的經驗，更讓一般民眾在漢字之外，能有其他語文工具接觸近代文明，並形成使用白話字的社群。陳慕真雖未能再對《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與白話字文本被忽略的原因進行追論，但由近代化的思考確立、深化《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與白話字文學於文學史上的重要性，亦可謂白話字文學的指標研究。

李勤岸自 2007 年起執行「台灣教會公報 (1895-1969) 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費時三年建立「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是白話字史料與文本以數位方式再出土、推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白話字文學—台灣文化 kap 語言、文學 ê 互動》一書，則是在此資料庫的基礎之上提出全面性論述，以及運用語料庫語言學、文化語言學進行語言、文學與文化跨領域研究的成果。其中，〈白話字文學中的文化現代性〉³⁵一文以語料庫統計、分析白話字文學作品當中的現代化詞彙，透視台灣接收現代性的歷史進程與文化變遷。此文以語料證成白話字文學與台灣現代性發展的關聯，但是另一方面，這篇論文卻同時暗示了白話字文學在研究場域所面臨的矛盾：何以白話字文學消失在台灣文學的現代性論述當中？由上可見，白話字史料與文本於文學、文化、歷史、語言學研究均有不容忽視的學術價值，亦是重要的研究基礎，然而就文學研究而言，白話字在台灣文學場域所遭遇的結構性困境尚未解決，遂然成為本研究主要的問題意識之一。

不同於白話字文學的專論，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³⁶開拓了不同的學術視野，提出日治時期在白話字與漢字「兩個傳統」下形成的「三種小說」：白話字小說、漢字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認為日治時期以「台語」作為文學語言，一方面有白話字小說呈現民族主義、社會主義之外的宗教精神與大眾關懷；另一

³³ 黃佳惠認為，相對於台灣新文學強烈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啟蒙趨向，白話字文學反日的色彩較不明顯，可能由於《台灣府城教會報》並非文藝雜誌，亦不強調文學作品，即使有文藝作品發表，其政治色彩亦不明顯。此外，台灣因天津條約開放傳教後，一般漢人有仇教心態，但清廷並未積極處理，又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對基督教會教為寬容，教政關係較良好，因此來自教會的批判較少，教會內部也可能因「外國教」屬性，或信教者的利益目的招致非信教者的仇視，而使得教會與外界產生隔離。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142。

³⁴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 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³⁵ 李勤岸，〈白話字文學中的文化現代性〉，《白話字文學—台灣文化 kap 語言、文學 ê 互動》(台南：開朗雜誌，2010.09)，頁 121-152。

³⁶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方面，漢字傳統小說與現代小說雖然因語文轉換的障礙而產出無多，但在台灣話文與中國白話文的拉扯之間，仍留有極富時代意義的作品，不同的文字載體透過語言完成在地化(localization)，共同呈現追求「台灣主體性」的目標。本文藉由召喚白話字與漢字台語文本的共時性，重建日治時期「台語」文學實踐的主體全貌，更進一步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揭櫫台語文學的重要性。

單篇論文方面，如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³⁷將台灣的白話字歷史與西歐地方母語對拉丁語的反動接軌，在世界文學的脈動下，提出白話字文學對台灣新文學開展的影響，並針對漢字觀點下的新文學認識論提出批判；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 ê 存在〉³⁸則就台灣文學史對白話字文學及戰後台語文運動的視而不見提出檢討；王昭文〈羅馬字與「文明化」——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³⁹的取徑，則是將羅馬字視為反殖民統治運動的一環，分析羅馬字在台灣人追求「文明化」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上述論文對白話字文學的發展概況，以及日治時期羅馬字運動的歷史梳理，皆有助於由運動論述的層次重新思考羅馬字運動、台灣話文理論及論戰的文學史意義。本研究亦將繼續延伸呂美親結合白話字傳統與漢字傳統的視野所提出的日治甚至戰前視野，深化台語文學的討論，並由「接受史」的觀點展開這一場與「台灣文學史」的對話。

二、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

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研究的學位論文，以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為一經典。陳論以投身台灣話文論戰的運動者們的政治思想，切入與社會運動同樣發軔於「民族主義」進路的台灣話文論戰，說明「祖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所想像的「大眾」，分別形成了「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主張，然而在文學創作的實踐上，正反雙方以「敘述以中國白話文為主體，對話用台灣話文」的趨勢交集，並在「抗日」與「文藝大眾化」的共識上形成聯合陣線。⁴⁰陳論對正反雙方論點提出客觀、細緻的析論和比較，並詳論論戰的發展意義，至今仍是了解台灣話文論戰的重要研究。不過，陳淑容認為在論戰之外如蔡培火所主張的羅馬字運動，以及連溫卿⁴¹、連雅堂提倡的台灣話保存

³⁷ 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收錄於《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2004.10），頁 8 之 1-8 之 14。

³⁸ 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 ê 存在〉，同上註，頁 9 之 1-9 之 17。

³⁹ 王昭文，〈羅馬字與「文明化」——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收錄於《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2004.10），頁 27 之 1-27 之 10。

⁴⁰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頁 164-165。

⁴¹ 值得注意的是，連溫卿曾響應「世界語」(Esperanto)運動，並加入日人兒玉四郎來台所創「日本 Esp (世界語)協會台灣支部」，1918 年主編該會的機關刊物《綠蔭》(Verda Ombro)。連氏雖然並非完全以台灣話為主體，但其世界語運動及台灣話主張不無關聯。參考呂美親，《日本時代

運動並沒有太大迴響，可能是著眼於論戰場域內而產生的限制。以致於較難以全面觀照論戰內外以台灣話／台語為中心的各種思考及其主體性與能動性。

至近，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提出更為全面的剖析。橫路啟子由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延伸出「漢語文化圈」的討論框架，認為：

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本島中，人們以漢族血統為民族認同的原則，將以漢字來讀寫、對其文化活動的建構有所參與或能夠參與的人所建構的想像共同體稱作「漢語文化圈」。漢語包含文言文、台灣話以及中國白話文等漢語系統的所有文字。⁴²

「漢語文化圈」的概念讓台灣話文論戰出現更多層次：一是台灣人透過漢民族的身份認同以及漢語文字的使用進行抵殖民的實踐，卻又在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選擇上出現分殊的矛盾；二是漢語文化圈內受到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的影響而產生界線，加上來自圈外日語作家的參與，而使得「鄉土」在地域、思潮、語文等因素的交錯指涉下出現多重意義，也致使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與日文，在不同的「大眾」想像之間拉鋸，最後凝聚出對「鄉土色彩」的一致追求與語文書寫的折衷實踐。除此之外，橫路啟子也深刻地指出，過去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線性史觀，以現今在台灣使用的「國語」為進化最終目標⁴³，由日治時期「台語」現實出發，橫路啟子進而關注到獻身建設台灣話文的知識分子們遺忘母語的焦慮，有助於重構論戰中以台語為中心進行論述的主體性，並重新理解論戰於台灣文學、台語文學史論脈絡下的發展意義。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⁴⁴則是將「文學現代性」視為「鄉土文學」得以存在的前提，認為台灣文學發展歷程中關於「鄉土」的辯證，其實是面對「他者」(the other)時，如何回歸「地方」界定自我，並與「現代性」互相協商、融合，進而批判性吸收的過程。所以「鄉土文學」是面對新舊文學以降以中國白話文為標準，以西方文學的進步時間感為目標的白話文運動之反動，並追求以台灣為主體，透過台灣話的使用以創造貼近庶民大眾的新文學。此外，林氏認為台灣話文運動雖然失敗，但仍然催生了以口語、對話表現台灣話文的形式，也更細緻地創造了一種「台灣式的中國白話文」，並開拓台

台語小說研究》，頁 5。

⁴² 橫路啟子，《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之歷史析論》(台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後出版為專書《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台北：聯合文學，2009.10)，頁 31。

⁴³ 同上註，頁 32。

⁴⁴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灣文學後續將「鄉土」視為文學表現內容的趨向與「特殊性」的討論⁴⁵，更間接影響了歌謠的收集，從民間文學與風土勾勒台灣「民族」的想像輪廓。⁴⁶

林淇養〈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形態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傳播策略〉⁴⁷、〈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兩篇，以台語文學發展的觀點重新詮釋台灣話文論戰。前文將論戰視為「台語」文學的建構與傳播過程，而黃石輝、郭秋生等人則是在以漢人為主體，語言上以台灣話為表意符號的台灣社會內，以台灣大眾所使用的台灣話作為文學語言，再生產一個屬於台灣的意識形態，藉此界定台灣文化的形式與內容、表現台灣人與台灣社會現實，建立台灣人意識形態。後文則由鄉土文學論爭之中的民族想像（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及語文改革的實踐，指出「台灣人」的民族想像在殖民統治下的抵抗意義，以及台灣的舊中國文化與新日本文化如何交會成具有台灣主體文化認同的「台灣話」的台灣文學。⁴⁸這兩篇論文展現以台語文學為中心的思考立場，但礙於論旨，未能探討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爭之中民族想像的矛盾，與戰後台語文運動／論爭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兩者在運動策略上如何接合。事實上，「台灣話的文學」未必能透過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詮釋，而順利具現於「台灣文學」的場域之中。本研究將就上論基礎繼續深論。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⁴⁹則認為，黃石輝、郭秋生等台灣話文論者是由於大正時期後日漸激烈的同化教育導致的文化危機感，而欲以台灣話文與殖民者爭奪台灣社會文盲教化權而發生的論爭。以「閱讀」作為「識字」的手段，利用民間文學、歌謠、歌仔冊等大眾文化書面材料，建立台語文字化的基礎，並藉由「過去」與「純粹」的語言經驗顯現台灣文化的「我性」來對抗殖民者的文化與精神教化。關於台灣話文的討論，陳培豐另由〈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⁵⁰提出台灣話文的技術挫折，以及作品中以台灣話文反映庶民苦悶、激烈口語的書寫策略，造成「逢中必雅，逢台必俗」的限制。至於台灣話文在小說文體表現上的限制，是由於缺乏翻譯西洋知識體系的經驗，無法呼應台灣「近代文學」載體需求的發展所致，最後在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與日文

⁴⁵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09-110。

⁴⁶ 同上註，頁 116。

⁴⁷ 林淇養，〈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形態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傳播策略〉，《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10），頁 123-149。

⁴⁸ 向陽（林淇養），〈民族想像與大眾路線的交軌：一九三〇年代台灣話文論爭與母語文學運動〉，收錄於《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12），頁 29。

⁴⁹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收錄於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頁 83-110。

⁵⁰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收錄於陳芳明編，《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190-237。

之間複雜的互動與取捨之後，產生了「東亞混合式漢文」。陳培豐掌握到台灣漢文的脈絡與複雜性，也為台灣話文運動提出了可能的問題癥結，但仍要說明的是，「台灣話文」於文學翻譯的缺席，並不代表「台語」缺乏與西方近代文體接觸的經驗。又台灣話文在這個複合式文體形成過程中，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積極意義？戰前的台灣話文與戰後台語文在這個層面上能否相互呼應？亦留待探討。

此外，身兼台語文學運動者、創作者的胡民祥，於 1981 年起陸續發表如〈戰前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民族文學的成長〉、〈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演變中兮台灣文學語言〉、〈走探台灣文學語言〉、〈動態看待台灣文學語言〉、〈賴和文學語言的辯證〉、〈台語文學的發展及未來的走向〉等文，開始建構台灣民族文學論。其中，〈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⁵¹一文經歷多次刊載，雖然並不是要直接為 1980 年代的台語文運動援引歷史及理論基礎，然而仍可視為將台灣新文學運動與戰後台語文學連結起來的代表作。⁵²本文開宗明義點出「台灣語是主體，是社會廣大群眾的日常用語，也就是說，經濟活動靠台灣語來溝通」，論證「台灣話」作為台灣社會普遍語言與台灣主體性之間的關聯，說明戰前台灣話文運動的社會基礎，也為戰後台語文運動預留伏筆。雖然因篇幅所囿，本文處理「台灣話」的概念缺乏明確定義⁵³，忽略了台灣話文的歷史鈍挫，從戰前「台灣語」到戰後「母語」之間的接合難免粗糙，展望「台灣話的民族文學」的論述更因而引來「運動性格強烈，在討論上不易有持平之論」⁵⁴之議，但是本文的確開啟了戰後「台語文」運動往戰前的「台灣話文」汲取語文理論、創作實踐與認同經驗的門扉，也提醒台語文學研究相對著重於戰後的運動與論述建構的同時，重新梳理、吸收戰前「資產」的重要性。

三、1980 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

台語文學強調「語言」與「文字」，以強烈的運動性格重新對台灣文學提出「正名」，實與「台灣意識」形成的文學史敘事與詮釋背景息息相關。在台灣文

⁵¹ 本文最後更名為〈舌尖與筆尖合一——台語文學的深層意義〉，輾轉發表處甚多，可參考李靜玫《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新文化》雜誌研究（1986.6~1990.12）：以新文化運動及台語文學、政治文學論述為討論主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07），頁 133 之整理，筆者參考版本為〈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收錄於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論文集》（台北：前衛，1989.08），頁 215-232。

⁵² 如林央敏謂此文為「國民黨據台後第一篇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來看待日治時期的鄉土文學論戰（或稱台灣白話文論戰），並且比較完整和比較深入的論述當時台灣話文運動的文章。」林央敏，《台語文學運動史論》，頁 30。

⁵³ 按照文旨，胡氏所謂「台灣話」指涉的應該是「台語」，亦即戰後狹義的「台灣閩南語」，但卻又強調台灣語是指涉福佬話、客家話與山胞話，在廣義與狹義之間浮動。胡民祥，〈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收錄於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論文集》，頁 220。

⁵⁴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頁 5。陳淑容認為胡民祥的論述策略與廖毓文類似，以台灣話文運動（而非論戰）為切入點，容易使人以為支持派略佔上風。

學的發展進程中，「台灣意識」如何形成？實質內涵為何？「台灣民族」的內部齟齬又如何產生？這些問題，勢必要將台語文運動放回台灣文學的發展脈絡下，進行共時性的梳理與比較才能解答。以下，筆者將關於 1980 年代後台灣文學正名論，並論及台語文學的相關研究整理如下。

謝春馨《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正名論》⁵⁵由台灣文學擺脫各種迂迴的指涉，確立以「台灣文學」為名的歷程，探究 1980 年代台灣文學發展動態。謝氏認為，儘管定義與內涵仍有許多歧異，但「台灣文學」的確立依舊脫離了中國主體性的收編，包納在台灣孕生的所有文學，也對本土派與反本土派的論述提出反思。此外，謝春馨並指出在正名的紛爭背後，是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拮抗，也注意到台灣意識內部亦有色彩濃淡之分，但對於本土論的意見不一，包括宋澤萊對葉石濤的批判、人權文學的主張、民族文學的呼聲與台語文學論戰，亦即本研究關注的文學台獨／台灣意識的內部齟齬，則僅能描述現象而未能深論。然而，就「正名論」的提出，以及對台灣意識陣營內部歧異的初步觀察，將討論延伸至「台語文學論戰」，謝論的研究成果仍相當具有前瞻性。

藍建春《台灣文學史觀念的歷史考察》從宏觀的視野梳理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探討「台灣文學」及文學史觀念、論述的變遷如何形成。藍氏認為，台灣文學史當中自日治時期漢文化新 v.s 舊、殖民 v.s 被殖民，到戰後台灣 v.s 中國，以及解嚴後所存在的各種族群邊界線內的認識論，形成不同的認同力量——即民族主義的互相拉扯，也因而形成台灣歷史各個主要分期的斷裂以及文學史的「重寫」。此外，藍建春將台語文學的發展放置在經歷中國 v.s 台灣意識辯證後「本土化」浪潮下的後解嚴時期內，企圖用「語言」來自我界定的實踐，並認為台語文學是在華語語境與漢字圈內，無法劃清中國與台灣的界線族群而引發的文化焦慮與政治反動，也因「台語」的語言與族群指涉而受到其他族群的質疑。⁵⁶藍建春對台語文學發展的詮釋，著重於從外部觀察文壇動態如何對應社會脈絡，因此較無法照見台語文學在國民黨執政下「文化瀕危」的內部運動邏輯與訴求，以及致力於追求文化主體，推廣多元主體的目標。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的研究觀點，認為「本土論」是指台灣在社會條件的制約之下，以「台灣立場」、「台灣意識」使台灣文學具備相對於中國文學、外來文學自主性而生的文學論⁵⁷，並將「本土化」視為一條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文學史當中，聯繫戰前、戰後鄉土文學論戰的發展軸線，認為日治時期已有「台灣話文」、「第三文學論」等文學本土化論述。經歷語言轉換、二二八

⁵⁵ 謝春馨，《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正名論》（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⁵⁶ 藍建春，《台灣文學史觀念的歷史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頁 469。

⁵⁷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5。

事件與中國意識正統論的壓抑，直到 1970 年代，本土論才又在民族、社會意識高漲的「鄉土」情境中浮現，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並銜接日治時期新文學經驗，形成一套與中國文學論對立的本土化策略。游勝冠將「本土化」視為台灣文學發展的系譜，並銜接戰前戰後鄉土文學論戰，勾勒出戰後台灣文學主體概念的形成歷程，有其獨到之處。可是如前所述，其論述較否定「將國民黨視為排除對象」的本土論價值觀，例如引用陳芳明批判「台灣意識先行」的論點，回應林央敏（事實上也是間接回應「台語文學」）的「一元本土論」，卻較少批判官方中國性的灌輸對本土文化的困境所造成戕害，似乎也就無法同情、同理由台語文學發展出的台灣民族文學論，並賦予其在本土化進程中回應政治、文化壓迫的積極意義。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認為，台灣 1980 年代後「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抬頭，以及文化「本土化」、「台灣化」的現象，與於 1970 年代台灣政治、文化變遷中孕生的「戰後世代」的世代意識、國族認同、歷史敘事息息相關，針對回歸現實世代由中國民族主義轉向台灣民族主義的過程與台灣文學正名的發展提供了細膩的分析，並將台語文學獲得國家補助出版一事，視為台灣民族主義敘事下的台灣文學業已形成。⁵⁸但如果以蕭阿勤的觀點，我們應該如何在「台灣民族主義」的框架內，理解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中所面對的諸多質疑、指控與反對？蕭阿勤則另於姊妹作《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當中，探討台語（文學）在「文化民族主義」(cultural nationalism)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蕭阿勤指出，台語文學被視為「台灣民族主義」的表達工具，確實是在社會、文化，尤其是語言方面對官方語言政策的反彈。不過，由於 1980 年代下半葉，台灣民族主義的建構多數為本省人，其中又以福佬人為多，台語因而成為表達政治不滿與族群忠誠的象徵，更逐漸成為建構民族文學的語言，也就此造成福佬人與客家人之間的摩擦。⁵⁹蕭阿勤對於台語文學的發展，以及重新定義台灣文學所引發的爭論補充得相當詳盡，於本書序言也表達了對「蔣黃事件」的關心⁶⁰，但是蕭阿勤在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討論之下，並沒有述及廖咸浩、陳若曦等人於台語文學論戰當中的反對觀點，也尚未討論客籍作家的語言觀，於是整體而言，似乎還無法解釋台語文學於文學史中被消音、引發認同衝突的可能原因，是本研究期待繼續對話、發展的空白。

四、台語文學史論的論述與建構

台語文運動至 1980 年代本土化浪潮中發軔以來，無論是文學作品與學術研

⁵⁸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08.06），頁 257。

⁵⁹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 2012.12），頁 232-272。

⁶⁰ 同上註，頁 7-8。

究都累積了相當的質量。不過，早期如林央敏《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張春風《台語文學概論》⁶¹等書，皆屬於史論與概論性質的著作而非文學史。直至最近，台語文學史論與相關著作繁花盛開，先由方耀乾完成《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為台語文學的發展勾勒出更為完整的歷史骨幹；林央敏繼後出版《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施俊州亦在國立台灣文學館委託之下寫成《台語文學導論》。在此，則針對相關論述與著述，大致梳理台語文學史論的建構歷程與各家觀點。

洪惟仁〈台語文學個分類與分期〉⁶²甚早展開台語文學分類與分期系統的討論，本文由證成台語儘管使用漢字，但並非漢語的「方言文學」開始，追溯中國戲文、歌謠漢字化的歷程，作為「閩南語文字化」的歷史跡證，並提出前人及許成章的《台灣俗文學探討》在分期與分類，以及將台語文學列入台灣文學討論的指標性。本文的文學史觀嘗試跨越雅俗，以最廣義的文字化文本建構台語文學的文類，在分期之外，另標出「貴族文學」、「文人學士」、「民眾文學」三種階級的關懷文類，呈現台語文學發展與「階級」意識的對應關係，亦提示揭櫫台語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林央敏《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可以說是戰後台語文學著述中第一本較為接近文學史論的著作，是早期台語文運動的紀錄，同時也是台語文學史建構及理論彙整的重要里程碑。值得注意的是，就戰後台語文學主張「以台語思考、以台語直接寫作」的後設標準而言，林央敏並不認為日治時期主張台灣話文的知識份子與其台灣話文作品符合台語作家／台語作品的要求。即使如此，林氏還是有意識地將戰後台語文學運動，與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的理論與歷史背景連結起來，強調戰前與戰後兩度為殖民政權所打壓的語文經驗，期待「台語文學運動的完成之時，就是台灣民族的完成之日」⁶³。

至於建構台語文學史的嘗試，則有方耀乾《U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以多元語言、文化的正當性抵抗台語文學所受到的各種意識型態攻擊，並思考弱勢文學如何解構當前的封閉主體，解構主流霸權並建構多元主體與多元中心，提出台語文學史（兼顧弱勢文學史）書寫的實踐方法論，更藉由族群與語言的「缺席」揭櫫文學史論述的權力結構共相：即「中國化」象徵暴力邏輯，進以質問華語的再殖民霸權，批判在此霸權結構下的中國、台灣意識。此後，台語文學終於有科學化、系統化，並具備目的與史觀的文學史陸續出版，其一是方耀乾以其研究成果完成第一本台語文學史《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以多元文

⁶¹ 張春風等著，《台語文學概論》（台北：前衛，2002.10）。

⁶² 原文發表於 1995 年 11 月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所舉辦的「台灣文學研討會」，本研究參考增補後較為完整的最新版本，參見洪惟仁，〈台語文學個分類與分期（上）（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1 期，2010.05，頁 4-22；〈台語文學個分類與分期（下）（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2 期，2010.06，頁 4-35。

⁶³ 林央敏，《台語文學運動史論》，頁 111。

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的「多元中心」史觀⁶⁴，讓戰前後、海內外台語文運動及文學實踐的積累得以出土，在台灣文學史當中開拓台灣母語文學的版圖。林央敏亦於《台語文學運動史論》之後，以「類別史」的體裁與「民族文學」的觀點，完成《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這兩本台語文學史，除了在史觀與體裁上相互補充之外，也都觸及如何界定「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問題，是本研究後期重要的觀察與對話對象。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⁶⁵以「白話字」、「漢羅」及「漢字」等文本分類，來呈現台語文學多重歷史淵源的發展、斷裂與交混，並以「詩」與「散文」觀察當代台語文學運動的形成。有趣的是，《導論》嚴格來說雖然不是文學史，但卻多少補齊了林央敏以小說立史而未逮的其他文類。所以，在這一波台語文學史盛開的花季，三大類型（詩、散文、小說）同年綻開，亦有其獨特的歷史意義。

此外，如胡民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民族母語文學論〉⁶⁶藉由分析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變遷史，證成閩客移民與南島民族「土斷」（在地化）為台灣民族，以這些族群的母語為「民族母語」而將台灣文學視為「台灣民族母語文學」演變史的觀點；蔣為文〈語言、文學 kap 民族國家 ê 建構：台語文學運動史初探〉⁶⁷主要由語言學的取徑證成閩南語經歷自然的土著化(indigenization)成為台灣話／台語的主體性，並以土著化的標準檢視華語（族群）的語言霸權與認同心態。另一個論述角度同樣也是透過語言學檢證「漢字」對文學、文化發展的影響，並舉出漢字式台灣話文在普及、閱讀、標準化方面的技術問題，在認同上則是認為使用漢字無法脫離其所支撐的漢民族想像，台灣也無法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因此，蔣為文借用越南脫離漢字改用羅馬字的語文經驗，正逐步實踐其台語、台語文學、台灣民族文學、台灣國家的想像，但其主張在學界、社會引發正反爭論，顯然是在台語文學、台灣文學史論比較脈絡下必須被關注的現象。

參照目前幾家對台語文學發展的分期與分類方式，可以發現在台語文學的定義（主要的爭議在於是否包含漢文言文文學，以及部份「類」台語文學的判定）以及分期標準上仍有多元的討論空間，依據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及取徑不同，欲在各個時期所呈現的發展動態有繁有簡，對於突顯台語文學本身的發展特性，或是呈現與台灣文學文壇主流的比較，也各有所好。其中，方耀乾所劃定的分期方式，較接近台灣文學史的斷代規則，也更彰顯台語文學發展牽繫著政治權力遞變的現實（儘管這種歷史斷代的方式亦有待商榷之處），本研究則以此分期作為時間範圍的參考，並將目前對台語文學發展的數種分期整理如下表：

⁶⁴ 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頁 14。

⁶⁵ 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

⁶⁶ 胡民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民族母語文學論〉，收錄於方耀乾編，《台語文學史書寫理論與實踐》（高雄：台文戰線雜誌，2009），頁 15-37。

⁶⁷ 蔣為文，〈語言、文學 kap 民族國家 ê 建構：台語文學運動史初探〉，《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頁 201-225。

	洪惟仁 ⁶⁸ (1995)	林央敏 ⁶⁹ (1997)	蔣為文 ⁷⁰ (2005)	方耀乾 ⁷¹ (2012)
分期方式與說明	<p>一、萌芽期：1925年以前，前期為清領時期，後期為日治時期 1895-1925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貴族文學：漢詩文、日本文學（1895後） 2. 文人學士：泉州南管文學、日人口傳文學紀錄 3. 民眾文學：閩南歌仔冊 <p>二、興旺期：1925-1937年（含教會白話字文學）</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貴族文學：日文、中國白話文 2. 文人學士：口傳文學紀錄 3. 民眾文學：歌仔冊、流行歌 <p>三、烏暗期：1937-1945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貴族文學：日文戰鬥文學 2. 文人學士：歌謠紀錄 3. 民眾文學：空白 <p>四、暗淡期：1945-1984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貴族文學：華文文學 2. 文人學士：華文鄉土文學、歌謠紀錄 3. 民眾文學：流行歌 <p>五、復興期：1984年迄今</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貴族文學：華文文學 2. 文人學士：華文鄉土文學、台語文紀錄、創作 3. 民眾文學：流行歌（KTV） 	<p>一、1945年以前：</p> <p>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922s 新舊文學論戰 2. 1930s 台灣話文論戰 3. 伏流民間的通俗文學 <p>二、1975-1985年：</p> <p>方言詩嘗試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960s 林宗源台語透濫華語詩（方言入詩），1970年代林宗源、向陽台語詩 2. 1980s 台語文運動與黨外運動勃興 3. 方言詩正名「台語詩」、「台語文學」 4. 台語文學運動與日治時期鄉土文學運動連結 <p>三、1986-1995年：</p> <p>台語文學開拓期</p>	<p>一、台語白話字文學形成期（1865-1920s）</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長老教會來台宣教、《台灣府城教會報》發行 2. 白話字小說與評論 <p>二、漢字白話文討論期（1920-1937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舊文學論戰、台灣話文論戰 <p>三、台語文學 tim-bi 期(1937-1987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1937-1945年：戰間期，台語書寫僅存《台灣教會公報》 2. 1945-1987年：方言詩寫作、海外組織與刊物推動台語文 <p>四、台語文學 koh 活期(1987-2000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國內台語文團體、刊物發展 2. 台語文數位化 <p>五、台語文學正名期（2000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台文體制化，台語邊緣化 2. 系統性研究、教材、學術專著出版 	<p>一、口傳文學時期</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民謠、褒歌 <p>二、荷西時期：1624-1662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新港文書 <p>三、鄭氏時期：1661-1683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漢古典文學引進 2. 泉漳口傳文學（台語白話文學） 3. 南島民族口傳文學 <p>四、清領時期：1683-1895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漢古典文學土著化 2. 白話字運動 <p>五、日治時期：1895-1945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台語歌仔文學 2. 白話字文學 3. 台灣話文運動 <p>六、中華民國時期：1945-1999年</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台語傳統戲劇、新劇、歌仔冊與流行歌的短暫蓬勃 2. 日語創作（跨越語言的世代） 3. 國語政策 <p>七、中華民國時期：2000年迄今</p>

⁶⁸ 洪惟仁，〈台語文學分類與分期〉系列。

⁶⁹ 林央敏，〈台語文學的誕生—台語文學運動之一〉，《台語文學運動史論》，頁 15-28。另，林央敏另有針對台語小說進行分期，分別是「口傳期」(1600-1920)、「萌芽期」(1870-1960)、「復育期」(1960-2000)以及「成熟期」(2001-2010~)，因為以文類分期而暫不表列，參見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台北：印刻：2012.12)，頁 27。

⁷⁰ 蔣為文，〈語言、文學 kap 民族國家 è 建構：台語文學運動史初探〉，《語言、國家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頁 218-224。

⁷¹ 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

五、台語文學論戰研究

蔡瑋芬《戰後台語文學運動之開展：1986-1991》¹是最早以台語文學運動為題的學位論文，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²，將台語文學論戰重新放回台語文學運動的脈絡，與「台灣文學」的概念進行對話。蔡氏認為，正當台灣文壇透過鄉土文學對現代主義進行全面反思的同時，台語文學進一步以「語言」作為理論與創作的核心，企圖挑戰、重新界定「台灣意識」的內涵，對外企圖脫離中國文學的邊緣位置，對內則針對國民政府長年以來獨尊華語的語言政策進行抵抗與批判，精確捕捉到台語文運動的時代意義。此外，吳長能《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³則是提出台灣文學自日治時期到戰後不斷發生以「台語」作為文學語言的運動與論戰的現象，援用「高低階語言」(diglossia)與「高低文字」(digraphia)等相關理論，說明日治時期與戰後為了反抗殖民者以國語政策企圖消滅本土文化達成同化目的——在戰後尤其以華語為霸權，台語文學運動期望藉由提昇台灣話／台語為高階語言文字，證成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努力。吳氏指出台語文學論戰延續了日治時期以來中國本位與台灣本位價值觀的爭論，但面對台語文學的發展困躓與論戰當中的癥結，突破較為有限。

葉祚樑《台灣九〇年代的身分建構與國族修辭——以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為主要的考察範圍》將過去缺席於台灣文學的「台語文學論戰」重新放回 1990 年代與「《中外文學》論戰」、「雙陳論戰」的共時脈絡下，釐清「台語文學論戰」的認同問題。葉氏認為，台語文學由語言建構民族的策略，是挑戰華語中心的「後殖民」實踐，在重建主體的過程中，引起了客語、原住民語「後現代」的多重解放，進而質疑台語文學以語言樹立的新主體。於是，台語文學論戰為台語文學帶來持續去華語中心的後殖民性格，並啟發了台語文學兼顧其他母語主體性的後現代精神。⁴雖然台灣文學研究對於舶來品「後現代」的內涵其實尚無定論，例如陳芳明、廖炳惠、林淇養等均曾論及「後現代」是否成立。⁵不過，在後現代的

¹ 蔡瑋芬，《戰後台語文學運動之開展：1986-199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² 呂興昌，〈台語文學的邊緣戰鬥——以 1989 年台灣文學論爭為中心〉，收錄於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2.02），頁 291-305；陳慕真，〈走向台灣民族的文學革命——論八、九〇年代的台語文學論爭〉，《台灣文學評論》6 卷 1 期，2006.01，頁 145-160；蔡瑋芬，〈從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民族論」看其後的兩次台語文學論爭〉，《台灣人文》10 卷，2005.12，頁 31-42。

³ 吳長能，《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新竹：時行台語文會，2012）。本文原為英語撰寫，原名“The Taigi Literature Debates and Related Development(1987-1996)”（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台灣研究英語碩士學程(IMTS)碩士論文，2008），後由作者以華文翻譯出版。

⁴ 葉祚樑，《台灣九〇年代的身分建構與國族修辭——以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為主要的考察範圍》（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35。

⁵ 後現代性 (postmodernity) 的概念由羅青提出，但陳芳明認為，由西方引進的後現代概念未必能與台灣社會現實嵌合，而就台灣社會的被殖民經驗而言，以「後殖民」指涉解嚴後的台灣文學發展較為適合；廖炳惠就陳芳明對後現代被片面挪用的批判，思索尚未定論的後現代在台灣的可能性，亦暗示台灣使用後現代概念的游移不定；林淇養則認為，羅青對台灣社會後現代的觀察未

疑義之外，葉論對台語文學論戰於台灣文學史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台語文學階段性發展，均有精確的觀察與詮釋。本論指出三場論戰面對中國意識重構身份與認同「本土」的同一性，但同時也暗示在論戰之間，語言問題可能是「台灣意識」分歧與衝突的共相⁶，本研究也將在這個基礎之上深化三場論戰之間的關聯。

此外，如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⁷雖然不是直接討論台語文學論戰本身，但是論者已將視野延伸至論戰前台灣華語文學與台語文學的語際關係，以及台語文學運動、作家轉向的文學史機轉，就台語文學與華語文學之間形成摩擦與衝突的遠因，本論提出相當細緻的梳理與深化，以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語言市場」(linguistic market)觀點，說明本省籍(甚至同一語族)作家、文化工作者、政治人物與文化菁英反對台語、母語文學的原因，是由於戰後「語言與政治共謀」，華語文學作為政治運動變體(亦即國語運動)產生的合法性／象徵性語文，主導台灣文學發展並形成華語體制下的「慣習」(habitus)與「文化霸權」(hegemony)影響所導致，實為台語文學論戰的前因與過程提出結構性的解釋，亦將為本研究重要的前行基礎。

後出的單篇論文方面，陳政彥〈台語文學論戰重探—過程與意義的再思考〉⁸以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提出的「文化霸權」觀點，詮釋台語文學運動者以自然通行的福佬話凝結台灣意識，來證成福佬話是台灣特有語言的主體性，抗拒被收編為中國「方言」之一，並反詰國民黨來台五十年的語言政策下所產生的「傳統的選擇」，亦即華語得以成為文化霸權的正當性。陳氏指出，各族群在論戰過程中展現對「台語」抱存獨占霸權的疑慮之後，台語文學運動也走向「代表」的理論細緻化路線，聯合族群陣線對抗華語／中國霸權，而這也是台語文學論戰在運動當中所呈現的效果。本文將後進的論述精確地安放於台語文學運動的脈動中，釐清過去在意識形態的對立框架內未能析辯的問題與現象，然而論戰後迄今的台語文學論述顯然又遇到了類似的瓶頸：如何面對「北京話」？「代表」與「正名」如何騷動「族群」的界線？台語文運動又要如何說服廣大使用華語／北京話漢字的一般人？台語文學的困境難以突破，或許必須探討與爭奪文化霸權互為表裡，亦即「台灣意識」的認同建構層次，才能深入了解。

必允當，又後現代的「抵抗」精神於羅青所指涉的「台北的」文學當中，徒存語言與符號的遊戲性質。參見陳芳明，〈後現代或後殖民：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廖炳惠，〈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錄於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2000)，頁 55-56、頁 87-92；林淇養，〈「台北的」與「台灣的」：八〇年代以降台灣文學的「城鄉差距」〉，《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 181-184。

⁶ 例如在邱貴芬與廖朝陽之間關於「北京話」是否為殖民語言的交駁，其實與雙陳論戰陳芳明主張的「再殖民」觀點類似，但是這些對於「再殖民」的覺察，卻沒有成為對台語文學論戰有利的後註，留待後續討論。

⁷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⁸ 陳政彥，〈台語文學論戰重探—過程與意義的再思考〉，收錄於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台灣語言學系主辦「第五屆台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論文集，2008.11.23。

綜觀前行研究，可以看出白話字文學的研究成果已有相當積累，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討論，以「台灣話」為主體性的思考也逐漸被重視，讓戰前台語文學的輪廓得以浮現，戰前台語文學史與知識論的再考掘、再詮釋與再書寫，儼然也有其可能與必要。在 1980 年代台灣文學正名論相關研究方面，論者固然注意到戰後「台灣意識」對台灣文學發展、台灣文學史書寫產生的影響，也都在台灣文學的脈絡中看見了「台語文學」，但可惜鮮少深入了解台語文學的發展歷程，在其中觀察台語文學與台灣文學的互動與碰撞。另一方面，目前台語文學雖然已有較完整的文學史著述問世，然而關於文學史論的建構，卻仍然存有相當大的討論空間，也需要進一步在台灣文學場域中與文學史對話。最後，和台語文學一同消失於台灣文學史當中的台語文學論戰，固然對台語文學產生直接影響，但是這場論戰對台灣文學而言意義也相當重大。如何把這場消失的論戰，以及被噤聲的台語文學從台灣文學史當中找回來，思索台灣文學史多元主體、多語交響的可能性，將是本研究致力所在。

第四節 研究方法

面對台灣文學歷來的語言與認同爭議，本研究試圖梳理台語文學的發展歷史與台灣民族主義興起的關係，藉以展開對台灣文學史論的解構、分析與比較，了解經歷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之後，台語文學的發展、史論建構與民族文學論，如何對台灣人追求主體性、自主性的民族認同提出反省與展望。因此，在研究方法方面，主要運用文獻研究(Documentary research)進行資料的梳理與論述的建構，並運用「後設歷史學」與「民族主義」的理論觀點進行文學史論的分析。

一、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從傅柯到海登·懷特的批判史學觀點

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認為，「知識」其實都滲透了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內，反映了具有特定文化表徵的語言表述，在這些表述背後，實際上充滿了「權力」的操控。為了解構話語，進而釐清權力的作用，傅柯取消了歷史書寫者的主體性，並將歷史視為文本(text)而非客觀事件，把統一的、連續的歷史敘述拆解為原本互不聯繫的歷史事件，還原歷史的「斷層」與「差異」，進而突出「歷史修撰」(historiography)的文本性質，突顯在單一、大寫的歷史論述當中，有複數、小寫的歷史存在。⁹

傅柯同時也指出，「傳統」的概念讓人得以思考不同事物的一致性，化約了事物起始間的不同處，讓個體、全集、觀念或理論得以跨越時空而息息相連。¹⁰而歷史敘事當中慣用的「精神」，則讓我們得以建構一套統一或解釋的原則，在

⁹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5.02)，頁 83-95。

¹⁰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07)，頁 93-94。

一時代同時或連續發生的事件間，能建立共同的意義、象徵的關係。¹¹也因此，傅柯反對傳統歷史研究強調時間的延伸，力求組織散亂的資料以重建某個事件或時代意義的方法，並認為此舉非但無法重現歷史原貌，反而將史學範圍局限於少數主題、事件或人物的主題研究中，將會忽略「中心」體系以外的領域，而這些歷史微觀的死角往往有著與整體歷史不相上下的重要性。¹²

另一方面，有別於傳統史家追溯起源、注重傳承用以建構體系的史學方法，傅柯認為應該以「現在」為立足點，了解過去迄今的歷程中，有哪些因素的發生與轉變可為現在的社會思維借鑒，在以「現在」為本源「重建過去」的歷程中，會發現在正統歷史中無足輕重的事件，將因為「現在」的位置而產生不同的意義。¹³傅柯的系譜學提醒研究者必須注意書寫者的「權力」如何影響歷史修撰，並透過考掘逼近「真實」，我們亦能由此觀察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的諸多事件，如何被聯繫為帶有某種傳統的歷史敘事，並挖掘更多理解、詮釋台灣文學史的角度。

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則受到傅柯的啟發，相對於舊歷史主義(old historicism)將歷史當作一種統合的實體(as unified entities)，是連續的、沒有縫隙的(seamless)、單一的(single)、只有一個正宗版本的觀點¹⁴，新歷史主義者懷疑歷史的「真象」，認為歷史是被「敘事出來的」，是透過所有已成書的文本所建構出來的，也是「不連續、充滿矛盾」的。因此，新歷史主義開始重新審視文學與歷史之間的關聯¹⁵，此一觀點為海登·懷特(Hayden White)批判性地吸收為後設歷史學(Metahistory)的思考框架。懷特認為，歷史敘事的相異處取決於歷史著述(the historical work)是由何者所構成，而要瞭解這些差異成份，必須先將這些理想典型(ideal-typical)著述的結構進行組織分析。¹⁶其分析的對象，便是歷史學家的「敘事」(narrative)作為一種歷史方法的考察：

對敘事的史家而言，歷史方法包含了調查文獻以確認這些證據能夠說出多少與事件有關的真實或貌似真實的(plausible)的故事。根據以上看法，一個真實的歷史記述，至少是歷史學家展現詩才(poetic talents)的成品，構想出作為假想事件的敘事，然後它必然是歷史「方法」正確運用的結果。¹⁷

¹¹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94。

¹² 王德威，〈導讀 2：「考掘學」與宗譜學——再論傅柯的歷史文化觀〉，收錄於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 40-41。

¹³ 同上註，頁 56。

¹⁴ 孟樊，〈新歷史主義的台灣文學史觀〉，《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台北：揚智文化，2006.01），頁 18。

¹⁵ Raman Selden 等著，林志忠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第四版）》（台北：巨流，2009.02），頁 236-238。

¹⁶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19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頁 4-5。

¹⁷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頁 27。原文：For the narrative historian, the historical

懷特認為歷史是虛實參半的成品，史料本身並不具有意義與重要性，而必須依靠史家將史料所構成的編年史(chronicle)編織(emplotment)成「帶有故事性質的歷史」(story)，才能讓讀者領悟歷史事件的意義。¹⁸孟樊則將懷特的觀點更具體地闡明如下：

新歷史主義者之所以不向史家求其客觀性，是因為他們認為歷史總是後來者對於過去事件的敘事，如果用傅柯的話來說，歷史敘事本身就是一種論述，而在論述形成的過程中，總是會選擇、抬高某些歷史因素（或歷史事件），同時也壓制和貶低某些因素或事件……¹⁹

從傅柯到懷特對舊歷史主義的批判，我們可以理解在文學與史學在敘事方法的類同性基礎上，於特定社會脈絡下產出的歷史文本受到意識型態影響，必然呈現非單一、非連續且互有出入的詮釋與結果。孟樊對後設歷史的說明，更提醒了我們必須留意在文學史的「傳統」或「精神」的一致性、連續性當中，有被「貶低」甚至「刪去」的內容，同時也有被「抬升」的事件。而文學史論在形構過程中再現的差異與斷裂，又具備什麼樣的敘事或不被敘事的意義與動機，則值得本研究援引以理解「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史中的處境。

筆者透過傅柯的考掘學對「歷史修撰」及「權力」的覺察，以及後設歷史學對「編織」歷史的行動詮釋，重新對「文學史的歷史」——亦即對文學歷史書寫的實踐與積累提出反省與批判，並不是要否定文學史書寫的功能、意義和價值。事實上，本研究以台語文學史觀解構台灣文學史，並試圖整理台語文學的發展對台灣文學語文問題的回應，無非也是一套「敘事」，相當程度也有被「解構」的自覺。但是，一如許俊雅對文學史讀者或研究者的提點：「閱讀者應該明白撰述者在選擇或遺忘的「過去史實」中，是否牽涉到不平等的權力結構與分配關係本質的思考，對每一種台灣文學史的特質才能清楚掌握。」²⁰筆者援用後設歷史學與台灣文學史對話，目的在於提供更多「複數」的歷史觀，突顯當前台灣文學史的書寫本質，挖掘文學史論述背後的權力作用是否產生了不平等的權力分配，也唯有如此，才能對文學史提出公允的修撰意見，為台語、母語文學找回其安身立命之所。

method consists in investigating the document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at is the true or most plausible story that can be told about the events of which they are evidence. A true narrative account, according to this view, is less a product of the historian's poetic talents, as the narrative account of imaginary events is conceived to be, that it is a necessary result of a proper application of historical "method".

¹⁸ 吳智偉，〈評《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史耘》7期，2001.07，頁176。

¹⁹ 孟樊，〈新歷史主義的台灣文學史觀〉，《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頁25。

²⁰ 許俊雅，〈台灣新文學史的分期與檢討〉，收錄於《見樹又見林——文學看台灣》(台北：渤海堂，2005)，頁227-228。

二、民族主義²¹

1980年代後現代(postmodern)與1990年代後殖民(postcolonial)論述的引進及交鋒，豐富了本土論思考台灣歷史、族群、文化及身份認同問題的理論基礎，參照張京媛所提出的後殖民理論的幾個面向，包括「批判東方主義」、「文化認同」、「對被殖民者的分析」以及「對民族主義的探討」等²²，事實上也更突顯了台灣人曾為（或仍是）被殖民者的身份而適用於後殖民理論的狀態。不過，本研究以「民族主義」(nationalism)來詮釋台語文學的「台灣意識」，一方面是希望在後殖民理論對民族主義可能成為「排外的法西斯主義」的憂心，以及對「民族主義依附於敵對者身上的諷喻」的批判之外²³，重新肯定民族主義於形塑集體意識、對抗殖民者的積極意義，在台灣民族主義自為現象的基礎上進行討論；二方面則是有感於台灣文學史上經過幾場後殖民理論的演繹、挪／誤用過後蔚為主流，卻不能解決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以及這個問題背後更深刻的認同困境。因此，本研究以「民族主義」為題，試圖回頭探討、釐清民族(nation)是什麼？民族認同如何產生？在「民族想像」的過程中，「語言」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希望能重新討論語言與民族認同的關係，並在涉入台灣文學的後殖民場域時，能有最低程度的對話。

史賓塞(P. Spencer)與沃曼(H. Wollman)認為，當代關於民族起源與民族概念的論述，大致可區分為原生論者(primordialists)與現代論者(modernists)，兩者主要的差別是：前者將民族視為「社會組織自古以來，必要的且或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此種有機的存在可溯源至迷霧般的歷史（或神話？）」。後者較不注重民族主義的根源，並認為民族主義的滋長與「現代性」的發展進程息息相關。史賓塞與沃曼在其論述中，以自視為介於原生論與現代論之間的史密斯(Anthony Smith)為模型，指出史密斯並不是否定「民族」在某種程度上是再／建構物的概念，而是強調「民族並非純粹或任意創造而成的」，亦即原生論的某些條件仍然為現代論提供了一個「前」現代的認同基礎。²⁴「語言」在原生論與現代論的民族主義當中都扮演著關鍵角色，但史賓塞和沃曼廓清將語言的「獨特性」等同於「排他性」的因果錯置，並說明語言成為「差異標記」，用以劃分社群敵我的真

²¹ 關於 Nation 或 Nationalism 一詞應譯為民族（主義）與國族（主義）的翻譯公案，在台灣往往隱喻著「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史觀差異，在此無法詳述。參照吳叡人翻譯《想像的共同體》時所提出的說明，認為 nation 一詞作為理想化的「人民全體」、「公民全體」的概念，和「國家」作為人民群體自我實現的目標或工具，在意義上有所不同。而「國族」主義同時遺漏了群眾性民族主義（在群眾間流動的語言民族主義），以及其他兼具官方與民粹性格的複雜類型。故本研究行文一律使用「民族（主義）」，但文中譯書若為「國族」者，則不改動。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台北：時報文化，2010），頁 21-22。

²²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2007.10），頁 14-19。

²³ 同上註，頁 18。

²⁴ Philip Spencer, Howard Wollman 著，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2012.02），頁 39-85。

正原因：

使一種說話和／或書寫方式優先於其他說話和／或書寫方式，並且將語言從「方言」(dialects)當中劃分出來並給予特別待遇。這可能（或者是必定）會伴隨著政治上的重要意義，並且是各式各樣鬥爭後的結果。²⁵

顯然，在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脈絡當中，「語言」作為一種認同的條件才開始因為「巴別塔的宿命」而產生「排他性」。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再參照幾位現代論的民族主義研究者如葛爾納、安德森與霍布斯邦的看法，了解語言文化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葛爾納(Ernest Gellner)認為，國族(nations)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元必須等同一致²⁶，同時也是一種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國家權力則是建立在團體成員屬於同一個文化或國族的基礎之上。²⁷進入現代社會後，「高級文化」——亦即通用的語意系統出現，即可讓習得高級文化的個人，能夠脫離傳統社會的階級與文化限制，取得身份地位並塑造「自我認同」，現代國家自然也能透過高級文化整合、滲透政治權力，並統整多元的文化差異。當公民參與、共享此文化時，自然就能凝聚出工業化社會的集體意識，現代國家政治權力的正當性也就此得到基礎。²⁸換言之，國族主義可以說是在西方現代性(modernity)的語境中，現代主權國家為了治理具有「同質性」與「可規格化」特性的工業化社會，所發明或建構出來，用以支撐治理正當性的意識形態，²⁹所以國族／民族主義的建構，同時也是「努力讓文化與政體結合在一起，為文化附加一座政治屋頂，而且還不能有一座以上的屋頂。」的實踐過程。³⁰

班納迪克·安德森則是開宗明義地說：「它（民族）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他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³¹安德森選擇用「概念」的形式來理解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義的起源和「識字圈」有關。由於資本主義在歐洲拉丁文出版市場已趨飽和的狀況下，轉往一般大眾使用的方言市場發展，加上拉丁文神秘化、宗教改革及偶然發展的行政方言影響，使得各種方言得以在有限範圍內被組合，形成了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並創造統一的交流、傳播場域。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也賦予了語言一種新的固定

²⁵ Philip Spencer, Howard Wollman 著，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頁 120。

²⁶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1），頁 1。

²⁷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6），頁 3-4。

²⁸ 蔡英文，〈導論〉，收錄於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頁 v-vi。

²⁹ 同上註，頁 iii。

³⁰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頁 59。

³¹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41。

性格(fixity)，使得語言可以透過無限複製下的時間積累，塑造民族主義的古老形象，最後，印刷資本主義創造了有別於舊行政方言的新「權力語言」。簡而言之，民族主義是透過「資本主義」、「印刷科技」與「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三者重合被想像而出，共同體和政治實體的關係也是偶然形成的。³²

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也認為，並不是民族創造了國家和民族主義，而是國家和民族主義創造了民族。³³不過比起安德森，霍布斯邦卻強調「民族無關語言、族群或其他類似要素，儘管這些因素可以增加集體認同感。」³⁴對於弱小族群在「門檻原則」³⁵下的民族想像欲求，以及挽救民族傳統、語言文化的努力，抱持較為悲觀的態度。不過，霍布斯邦並沒有否定「語言」在民族想像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相反地，為了理解「為何語言隔閡會被拿來作為族裔區隔的表徵，並藉此劃分不同的族群與國家」³⁶，霍布斯邦開始探討在近代民族主義之前的「民族主義原型」(proto-nationalism)形成過程中，「語言」與「族群特性」(ethnicity)到底對人們集體情感的凝聚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其認為，作為區分不同民族與國家的民族語言(lengua national)是「一國官方的正式用語，有別於地方方言，亦別國的國語不同，是該國國民最常用的語言。」³⁷基本上是人為建構出來的，是從各種不同的通行語言之中，精練出一套標準化的對話方式，然後再把所有的通行語言降格為方言。³⁸因此，即使語言並非區分民族的唯一標準，但是選擇哪一種方言作為民族標準語言的基礎，確實是一種政治操作：透過人為力量進行標準化，讓固著於印刷物之上的語言看來更為「不朽」，並透過國民教育與行政措施，將執政者與菁英分子所使用的優勢語言獨尊為「國語」(national language)。³⁹

台灣被捲入「日本」、「中華民國」這兩次近代民族國家建構「國語」的歷史經驗，可以說幾乎符合霍布斯邦所提出的公式，只是戰前、後的「國語」運動不但直接對台灣本土語言產生影響，和舊國語（日語）之間的歸化競爭，也間接加強了新國語（華語）對本土語言所施放的壓力，這顯然是一套層次更複雜的政治影響過程。因此，儘管如伊薩克(Harold R. Isaacs)所言：「在個人形成基本群體群認同上，語言是不可或缺的要項，但再重複一遍，它只是一系列要項之一，所有這些要項各有其功能，形成多種不同的組合，而語言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不一而

³²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81-89。

³³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8.02)，頁 14。

³⁴ 同上註，頁 27。

³⁵ 霍布斯邦在此沿用馬志尼所提出的「門檻原則」(principle of threshold)，是因為其所定義的「民族」是具備「政治實體」、「獨立主權」，並以資本主義經濟力為後盾的「國家」。在此前提下，尋求建國的弱小族群將因為人口、土地、經濟等未達門檻而難以獨立。同上註，頁 39-42。

³⁶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70。

³⁷ 同上註，頁 21。

³⁸ 同上註，頁 72。

³⁹ 同上註，頁 69-82。

足。」⁴⁰甚至對葛爾納、霍布斯邦等「反土語」論者而言，將族裔語言提昇為『國語』的過程並無涉於民族主義的形成，或最多只是刺激民族主義產生的「中介變相」。⁴¹但是，一如安德森在四波民族主義的浪潮中所描述的語言現象⁴²，當語言在統治者的治理術當中成為認同的門檻，在台灣社會當中產生「會說日語才能成為皇民」、「會說國語才能成為中國人」的認知或集體記憶，乃至於壓迫出「會說台語才是台灣人」的語言民族主義之後，我們於是更不能忽略這些讓「語言」成為台灣民族認同「必要條件」的政治背景。

因此，透過上述討論要再次確立的是：以台語文學為出發點，並非是要先驗地證成一種「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而是要以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文化人造物」的觀點，並借用上述相關研究對「語言」如何在統治與被統治者之間催發、凝聚、甚至操作民族主義的觀察經驗，試圖說明為何在戰前與戰後的社會情境中，台灣話／台語會成為想像「民族」的重要素材？又為何引起「語言民族主義」的緊張和焦慮？而戰前、戰後的台語文學發展，以及台語文學在「台灣意識」的浸潤中所想像的「民族」內涵是什麼？在「台語文學論戰」當中遇到哪些質疑或批判？本研究即以上述若干民族主義論述的語言觀點為研究方法，透過掌握語言成為民族主義的「互補要項」的過程，來思考台語文運動、台語文學史論，以及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可以如何完成。

第五節 撰寫說明

本文書面語言受先行研究的書寫經驗⁴³啟發，以第三章第二節「行向本土」(kiánn hiòng pún-thóo)為分水嶺，前半以華語書寫，後半以漢羅台語文書寫。如此分隔，用意在於透過書寫語言的轉換，突顯論文對話對象、筆者的論述立場與邏

⁴⁰ Harold R. Iss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2009.07)，頁 153。

⁴¹ 在此援用方孝謙對葛爾納與霍布斯邦的評述，方氏認為葛爾納沒有討論國家機器如何造成語言型民族主義的興起，而霍布斯邦是將國語是知識份子的偏執，與一般民眾的關係不大。參見方孝謙，〈殖民地民族主義與 1920 年代的日治台灣——以「治警事件」及土語運動為例〉，《東吳社會學報》3 期，1994.03，頁 161-197。

⁴² 安德森指出地理大發現之後，「多元文化論」導致歐洲社會自我動搖，而出現了讓神聖語言降格，方言得以成為文學語言、印刷語言的時機。伴隨著辭典的編纂，語言不僅在轉譯之間取得平等地位，更得以透過印刷出版連結廣泛的閱讀階級(reading classes)。可見語言地位的提昇，有助於凝聚使用該語言群眾的集體意識，也使得第二波「群眾性語言民族主義」於 1820 年後出現於歐洲後，「民族的印刷語言」逐漸成為民族想像的重要工具，並形成一套可供「盜版」(copy)的散播模式。至於第三波「官方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則是對於前述群眾性民族主義的「反動」(reaction)，「王朝制度」歸化甚或收編「民族」，並選擇某種方言作為國家語言，由上而下進行同化，建構新的集體想像並鞏固王權。在第四波「殖民地民族主義」當中，出現一批通曉殖民母國語言與被殖民者語言的雙語知識份子，這些年輕人被歧視性地限制於殖民地的教育與行政範圍內流動，因而產生了殖民地民族想像的領土基礎。

⁴³ 目前已有許多台語文學研究以台語文書寫，也有如葉社樑《台灣九〇年代的身分建構與國族修辭——以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為主要的考察範圍》主要以華語書寫，專章論及台語文學論戰時則改為台語。

輯。論文前半部與台灣文學華語場域對話，提供戰前台語文學（白話字、台灣話文）的史觀與現代性視野，並由本土語言及台灣話的特殊位置，重新梳理由戰前過渡至戰後的政治、社會變遷對台灣語言造成的影響；後半部則是進入與本土立場的對話與台語文運動論述的深化，筆者改以漢羅台語文進行論述，希望這樣的書寫實踐本身，亦可作為對台灣文學本土論語言觀念的具體回應，一方面提供讀者閱讀台語文的機會與嘗試，另一方面亦是將台語提昇為學術論述語言的練習。

台語文書寫方面，以教育部推薦用字與「台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所收錄的漢字為主，並加註台灣閩南語羅馬字(台羅)拼音，而部份常用的虛字如華語「的」(e)、「在」(ti)等，則參照現今漢羅台語文的書寫習慣，以羅馬字表示。

第二章 全球化下的台灣在地現代性：戰前台語文運動的發展

前言：「台灣文學」、「台灣新文學」、「台灣現代文學」與「台灣文學的現代性」

如果要為台灣文學的起源找到一個歷史的錨點，我們首先會發現台灣文學的歷史概念，有「台灣文學史」與「台灣『新』文學史」這兩種不同的時間意義與敘事內容。一般而言，「台灣文學史」囊括的是有史以來在台灣所發生的文學活動與發展歷程，例如黃得時〈台灣文學史序說〉即上溯荷治以降的獨特歷史經驗，截至改隸前的散篇史論，葉石濤亦得力自此而完成《台灣文學史綱》古典文學部份；至於台灣「新」文學，則習慣自 1895 年台灣被割為日本殖民地開展。為什麼在台灣文學史當中，會另外有一個「新」的敘事起點，一種新的時間體驗而被不斷強調，甚至以陳少廷為濫觴，將「新文學史」由「文學史」的時間軸當中被獨立出來「自成一史」？在進入台灣文學史之前，這個兩種敘事的差異與其個別具備的意義，或許要先分別釐清。

「新」文學史作為文學史的時間標的，普遍被認為是進入日治時期之後，台灣海外留學生接受現代知識的洗禮，掌握了國際政治形勢，並受到來自左右翼的民族、人權等世界思潮影響後，成為新興的殖民地知識份子，致力於台灣的政治運動，更企圖透過語文改革與創作實踐進行文化抗日而引起的文學流變。由此可知，台灣文學的「新」意，除了指涉「歷史的斷裂」與「當前歷史的現時性」以外，還建構在社會學意義的「現代性」(modernity)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之上。當前學界對於「現代性」的定義仍莫衷一是，但如果參照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代表性說法，現代性可謂「後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 20 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模式，並大略等同於『工業化世界』」。¹所以，如果以資本主義與工業化作為辨識現代性的指標，台灣社會現代化(modernization)的開展，似乎就必須等到殖民體制引介資本主義，將台灣推向全球性的工業化、都市化潮流，並受到由殖民體制轉嫁的西方知識的薰陶，具備了物質與文化現代性的基礎後才抵達「現代」，成為一種「遲到的現代性」(belated modernity)²，也因為是伴隨著殖民者「強制的現代化」(forced modernization)工程而來，而又被稱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³

所以，日治時期以來，台灣文學史所指涉的「新」已不單純只是「文學現代性」的層次而已，更涉及殖民權力浸透下，作家、文本與社會脈絡的交互關係，

¹ Anthony Giddens 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2002)，頁 30。

² 陳芳明，〈現代性與日據台灣第一世代作家〉，《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2004)，頁 30。

³ 陳建忠，〈差異的文學現代性經驗——日治時期台灣小說史論(1895-1945)〉，收錄於陳建忠等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頁 23-34。

台灣「新」文學概念的成形乃至於獨立成史，儼然因此成為批判保守固有文化、抵抗（日本）殖民政權的重要符碼⁴，「新」的標誌亦隱喻了新／舊、現代／傳統、殖民／被殖民的對立框架，形成文學史上一道整齊的時間切口，以此展開殖民記憶的訴說，以及一連串試圖追認出「民族」的論述過程。

但問題在於，這一套以日治時期的斷代隱喻被殖民的歷史記憶，並強調在民族認同的拉扯中批判地吸收現代性的兩難，以建構民族主體性為嚆矢的文學史書寫技術，是否能夠精準地呈現台灣自 17 世紀初以來，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與西方殖民勢力的接觸而「邁向現代」的歷程？又能否全面掌握在前述境遇下交混雜揉而出的文化樣貌？對此，邱貴芬曾提出「全球化」的研究視角加以反省與檢討，其認為台灣文學研究的「殖民譬喻」固然強調台灣於被殖民境遇中的文學現象對殖民勢力的回應，但後殖民的框架未必能解釋所有的文學現象。⁵另一方面，現代性普遍被視為是孕生自歐洲自中古時代以來，諸如文藝復興運動、資本主義形成、宗教改革、民族國家出現、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邁入「現代社會」的重大歷程當中⁶，並伴隨著不對等的殖民關係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散佈至全世界／非西方世界，在面對以西方為中心，以時序為優勢的現代性論述時，台灣總有以歐美社會型態為標準的落後感，以及在時間上落後西方的遲到感。於是，邱貴芬試圖以「全球化」修正台灣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以全球的「空間」想像容納台灣將現代性「在地化」後的異質性⁷，重新評估台灣於現代化進程中相對於西方「他者」的主體性，並解決後／殖民史觀可能造成的認識論之偏狹與缺失。

如果借用邱貴芬的「全球化」反省重新梳理台灣歷史的發展，台灣「新」文學與「現代性」論述之間的關聯似乎就出現了一些癥結：台灣社會與「現代性」的接觸真的「遲到」了嗎？若現代性與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擴張息息相關，那麼台灣文學的現代性是否早已於日治之前與西方帝國接觸，體驗到具備現代性格的物質建設、制度經驗與文化差異的那一瞬間就開始萌芽，而未必要遲滯到日本殖民體制帶來更全面的資本主義與現代化工程後才有可能？「新文學運動」背後的「現代性」、「文學流變」以及「反殖民」命題關係之間有沒有重新調整的可能性？台灣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如何轉化為在地異質性，成為台灣文學的重要特質？本章將就以上提問，重新梳理台灣社會與西方現代性交會的歷程，以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為主軸，由「接受史」的角度觀察台灣後殖民論述的能見與不見，而在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動態當中，台語文學的發展又如何體現台灣於全球化下展現的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與民族想像。

⁴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台北：聯經，2011.10），頁 59。

⁵ 邱貴芬，〈後殖民之外——尋找台灣文學的「台灣性」〉，《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頁 115-118。

⁶ 黃瑞祺編，《現代性、後現代性、全球化》（台北：左岸文化，2003.02），頁 7。

⁷ 同註 5，頁 128。

第一節 來自西方的曙光：清領時期白話字運動的歷史意義與文學成就

若從世界文學的高度俯瞰台灣與西方現代意識的接觸，針對歐洲自 15 世紀文藝復興運動以降的社會發展，並藉由軍事侵略、傳教、通商貿易等活動擴散現代性的歷程進行共時性的觀察，顯然西方的現代意識於 17 世紀時，就已透過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航海家、貿易商人、殖民行政官吏和傳教士進入東亞和台灣，而不僅限於日治時期全面現代化與清末劉銘傳短暫且局部的現代化建設而已。作為西方國家海外擴張的一環，同時也是現代性溫床與載體的基督教⁸及其傳教事業的影響，以及 1865 年長老教會於台灣開教後所引進的西方技術與制度——一種步入現代社會之前的「前」現代性於推進台灣現代化的貢獻及影響，仍舊是一段容易被忽略的歷史。因此，本節將探討清領時期台灣於基督教在華傳播的脈絡下，台灣文學的現代性體驗與實踐，如何因基督教文明／文學的傳入，在教會「前」現代性的傳教事工、社會建設當中而有所可能。

一、《聖經》義理跨域流動、多語譯介的語言書面化效應

16、17 世紀，在對東方貿易的外部需求，以及基督教世界對外擴張的內在趨力之下，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國相繼由海路抵達中國沿海，但相對於葡、西二國，荷蘭遲至 1581 年掙脫西班牙統治而獨立後才發展其海外拓領。1600 年後，荷蘭正式展開以中國為目標的遠航，企圖登陸時為葡萄牙所佔領的澳門與中國通商未果，1602 年成立聯合東印度公司後，首航艦隊司令韋麻郎(Wijbrand Van Waerwijk)才在二次進佔澎湖均被驅逐的狀況下協議進駐台灣，並於 1642 年驅走佔領台灣北部的西班牙人，開啟了台灣荷治時期的歷史局面。

除了透過軍事鎮壓與行政控制等手段，將台灣作為轉口貿易中心，並自中國引渡漢人到台灣進行移民開發，展開最大效益的經濟掠奪之外，荷蘭殖民者亦在不增加經濟負擔的前提下⁹，將基督教的傳佈視為附屬於行政機制之下的教化手段，用以彌補武力鎮壓的不足，武力同時也為傳教開闢道路，兩者相輔相成。¹⁰由於荷蘭改革宗教會所遵循的是路德教派的語言主張——亦即反對天主教以拉

⁸ 「基督教」稱呼有兩個意涵，一為基督教三大派系：羅馬天主教會、東正教會與抗議宗（新教）的總稱，二專指為抗議宗、改革宗的新教／基督教／基督新教。參見王美秀，《中國基督教史話》（台北：國家，2004.05），頁 8。本文則直接區別為「基督教」和「天主教」。

⁹ 為了照顧荷蘭東印度公司貿易據點的居民信仰需求，東印度公司與荷蘭改革宗教會合作，招徠牧師與傳道師協助海外宗教工作，但東印度公司本身對於宣道的觀點較著眼於商業利益，與傳教士之間對於宣教的態度未必一致，亦因此埋下了日後貿易與宣教目的之間的緊張關係。然而宣教工作最終還是發揮了對統治、社會控制與商業利益的助益。參考 J.J.A.M. Kuepers（柯博識），查忻譯，〈荷蘭改革宗台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宣教（1627-1662）〉，《台灣文獻》58 卷 1 期，2007.03，頁 6-8。

¹⁰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台北：聯經，2000.10），頁 107-108。

丁文為神聖、共同語言，主張以方言或日常口語來傳教¹¹，因此，當 1627 年第一任牧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1647)抵台後，旋即投入學習新港語(即西拉雅語)與虎尾語，並以羅馬字編譯西拉雅語字典、翻譯祈禱文。繼任的尤紐士(Robertus Junius, 1606-1655)牧師更積極成立學校、培養本地人牧師，持續編寫新港語典與教理問答、講道文等。1662 年，荷人投降於明鄭並退出台灣後，羅馬字仍被新港等社用於紀錄契約文書，即「新港文書」或俗稱的「番仔契」(huan-á-kheh)，在西班牙人佔領北台灣期間，亦曾為傳播天主教之需而以羅馬字書寫凱達格蘭族的「淡水語」，並編有語典及教理書。¹²直到 19 世紀前葉，以羅馬字寫成的新港文才隨著新港語死語化¹³而中斷。可見荷西時期羅馬字教育，確實曾為平埔族的讀寫能力奠下一時穩定的基礎。

台灣再次與基督教接觸，已是 19 世紀基督新教(Protestant)英國長老教會(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中國經驗的延伸。在《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以前，基督教的傳教受限於清廷禁令，大多只能暫時先於東南亞如新加坡、馬六甲、曼谷、檳榔嶼、巴達維亞等中國移民較為集中的區域，以文字譯著宣教。而後，拜中國對外交涉失敗所簽訂的條約之賜，基督教終於得以進入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等五口，以及割讓予英國的香港，在英法聯軍爆發之後，基督教於開放區域傳教的趨勢更趨蓬勃。

面對清廷禁止以口頭直接傳教的限制，又要跨越部份地方語言沒有漢字或其他書面文字作為記載工具的傳播障礙，傳教士們開始思考以羅馬字學習語言，並以此宣達教義，甚至使信徒具備閱讀聖經能力的可能性。例如第一位抵達中國宣教的英國倫敦宣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ev. Dr. Robert Morrison)於馬六甲開辦「英華學院」(Anglo-Chinese College)時，即擬定漢語羅馬字方案，協助傳教士學習閩南方言，而後麥都思(Rev. W.H. Medherst)將外國傳教士以羅馬字拼寫閩南方言拼音方案統整為「白話字」，編成《白話字小字彙》，並在 1837 年於澳門出版最早的閩南語字典《福建方言字典》，其拼音法陸續經過各派傳教士改造，並用以譯經、編纂字典、設計教材與教學，這一套以羅馬字標注、學習廈門話的「白話字」才逐漸定型並廣為流傳。¹⁴

於是，在多語譯介的過程中，《聖經》、聖詩歌與教理書成為某些地方語言最早的印刷書籍，為沒有漢字或其他文字對應的地方語言提供紀錄的形式¹⁵，傳教

¹¹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台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語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台北文獻》直字 125 期，1998.09，頁 86。

¹² 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頁 33。

¹³ 新港語／西拉雅語近年在台南縣平埔族西拉雅文化協會推行復育計畫的努力下，已出版萬益嘉《西拉雅詞彙初探：以新港語馬太福音研究為主例》一書，為西拉雅語研究與推廣奠定基石。

¹⁴ 董芳苑，〈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55 卷 2 期，2004.06，頁 289-324。

¹⁵ Kenneth S. Latourette 著，雷立柏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頁 368。

士們以白話字翻譯或編寫的讀物內容，也涵括天文、地理、數學、生理、醫療衛生，以及中國古籍、歷史、倫理、休閒、生活用書等人文知識，甚至發行報刊。¹⁶在教會西式醫療與新式教育的社會建設基礎之上，白話字顯然不只是傳遞教義的載體，而是將西方的現代文化、知識、制度和基督教徒的生活緊密連結在一起的文化紐帶，並藉此吸引更多信眾。

值得一提的是，白話字為缺乏文字紀錄的地方語言所帶來的一線「書面化」生機，也對中國本土的「語文現代化」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例如盧贛章有感於中國富強必先由普及教育，使人民「好識學理」、提高文化水平做起，遂結合漳泉韻書「十五音」與白話字完成「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為漢字標注廈門語音進而識字以吸收新知，更刺激了中國各地切音字運動的熱潮。¹⁷因此，有論者認為教會的白話字教育，不但應在中國教育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對日後中國語文現代化的討論及拼音方案的發展而言，也有不容忽視的啟發意義。¹⁸

只不過，儘管基督教在傳教過程中扮演著引介西方現代性的角色，白話字亦可以說是東南亞、中國東南沿海乃至於台灣等閩南方言文化區域接觸到西方現代性的「文明之鑰」，但對於中國人而言，基督教終究是西方帝國主義之力進／侵入積弱不振的清末中國的權力符號。無論是基督教義與中國儒家傳統、禮儀、信仰之間的扞格，或者是將在條約保護下的傳教事業視為列強逼侵的一環¹⁹，在基督教傳教過程中，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加深，傳教區域由沿海深入內陸，各地發生「民教衝突」與「教案」²⁰的次數與規模也逐漸增加、擴展。在這種「半殖民」化的國族際遇當中，教案的發生被認為是中國面臨西方帝國主義進行經濟、政治、文化侵略時，「為了維護民族的尊嚴，保衛自己的生存而進行的鬥爭，是一種反侵略的自衛運動。」²¹那麼，我們要繼續探問的是：西方的帝國主義與傳教熱浪，透過什麼樣的媒介，進入時為半殖民地的中國——清帝國所領治的半殖民地台灣？台灣對於傳教的抗拒或受容，是否展現與中國類似的反動論述甚或民族情結？基督教與其夾帶的西方現代性從中國傳遞到台灣的過程中，教會、傳教士乃至於作為語文工具的白話字，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又為台灣社會帶來哪些變化？

¹⁶ 陳少明，〈近代閩南教會的白話字教育〉，《教育評論》11卷6期，2010，頁134。

¹⁷ 許長安、李熙泰編著，《廈門話文》（中國廈門：鷺江，1993.12），頁94-116。

¹⁸ 同上註。

¹⁹ 可參考呂實強，〈晚清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義理的關斥（一八六〇——一八九八）〉、〈晚清中國知識份子對基督教在華傳教目的的疑懼（一八六〇——一八九八）〉二文，收錄於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4) 教案與反西教》（台北：台灣商務，1986.08），頁101-128；129-144。

²⁰ 蔡蔚群認為，「民教衝突」較強調反教行為的社會、文化意涵；「教案」以案件為名，多有政治、外交上的意義。除非民教衝突規模過小，否則進入官方交涉的程序，將成為正式的外交案件。參見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2000.09），頁8。

²¹ 張力、劉鑿唐，《中國教案史》（中國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04），頁461。

二、長老教會的白話字運動與台灣社會的「前」現代經驗

台灣是由移民所形成的多族群、多語言社會。但是清領時期的台灣，已因歷次以閩粵移民為主的移民經驗，逐漸形成以漢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根據日治時期 1915 年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顯示，當時台灣總人口數約 347 萬人，在佔總人口 95.57%（約 332 萬人）的本島人當中，漢人約佔 92.87%（約 323 萬人），其中有 79.12% 的福建人（約 275 萬人）、廣東人則佔 13.75%（約 47 萬人），能力範圍內可統計到的原住民（熟蕃與生番）只佔 2.7%（約 9.3 萬人）²²，此一透過遷徙、競爭與同化所形成的社會結構，幾乎成為台灣迄今的族群比例基礎。漢人逐漸成為台灣社會較強勢的多數族群後，相對多數來自福建漳、泉移民的語音經過「漳泉濫」(tsiang-tsuân-lām)，並吸收客家話、原住民語，以及日、西、荷、英等外語所形成的「台灣話」(Taiwanese)，業已成為通行全島的共用語。至於社會文化方面，台灣經歷明清治理後，儒家思想、中國文化深植民心，是以在與中國極度類似的文化情境及語言經驗中，台灣的社會語境成為一股「語言的召喚」²³，讓長老教會決定將台灣作為繼廈門、汕頭之後的第三個據點。1865 年，英國長老教會派遣馬雅各(James L. Maxwell)醫生來台開教，馬偕(Rev. George Leslie Mackay)牧師也受加拿大長老教會之命，於 1872 年抵台。19 世紀西方的現代意識就此隨著福音的吹拂，飄越黑水溝而抵達福爾摩莎。

不過，即使台灣已有荷治時期的傳教及語言書面化之基礎²⁴，長老教會在台初期的傳教，仍不免面臨與在中國宣教類似的困難，誠如馬偕日記所述：

在每一個地方的廟門口，私人住家、樹下、橋上以及木板上，都貼著可怕的告示，並且當中呼籲所有真正的漢人團結起來，將這些「外國鬼」(Foreign devil)趕出台灣島外，並且恐嚇每一個村落、城鎮或城市的住民，如果有人膽敢聆聽這些邪惡的教義，將會被逐出。而孔夫子的教義才是中國古老神聖、完善以及適合中國的教義。不需要外國狗厚顏無恥的前來教導。²⁵

²²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1915 年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資料〉，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popu/>，使用日期：2012.09.08。

²³ 杜嘉德與金輔爾發現滬尾、艋舺多為福建漳州、廈門一帶移民，閩南語甚至通行於台灣全島。相對於「在中國大陸隔了一百哩就語言不通」，台灣與廈門在移民和語言親近，讓杜嘉德以為這是一種「強烈的呼喊：『到這裡來幫助我們』」。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1990），頁 274。

²⁴ 例如 1865 年 11 月，馬雅各曾與英國駐台海關人員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前往府城以東的平埔族社進行醫療宣教，但平埔族人將二人認為是兩世紀前來台的荷蘭人「紅毛親戚」，給予熱情款待。馬雅各亦在此時發現當地平埔族人仍使用荷治時期引進的羅馬拼音字母書寫西拉雅(Siraya)語所留下的蕃仔契，因此激發他以白話字翻譯聖經的靈感。參見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頁 120-130；朱真一，〈早期歐美的醫界人士與台灣語言〉，《台灣醫界》51 期，2008 年，頁 493-497。

²⁵ Rev. George Leslie Mackay 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台北：玉山社，2012.03），

基督教在列強透過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實施軍事及經濟侵略的優勢下入台，面對漢人社會不同的宗教觀，以及根深柢固的儒家思想與傳統習俗之時，依然被視為「番仔教」、「外國鬼」而遭到嚴重的歧視與抗拒，民教衝突時有所聞。至於醫療環境方面，早期台灣瘴癘肆虐，但醫療知識多仰賴漢醫且良莠不齊，因此基督教以相對進步的西醫進入台灣，以免費行醫的方式傳播福音，卻令人懷疑動機不純而招致謠言與抹黑。²⁶

由上可知，長老教會的宣教事業如果除卻商教糾紛、官紳利害與政教因素，傳教士與庶民的接觸，首先勢必要跨越東西文化的隔閡與知識的落差，才能繼續在台耕耘，進一步培養在地傳教人員。所以，如果要讓更多未曾受過教育，不但不識（漢）字，知識與思想亦不比上流階級的普羅大眾能真切了解教義與現代知識，唯有透過其熟悉的語言——亦即包括台灣話在內的不同族群母語來傳教才有可能達成。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傳教士首先學習通行於台灣社會的台灣話，並隨著進入不同的族群聚落，展開了一連串以受教對象使用的母語、日常語言譯介聖經義理的在地化過程。

在廈門的人力與資源協助下，長老教會最初於台灣南部的傳教事業，延續著相對重視文字宣教的傳統，使用的宣教出版品也多由廈門提供。但隨著信仰人數增多、傳教事業擴大而應生的印刷需求，加上長老教會在台灣中南部傳教的人力與物質條件逐漸成熟，也不乏有中國傳教時印行報刊的經驗可供參照，巴克禮 (Rev. Thomas Barclay) 遂決定以馬雅各於 1880 年捐贈的印刷機開印宣教報刊。台灣史上第一份報紙——《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台灣府城教會報) 也就此問世。

事實上，早年以廈門話翻譯的《聖經》、聖詩歌與教理書，以漢字、白話字書寫者皆有，並不是一開始就都以白話字作為書面語。例如早期傳來台灣 13 首版本的《養心神詩新編》即是用漢字書寫，以「字邊有圈讀本字，字邊無圈讀白話」來標示廈門話讀音。²⁷但作為「漢字文化圈」內的第一份「非漢字」的大眾傳播媒體，巴克禮開印《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之時沒有選擇漢字，而在一開始就確立以白話字同時進行「啟蒙」與「宣教」的傳教策略，除了可能與傳教士發現並繼承荷治時期使用羅馬字的宣教經驗，以及廈門已有現成白話字出版品的利便等原因相關之外，我們亦可以由《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的發刊詞，觀察傳教士們如何思考台語、白話字與傳教事業之間的關聯：

頁 105。

²⁶ 洪辭惠，《台灣政教關係之研究－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大宣言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06），頁 86-88。

²⁷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頁 77。

白話字原文	漢羅
<p>Khò-sioh lín pún-kok ê jī chin oh, chió-chió lâng khoàⁿ ē hiáu--tit. Só-í goán ū siat pát-mih ê hoat-tō, ēng pèh-oē-jī lâi ìn-chheh, hō lín cheng-lâng khoàⁿ khah khoài bat. Iā kín-lâi tī chit-ê Hú-siáⁿ goán ū siat chit-ê ìn-chheh ê khi-kū, thang ìn-jī chhin-chhiūⁿ chit hō ê khoán-sit. Taⁿ goán ng-bāng lín cheng-lâng beh chhut-lát òh chiah-ê pèh-oē-jī; āu-lâi goán nā ìn sím-mih chheh lín lóng ē hiáu-tit khoàⁿ. Lâng m̄-thang phah-sng in-ūi i bat khóng-chú-jī só-í m̄-bián òh chit-hō ê jī; iā m̄-thang khoàⁿ khin i, kóng sī gín-ná só thák--ê. Nng-iūⁿ ê jī lóng ū lō-iōng; put-kò ìn-ūi chit-hō khah-khoài iā khah-bêng, só-í lâng tiòh tãi-seng thák-i. Au-lâi nā beh sòa thák Khóng-chú-jī sī chin hó; chóng-sī pèh-oē-jī tiòh khah tãi-seng, kiaⁿ-liáu nā m̄-thák, lín bē hiáu--tit khoàⁿ goán pát-jit só ìn--ê.</p>	<p>可惜恁本國 ê 字真儂，少人看會看曉得，所以阮有設別物 ê 法度，用白話字來印冊，予恁眾人看較快捌，也緊來 tī 這 ê 府城阮有設一 ê 印冊 ê 器具，通印字親像這號 ê 款式。今阮向望恁眾人欲出力學遮 ê 白話字，後來阮若印甚物冊恁攏會曉得看。人毋通拍算因為伊捌孔子字（註：漢字），所以毋免學這號 ê 字，也毋通看輕伊，講是困仔所讀 ê。兩樣 ê 字隴有路用，不過因為這號較快也較明，所以人著代先讀伊。後來若欲繼續孔子字是真好，總是白話字著較代先。驚了若毋讀，恁袂曉得看阮別日所印 ê。²⁸</p>

發刊詞當中明白指出，推行白話字的目的是在於期使信眾具備以「自己的語言」閱讀、理解聖經的能力，無須依靠傳道人的講述就能明白上帝的旨意。顯見當時台灣雖在「漢字文化圈」內，但「漢字普及率」過低，實為特定知識階級壟斷的社會現實，強化了教會以白話字傳教的動機。²⁹同時，白話字教育在台灣推行的另一項關鍵，在於教會並沒有要否定「孔子字」在台灣社會當中既有的歷史地位，及其背後所蘊藏的思想體系與功用，只是就學習效率與普及速度來說，白話字是直接吸收新知與輔助學習「孔子字」的語言工具，是「較代先」的當務之急。羅馬字運動未來與漢文化的競合與揉雜，可以說在此時就埋下了遠因。

《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於創刊號刊明推廣白話字的原因，也積極地進行白話字的「語言行銷」(language marketing)³⁰，刊出由廈門的英國長老

²⁸ 轉引自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01 文化論述 kap 啟蒙》(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11)，頁 3-4。原刊於《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1885 年 7 月，第 1 張。

²⁹ 雖然就連力學漢字、文言文的馬偕都認為，漢字不但「難學」，也「難以表達台灣話」，可是整體而言，以白話字傳教的選擇似乎較少直接碰觸到以漢字書寫台語的問題。馬偕的觀點轉引自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 為中心》，頁 21。

³⁰ 張學謙，〈白話字 ê 活力 (1885-1970 年)〉，「活力白話字 (Peh-oe-ji=POJ) 在台灣研討會」論文

教會唐獻理牧師所舉辦的〈Pèh-oē-jī ê Lī-ek〉(白話字 ê 利益) 徵文獲獎文章，獲得第一名的廈門葉漢章牧師在文章中，即點明白話字可以透過聲母、韻母和調號完全表音，避免字音字義的誤讀而真切理解聖經的傳播優勢。此外，葉牧師也呼應發刊詞所說，認為相對於漢字難寫難學，白話字學習速度更快，也更適合普及及作為吸收新知的工具。³¹第二名的文章出自台灣教徒劉茂清之手，他在實用性的觀點之上更提出了白話字有助於打破性別不平等與社會階級的功能：

白話字原文	漢羅
<p>Pèh-oē-jī ē hō lú-jîn ū tì-huī . Hū-jîn-lâng ê chài-tiāu bô khah-su ta-po-lâng, só-í ē bô hák-būn, in-uī Khóng-chú-jī oh-thák . Nā boeh thák pèh-oē-jī, tuì lák-hoè kàu cháp-hoè sì-nî ê kú, chiū bô bē-hiáu-siá ê jī, iah bô bē-hiáu-thák ê chheh ; án-ni kiám m̄-sī chin toā ê lō-ēng ?</p> <p>Pèh-oē-jī ē hō tàk-téng chò-kang ê láng ē hiáu thák Sèng-chheh, kap chai chē-chē hāng ê tãi-chì. Tàk-téng chò-kang ê láng tàk-jit ū kang tīⁿ-poàⁿ, iáu-kú nā boeh thák pèh-oē-jī ún-tàng ē khí-lái. Goá khoàⁿ hiān-sí teh thiaⁿ tō-lí--ê khah-chē sī choh-sit kap cháu-thàn ê láng, pún m̄-bat poàⁿ-jī; tuì thiaⁿ tō-lí chiàⁿ tàk-pái An-hioh-jit òh thák jī-bó, tng tú-á teh-thák ê sí m̄-káⁿ siūⁿ ē bat, nā-sī kàu-boé lóng ē ka-tī thák, m̄-bián tiāⁿ-tiāⁿ oá-khò pát-láng lái kà . Chiong-lái pèh-oē-jī ná chē láng bat, chiū pèh-oē-jī ê chheh iā ē ná-chhut ná-chē iūⁿ, kiám-chhái Thian-bún Tē-lí ê chheh ; á-sī Soàn-hák Kek-bút ê chheh; Lék-tāi ê tãi-chì, tàk-kok ê sin-bún; che lóng ē ke-thiⁿ láng ê tì-huī; án-ni-siⁿ kiám thang kóng pèh-oē-jī m̄-bián thák ē chò-tit ?</p>	<p>白話字會予女人有智慧，婦人人 ê 才調無較輸查埔人，所以會無學問，因為孔子字 oh 讀，若 boeh 讀白話字，對六歲到十歲四年 ê 久，就無 bē 曉寫 ê 字，亦無 bē 曉讀 ê 冊；án-ni kiám m̄ 是真大 ê 路用？</p> <p>白話字會予逐等做工 ê 人會曉讀聖冊，kap 知濟濟項 ê 代誌。逐等做工 ê 人逐日有工纏 poàⁿ，iáu-kú 若欲讀白話字穩當會起來。我看現時 teh 聽道理 ê 較濟是作稽 kap 走趁 ê 人，本 m̄-bat 半字；對聽道理正逐擺安歇日學讀字母。當 tú 仔 teh 讀 ê 時 m̄ 敢想會 bat，若是到尾攏會家己讀，m̄ 免定定倚靠別人來教，將來白話字那濟人 bat，就白話字 ê 冊也會出那濟樣，kiám-chhái 天文地理 ê 冊；抑是算學格物 ê 冊；歷代 ê 代誌，逐國 ê 新聞；che 隴會加添人 ê 智慧；按呢 siⁿ kiám 通講白話字 m̄ 免讀會做得？³²</p>

集，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2006.02.18，頁 11。

³¹ 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1 文化論述 kap 啟蒙》，頁 199-205。

³² 同上註，頁 206-207。原刊於《TÁI-OÂN HŪ-SIÁⁿ KÀU-HOĒ-PÒ》，1886 年 2 月，第 7 張。

劉氏認為「孔子字」難學，而且往往被特定的階級與性別所壟斷，不但「做工」、「作穡」或「走趁」的下層平民與知識無緣，女性更在階級的隔閡之上遭受父權社會的性別歧視，淪為台灣社會的雙重，甚至多重邊陲(periphery)。除了展現性別與階級平等的進步觀點外，劉茂清同時也談到白話字的普及與「知識體系」建構的關聯，透過白話字可以學習到的，舉凡天文地理、數學、歷史、各國史地……等西方近現代的文明與科學知識，都幾乎不見於以科舉考試為目的而設立的傳統教育當中。例如《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創刊號〈Lūn siat-líp Tiong-òh〉（論設立中學）一文，論及長老教中學的建制，即可由短短的篇幅中窺見教會現代教育的內容：

白話字原文	漢羅
Siat-líp Tiong-òh ê ì-su sī chái-iū ⁿ ? Sī in-ūi lāng tī hiah-ê Sió-òh thak bô lōa chhim, iā-sī kan-ta thak-jī nā-tiā ⁿ , bô sím-mih òh pát-hāng; só-í goán siū ⁿ -tī Hú-siā ⁿ tiòh siat chit-ê Tiong-òh hō lāng thang siū tak-hāng ê kà-sī, chhin-chhiū ⁿ Sèng-chheh ê tō-lí, Thak Pèh-oē-jī Tng-lāng-jī, Siá-jī, Tē-lí, Tāk-kok ê kí-liók, Sng-siàu, Thian-būn, hit-hō.	設立中學 ê 意思是怎樣？是因為人 tī 遐的小學讀無佻深，抑是干焦讀字 nā-tiā ⁿ ，沒啥物學別項。所以阮想 tī 府城著設一 ê 中學予人通受逐項 ê 教示，親像聖冊 ê 道理，讀白話字、唐人字（註：漢字）、寫字、地理、逐國 ê 紀錄、算數、天文彼號。 ³³

在 1885 年余饒理(Mr. George Ede)設立長榮中學之前，巴克禮已於 1876 年創設「台南神學校」，馬偕則分別於 1882 年與 1884 年創立理學堂大書院（牛津學堂）及淡水女學堂，長榮女中則於 1887 年創設，至於甘為霖(Rev. William Campbell)於 1891 年為盲人教育所開辦的「訓瞽堂」，更首開台灣特殊教育之先。除了教育事工以外，教會為了傳道而進行的「半殖民醫療」，不但引介許多近現代醫學的知識，也透過宣教將知識轉化為信徒的生活守則，並為台灣建制了地方醫療中心。例如早期南部有旗後、新樓二院，中部有大社、彰化兩院，北部則有淡水偕醫館與馬偕紀念醫院，到日治初期逐漸形成南部新樓、中部彰化、北部馬偕的三足鼎立模式，並和日本政府全面西化的醫療體系合作，實際參與了殖民政府的近代公共衛生(Public Health)事業，和統治當局保持著既競爭又合作的微妙關係。³⁴

由此可見，台灣在清領時期成為西方「半殖民地」的脈絡下，長老教會以白話字為媒介發行《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逐步擴建學校建設與醫療體系，為台灣教育與知識所注入的現代化養分，不但在台灣改隸之後能直接成為現

³³ 轉引自賴永祥，《教會史話》第四輯（台南：人光，1997），頁 29。原刊於《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1885 年 6 月，第 1 張。

³⁴ 經典雜誌編，《台灣醫療四百年》（台北：經典雜誌，2006.05），頁 77-78。

代化工程的一部分，教會的現代教育更為日後台灣的現代化拔擢更多可用的人才。例如吳文星研究指出，教徒子弟佔醫學校畢業生相當比例的人數，首開海外留學之端，主因為教徒子弟較一般台人先接受教會的宗教課程與西／新式教育，於日治初期對殖民政府所引介的新教育接受度較高。因為信教，台人教徒有更多機會前往日本、歐美留學，而殖民政府的現代化，相當程度也必須藉由和基督教的前現代建設整合，才得以更順利推行。³⁵因此，對照廈門的傳教經驗，可以發現從一開始的宣教需求到《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的創刊，教會推行白話字教育提昇「識字率」（包括漢字與白話字），其實是與傳播福音互為表裡的重點工作。同時，作為社會教育的基礎，教會藉由白話字讓台灣人能透過日常所使用的台灣話與族群母語，與教會的各種近現代社會建設緊密連結，搭建西方基督教與台灣本土之間的知識與文化橋樑。也因此，基督教的傳播在台灣發起的白話字運動，對於我們觀察台灣「前」現代性的形成，甚至作為理解日治時期「殖民現代性」的基礎，特別就文學、文化運動而言，均有不容忽視的歷史意義。

三、基督教文學³⁶與台灣文學的對話、交混及生成：清領時期白話字詩與散文

在前現代的語境中，白話字不但帶動了東西文化的交會與相融，也為台灣打開一扇觀看世界的窗口，在語言書面化之後，進而產生了「現代」的文學實踐。如黃佳惠針對《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自 1885 年發刊至 1942 年停刊的考察，將報中內容分為 12 類³⁷，陳慕真更將《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白話字文學細分為「小說」、「散文與報導文學」、「詩歌」、「戲劇」、「翻譯文學與寓言故事」、「學術論述」等六類。³⁸這些文本的出土與文類的分類，證明了《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不只是教會重要的宣教媒體，同時也為白話字文學提供了絕佳的孕育環境，更是某種「現代」的文學氳蘊，且成果豐碩。

不過如前所述，在《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刊行之前，其實已有許多中國廈門的教會刊物，透過白話字改／譯寫的形式渡越而來，成為台灣白話字文學萌芽的重要養分。正如朱惠足強調「移植」與「翻譯」對（殖民）現代性

³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台北：五南，2009.09），頁 126-127。

³⁶ 參考研究者施瑋的界定，廣義的基督教文學可以指涉「傳遞聖經所啟示的世界觀、人生觀的文學作品」、「基督徒所寫的文學作品」或「有關聖經、教會、教義或基督徒生活的文學作品」，而狹義的基督教文學則是基督徒（信仰、跟隨基督者）寫的傳遞聖經世界觀的作品。另一方面，《聖經》本身亦被視為具備高度文學性的文本，能將文學理論用以詮釋經文。是故，本文在此將《聖經》的譯介視為廣義基督教文學的一部分，統稱基督教與《聖經》於台灣傳播產生的文學影響。參考施瑋，〈華文基督教文學淺議〉，《舉目》28 期，2007.11，網址：<http://behold.oc.org/?p=5208>，使用日期：2013.07.24；郭秀娟，《認識聖經文學》（台北：校園書房，2003.06），頁 13-20。

³⁷ 黃佳惠所提出的 12 種分類包括：教義闡揚、惡習批判、中西新聞、天文地理、科學新知、人物傳記、專題報導、遊記見聞、通訊、書信、原住民相關、文字及語言探討。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頁 29-49。

³⁸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頁 119-124。

形成的重要性：殖民者必須要透過「翻譯」的程序來將外來事物轉化為在地種族所能理解、接受的語言與文化，才能進一步將西方的物質、制度、思想與文化「移植」到不同種族、語言與文化的殖民地台灣，使其在地化。³⁹這些直譯或再譯自西方文學的各種白話字文類，也和台灣的原創作品共同展現世界與本土的文化視域，激盪出繁花並茂的在地盛景。是以無論基督教如何與殖民主義曖昧糾葛，要探究台灣文學如何在清領時期「半殖民」的情境下以白話字接軌「現代」，我們都有必要往前梳理白話字文學如何在「翻譯」的過程中生成，才能看見白話字如何在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跨域、跨語言的對話與交混(hybridity)過程中，成為台灣文化、文學重要的一部分。

《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自 1885 年創刊至 1895 年進入日治之前的清領期間，已有上百篇文學作品，其中以散文最多，且和詩、小說比例相差懸殊。⁴⁰何信翰認為，台灣白話字文學不依循西方史詩或中國《詩經》以詩歌為始的傳統，是由於詩歌在台灣民間文學與漢古典文學的發展中已相當發達，再加上當時白話字是為了教育普及、傳道說理而設，所以白話字文學最初自然以較能彰顯論說功能的散文為主。⁴¹此外，也由於小說、劇本數量較少，整體而言尚未成熟，故以下將先以清領時期《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中數量最多的「白話字散文」，以及基督教結合音樂技術所衍生的「白話字（聖）詩」為主，初步勾勒此時期白話字文學的發展特色。

（一）空白中的空白：「戰前現代散文」中的「白話字散文」

其實在討論《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數量最多的白話字散文之前，台灣文學的「散文研究」本身就是一項相當有趣的論題。台灣當前的現代散文研究多自「戰後」起論，除了許達然、陳建忠等論者曾觸及「日治散文」的討論之外⁴²，目前現代散文的「戰前」系譜在台灣散文論中猶待考掘，以至於台灣現代散文仍「固無史也」。有鑑於此，孟樊提出了他對戰後現代散文系譜史觀的質疑，尤以諸多論者將戰後散文發展的系譜上溯至中國古典散文的傳統，更強調與五四現代散文的接軌，但卻缺乏對日治時期的梳理與討論，實是值得注意的議題。⁴³

³⁹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2009.08），頁 275。

⁴⁰ 李勤岸，台灣教會公報（1895-1969）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清國時代（1885-1895）資料數為 124 筆，散文 100 篇、詩 11 首、小說 10 篇、傳記 3 篇。網址：<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bout-2.htm>，使用日期：2012.09.11。

⁴¹ 何信翰，〈早期白話字詩的特色〉，收錄於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3 詩·歌》（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11），頁 ix-x。

⁴² 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收入《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1994.11）；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收入「時代與世代：台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12），頁 191-226。

⁴³ 孟樊，〈台灣散文的系譜史觀〉，《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頁 217。

但借題發揮，在「戰前現代散文」尚待證成之前，日治時期以前的台灣是否已經有「現代散文」的蹤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們勢必要從何謂「散文」，又如何「現代」，來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也必要注意到白話字散文在台灣文學史當中的特殊性。

參照鄭明嫻的定義，散文是與「韻文」相對的散行文體，範圍極廣，而後專指具備文學性，並與小說、戲劇、詩歌並行的文類之一⁴⁴，至於「現代散文」則是由「中國古典散文」、「傳統白話小說」與「西洋散文」(Essay)三道源流匯流而成的文體流變。⁴⁵但是，台灣匱乏於戰前現代散文的研究，而（不得不）將戰後現代散文的發展與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扣連，這已是台灣現代散文視野的既有侷限，再加上包含現代散文在內，整個「現代文學」系譜的「現代」，都經常被視為是濫觴自晚清以來，在西方國家逼侵的危機下企圖救亡圖存，並嘗試以「思想啟蒙」來適應全球化情境下的現代性所激盪出的反饋。⁴⁶那麼，要在全球化的視野下，來理解不以漢字書寫，且不同於於殖民現代性，較單純由宗教現代性的浸透，雜揉東西方文化而誕生的白話字文學，似乎就必須後設地回到文學本身，將之重新放在台灣文學史的脈絡中，才能在現階段「戰前現代散文」預留的空白之內，理解「白話字散文」在台灣文學現代化的過程中，到底具備什麼樣的意義與價值。

散文是一種容許敘述者以主觀的態度處理題材、進行敘述的文體，由於具備「題材多元」、「形式開放」、「結構流動」以及「語言生活化」等特色⁴⁷，所以相較於小說，以及更脫離口語系統的詩，散文實是一種更為接近實際語言行為的文學語言。⁴⁸是故，以白話字所書寫的散文之所以能在清領時期台灣的社會語境當中，成為《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發刊初期最主要的文類，肩負起教育、論述、傳道與啟蒙的重責大任，並展現強烈的寫實風格，著實和白話字強調口語書面化的特色，以及散文的語言性質與功能，二者相輔「加」成有關。如果再上溯至馬禮遜譯經之初，在四書五經與白話小說之間選擇以《三國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體裁作為翻譯範式⁴⁹，那麼白話字散文可以說是在中國現代散文自古典傳統的血肉中脫胎，又在晚明以降通俗文學的嘗試當中，透過傳教士以西方語言、書寫思維直接實踐的翻譯，以不同的語言主體與文字形式而孳生的一種變體。所以，由白話字散文的「混血」可見，無論是對中國或台灣而言，白話字以地方語言為主體，進行「語言書面化」與「文學現代化」的時間點上，毋庸置疑遠早於以「國語」為之的五四新文學。

⁴⁴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出版社，1988.11），頁 1-2。

⁴⁵ 同上註，頁 7。

⁴⁶ 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聲》（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3.11），頁 1-2。

⁴⁷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27-32。

⁴⁸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1989.03），頁 2-3。

⁴⁹ 楊雅惠，〈十九世紀基督新教東傳的漢語聖詩——《養心神詩》初探〉，收錄於龔顯宗等編，《移居、國家與族群》（高雄：中山大學人社科學研究中心，2010.05），頁 52-53。

就翻譯的意義來說，白話字文學初期多出自西方傳教士譯筆，強調文學與宗教的結合而具備強烈的宗教取向，確實與五四新文學的現實關懷不同。但相對於由北京話口語配合漢字，在現代化的淘洗中早已進入「文學美學」發展階段的「中國白話文」書面語，白話字文學真正的「現代化」意義與價值卻並不一定在此。對缺乏載體的地方語言來說，花更多時間透過白話字或其他方式（例如和製「漢語」，包括北京話、台語……等）來完成「語文現代化」的工程，這個技術成熟的時間差並不難想見。當基督教基於宣教的現實目的，企圖藉由翻譯進入異地語境的同時，為非主流（漢）語言開啟漢字以外的「語言現代化」途徑，不但在歷史上幾度催發台灣語言的書面化，相較於日治時期之前「漢文」作為書面語的背後實為言（台語口語）文（漢文）斷裂⁵⁰，口語嚴重缺乏書面化的語言現實，白話字文學扮演著以羅馬字將台語錘鍊為書面語言，將西方的現代性以台灣話轉化為台灣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與文化，並擴充台語語言談功能(elaboration)的媒介角色⁵¹，在克服主流／官方語言與非主流／方言之間自外而內，從物質文明(Material civilization)到精神文明(Spiritual civilization)逐步吞吐現代性的時差問題上，白話字文學的重要性與效益不可謂不大。

於是，在《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清領時期的積累當中，我們即可看見台語藉由白話字的書寫，形成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傳知散文(informative)⁵²為傳教與教育所注入的啟蒙力量，其中更可見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之間豐富的文化流動網絡。例如發刊詞與〈Pêh-oē-jī ê Lī-ek〉系列文章，即是分析台灣的語文環境之後，確立以白話字作為傳教媒介的教育論述，而在日治時期實施兒童義務教育之前，《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甚至已出現〈Lūn kiù Siâu-liân lâng〉(論救少年人)、〈Pák-kha ê iàu-lūn〉(縛跤 ê 要論)、〈Kà-sī cha-bó gín-ná〉(教示查某囡仔)等，針對青少年與兒童，尤其是女童的教育提出宗教、人道立場的關懷與指導。醫學衛生方面，〈Lūn kiù chiáh A-piàn ê lâng〉(論救食阿片 ê 人)、〈Lūn ēng A-piàn oân ê guí-hiám〉(論用鴉片丸 ê 危險)等篇則反映當時台灣社會吸食鴉片的藥癮惡習；〈Poê-iúⁿ Gín-ná〉(培養囡仔)更是罕有的育嬰知識，從斷母乳的時間到副食品的建議均有詳細的說明。

除此之外，教會醫療特別扶助欠缺妥善社會福利照顧的盲人與癱瘋病患(Thái-ko pīⁿ)，也透過散文述其關心。例如甘為霖〈Chhiⁿ-mî-oh〉(青暝學)引以賽亞「Hiah-ê 青暝--ê, 我著牽--伊; m̄-bat 路, 我著 chhoā--伊; hō 暗做光, khiau 做直。」⁵³一句，充分顯現把為信眾打開心眼的佈道精神，深化為對盲人與眾多社會邊緣

⁵⁰ 在這裡，筆者以「言文斷裂」指涉「語言無法透過文字書面化」的問題，和一語言有文字符號可承載的狀況下，企圖拉近「口語」和「書面語」距離的「言文一致」不同。

⁵¹ 張學謙，〈你會曉「講母語散文」，敢會曉「寫母語散文」？〉，收錄於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5 散文》(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11)，頁 xv。

⁵²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頁 237。

⁵³ 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1 文化論述 kap 啟蒙》，頁 226。原刊於《TÂI-OÂN HÚ-SIÂⁿ

人的生命關懷，〈Lī-ek chhiⁿ-mí lāng〉(利益青暝人)⁵⁴一篇更以科學精神為讀者說明導致眼盲的原因，並論述如何提昇盲人的生活自理能力。新知識方面，如〈Bīt-phang ê luī〉(蜜蜂 ê 類)、〈Chhiū-bák ê lī-ek〉(樹木 ê 利益)、〈Tiòh toā-táⁿ ná sai〉(著大膽 ná 獅)、〈Lūn Kam-chià〉(論甘蔗)、〈Chò choá ê hong-hoat〉(做紙 ê 方法)等，許多西方的自然科技知識，以及清末台灣、東亞與世界的動態，都透過報導文學(Reportage)的形式而以台語逐漸出現在台灣人的視域當中。至於外來的基督教與台灣傳統信仰的齟齬，我們也能在〈Pak-káng Má ê Sin-bùn.〉(北港媽 ê 新聞)、〈Piān Sîn-chú Lūn〉(辯神主論)、〈Ngiá-pút Oan-ke〉(迎佛冤家)、〈Giòk-hông, Thian-hō, Sêng-hông ê lái-lèk〉(玉皇，天后，城隍 ê 來歷)等篇章，看見基督教對偶像崇拜的介入與批判，〈Kàn-chèng ngiá Pút-kut ê Pió.〉(諫諍迎佛骨表)更將韓愈〈諫迎佛骨表〉譯為台語，可見基督教致力去除迷信，並企圖調和東西方信仰內涵的諸多努力。

在翻譯與報導文學方面，無論是直譯或再譯自西方與中國的文本，質量均相當可觀。除了上述〈諫迎佛骨表〉之外，〈Iá-sor siók Goá〉(耶穌屬我)譯自上海，〈Kham-pi〉(謙卑)是由汕頭話再譯為台灣話，可謂地方語言之間的翻譯流動，〈Chhú-siān ê Jū-giān〉(取善 ê 喻言)譯自中國上海某月報，以及譯自《英國新聞報》的〈Lūn Siōng-tè chù-tiāⁿ ê sí〉(論上帝註定 ê 時)，其中更有攸關台灣歷史命運的〈Hô-iok ê Tiâu-khoáⁿ〉(和約 ê 條款)，將《馬關條約》漢文以白話字譯為台語。所以，《TÁ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於清領時期創刊即能有豐碩的，並以啟蒙論述為主的白話字散文作品，一方面必須歸功於白話字系統於廈門已臻完備，且已累積相當程度的知識體系與印刷經驗，能迅速普及於台灣社會；二方面更可看見當時的台灣，如何在台灣話的語境當中，以白話字與全球接軌。在「言文一致」的實踐上，白話字文學確實搭起讓信眾走入前現代社會建設與制度秩序的文化橋樑，無論是時間的先驅性與作品的成熟度來看，都遠超過日後中國白話文與台灣在地語言乖離，並且只能以書面語存在的侷限。

(二) 「西體東用」、「東瓶裝西酒」的白話字詩

「詩」在基督教文學當中，多是以讚美上帝、敘述聖經故事、勸世或者呈現基督教義以佈達信仰的「聖詩」為主。隨著基督教東傳，聖詩也由傳教士翻譯、改寫，甚或新創而來。例如一般認為流傳在台灣最早的聖詩，是英國倫敦傳教會的養為霖(Rev. William Young)依據原意以廈門白話重新譯寫，並增加數首新編，於1854年由廈門寮仔後花旗館印行的「漢文版」《養心神詩新編》。但「養心神詩」的編纂，其實又始自馬禮遜將當時流通的英文聖詩，包括蘇格蘭韻文詩篇、

KÀU-HOĒ-PÒ》，1893年8月，第100卷，頁77。

⁵⁴ 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1 文化論述 kap 啟蒙》，頁229-231。原刊於《TÁ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1895年8月，第125卷，頁78-79。

「英國聖歌之父」以薩·瓦茲(Isaac Watts)的詩歌、浪漫主義詩人威廉·考伯(William Cowper)與約翰·牛頓(John Newton)所合著的聖歌集 *Olney Hymns* 等，融合了中國古典文學的詩文體例、典故及語法，先譯為漢語散文，而後再譯為韻文而成⁵⁵，後續諸多版本的「養心神詩」(lóng-sim-sîn-si)與「聖詩歌」(Sèng-si-koa)的積累編成即濫觴自此。此外，不同地區、各種版本的聖詩之間並不是單一的、線性的繼承或進化，相反地，聖詩的編纂經歷漫長且複雜的翻譯旅行，不但襲用的文本來源多元，在創新與編選過後，更透過文化及語言的轉譯、東西方樂理韻律的交融，以及宗教價值觀的齟齬和摩擦，於在地演繹的動態過程中歷次集結。因此，透過多重交混而形成的白話字聖詩，其文類的特殊性對台灣文學史而言到底具備什麼樣的發展意義，更值得仔細梳理。

以「養心神詩」為例，馬禮遜雖然企圖使用介於文言與口語之間的折衷文體來翻譯聖經、聖詩，不過其於 1814 年編譯的漢文《養心神詩》仍大量採用古典詩文體裁與典故。⁵⁶相較之下，養為霖以廈門土腔白話重新選譯而成的漢字版《養心神詩》13 首，風格迥然有別，不但選譯的來源略有不同，同樣選譯自 1560 年《英文日內瓦韻文詩篇》，由凱斯(William Kethe)以詩篇 100 篇寫成的聖詩〈天下萬邦萬國萬民〉(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因為翻譯的立基點不同，於書面語的呈現也有所差異，對照如下：

1814 年馬禮遜《養心神詩》	1854 年養為霖《養心神詩新編》
萬萬民人在普天下， 以歡喜之聲頌神主； 樂服事之其美佈告， 進來其前及快樂舉。 爾當知以主實為神， 是其造我而非我自； 我等其羣者其養我， 而以為其羊取我至。 夫以頌言來進其門， 以快樂之心逕其堂； 常遠頌讚其之盛名， 益成如此乃應當揚。 因何耶我主神懷恩， 其慈悲永遠而在焉；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一齊來倚上帝面前； 大聲吟詩稱讚伊真， 上帝至尊人人着敬。 上帝以外無別上帝， 咱做百姓伊來生咱； 天頂地下獨伊一個， 至大至尊當來誦讚。 大家入殿堂門內， 同心同力敬拜上帝； 上帝之恩至萬世代， 更高於天更闊於地。

⁵⁵ 楊雅惠，〈十九世紀基督新教東傳的漢語聖詩——《養心神詩》初探〉，收錄於龔顯宗等編，《移居、國家與族群》，頁 52-53。

⁵⁶ 同上註，頁 52-56。

具真實常常立堅守， 並將於世得熙恬。 ⁵⁷	天下萬邦萬國萬民， 心肝歡喜稱呼上帝； 上帝慈悲愛痛憐憫， 長長久久永永不廢。 ⁵⁸
-------------------------------------	--

馬禮遜將 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 譯為〈萬萬人民在普天下〉，雖然不比其編譯的《養心神詩》第 15 首幾乎通篇援引《詩經》雅頌語典⁵⁹，不過本詩仍可見許多繼承漢文書面語之後的鑿痕。至於養為霖以廈門腔譯成的版本，不但大意簡明，更能直接以廈門話或台灣話誦讀。所以，即使是在漢語文化圈內，面對地方語言與漢字之間「言文斷裂」，甚至缺乏文字系統予以承載保留的語文現實之下，基督教結合「漢字」的表意優勢與「漢文」悠遠的書面語傳統，未必能成為教義傳播的墊腳石。當聖詩的翻譯進入以「地方語言」為主體的言說方式時，以「口語」所支撐的文化語境來媒合基督教義，再加以「文字化」的轉譯流程，遂形成白話字文學和漢文書面語之間最大的差異。

假如再由聖詩的韻律來看白話字聖詩譯體的形成和地方語言的主體性，以及西洋樂理韻律的關聯，白話字與漢文書面語的翻譯差異似乎就更清楚了。一般而言，聖詩所搭配的音樂韻律(meter)可分為規律型與不規律型，規律型有普通律(CM, Common Meter, 8,6,8,6)、長律(LM, Long Meter, 8,8,8,8)以及短律(SM, Short Meter, 6,8,6,8)三種⁶⁰，從前揭馬禮遜與養為霖的兩首譯詩也能看出依循 8,8,8,8 長律規律的特色。但有趣的是，在馬禮遜的譯本當中，除了〈萬萬人民在普天下〉之外，其餘的譯詩，以及自馬禮遜以降的各版漢文「養心神詩」，都是以仿擬古典詩文七言形式的 7,7,7,7 韻律為多。⁶¹反觀養為霖的廈門話譯本雖然只

⁵⁷ 聖詩均轉引自江玉玲，《聖詩歌：台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溯源》(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2004)，頁 130。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楊雅惠，〈十九世紀基督新教東傳的漢語聖詩——《養心神詩》初探〉，收錄於龔顯宗等編，《移居、國家與族群》，頁 55-56。

⁶⁰ 江玉玲，《台語聖詩與韻文詩篇》(台北：道聲，2005.04)，頁 99。

⁶¹ 馬禮遜以後，尚有米憐(William Milne, 1785-1822)、儒翰馬禮遜(John Robert Morrison, 1814-1843)、麥都思、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黎力基(Rudolph Lechier,)與賓威廉(William Chalmers Buens)等傳教士均曾編譯「養心神詩」，各版本詳細說明與韻律，可參見江玉玲，《聖詩歌：台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溯源》，頁 33-52。下表為參照江氏文字說明整理所得的統計資料，1851 年與 1854 年資料不足，僅能推算確定數量，實際上應更多：

年代	版本	聖詩數量	規律型	不規律型(7,7,7,7)
1814 年	Robert Morrison 《養心神詩》	30 首	1 首	29 首
1821 年	William Milne 《新增養心神詩》	50 首	7 首	42 首
1835 年	John Robert Morrison 《續纂省身神詩》	54 首	30 首	24 首
1838 年	Walter Henry Medhurst 《養心神詩》	71 首	1 首	70 首

有 13 首，但卻只有前三首採取 7,7,7,7 的韻律，其餘是 8,6,8,6、8,8,8,8 與 6,6,8,6 等規律型韻律。馬偕帶來台灣的 1871 年版聯合《養心神詩》59 首當中，七言約有 12 首。⁶²又參考甘為霖於 1900 年編成，堪稱「台灣版」養心神詩的 122 首《聖詩歌》，其中全部使用 7,7,7,7 或以七言為主的不規律型聖詩約 30 首，混雜使用七言約 2 首。⁶³整體看來，如果就漢文聖詩與白話字聖詩初期的承襲與發展而言，比較之下可以明顯看出兩者的特色所在：漢文聖詩幾乎是大量襲用古典詩文七言形式與語典的趨勢，白話字聖詩反而較不遵循漢文傳統的詩文格律，數量較少，但仍佔有一定比例。

此外，白話字聖詩和漢文聖詩雖然都在西方聖詩歌詞與樂理的 7,7,7,7 不規律型當中，找到七言句式發展的空間，但是和漢文聖詩所展現的古典七言格律相比，白話字聖詩卻反而更像長期流傳於台灣民間以說唱形式呈現的「七字仔歌」，與漢文聖詩的風格明顯不同。以下摘錄 1891 年〈Kàu-hōe ê hiaⁿ-tī só chò ê si kap koa〉（教會 ê 兄弟所做 ê 詩 kap 歌）為例：

白話字原文	漢羅
Khong-hi jī-tián ū ki-chài, Nng-jī lâ-sò ū chāi-lāi; Hák-būn ê lâng khi chhiau-chhoē, Kì-tī hô--jī cháp-it oēh.	康熙字典有記載， Nng 字耶穌有在內； 學問 ê 人去 chhiau-chhoē， 記佇禾字 11 劃
Bat-lí ê lâng bô hô-hūn, Ták-hāng só chò chīn pún-hūn; Chò lâng tiong-tit kiá ⁿ hàu-gī, Tit-tiòh Siōng-tè chin hok-khi.	Bat 理 ê 人無胡混， 逐項所做盡本分； 做人忠直行孝義， 得著上帝真福氣。
Lán thák sèng-hiân ê keng-si, Tiòh thàn chheh-lāi ê kà-sī; Sù-su ngó-keng ū kóng-khí, Hók-sāi Siōng-tè chin háp-lí.	咱讀聖賢 ê 經詩， 著趁冊內 ê 教示； 四書五經有講起， 服侍上帝真合理。
Chō thī ⁿ chō tē chin Chú-chái ⁿ , Chit-hō chiá ⁿ -sī thang kèng-pài; Pēng bô ki-chài ū Giók-hông,	造天造地真主宰， 這號正是 thang 敬拜； 並無記載有玉皇，

1842 年	James Legge 《養心神詩》	27 首	0 首	27 首
1851 年	Walter Henry Medhurst 《養心神詩》	117 首		28 首以上
1854 年	William Charlmers Burns 《神詩合選》	65 首		36 首以上

⁶² 整理自江玉玲，《台語聖詩與韻文詩篇》，頁 65。

⁶³ 在此以該詩首句是否為七言，以及在全詩中七言詩句數的多寡來判斷。數據整理自江玉玲，《台語聖詩與韻文詩篇》，頁 536-539。

Hiān-sî siók-jîn kiò Thi ⁿ -kong.	現實俗人叫天公。
Lán lâng sîn-hùn kāng chhit pē, M-sī chhit lâng ū chhit-ê; Lán ta ⁿ tai-ke ū kài-gāi, Kàu boé lêng-hùn kāng só-chāi.	咱人神魂共一爸， M是一人有一ê； 咱今大家有界礙， 到尾靈魂共所在。
Tiong-kok siū siâ bê-hék chhim, Hàn-tiâu liú-thoân kàu hiān-kim; Bêng-tè ê sî ài pài pūt, Chhe lâng chiū khi giâ hùt-kut.	中國受邪迷惑深， 漢朝流傳到現今； 明帝ê時ài拜佛， 差人就去giâ佛骨。 ⁶⁴

這首聖詩可以說是清領時期屈指可數的白話字詩中難得一見的長篇，以七字一句，四句一段，一共 24 段。延續不同於漢文聖詩的口語、直白特色，除了宣揚教義之外，本詩還批判性地創造了一種將台灣的漢文化、信仰傳統相容於西方文明與宗教的敘事。從康熙字典所銘刻的基督教中國傳教史開展，將中國傳統忠、孝、義等德性，以及四書五經關於「天」的討論，與基督「上帝」闡連在一起。同時，更企圖消弭中國傳統的偶像崇拜與迷信，企圖連結兩者之間不同的人神想像⁶⁵，把中國傳統的「神魂」牽引入基督教的「天堂」當中，靈魂終將「殊途同歸」。

如語言學家王育德所言，七言形式與漢語的韻律發展有關，但是於歌仔冊中大量使用的七字仔，卻是方言使用者自然領悟的韻律技巧，與古典詩文相比，是一種在押韻、平仄上相對自由的文體⁶⁶，也是「咬入在地塗肉ê文學形式」。⁶⁷故跳脫了古典詩文嚴格的格律規範後，白話字詩在歷史與技術的因素下，不但吸收了西方聖詩的韻律形式與押韻模式⁶⁸，出現相對於漢古典詩的「新詩」體裁，另一方面卻又保有漢文的民間傳統，兼納東西詩歌文學的特色與形式。從白話字聖詩的發展與流傳過程，以及前引難得的長篇聖詩創作當中，已可見西方文學與台灣文學匯流交融的在地展演。而在教會推行的白話字運動中所留下來的各種文學創作與現代文化論述的初胚，不但可能領先於台灣新文化運動初期的目標與實踐成果，確實也對台灣在日治時期之前浸潤於「前」現代的社會面貌有所描繪。

⁶⁴ 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3 詩·歌》，頁 228-234。原刊於《TÂI-OÂN HŪ-SIÂN KÀU-HOĒ-PÒ》，1891 年 9 月，第 76 張，頁 62-63。

⁶⁵ 例如賴英澤指出，由於台灣人的信仰注重神明的靈驗，人神之間往往建立於「交易性關係」(Commercial relation)之上，此外，台灣人亦多以道德內在理解宗教。因此，基督教人神之間「人格關係」的互動方式，以及重視教條律例的特色，顯然與台灣的信仰傳統有相當大的差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新樓書房，2000)，頁 74。

⁶⁶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王育德全集 3 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2000)，頁 191-194。

⁶⁷ 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頁 19。

⁶⁸ 何信翰指出，白話字詩採用歐洲拼音文字的押韻法，歷史因素是因為聖詩是由西方傳教士翻譯、改寫或創作，其白話字詩自然依循歐洲規則。至於技術因素，則是由於羅馬字語音外顯，表音限制較少，而漢字的字音與字義連結較薄弱，必須依靠嚴格的固定押韻來造成讀者的期待效果。參見何信翰，〈早期白話字詩ê特色〉，收錄於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 03 詩·歌》，頁 xi-xii。

第二節 被「遺忘」的傳統：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再詮釋

隨著《馬關條約》的簽訂，基督教在宗教與帝國的曖昧之間，將西方文明引渡到清帝國的邊陲——台灣。面對基督教在地化的諸多實踐，許多前行研究已從信仰、歷史、文化、語文等面向，肯定長老教會在台各種傳教建設的積極意義。文學研究方面，呂興昌自 1994 年以來，也早已在眾多史料當中，特別針對白話字的文學資料，包括清領時期創刊、積累、改版迄今的《TÂI-OÂN HŪ-SIÂ⁶⁹ KÀU-HOĒ-PÒ》，甚至日治時期蔡培火早於白話文運動之先提倡「羅馬字運動」的歷史事實揭櫫「白話字」的重要性。⁶⁹雖然就實際情況而言，白話字仍多流通於基督教徒的白話字社群之間，幾乎和日治時期的主流文化場域關聯甚少，自成脈絡⁷⁰，但新文化運動當中，教會白話字卻也不是完全沒有引起共鳴。因此，在日治時期白話字文學以及台語小說等文學研究的基礎之上，本節將以「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⁷¹的觀點，延續前述白話字文學的視角，側重於台灣新文化、新文學運動當中一道「被遺忘的傳統」——羅馬字，回到日治時期台灣文壇發明「新」文學的情境中，梳理在新文化運動中屢履挫敗的羅馬字運動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與特殊性的具體貢獻，以及羅馬字與台灣話文之間存在的共同歸趨。也就是將日治時期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視為一次整體的「台語文運動」，探討這兩條路線如何揭櫫台灣新文學語文論爭所要追尋的文化主體性，並重新在新文學的發展當中，梳理「台語文運動」的源頭與流向。

一、「等待」一個民族的誕生：台灣文化民族主義的開展

在前述討論中，我們已藉由白話字文學於清領時期在散文與詩歌兩面向的表現，釐清「現代性」——或者應該說在「全球化」的視角下，台灣對西方現代性的受容，以及西方現代性「在地化」後的異質性成為台灣文化一部分的過程。既然在 19 世紀以來西方新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對外擴張的影響下，甚至更早於 17 世紀時，台灣就已被捲入全球性的西方現代浪潮中不曾（亦無法）缺席，那麼，以「遲到」形容台灣的「現代性」，無異是一組著眼於殖民隱喻的焦慮修辭，忽略了在殖民政府治台之前，教會的「宗教現代性」對台灣所產生的影響，而後作為殖民體制嫁接、整合現代性的部份基礎的連續過程。

那麼，台灣人到底在「等待」什麼？這段空窗期的時間差意味著的，或許正

⁶⁹ 參見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於氏著《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頁 435-462。

⁷⁰ 當然，不排除台灣新文化運動者亦有可能因為信仰或其他因素接觸過白話字，但實際情況仍難以掌握。

⁷¹ 基本上，由於教會白話字文學在「當時」並未受到台灣文學、文化圈的重視，教會內外的台語文實踐基本上是斷裂分流的，因此本文所謂「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暫不包括教會白話字文學的發展動態。另外，由於「鄉土文學論戰」的範疇還包括以日文寫作的台灣作家的「鄉土」特殊性論述。故技術上，本文聚焦於台灣話文的討論，以「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為題。

如霍布斯邦「被發明的傳統」所言，「傳統」可能是人為建構的，也可能是短時間內無形中成形而來⁷²，當台灣成為殖民地，進入必須不斷思索著國族認同，艱難地適應自前現代過渡至現代的社會情境之後，如何因應「現實的需要」，自直接或間接吸收到的重層現代性當中，選擇所欲承接或棄捨的「傳統」，並以此創發屬於台灣自身的主體性，讓台灣文化、文學能往「自為主體」並具備「抵殖民」性格的「新」方向發展。這個過程，似乎才是台灣「新」文學在必然「遲到」的狀態下更應該仔細思考的關鍵，而不全然只是強調在日本追趕西方，台灣又落後於日本的線性時間差當中，台灣如何接收「現代性」的相對急迫感而已。

由於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的思潮以及日本大正民主主義的洗禮，在「文化成熟度」作為民族自治權的文化條件的政治前提下，台灣知識份子開始思考如何開創台灣獨立的文化／新文化，作為民族自決的基礎。⁷³但是，如果以1920年代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發起「啟發會」，後改為「新民會」所發行的機關誌——《台灣青年》雜誌作為梳理「台灣新文學」概念的起點，我們不難發現這一份企圖喚醒台灣民族意識以建立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在創刊之初想像「台灣新文化」之時，其實就透露出新文化建設在確認「傳統」，保存固有文化作為民族認同基石的同時，於諸多複雜的現代性脈絡當中做出選擇的時代情境。比如在殖民地語言與文字高度混雜的情況下，《台灣青年》內文包括簡易文言文、日文、漢字、假名，但這群「台灣青年」是以台語白話字寫成的《THE TÂI-OÂN CHHENG-LIÂN》來賦予這份刊物自我陳述的力量。那麼，留學殖民母國的台灣知識份子，在這些語文實踐與論述思維當中，逐步想像出來的台灣「新」文化是什麼樣貌？或許我們先以當時唯一一句能透過台灣話直接連結殖民地台灣的白話字烙痕，展開思考。

《THE TÂI-OÂN CHHENG-LIÂN》的浮現，與時任編輯與發行人的蔡培火密切相關。蔡培火以自身學習的經驗致力於台灣羅馬字的推廣，並早於1914年加入由日人板垣退助在台創設的「台灣同化會」時，就已提出推廣羅馬字的建言，可惜會內反對而無法實現。留日期間，蔡培火與日本基督教領袖植村正久結識，因而受洗成為基督徒，並藉由這一層會友關係結識了許多基督徒學者，同時也是政界要角的有力人士。這層關係不僅為日後議會請願運動所用，也為初創的《台灣青年》播下羅馬字論述的種籽。例如植村正久率先論及羅馬字，其〈願望台灣之青年〉一文站在自由與平等的教義立場，強調精神的與自然的「天演」融合，並發出「同化者未必為全然化作內地人之義也，蓋其間不可無自由以行取捨」之議，對於台灣基督教徒之間通用羅馬字表示「誠可驚嘆之進步，內地人則幾乎瞠若其後矣」，亦希望日本當局獎掖羅馬字普及，羅馬字，期待「或可由帝國南端

⁷² Eric Hobsbawm 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2002.08），頁11。

⁷³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06，頁145。

而北進乎」。⁷⁴此外，還有眾議院議員田川大吉郎〈歐美之思想與羅馬字〉、海老明彈正〈啟發台灣文化之方針〉等文，無論是論羅馬字與歐美思潮之間的進步關聯，或是激進如田川主張廢除漢字，直接吸收歐美文化才能達到知識普及，都為蔡培火日後的羅馬字運動奠下基礎。而當時的蔡培火以台語白話字為題，或是植村正久等人的羅馬字論述，是否都為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起步，銘刻了一個特殊的時代意義？關於這點，我們又必須要深入了解漢字文化圈當中，台灣的政治母國「日本」，以及台灣新文化運動大量拷貝、朝向的文化母國「中國」，如何在遭逢西方「知識域暴力」(epistemic violence)⁷⁵的現代化焦慮中，面對必然發生的語文衝擊。

日本在進入明治維新之後，前島密即提出《漢字御廢止之議》積極建議廢除漢字，改用日本固有的「假名」，以求實現「言文一致」的日語口語文，達到教育普及的目標，並認為「五洲的文字必將統一於羅馬字」，日本應立即改用羅馬字。此後，日本的文字改革出現「假名派」、「羅馬字派」，亦有極端主張改用英語或回歸傳統者，在這之間則有福澤諭吉、矢野文雄與原敬等人主張「逐漸減少漢字」的折衷方案。其中雖然亦有抱持「漢字不可廢」論者，但日本於1902年以採用音韻文字，減少漢字為宗旨，並成立「日語調查委員會」調查假名羅馬字之優劣得失之後，至少在1939年發生「左翼羅馬字運動事件」，左翼文字改革派被視為使用「敵國文字」而遭到鎮壓之前，日本國內都還有羅馬字的熱烈爭論。⁷⁶所以，即使不論這些留日台灣學生是否和蔡培火一樣，在台灣或到日本受到教會的影響而接納羅馬字，就當時日本社會對羅馬字的普遍討論而言，羅馬字論述都應該在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的文化視域內，而以相當政治性、宗教性的機緣出現在《台灣青年》之中。

另一方面，和台灣有文化之親的中國，同樣在西方列強所施加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壓力之下，試圖由「洋務運動」在技術上的西化破產，深入思考改革中國文化以救亡圖存，而由眾多知識份子發動五四新文化運動，並隔海為台灣留學生想像台灣文化挹注了諸多經驗與能動性。正當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為白話文學注入精神內涵的同時，「漢字」及其背後所承載的「舊」文化傳統卻也開始受到質疑，亦逐漸在五四健將之間開展為一場「文字改革」的議論。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聲浪當中，魯迅說「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錢玄同高呼「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陳獨秀則是將語文問題切割為「廢漢語」與「廢漢字」兩個層次，認為漢語為國

⁷⁴ 植村正久，〈願望台灣之青年〉，《台灣青年》1卷1號，1920.07.15，漢文部，頁29。

⁷⁵ 張君玖引用 Spivak 自 Foucault 「知識域」擴展而來的概念，指涉的是非西方國家面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時，除了政治經濟與軍事衝擊之外所遭逢的「思想暴力」(the violence of thought)。見張君玖，《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台北：群學，2012.03)，頁103-104。

⁷⁶ 關於戰前日本文字改革與羅馬字運動過程，可參考何群雄，《漢字在日本》(香港：商務出版社，2001)，頁3-73。

家民族之根，不易也不能廢，但他贊成錢玄同對漢字的觀察，也注意到「中國許多語言只能說出，不能寫出」的漢字缺陷，而在保存「漢語」的前提下開啟了使用世界語、注音字母、拉丁化拼音文字等文字改革的相關討論。⁷⁷

相較之下，台灣對於「漢字」存廢幾乎沒有展現多少懷疑，與日本、中國的情況顯然有所落差。因為不同於日本、中國由知識份子「主動」發起文字改革，議論漢字存廢相較，台灣的情況是：正當台灣知識份子還在思索如何建構台灣文化主體性之時，漢語（台灣話、客家話）及漢字等本土文化的重要元素，已逐漸被殖民政府逐步廢除「漢文」的危機所壟罩，台灣知識份子的焦慮於是以相當清晰的論述浮現出來，例如黃呈聰所言：

我們台灣的同胞，亦是漢民族的子孫，我們有我們的民族性，漢文若廢，我們的個性我們的習慣我們的言語從此消滅了！所以台灣的學校若不以漢文做必修科，明明將我們無視了……⁷⁸

至於主張羅馬字的蔡培火，則是將原本多為教會社群使用的羅馬字「世俗化」(secularization)⁷⁹，作為普及國語，為讓本島人抵達文明的「過渡工具」⁸⁰，對於殖民政府馳禁漢文的政策，認為「只可由其國之人創造之或改廢之」，而且「若係改革，則吾等亦有為發起者之一人之勇焉。」⁸¹亦即在政治的國語及文化的漢文之間，推動羅馬字運動。

在這樣的現實條件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相對於當時日本和中國針對廢除漢字與羅馬字、拉丁化的討論，台灣幾乎是自外於當時漢字文化圈的廢漢字震盪，而這種將廢止「漢文」等同於滅絕「民族性」的焦慮，也成為新文化運動初期相當普遍的論述內容。以薩伊德(Edward W.Said)的說法，這樣的現象可以說是逼使台灣知識份子必須提早「回應殖民主義所帶來的屈辱」，以「重新發現和重返被帝國主義的過程所壓制之土著過去的歷史」為基礎，進行「劃定文化疆界」的工程以開展意識形態的反抗。⁸²所以，作為近代國家透過教育養成「均質性」、「標準性」居民所必須的「國語」⁸³，又是殖民者企圖注入漢文教育的「精神血液」⁸⁴，日語在即將侵蝕台灣本土文化與認同的危懼之際，台灣知識份子幾乎別無選擇地選擇以保留固有文化「台灣漢文」為前提，展開對「新」文化、「新」

⁷⁷ 參見王愛云，〈陳獨秀與文字改革〉，《安徽史學》4期，2012，頁91-93。

⁷⁸ 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台灣》4卷1號，1923.01.01，漢文部，頁27。

⁷⁹ 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頁2。

⁸⁰ 蔡培火，〈新台灣の建設と羅馬字(二)〉，《台灣民報》1卷14期，1923.12.21。

⁸¹ 蔡培火，〈吾人之同化觀〉，《台灣青年》1卷3號，1920.09.15，漢文部，頁26-27。

⁸² Edward W.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10)，頁395-396。

⁸³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125。

⁸⁴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9.04)，頁47-50。

然而在恢復並改革「漢文」的隊伍當中，我們卻又難以忽視蔡培火的羅馬字主張斡旋於「國語」日語以及漢文改革論之間的特殊性。之所以難以忽視，是因為除了蔡培火孤軍疾呼羅馬字之外，在其影響之下的台灣文化協會，以及張洪南、葉榮鐘等人，都在建設新文化的共同願景下，程度不一地支持羅馬字。張洪南認為，為了推行大眾教育，達到台灣社會的現代化，並保存台灣文化及語言資產，眾人應重視文協所提倡的「台灣羅馬白話字」，並提出當時台灣社會對羅馬字的幾項誤解，包括認為羅馬字是外國字、只限基督教信徒使用，以及只有文盲才需要學習的錯誤觀念⁸⁶；葉榮鐘雖然對日本羅馬字運動與中國廢漢字論述不表期待，可是又以土耳其羅馬字的成功，呼籲眾人思考羅馬字的可能性。⁸⁷此外，台灣話文派的黃石輝、郭秋生⁸⁸等人也有注意到蔡培火的羅馬字論述，黃石輝更點綴應用於他的台灣話文論述當中。這說明了儘管蔡培火只是將羅馬字視為工具性的存在，不帶有任何民族想像的文化功能，並且一再申明不會採取內地（日本）羅馬字論者廢除漢字與五十音（假名）的激進作法⁸⁹，但這種堅持於作為文化語言的漢文，卻又妥協於作為政治語言的日語之外，還交混著羅馬字或拼音／表音文字的文化異質性而開展「反對文化」⁹⁰的複合式論述，甚至以此為基礎改良為「台灣白話字運動」。⁹¹我們可以說，蔡培火仍舊援用著來自西方的「他者」文化觀，為台灣新文化運動指引一條尋找主體性——「鄉土」所在的方向，並且在台灣文化場域發揮著一定程度的作用。而漢文化、儒學儘管在「東亞文化圈」當中淵源已久，總督府初期更據此發出「同文同種」的政治呼籲，但維繫「漢文」顯然不

⁸⁵ 在這裡要說明的是，如研究者陳建忠曾以賴和台灣話文實踐的複雜性為例，提醒我們無論是將台灣話文視為「台灣人的民族語」，或者強調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之間的對立者，恐怕都是以今日觀點解釋文學活動，有過度詮釋歷史之嫌，因此陳氏不認為台灣作家提倡台灣話文僅是日人禁絕漢文之下的權宜之計。這樣的觀點確實值得後續研究者時時反思，不過我們亦必須注意到的是，本文盡可能以台灣作家的集體性觀察台灣、日本、中國面對漢字存廢的態度，不同於以賴和個人對台灣話文的認知或想像進行推論（或者後文將提及的黃石輝，是否能作為回應陳建忠的反論？），更何況，再怎麼如何強調客觀性，研究者所「再現」的文學活動，都必然經過主觀的敘事過程。因此，筆者仍提出不同於陳氏的階段性觀察，作為後續討論的基礎。參見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2004.01），頁 246-247。

⁸⁶ 張洪南，〈誤解されたローマ字〉，《台灣》4卷5期，1923.04.10，和文部，頁 48-54。

⁸⁷ 葉榮鐘，〈關於羅馬字運動（一）〉，《台灣民報》260號，1929.05.12。

⁸⁸ 郭秋生雖較傾向以漢字完成台灣話文，但仍認為如果不能確認字音，有必要併用羅馬字或假名。但這種方法不常見於郭秋生的台灣話文嘗試當中。郭秋生，〈說幾條台灣話文的基礎工作給大家做參考〉，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頁 223-225。

⁸⁹ 蔡培火，〈新台灣の建設と羅馬字（二）〉，《台灣民報》1卷14期，1923.12.21。

⁹⁰ 施俊州認為，白話字不否定漢字、以工具性為主的思考雖然溫和，但卻具備潛在的反抗力，是一種另類的「反對的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參見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頁 8。

⁹¹ 這裡所說的「台灣白話字運動」不同於「教會白話字」，是蔡培火接受伊澤多喜男的勸告，在延續羅馬字運動「表音」精神的大前提下，以 20 個日本假名、6 個中華民國注音符號與 2 個新創字母，加上平仄記號而改良出來的新系統。見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 347。

完全是自然而然的「選擇」，而是吊詭地受到殖民者禁用漢文的反轉與介入，並且在挑選固有文化、整合各種現代性之間的異質性之後，在新文化運動者之間所磋商、妥協而來的論述策略與默契。

二、各自表述下的「鄉土」：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的思索與嘗試

從蔡培火以羅馬字啟蒙台灣大眾的主張當中，我們看見在他在維繫漢文傳統的策略背後，存在著挪用、吸收異質現代性，形成台灣新文化論述的獨特視野。那在整個台灣新文化運動的發展過程中，是否也反應著這些激盪所產生的變化？我們又可以從蔡培火早在「同化會」時期就在構思的複合式的論述策略，以及《THE TÂI-OÂN CHHENG-LIÂN》的鑿痕中看見什麼樣的可能性？只有蔡培火企圖以「現代」的異質性證成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嗎？或者還有更多人風雨同路，和蔡培火一同走在其所望見的「鄉土」路上？這又必須先談談，當時被眾人提出來作為建構台灣文化主體的固有文化——「漢文」到底具備什麼樣的內涵或想像。

其實作為固有文化的「漢文」是一個非常模糊且曖昧的概念。對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而言，「漢文」並不完全是古典文言文，受中國五四運動影響而形成的白話文也可以是「現代的」漢文。⁹²陳培豐亦以「文體共同體的想像」來形容當時台灣的漢文觀念在中國與日本兩條脈絡影響下的流動情形，指出在《台灣青年》初期的論述中，「漢文」、「白話文」之間的關係尚未被精確定義的現象。⁹³但是在一片對殖民政府實施同化教育、減少漢文課程的批判當中，蔡培火最先關注到的是本島人將面臨無法以「台灣語」作為學習途徑的困境，並主張「台灣話」及「漢文」才是符合「台灣特性」的教育。⁹⁴也就是說，對蔡培火而言，其所認同的固有「漢文」，其實有著作為「漢語」的台灣話，以及帶有強烈文化認同符號的「漢字」的語、文意義。一如陳忻提倡白話文背後也對台灣語言現實所提出的觀察與呼籲：「我鄉語言中，有因無字者甚多，不可盡以文字音寫之。」⁹⁵漢字除了難學、普及困難之外，也還存有「書同文」背後「言文不一致」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台語也將因為使用漢字，陷入容易譯回中國白話文並造成閱讀混淆，同時更必須和中國白話文在翻譯之間進行不可譯、不對等的「剩餘」(remainder)鬥爭。⁹⁶

由此可見，在新文化運動之初，蔡培火面對台語及漢文這「兩種固有漢族語

⁹² 王順隆，〈日治時期台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台灣風物》49卷4期，1999.12，頁110。

⁹³ 陳培豐，〈日治時期台灣漢文脈的漂流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台灣史研究》15卷4期，2008.12，頁31-86。

⁹⁴ 蔡培火，〈台灣教育に關する根本主張〉，《台灣青年》3卷3號，1920.09.15，和文部，頁40-60。

⁹⁵ 陳忻，〈文學與職務〉，《台灣青年》1卷1號，1920.07.15，漢文部，頁40-60。

⁹⁶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2008.04），頁34-38。

言」(two traditional Chinese languages)⁹⁷之間的「剩餘」對新文化運動的干擾，同樣基於解救「台灣話是僅僅可以口述，而不可以書寫……」⁹⁸的困境，選擇以相對於漢字的他者文字「羅馬字」，來逐漸消除這兩種語言之間因不可翻譯性而產生不利於啟蒙的矛盾與衝突，這的確只有自學過羅馬字，深刻認識台灣的語言現實，並看見漢字遙遠自民間的蔡培火才有可能發現的問題。在透過遷徙、競爭與同化的移民過程而自然形成的「台灣話」語境當中，蔡培火寫下《THE TÂI-OÂN CHHENG-LIÂN》，不但早早就召喚出西方基督教在東亞甚或台灣所注入的文化異質性，來處理台灣話的翻譯困境，也已透露出將台語視為台灣「民族語言」的思考，並且比誰都要更早、更清晰地呈現一個以台灣話為文化主體，包匯著許多異質現代性的「等身大台灣」的殖民地圖景，在與殖民者的政治、文化侵略斡旋之間，跨出其創新／改造台灣文化的第一步。

而且，在台灣通行既久的台灣話即將伴隨同化教育馳禁漢文，進而被國語／日語取代的現實，不僅在台灣知識份子之間激發出像連溫卿、連雅堂強調台語文字化、整理並保存台語的論述⁹⁹，也造成普羅大眾的焦慮與不安。例如 1929 年 12 月，《台灣民報》曾經刊登一篇批判台中一中禁止學生說台灣話，甚至將學生予以停學的社論。對於校方霸道的同化主義，社論最後以「台灣父兄」們的說法作結：

台灣語既是我們生來慣用的語言，任是如何嚴禁也不得不說的，但學校當局，這樣非常識的態度，真是太頑固云々。¹⁰⁰

這則社會寫真也驗證林淇養的推論，早在 1920 年代蔡培火、連溫卿，到連雅堂的台語文字化論述中，台灣文學、文化界共同的「台灣人身份認同」就已經浮上檯面，並開啟了台灣話文建設工程及其背後「台灣」意識形態的建構。¹⁰¹而白話文論述中一直沒有被重視的語文現實，也終於在中國白話文越來越靠近台灣的時候，揭示了白話文論述將比原本的台灣漢文更加「言文不一致」的理論盲點。

事實上，白話文論述作為一種「文體」的同時，並不是沒有往「言文一致」的方向變化。我們從施文杞對《台灣民報》當中逐漸形成「台灣式白話文」的批判就可以觀察到，當時台灣的白話文書寫已經開始展現強烈的口語特色（多用

⁹⁷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06，頁142。

⁹⁸ 蔡培火，〈我在文化運動所定的目標〉，《台灣民報》，1927.01.02。

⁹⁹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頁134-136。

¹⁰⁰ 〈極端的國語中心主義 僅說一句台灣話 被命停學一週間—台中一中的怪事—〉，《台灣民報》10卷293號，1929.12.29。轉引自丁鳳珍，日治時期台語文學資料庫，網址：<http://www.ntcu.edu.tw/hongtin/>，使用日期：2012.11.02。

¹⁰¹ 林淇養，〈台語文學傳播的意識形態建構：日治時期台灣白話文運動的文學傳播策略〉，《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頁139。

「啦」，並且使用「和制漢語」（如「開催」、「都合」）與台灣話文（如「鳥仔」、「狗仔」），同時更在文言與白話之間來回穿梭。¹⁰²這樣的在地化文體，完全反映著身為殖民地的台灣在渡越傳統與現代的同時，無法避免受到中國、日本語文拉扯的現象。但是，當白話文論者慢慢高舉中國白話文的大纛之後，他們所要革新的對象已不只是詩翁詩伯背後的古典主義，而是以中國白話文為標準看來完全不登大雅之堂的「台灣式白話文」及其文化底蘊——「土語」。張我軍明確地說「我們的話是土語，是沒有文字的下級話，是大多數佔了合理的話」，至於他改造土語的方式則是：

我們欲把我們的土語改成合乎文字的合理語言。我們欲依傍中國的國語來改造台灣的土語。換句話說，我們欲把台灣人的話統一於中國語；再換句話說，是用我們現在所用的話改成與中國語合致的。¹⁰³

尚且不論張我軍在移植五四運動的同時，是否也為白話文附加了政治意義，但張我軍拷貝胡適「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的時候，至少忽略（或根本上同意）了兩個重點，一是胡適的白話文學重點不在於「話」，而是在閱讀古典傳統與當代白話的過程中，接收漢字凝聚的共同體表象所打造出來的「書寫語言」；二是白話文學根本上排斥了俗語（地方語言），並且透過國家的力量才有可能打造出文學的「國語」¹⁰⁴——因為對張我軍而言，台灣的文化不但下級、低俗，甚至是「中國文學的一支流」¹⁰⁵，不夠資格也沒有必要自為主體。

這番取消了台灣主體性的土語改造論，在當時以台灣話作為自我認同的台灣社會而言，無疑是為新文化運動投下了一枚震撼彈。不過，也要等到黃石輝高聲呼籲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的時候，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才終於以相對的存在被提出來討論：

你是台灣人，你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巴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那支如椽的健筆，生花的彩筆，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¹⁰⁶

¹⁰² 施文杞，〈對於台灣人做的白話文的我見〉，《台灣民報》2卷4號，1924.03.11。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1979.03），頁52-54。

¹⁰³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67號，1925.08.26。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98-103。

¹⁰⁴ 林巾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65-67。

¹⁰⁵ 張我軍（一郎），〈請合力拆下這座敗草從中的破舊殿堂〉，《台灣民報》3卷1號，1925.01.11。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頁81。

¹⁰⁶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1。

黃石輝以共同的空間性、時間性、知覺和語言來界定「台灣人」¹⁰⁷，認為真正為了「台灣人」而寫的文學，應該是用「台灣話」來描寫「台灣」的文學，才是「台灣的文學」——鄉土文學。因為對黃石輝而言，「台灣人」不僅是在政治意義上是「民族的」，更是在階級意義上相對於「殖民者」以及「知識分子」的「勞苦大眾」，而「台灣話」才是勞苦大眾所能掌握的語言，所以台灣（民族）文學不能用「貴族式」的文言文和白話文，必須要「用台灣話寫成各種文藝」、「增讀台灣音」、並且「描寫台灣的事物」¹⁰⁸才能完成。此外，針對張我軍所質疑的台灣話的文學價值，黃石輝亦認為「無論什麼語言都有文學的價值，內山的生蕃話亦有文學的價值」，同時並點出原住民「沒有文字好建設他們的文學」的問題。¹⁰⁹

除此之外，黃石輝還認為「台灣是一個別有天地，政治上的關係不能用中國的普通話來支配；在民族上的關係（歷史上的經驗）不能用日本的普通話（國語）來支配。」¹¹⁰，郭秋生更說「政治主體不同，同時自不能以方言地域的地位自居。」¹¹¹可見，黃石輝提出「以台灣人說的語言完成的台灣的文學」所訴求的「鄉土文學」論述，想建構的不只是「台灣話的文學」或「台灣的民族文學」而已，一個更宏大的「台灣話的民族文學」作為整合台灣語言、文字的新提案，就此登上台灣新文化運動的舞台。

從知識份子的論述和一般大眾的反應來看，台灣話在當時被視為與殖民地台灣重合的民族語言或共用語，幾乎已經是普遍的社會現實，也是黃石輝強調「文藝大眾化」，以「勞苦大眾」所能掌握的語言書寫台灣／鄉土文學的基礎。但也就在此時，黃石輝的論旨如松永正義的觀察所見，悄悄地從「文藝大眾化論者」轉變為「台灣話文論啟蒙者」¹¹²？為什麼在相對於「大眾」，「台灣話」到最後反而成為黃石輝的論述重點？這個問題意識的微妙變化有什麼樣的意義？

吳叡人認為，黃石輝問題意識的轉變應是在台共全島大檢舉的風頭上做的自我審查，不應被視為立場的真正改換。¹¹³不過，黃石輝儘管是一個左翼論者，但他提倡鄉土文學的動機，主要還是針對台灣新文化運動中「一班古典主義者的冬

¹⁰⁷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06，頁177。

¹⁰⁸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1。

¹⁰⁹ 同上註，頁2。

¹¹⁰ 黃石輝，〈我的幾句答辯〉，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70。

¹¹¹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45。

¹¹² 松永正義，〈郷土文学論争（1930～32）について〉，《台湾文学のおもしろさ》（日本東京都：研文，2006），頁138-139。

¹¹³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06，頁178。

烘先生們」，以及向台灣文學界丟炸彈的張我軍所執意要強調的「雅俗」問題。然而，「中國語雅而台灣話俗」以及「國語 v.s. 方言」的爭論背後，其實也是一場討論著「台灣共同語言是什麼？」的論辯，故黃石輝的台灣話文論強調「啟蒙」的立場，必須順應「大眾的要求」，改善台灣社會眼前的「文盲」困境，無非是要證成相對多數的「勞苦大眾」所使用的「台灣話」，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論述中有其文化正當性。

黃石輝的第二層論證，提到「無產階級」的要求就是「作一個完全的『人』的生活，享受應有的『權利』，盡應盡的『義務』。」¹¹⁴因為黃石輝認為，假如不透過台灣話，新文學與新文化的意義將無法普及於勞苦大眾之間，但如果不能建設文字、以文學保留並呈現台灣話，那麼台灣話必當隨著殖民者的同化政策，以及模糊曖昧的白話文論述而逐漸消失，不能藉由台灣話理解、認同台灣文化的台灣人，如何成為一個「完全的人」？所以，黃石輝不以普羅文學而用鄉土文學申論「台灣話的民族文學」，所要強調的是「台灣話」連結「台灣人」與「台灣文化」的重要性與特殊性，「台灣話」既是本質也是策略，並期待最後能透過文學的形式，將之錘鍊為成熟的書面語言，進一步完成「民族的印刷語言」。

更重要的是，黃石輝特意強調鄉土文學要能「朗讀」，其實就顯現當他要推動「台灣話的民族文學」的時候，已經對「言文一致」在台灣的矛盾，以及台灣話在「言文一致」當中的「言文斷裂」困境有所認知：台灣不但沒有中國白話文對應的北京話語境，中國白話文的漢字和台灣話慣常使用的漢字也有所差異，所以他延伸出來的「言文一致」所要處理的並不是「口說語」和「書面語」之間關於「文學語言」的差異，而是自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展以來就沒有被正視的根本癥結：那就是在白話文對「語音的忽略」之下，台灣話如何以文字保留，而且為了台灣漢民族認同以及與中國互通，必須是透過「漢字」保留的問題。¹¹⁵跨越這個語文命題的斷裂困境，才能更進一步防止台灣文化在同化教育中加速消亡。也因此，這時候的黃石輝才會不意外地加入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的陣營，並幾乎直接放棄了引起諸多爭議的「鄉土文學」。¹¹⁶

至此，我們可以確認的是，雖然「鄉土」在日治時期前後有不同的意義，但黃石輝、郭秋生的「鄉土」，顯然是要「進一步在內容和形式上都要求更大自主

¹¹⁴ 黃石輝，〈答負人〉，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00。

¹¹⁵ 「我們目下所需要的是可以用台灣話直讀的文字，至於狹義的文學作品還是一個問題」，黃石輝，〈鄉土文學的再檢討給克夫先生的商量〉，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57。

¹¹⁶ 例如黃石輝說：「假使有人想要將鄉土文學台灣話文提做私伙，我總敢笑伊是憨大頭。」，黃石輝，〈答負人〉，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00。而論戰後期郭秋生也澄清：「鄉土文學的問題，這和我所提倡的漢字台灣話文的建設本是個別的問題，這點須要截然分別，莫得混淆相提並論，弄成認識不足的笑話。」，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台灣話文〉，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36。

性之表現」¹¹⁷來證成台灣主體性的語文運動。照著先後脈絡來看，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這篇文章，可以說把黃石輝最初模糊曖昧的問題意識解釋得更清晰了。郭秋生除了強調「言語不但是集團生活的反映，更就是民族精神的體現」來為台灣話文搭建民族語言的正當性，以及以語音為主的文字化論證基礎之外，他更重要的觀察在於洞視殖民者的同化教育讓台灣人成為「文盲」的文化危機，這也是為什麼郭秋生後來為什麼說「不能滿足中國白話文，時代不許滿足的中國白話文使我用」¹¹⁸的原因，因為他警覺到：同化教育根本上就是殖民者要將「殖民地的原住民都套上本國的文化」，是從「語言」、「文字」、「生活樣式」到「固有精神、族性」的「去勢」過程。台灣人如果接受忽略台灣特殊性的同化教育，不但將學無所成，甚至「連台灣式的最低生活都保不起」。¹¹⁹在這裡所說的「台灣式」的生活，不是只有物質、技能層面，還包括精神層面的「文化」意義。郭秋生如是延伸：

原來言語是集團生活的產物，有其生活的習慣，而後有當該言語的出現。是故，一個言語集團雖是移住在他言語集團裡生活，非說他集團的言語不可，其於固有的生活樣式也萬不能廢止。而從他集團之樣的固有的生活樣式已無從廢止之限，則又何能離開當該生活樣式所產生的固有言語？¹²⁰

郭秋生認為言語與集團生活樣式息息相關，所以他才會更加強調「文盲世界」的真正意涵：「就是台灣語來說，要不是在各家庭自然的習得和生活使不得分離，怕都要亡台灣語使台灣人將加上一個語啞症了。」¹²¹

又例如黃石輝為了反對點人所提出的：「除了台灣白話文而外，還有在來所襲用的漢文（文言）和日文等等，如果學會了任何一種的文字，文盲症是『自然的』可以療救的。」¹²²，特地以「國語讀六冬，不識屎桶坊」¹²³點破彼此之間對「文盲」的定義差別——解救文盲不是識字就好，而是使用任何一種非台灣特有的語文都將脫離台灣的，同時也是勞苦大眾的現實。這也說明了黃、郭二人的確是針對殖民者不公平的同化教育產生文盲，並以台灣話文積極與殖民者爭奪民眾

¹¹⁷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與研究論集》（台北：允晨，1993.08），頁 253。

¹¹⁸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97。

¹¹⁹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1-43。

¹²⁰ 郭秋生，〈還在絕對的主張建設「台灣話文」〉，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44。

¹²¹ 同註 119，頁 39。

¹²² 點人，〈檢一檢「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86。

¹²³ 黃石輝，〈和點人先生談枝葉〉，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15。

教化權¹²⁴，但他們透過台灣話文論述所要消除的「文盲」，更是台灣人與台灣文化之間，因台灣話無法以書面留存，而產生的文化與民族認同危機——也就是「文化之盲」。「文盲」不是單純的識字問題，而是必須以漢字、台灣話解救「文化之盲」的意涵，將台灣話文的民族想像與左翼的階級關懷接合在一起，呂興昌認為這就是黃石輝「超階級」的指涉所在：

伊就是咧暗示，佇殖民統治下兮台灣人，無論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母語，既然受著誠無天理兮壓制俗剝削，當然會使講攏是一無所有兮普羅大眾。¹²⁵

日本大正民主強調文化本位，將「人」視為「道德主體」(man as moral agent)的文化主義¹²⁶之精神，而黃石輝和郭秋生特別強調台灣「人」與台灣「文化」之間必須透過「台灣話」聯繫的重要性，正是在台灣的社會現實之中尋求文化主義的實踐，這樣的傾向甚至在「民間文學」的採集行動中更為明顯。例如黃石輝鄉土文學論述的開端——鄭坤五〈台灣國風〉，從其以「不仰拾中華唾沫」努力提倡以台灣話文完成的褒歌藝術，以及後來支持台灣話文派，都可窺見他採集民間文學欲以證成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想法。¹²⁷郭秋生主張收集「歌謠」，雖然是為了從「環境不惠」的兄弟身邊，進行既有的台灣話文字彙整工程，不過他背後卻有著民俗學研究的關懷。¹²⁸此外，雖然台灣話文運動經常被理解為反對者因為傾向中國認同，以及將台灣話視為粗鄙、次等的語言，而扼斷了「台灣話的文學」建設可能性，以至於台灣話文陣營也因為技術問題無法有效克服而終告消沉。但事實上，台灣話文仍然作為一個鮮明的「主體」，在中國／台灣式白話文以及日文之間逐漸被嘗試著，呈現台灣人說台灣話的口語現實。正如陳逸松談到語言問題時所說：

由於沒有與吾人現在所使用的語言——台灣話一致的文字，一直以來僅能藉國語或白話文來書寫，用這種方法書寫的文章不過是譯文罷了。因此決定一個言文一致的語文是今後無論如何都必須要做的事。¹²⁹

¹²⁴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收錄於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 83-110。

¹²⁵ 呂興昌，〈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論黃石輝台語文學兮觀念和實踐〉，《台灣新文學》6 期，1996.12，頁 292-293。

¹²⁶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 卷 2 期，2006.06，頁 149。

¹²⁷ 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頁 405-406。

¹²⁸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92-93。

¹²⁹ 《台灣文藝》2 卷 5 號，1935.05.01，頁 133。譯文轉引自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頁 272。

所以，從蔡培火寫下《THE TÂI-OÂN CHHENG-LIÂN》，提示著西方透過基督教在東亞所注入的文化異質性有實踐的可能、黃石輝以左翼階級民族論為基礎而建構出來的語言民族主義，到郭秋生的台灣話文理論，甚或中國白話文與台灣話文的合流與交融，我們都可以發現他們所欲維繫的民族語言——台灣話，正是新文化運動在台灣複雜的語文情境中所欲探求，足以抵抗殖民同化的「主體」所在。但是這個主體，卻在台灣、中國與日本的政治與文化拉扯間始終破碎著，像是蔡培火推廣羅馬字與漢文並行，以及後期提出新式「台灣白話字」的混雜論述，黃石輝、郭秋生必須輔以羅馬字、假名來呈現台灣話，都證明了「新」文學面臨語言與文字的文化衝擊，實際上經歷了相當複雜的選擇與協商，是透過各種異質性的交混才被確立、呈現出來的在地現代性，也是一種無法單以面對日本的殖民現代性、單一語言來確立的文化現象。然而，日治時期台灣人以本土語言、文化建構台灣主體性的民族想像，卻也因為台灣話文運動出現瓶頸，加上同化教育的釘根、戰事升溫、漢文欄遭廢，殖民地台灣進入戰間期皇民化運動的高峰而暫告沉默。

第三節 文學史的「新」思考：戰前台語文學的文學史意義

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壇，在殖民性與現代性的雙重擠壓之下「發明」了「新」文學的傳統，但後設看來，台灣文學史以日治時期作為「新文學」的斷代，甚至繼承了殖民情境下回應現代性與殖民性而發展出來的文化策略，是否亦有縮限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可能？一如黃美娥的提問：

如此的書寫，暗示了研究者將台灣新文學的興起視為與傳統文學的決裂與對立，但此等「斷裂關係」的呈現，是否就是考察台灣文學由「舊」到「新」發展進程的唯一視角？¹³⁰

本章針對戰前台灣文學的形成，以及台灣「新」文學各種可能的意義進行解構與重構，提出「戰前台語文運動」的概念，並以清領時期的白話字運動以及日治時期台語文運動，來理解台灣社會自教會系統伏流而出的羅馬字運動與台灣話文之間的論述關係，二者所具備的歷史與文化淵源，目的在於呈現日治時期以來，台灣「新」文學背後所蘊涵的「斷代」、「殖民」，甚或是「漢文化」等等暗喻與賦義，如何極度限制了台灣文學認識論的積累與發展。首先，清領時期基督教來台設教，為台灣帶來前現代的西方文明建設與制度，也以發展成熟的「白話字」為台灣的地方語言開啟文字書面化的契機，不僅被教會視為傳教與啟蒙的利器，台灣也因此出現不同於漢字、漢文傳統，以羅馬字譯介、創作的「白話字文學」。從清領時期《TÂI-OÂN HÚ-SIÂN KÀU-HOË-PÒ》初期數量最多的「散文」，以及「聖詩歌」的形成、流傳及衍繹來看，白話字散文、詩歌可以上溯至馬禮遜譯經之初，

¹³⁰ 黃美娥，〈迎向現代——台灣新、舊文學的承接與過渡（一八九五—一九二四）〉，《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語文想像》（台北：麥田，2009.03），頁 31。

參照中國近代文學的流變經驗，以西方語言、書寫思維直接實踐的翻譯歷程，可以說是中國與台灣文學現代化的發展過程中，以不同的語言主體與文字形式而孕生的一種變體，其背後不但具備複雜的文化譯介網絡，更因為長老教會奉行基督新教佈道的精神與策略，強調以受教者的語言傳道，而讓在地的語言及文化得以透過白話字的實踐，有機會推昇到知識的啟蒙與文學的藝術層次。換言之，在基督教文學與台灣文學跨域、跨語言的對話與交混過程中，白話字文學作為台灣文學重要的「現代」實踐，已逐漸成為台灣文化、文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台灣話日後自為主體的重要異質媒介。

教會內的白話字文學到了日治時期，發展其實更為快速蓬勃。《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除了開始大量刊載短、中篇小說之外，1920年代已有賴仁聲〈An-niû ê Bák-sái〉（俺娘 ê 目屎）、鄭溪泮〈Chhut Sí-soàⁿ〉（出死線）等長篇宣教小說，雖然因強烈的傳教勸說而折損了些許文學價值，但是《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以在地語言進行「我手寫我口」，啟蒙大眾、紀錄社會並保存語言文化等實踐，以及蔡培火在新文化運動中以白話字追求文明開化，並將自西方舶來的白話字與台灣在地的漢文化結合，推昇到反殖民運動層次，都為這項台灣的現代印刷事業賦予了相當重要的時代意義。¹³¹

雖然就實際情況而言，白話字及文學創作仍多流通於基督教徒的白話字社群之間，和日治時期的主流文化場域關聯甚少，而蔡培火也幾乎沒有運用長老教會推行白話字教育的實績，這是否關係到他在東京才成為基督徒，以及站在推行反殖民運動的立場，教會體系所能提供的知識資源有限？此非本文要處理的細節，但顯然從一開始，戰前台語文學透過白話字與漢字所展現出兩種不同的文化底蘊，在其發展過程中並沒有完全匯流起來的機會和條件。台灣人面對這兩種文化時的選擇態度，以及兩種文化在台灣文化、政治、社會場域當中的匯合與分流，終究使得日治時期新文化運動，形成以漢字為中心的羅馬字論述，而且幾乎只見蔡培火孤軍奮戰。

可是，我們仍不能因此低估羅馬字的影響力¹³²，自蔡培火擔任《台灣青年》編輯與發行人，以《THE TÂI-OÂN CHHENG-LIÂN》及加入台灣文化協會，為新文化運動刻下台灣話的聲紋以來，他業已揭槩了一條通往「鄉土」的道路。在一片主張保留漢文，並朝向曖昧的白話文努力的喧嘩當中，蔡培火清楚地認識到「台灣話」作為主體的重要性，因此在漢文馳禁，保存漢文為固有文化作為一種「別無選擇的選擇」同時，蔡培火已觀察到白話文的最高指導原則「言文一致」，無意也無法處理台語及漢字之間的「斷裂」問題，於是他運用參雜了異質性的複合

¹³¹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頁 52。

¹³² 如呂美親所言，黃春成寄給葉榮鐘的簽名照以「Ng, Chhun-sêng」署名，日治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對白話字的掌握與接受程度或許比想像中來得高。同上註，頁 87。

式文化論述，企圖運用羅馬字消除「台語」及「漢文」兩種主體性之間的「剩餘」，召喚受到壓迫的被殖民主體，同時推動現代化進程的一種輔助策略，用以證成台語的主體性與異質性，來突顯台灣民族的存在現實。至於白話文亦終於在中國的標準逼臨後，由黃石輝、郭秋生重新論證台語在台灣人與台灣文化之間扮演的重要角色，並透過台語文字化和民間文學的採集，往「消除文化之盲」的方向努力著。而且在這之間，羅馬字依舊被視為漢字以外重要的文化工具，在黃石輝、郭秋生的台灣話文論述當中星火點綴地閃現。

呂興昌曾先驗地說：「台灣新文學的萌芽時期似乎應該提早三十多年：它可能不是出現於 20 世紀的 20 年代，而是發生於 19 世紀的 80 年代。」¹³³可是為什麼在「現代化」進程中，率先以台灣的本土語言實踐「我手寫我口」，並也確實出現了散文、新詩等現代文體的白話字文學，仍為當前研究所忽略？這似乎證明了日治時期以降，台灣「新」文學所預設要談論的並不全然是「現代性」的問題而已。無論是在日治時期「被殖民」境況下的新文學運動，或者是戰後「後殖民」的台灣研究，「新」文學史在現代性之外更強烈的「殖民譬喻」，都已讓「漢字」、「漢文」成為被殖民境遇下台灣主體性的文化符碼，而讓其中混合著羅馬字或其他論述（例如使用假名、世界語）的異質性近乎消失，更遑論幾乎與主流文化場域無涉的教會白話字文學。此外，不少研究者和台灣話文論戰反對方抱持著類似的觀點，認為台灣話粗鄙、有音無字、無法形成文學語言，更無法滿足台灣對近代化的需求和渴望。但是這些論述卻都迴避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為什麼台語作為一種廣為台灣人所使用的本土語言，卻反而無法完成文字標準化，更難以被精練為文學語言？如果台灣話文是由於缺乏「國家」的介入與投資，「鄉土」所指涉的「民間」不堪支持台灣話「標準化」¹³⁴，那麼何以在台灣，一樣沒有國家力量介入的中國白話文，卻可以比美作為「國語」的日語，躋身文學語言的選擇之一？

將「翻譯」作為邁入「現代」的必然途徑或標準，白話字文學豐富的翻譯網絡，以及比起以漢字書寫的中國白話文或台灣話文，更能在「言文一致」的目標上，展現台灣以在地的多元性格回應全球化下現代性的姿態。換言之，「台語」本身藉由白話字進行的翻譯工程，其實並不缺乏與西方近代文體接觸的經驗，但是也就如同陳培豐所說：

日治時期甚至於戰後，以漢文為媒介，台灣在「祖國」與「殖民宗主國」左右逢源之下，同時享用了兩個現成翻譯管道的成果；而不曾有過嘗試使用自己的本土語言，扎實體驗翻譯之旅的強烈動機或必要性。¹³⁵

¹³³ 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頁 459。

¹³⁴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09-110。

¹³⁵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邱貴芬、柳

台灣話與漢文作為「兩種固有漢語」之間所存在的斷裂，以及其他語言共享漢字作為表意符號，使得語言和語言之間主體界線漸趨模糊，台灣話文反而更容易譯回中國白話文，而台語透過「白話字」與「台灣話文」所形成的兩道翻譯實踐也幾乎溝渠不通。所以，我們可以反思的是：如果台灣話文作為民族想像的文化媒介，其中蘊藏著對「沒有文字好建設他們的文學」的原住民族的關心，卻因為選擇了漢字並「發明」了漢文化的傳統而無法實踐，那麼，時代的限制，是否仍是未來台灣主體性論述的限制？

要再強調的是，當日語作為「國語」，在皇民化政策下成為台灣作家另一條回歸鄉土的途徑時，當時台灣作家使用台灣話文的掙扎、困頓，而至妥協於白話文與日文的書面語技術，這顯然才是「不得不」的選擇。因為台灣在戰前根本從未進入「北京話」的社會語境，日語雖然作為國語被大力推行，但總督府並未全面禁止本土語言的使用¹³⁶，國語運動也因此無法完全絞斷台灣人與台灣話的文化連帶。¹³⁷儘管使用的是以中國白話文為主，交混台灣話文的文體，但這些作品到最後卻都企圖透過台灣話文持續召喚現實的「鄉土」作為共同的歸趨。¹³⁸所以，提出「戰前台語文學」的發展，或許可以讓我們更精確地梳理日治時期的台灣以「台灣話」為主體，自不同的時間點與路徑接收、嫁接、選擇蜂擁而來的異質現代性，並在世界、東亞的舞台上，展現台灣在地「翻譯」而生的現代性的過程，以及「台灣話」在這當中為台灣民族想像所提供的能動性，甚至台灣話文運動的瓶頸。

因此，對台灣而言，必然晚進於日本甚或西方的「現代性」的差序，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或許從未「遲到」過，而以新／舊、現代／傳統、殖民／被殖民的對立框架作為「新」的唯一解釋，以「遲到」修飾台灣對現代性的受容，這樣的說法顯然只捕捉到「殖民現代性」的影響而已。無可否認，「殖民現代性」侵入對台灣的影響固然深刻，但研究者張隆志亦曾深切提醒我們：殖民現代性分析並非「殖民地現代化」的代名詞，更非機械性地描述「在殖民地的現代性」，而是要

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頁 228。

¹³⁶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年代：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2003.02），頁 91。

¹³⁷ 例如中島利郎認為，皇民化時期邁入高峰後，即使強迫使用日語而有 57% 的日文通曉率，但不只是語文程度上有分別，台灣人在口語上應該仍然較熟悉台語，故在廣播宣達政令方面，社團法人台灣放送協會(JFAK)於 1942 年增設了以台語為主的第二放送頻道。而且又因為收聽廣播者多為資產階級或知識份子，相對於多數農民工人而言並不普遍，放送難收實效，所以竟然由新竹州總務長平原提出進行「台灣語啟發運動」，提出「台語復權」的地方行政宣告，可見台語仍是當時台灣人最主要的語言。中島利郎著，彭萱譯，〈日治時期台灣研究的問題點——根據台灣總督府的漢文禁止以及日本統治末期的台語禁止為例〉，《文學台灣》46 期，2003.04，頁 298-317。

¹³⁸ 如王詩琅所言：「台灣語式的白話文之嘗試者漸增，而也漸漸地決定為它的主要方向，由我們看起來，固然是個必然的歸趨。」參見王錦江，〈一個試評——以「台灣新文學」為中心〉，《台灣新文學》1 卷 4 號，1936.05.04。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217。

辨明「殖民主義」與「現代性」在母國與殖民地的共構關係與歷史時態。¹³⁹我們並無法單由「殖民現代性」看出台灣在受到全球化影響的歷史進程中，如何逐步積累邁向「現代」的資源與能動性，亦無法單以日治時期就能完全釐清台灣如何因應歷來被殖民的現實，而自重層的、異質的現代性當中進行「選擇」，藉以創發自身主體性來邁入現代的複雜成因。

假如台灣不只有「殖民現代性」，而有更多的「台灣的現代性」；假如台灣文學不只有回應被殖民命運的文字姿態，還有更多「台灣文學現代性」的其他形式與可能，那麼回歸「文學研究」，我們應該重新面對「新」文學論述在不斷被繼承、再現的同時，因為「殖民譬喻」背後的論述焦慮而被忽略、遮蔽、銼磨掉的文學、文化現象。「戰前台語文運動」在重層脈絡當中所展現的在地現代性，以及台灣話透過漢字與羅馬字論述而呈現的文化主體性與特殊性，或許就是台灣文學於全球化下展現多重現代性與民族想像的面貌之一，更牽繫著台灣文學未來更趨複雜而未解的語言宿命。

¹³⁹ 張隆志，〈殖民現代性分析與台灣近代史研究：本土史學史與方法論芻議〉，收錄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04）頁 158。

第三章 從鄉土到本土：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發軔

前言：「鄉土文學」、「台灣文學」、「台灣民族文學」、「台語文學」

台語作為台灣社會自然形成的共用語，成為基督教來台開教的契機之一，以及日治時期台灣人想像民族所仰賴的語言與文化媒介，已在上述戰前台語文運動的兩條脈絡中清晰地浮現。不過，隨著殖民政府加劇同化力道，大力推行皇民化，戰前台語文運動的兩條脈絡均因此受到壓抑。先是 1937 年 4 月 1 日，台南新報社、台灣新聞社、台灣日日新報社發表共同停刊漢文聲明，台灣新民報則以版面減半因應，台灣話文的嘗試在漢文欄逐步廢除的衝擊下逐漸消退。至於白話字文學重要的發展場域，亦即經歷數度更名後的《台灣教會公報》，也於 1942 年被迫停刊。到了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初期，雖然曾有過短暫的國語方言並行、以台灣話促進學習國語的時期，也有針對「方言文學」的討論¹，但在日語被禁用之後，台語也因 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而隨後淪為禁忌語言，只能以電影、歌謠、流行歌、歌仔戲與布袋戲等流行文化的形式伏流於民間。²

「國語政策」對「方言」的長期、全面性壓禁，直到 1960 年代林宗源開始嘗試方言／母語入詩，以及 1970 年代出現了如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楊青矗、王拓、洪醒夫、宋澤萊等作家，在小說敘事與對話中鑲嵌台語，開拓了「鄉土文學」的特殊體裁後才略見鬆綁。尤其是 1980 年代，「方言詩」終於脫掉國語的緊箍，「正名」為「台語詩」、「台語文學」。同一時間，過去以「鄉土文學」、「中華民國文藝」、「中國新文學」、「在台灣的中國文學」等各種代稱的台灣文學，也終於以「台灣文學」自我命名。可是，在兩種「正名」之間，用什麼樣的語言書寫才是「台灣意識」的展現，卻再次捲起一波波重新定義「台灣文學」的風暴。

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當中常被抹為「準民族主義」或「福佬沙文主義」，但是許多論者都迴避了這些指控根本的矛盾：自日治時期開始，諸如台灣話文論戰、戰後初期《新生報》「橋」副刊論爭與 1970 年代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文學」被提出、被命名，以及自葉石濤以降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無一不是預設並欲建構台灣的「主體性」才因此發生爭論。但如果面對殖民者的語言政治，使用日語、華語，都可以被視為台灣文學「後殖民」的語言實踐，那為什麼在「鄉土文學」之後，被「再殖民」的語言政策視為是「方言」的台語，反而不能以「台語」為主體，形成屬於自己的「後殖民」文學形式及語言？「鄉土文學」或「華語文學混用方言」，與「台語／母語文學」這兩種不必然有衝突的文體或論述之

¹ 戰後方言文學的討論，可參見呂焜霖，《戰後台語歌詩的成因與發展——兼論向陽與路寒袖的創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02），頁 95。

² 同上註，頁 110-122。

間，何以會出現激烈的爭論？為什麼台灣文學場域會存在著某些忽略、拒絕、甚至批判母語文學的意識形態？我們似乎不曾得到正面的回應。

如果說從日治時期以來，台灣話、台語就一直是台灣文學無法壓抑，卻又難以實現，甚至成為一股超越斷裂歷史的書寫欲望，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只是強調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背後的語文困境，卻又忽略戰後台語文運動的興起；無法迴避台語文學以「台灣民族文學論」所引起的爭議，就只好以「包容」強制結束或逃避一個關於「台灣人」身份的質問。面對台灣文學的語文爭論，筆者想要深入討論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台語文學進一步以「台灣民族文學」的姿態質疑「台灣文學」所追逐的「主體性」、「自主性」？如果台語文學確實以「台灣民族文學」的姿態引發了「中國意識」的焦慮，那又為什麼又同時引起了理應站在同一「台灣立場」、懷抱「台灣意識」，並主張「台灣文學」有其自主性的本土論者的反對與批判？簡而言之，假如當前「台灣文學的民族想像」確實如蕭阿勤所說：「台灣民族主義關於台灣文學的歷史敘事已逐漸廣被接受，成為重要的替代理解方式。」³我們似乎無法在「台灣民族主義」的框架中，理解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場域所面對的諸多質疑、指控、反對，以及台語文學為什麼要建造另一座「政治屋頂」，卻沒有得到其他本土論者支持的根本原因。

必須強調的是，台灣文學具備複雜的歷史、社會、族群與文化脈絡，自然無法單以某種意識型態概括而論，但既然「民族主義」是台語文學朝向「台灣民族文學」的自我追逐，並且在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中不斷發生類似的、「宿命」式的論爭，我們就必須繼續梳理台語在經歷皇民化、以日語為之的「國語政策」壓抑之後，在戰後「再殖民」的台灣文學場域當中如何被討論，而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又如何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之間，形成「台灣民族主義」的認同分歧。

本章節將先以「語言政治」的觀點，把梳戰後國民黨企圖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文化重建(culture reconstruction)⁴，如何將台灣的語言、文化與文學強制建構為支撐黨國政治意識形態的認同支柱？在「再中國化」之後的語文問題，又如何成為戰後島內台語文運動的契機？「台語」的文學實踐，以及對台灣文學的重新定義，為什麼同時引起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詰問？本研究則試圖重新自戰前渡越至戰後台灣文學場域，梳理台灣的語言與文化變遷，再次考察「鄉土文學」以「國語」為中心揉雜「方言」的文學體裁，以及自 1960 年代即走向「本土」立場的《笠》詩刊與《台灣文藝》如何思考文學語言，由此梳理台灣文學「民族想像」的演繹與鬥爭過程。

³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256。

⁴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12），頁 17。

第一節 尋找「鄉土」：戰後台灣文學場域的政治語言及語言政治

從戰後《新生報》「橋」副刊的論爭到「鄉土文學論戰」，「鄉土」所指涉的「台灣現實」一直都是作為反抗官方論述的政治語言(language of politics)⁵，儘管當時「台灣」的終極回歸仍是「中國」，但這一道凝望「鄉土」的視線對黨國體制的質疑與挑戰，無疑為台灣文學開啟「尋根」與「反抗」的契機。不過，如果從文學語言的觀點來看，「鄉土文學」文體可以被視為「方言」的解禁嗎？作為台灣文化主體之一的台語，真的在「鄉土文學」的「方言」當中找回了自身的主體性了嗎？自 1980 年代正名迄今論爭不斷的「台灣文學」，顯然仍殘存著某些政治與文化壓抑，讓語言問題成為台灣文學懸而未解的衝突。

施正峰曾就台灣複雜的語言衝突，提出語言的政治關聯性(political relevancy of language)，咸認為語言的使用除了是基本人權(right)的實踐之外，無論從個人角度或組合角度來看，都與政治權力、經濟資源與社會地位相關，語言問題與政策根本上就是政治角力的結果⁶，亦即所謂的「語言政治」(politics of language)。⁷然而，也霍布斯邦提醒我們：「『民族』是具有雙元性的，它必定是由居上位者所創建，但卻也一定得從平民百姓的觀點分析才能完全理解。」⁸，既然台灣文學、文化場域的語文爭議，都是政治與社會現實所反映出來的認同「鏡像」⁹，本研究在語言政策之外，再納入接受(reception)的觀念，加入台灣作家與文化運動者在戰前、後的語言政治之下可能形成的「方言觀」，重新梳理在被殖民的政治與歷史情境當中，日治時期的國語運動如何自戰前延續至戰後，而戰後國語運動對於「舊」國語的肅清，對台灣的語言、文化與文學實踐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並以此展開戰後台語文運動的發展，以及台灣文學語言問題的深入討論。

一、總督府的國語運動與台灣文化人的「方言觀」

《逆寫帝國》一書對殖民地語言有如下的觀察：「帝國主義的壓抑，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特色，便是其對語言的控制。帝國化的教育制度，把都會語言的「標準」版本，設置為典範正統，使其他一切的「變種」(variants)，皆被邊緣化為雜

⁵ Linda Javin 訪問，魏如風譯，〈論權力與人民—訪問陳映真〉，《暖流》1 卷 3 期，1982.03，頁 21。

⁶ 施正峰，〈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收錄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1996)，頁 56。

⁷ 施正鋒，〈語言人權〉，收錄於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07.05)，頁 219。

⁸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14。

⁹ 在此用「鏡像」參照黃美娥現代性「鏡像」對拉康(Jacques Lacan)鏡像階段論的闡釋，以現實為鏡，詮釋台灣文學的語文爭議與社會大眾語言態度的對應關係。參考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語文學想像》，頁 27。

駁不純。」¹⁰但是台灣經歷兩次語言的浩劫，而同為殖民者的語言政治，日本總督府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在「變種」、「邊緣化」本土語言的策略與態度，卻也因為對抗殖民文化的「漢文」具有重層意義而不盡然相同。

自 1895 年領台之初到 1937 年之間，日本總督府陸續成立「國語學校」及「國語傳習所」，並增設漢文課程，逐步將傳統中國教育的「書房」收編至新式的教育體制當中，再配合「國語講習所」的設置來提昇日語普及率。不過周婉窈認為，「國語」縱然是近代國家統治本地與其殖民地人民的治理工具，但對日治之初的台灣人而言還沒有發揮太大的效果，一般民眾在抵抗異族統治的思維之下，主觀的學習意願也不高，台灣人幾乎是隨著教育的逐漸普及，基於實用目的才開始接觸日語。¹¹因此，日語逐漸發揮作為「國語」，要為台灣人注入「精神血液」的積極意義，可以說是到了 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殖民政府發動「國民精神總動員」之時才真正突顯，除了取消連年減授的公學校漢文課並廢止漢文欄之外，總督府對本土語言的壓抑措施也更為積極。

只是從前述「台語復權」的現象可知，日治時期的國語政策並沒有，也無法完全禁絕本土語言的使用。相反地，比起日治時期以日語作為「政治國語」，北京話作為「文化國語」，在漢文被禁之前，對當時台灣新文學運動產生的影響或許更大。那麼，相對於政治的與文化的國語，台灣話文論戰當中辯論台灣話主體性的「方言觀」¹²如何產生？它全然是殖民政治操作之下的結果嗎？¹³又或者其中有更細緻、更曖昧的因素，影響了戰後台灣人對「新」國語的接受，以及面對「方言」的態度？

關於「方言」，洪惟仁認為有三種意涵：一是政治立場上的非標準語；二是歷史語言學立場被歸屬同一語系的語言；三是社會語言學立場，無法彼此互通的是「語言」，可互通但口音不同則是「方言」。¹⁴然而，重新梳理台灣話文論戰可以發現，這場論戰除了黃石輝一直強調在政治上，台灣話不能被中國普通話所支配，而且兩種「語言」在「語勢」上的差距幾乎無法溝通的現實以外，台灣話文論者整體而言並沒有過度迴避台灣話與北京話在歷史語言學意義上同為「漢語」

¹⁰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1998.06），頁 8。

¹¹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年代——台灣史論集》，頁 80-81。

¹² 可以想見的是，台灣話應該不會被日本人視為是「他們的方言」。根據先行研究者呂美親的觀察，1920 年代以後出版的台灣語辭典相關書籍中，完全不指台灣語為方言。「台灣方言」的產生，其實指的是台灣人講的日語（台灣腔、台灣國語），而台灣人把台灣話當日本方言可能性極低。「日治時期台灣人的方言觀」值得作為本研究的延伸繼續討論，在此亦特別感謝研究者呂美親負笈東瀛，仍於網路上對筆者提出的相關議題不吝回饋與意見交流。

¹³ 吳長能，《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頁 41。

¹⁴ 洪惟仁，〈台語文化的命運與前途〉，《台灣語言危機》，頁 16-17。

的方言關係。例如郭秋生雖然主張中國與台灣已是不同的政治主體，取消了台灣話文在政治立場上「非標準語」的「方言」位置（所以相對地，日語和台灣話之間就有此種政治立場的「國語」與「方言」位階之分）¹⁵，但他認為台灣話仍然有和過去的言語不變的部份，透過既定的文字被保留下來。¹⁶黃純青則折衷於「獨立的台灣話」以及「作為中國方言的台灣話」之間，主張改造獨立的台灣話，但必須參酌台灣話與中國方言（指廈門話）的歷史淵源，建構與中國話之間的共通性。¹⁷莊垂勝雖然認為當前要務「急於普及」，必須堅持「台灣話文為主，中國話文為從」，但他也曖昧地說：「如果台灣話是中國的方言，台灣話文又當真能夠發達下去的話，還能夠有一些文學的台灣話可以拿去貢獻於中國國語文的大成，略盡其『方言的使命』。」¹⁸反對方則見張我軍以中國的「國語」與各地「方言」的關係看待台灣話文¹⁹，廖漢臣將中國白話比擬為以東京語為標準的日本國語，認為台灣應該也以中國白話進行創作。²⁰自論戰中後期均不曾改變其反對立場的賴明弘則認為：

台灣人既是中國的一地方人，台灣人若脫不出中國傳來的風俗習慣、文化，至於語言既是中國的一地方方言，換句話說，無論接台灣文化的根源不同，我們台灣人如不換從來的語言——台灣話——講台灣話，我們台灣人既是還用漢字，我們祇有繼承前人的努力，無條件接受中國白話文以為我們台灣新文學建設的表現工具罷了！……中國白話文就是「吾手寫吾口」的文，就是講中國的一地方方言的台灣話的人需要的台灣話文。²¹

郭一舟則以語言學的角度，回應《台灣文藝》同人對台灣話言文一致的討論。他以台灣話行文介紹福佬話，並指出福佬話作為「方言」，在台灣有兩種涵義：從文化圈、語言的系統而言，對華北的官話來說是「方言」；另一方面，從政治圈來說，對日本國語而言也是「方言」。²²

¹⁵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9。

¹⁶ 郭秋生，〈建設「台灣話文」一提案〉，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5-49。

¹⁷ 黃純青，〈台灣話改造論〉，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26-129。

¹⁸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209。

¹⁹ 張我軍，〈新文學運動的意義〉，《台灣民報》67 號，1925.08.26。收錄於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102。

²⁰ 毓文，〈給黃石輝先生——鄉土文學的吟味〉，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68。

²¹ 賴明弘，〈絕對反對建設台灣話文推翻一切邪說〉，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518-519。

²² 郭一舟，〈福佬話（上）〉，《台灣文藝》2 卷 6 期，1935.6.10，頁 113。

由此可見，台灣話文在總督府馳禁漢文之前仍有相當程度的討論與文學實踐，台語也幾乎是日語之外的共通語言，但是對當時的台灣文化運動者而言，無論是支持或反對台灣話文，在「雙言現象」(diglossia)²³業已形成的社會語境當中，台灣話或許作為「漢文」有高階語言的優勢，然而作為「語言」本身，早已因為「語言文化」與「政治」的方言從屬關係，而陷落在政治國語／日語或者是文化國語／北京話的雙重邊陲，於日治時期的國語政策之下，台灣話文的發展限制不言而喻。

二、國民政府的國語運動：新、舊國語的鬥爭與本土語言的「方言」烙印

安德森認為，日本的明治維新以及其對殖民地所施加的同化政策，是非歐洲地區的帝國相當典型的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sm)²⁴，日本學者若林正文認為戰後國民黨的對台統治也有類似的性格。但是，國民政府的官方民族主義不但離台灣當下最近、影響時間更為長久，更重要的是，它是在日本殖民體制脫退的「後殖民」期間，由國府政權的「再殖民」(或「內部殖民」)對日治餘緒進行政治清算與文化鬥爭的「去殖民」實踐。去殖民與再殖民的糾葛與拮抗，使得台灣被殖民過後的文化與身份重建，隨著尚未被清理、解構進而祛除的殖民權力，立即被再一次的殖民所介入。例如在日本戰敗後，台灣人群聚在基隆碼頭以〈歡迎歌〉當中迎接國軍，歡慶回歸祖國懷抱；戰後初期的台灣人也幾乎不分海內外，自動而熱烈地學習「新國語」，引爆「光復」初期國語熱。但是這股祖國熱的背後，卻是如葉榮鐘所言：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聯繫，祖國祇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²⁵

雖然經歷了日治時期皇民化運動對政治母國的「朝聖」²⁶之後，台灣人體驗過，

²³ 「雙言現象」指的是，一個民族的書面語言和口說語言差別大到形成兩種分立的語言。在公認有「正確」與「不正確」兩種語言形態當中，唯獨有教養的語言會成為書寫承載的對象；其次是，書寫系統的變化速度跟不上與時俱進的白話(vernacular)語言。所以就台灣而言，口說語言包括「台語」、「客語」、「原住民語」以及「日語」，但書寫語言卻以「中國白話文」與「日文」為主。可見台灣的「雙言現象」在口語及書面語之間的對應其實更為複雜。Steven Roger Fischer 著，呂建忠譯，《文字書寫的歷史》(台北：博雅書屋，2009.09)，頁 308-309。

²⁴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144-148。

²⁵ 葉榮鐘，〈台灣光復前後的回憶〉，收錄於李南衡、葉芸芸編，《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1995)，頁 419。

²⁶ 在此化用「朝聖」(pilgrimage)一詞，脫胎自 Benedict Anderson 「世俗朝聖」，原指專制化的君主制國家為了創造向其效忠的統一權力機制，而在各行政單元之間發展出類似古老宗教想像共同體的朝聖模式。參見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頁 98-102。

也意識到「國語」之於「國族認同」的重要性²⁷，但是從葉榮鐘的觀察可知，「中國」對台灣人而言只是虛無的觀念。那麼，何以在缺乏經驗實感的狀態下，台灣人能欣然接受不曾在台灣社會發聲的「國語」——北京話？又為什麼這股熱潮在短時間內急速消退？而在新舊國語的鬥爭之間形成的語言觀當中，台灣的本土語言又為何不能成為「台灣的國語」，反而比日治時期受到更大的壓抑？以下將在日治時期的方言觀之上，繼續梳理國民政府的語言政治對台灣所造成的影響。

戰後台灣的國語運動作為中國化政策的一環，必須追溯到戰前。正當殖民地台灣的皇民化及國語運動達到最高峰之時，國民政府對收編並重建台灣文化的想像，卻也早於戰火煙硝當中悄悄展開。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召開「開羅會議」並簽署宣言之後，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旋即依據宣言內容，下達研擬收復台灣的各項準備，翌年更設置了「台灣調查委員會」，指派陳儀為主任委員，擬定《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這份綱要針對台灣的文化重建，提出了「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²⁸的基本原則與相關措施，可見在尚未收復台灣之時，國民政府對抗戰大敵「日寇」所轄的台灣人，早已產生「奴化」的印象與認知。對此，陳儀曾致函國府教育部長陳立夫，提到收復台灣後應以「教育」為重，彌補日人施行奴化教育、強迫實施日語、日文教育的傷害。²⁹於是，以「中國化」對抗台灣「日本化」的最高指導原則，遂以各種教育、文化體制及語言政策的實施與管制細則輻射而出。

但是，甫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尚處在日本語文化圈與學習國語的無政府狀態³⁰，自然還不能完全改正日化的習慣及用語，尤其對台灣年輕知識分子而言，日語已是最能掌握的語文³¹，在不能掌握北京話之前，日語其實是邁向文明的「工具上的友性語言」，台灣人不忍也不能棄之。³²此外，國語政策亦有許多推行上的問題與阻力，例如師資國語程度參差不齊、經歷日治後的台人有學習語言的能力侷限……等。然而，國民政府的語文政策卻無視於台灣人重新學習國語的困境，除了將使用日語的台灣人指陳為「愚民」、「奴化」之外，更將國語能力作為公務員的任用標準，視學習國語為國民精神的展現與政治參與的門檻。所以，如同陳翠蓮以「台人奴化」的觀點所提出的觀察：戰後台灣的語言問題並不只是溝通工具的範疇，更牽涉到強制性的壓迫與政治權利的剝奪，因而被賦予了

²⁷ 周婉窈，〈台灣人第一次的「國語」經驗——析論日治末期的日語運動及其問題〉，《海行兮的年代——台灣史論集》，頁114。

²⁸ 〈台灣接管計畫綱要〉，收錄於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中國南京：南京，1989），頁49-57。

²⁹ 〈陳儀關於台灣收復後教育工作與陳立夫往來函〉，收錄於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頁58。

³⁰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45。

³¹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卷4期，1991.12，頁158。

³² 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2006.06），頁48。

高度的政治意義。³³

同時，在新、舊國語所潛藏的拮抗與緊張之間，台灣人對於國民政府重視本土語言其實有所期待。例如楊雲萍於《民報》發表〈奪還我們的語言〉，提到日治之初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伊澤修二訪問長老教會傳教士巴克禮，請教在台開展「新教育」事宜，巴克禮建議伊澤應以台灣話進行教育，並必須以「白話字」拌寫，然而伊澤卻不改其志。楊雲萍以此為例，說明殖民者終究沒有要教育台灣人，只想消滅台灣人的語言和文化，藉此呼籲官方勿再次重蹈總督府的殖民行徑，「此問題不僅是所謂『語言』的問題，實關於『民族精神』之問題。」³⁴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堅決反對台灣話文建設，認為台灣話終究是中國地方方言的賴明弘，到了戰後巧妙地以此反問：「試問廣東人講廣東話，福建人講福建話，浙江人講浙江省話，難道他們便不了解民族的精神與文化嗎？」³⁵再次暴露國民政府以國語界定國民精神的偏頗與歧視。

但即使台人強烈抗訴，專責國語事務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魏建功、何容等人，依舊如火如荼地開展語文建設，重建民族精神。例如魏建功的國語運動綱領明確主張「儘快恢復台灣話」，因為他認為台灣人已受「日本語五十年的浸染」，如果要推行國語，則必須先復原台灣人的文化和思路，才能「發揮出自己方言的應力量」。³⁶魏氏強調，台灣人所講的是「中國的方言」，並且與標準語系統相同，可以透過「方言」和「標準語」的對照作為學習國語的捷徑³⁷，所以，戰後初期的國語運動配合魏建功「由方言教授國語」的推行策略，事實上有短暫的「方言恢復期」，而這也是諸多論者用來翻案國語政策消滅本土語言的說法。

只是所謂的「恢復方言」，目的並不在於重視台灣本土的語言文化，最後的目標在於「學習國語」，並重新確立台灣話過去與「文化國語」——北京語之間曖昧的語言從屬關係與政治想像。正如游勝冠所說，國民政府的「後殖民」語言政策在台灣樹立「北京語」霸權的方式，即是先以「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來

³³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 1946 年「台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9 卷 2 期，2002.12，頁 153-155。

³⁴ 楊雲萍，〈奪還我們的語言〉（上）、（下），《民報》13 號、14 號，1945.10.22-23。收錄於楊雲萍著，許雪姬、林瑞明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2），頁 216-219。

³⁵ 賴明弘，〈光復雜感〉，《新知識》1 期，1946.08.15。轉引自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頁 41。陳志瑋以此認為賴明弘強調台灣話的「國語」位階，筆者認為參照賴明弘戰前的方言觀，如此推論應有再斟酌之處。

³⁶ 魏建功，〈何以要提倡台灣話學習國語〉，《新生報·國語》3 期，1946.05.28。轉引自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53。

³⁷ 魏建功，〈台語即是國語的一種〉，《新生報·國語》5 期，1946.06.25。轉引自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頁 54。

確立台灣話從屬於國語的上下位關係，再由這種從屬關係反襯日語的外來性格，建立排除日語的合法性。最後，由台灣隸屬中國的政治關係推論，台灣應該放棄日語，使用中國通行的國語。³⁸以「中華民國」為政治基礎，北京話與台灣話之間終於不再是（中）國與（外）國之間的形式，也不只是語言學上的分類關係而已，「國語」與「方言」位階於此時正式確立。

然而隨著官民、省籍衝突日益升溫，戰後初期因為無法迅速學習國語、改正日化習慣，而被視為「奴化」的台灣人，深刻感受到國語問題背後的政治歧視，加上貪污腐敗、文化差異等諸多衝突，積累已久的民怨終於因為查緝私煙而爆發為二二八事件。出於對「國語政策」的反感，台灣人迅速地將日語與台語自口舌之間召喚回來，除了使用日語廣播、書寫戰報之外，台語亦成為本省人辨識族群身份的刀刃。侯孝賢以二二八為背景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片中聾啞的男主角文清在火車上遭到追打外省人的本省人逼問，吃力地用台語說：「我是台灣人。」(Guá sī Tâi-uân-lâng.)這一幕所再現的，正是衝突過程中的語境一隅。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人的語言與文化面臨更劇烈的剿滅危機，不只是作為台灣人主要表達工具的日語理所當然地被禁用，就連最初為普及國語而恢復的台灣話，也從最初「應無退卻不退卻」³⁹的問題，到最後卻成為被壓抑，甚至與日語同樣成為必須被抹除的對象。從這裡可以看出，國民黨的國語運動面對方言的問題意識與政治態度，從「收編」到「壓抑」的轉變。

到了 1950 年代，國共內戰敗北，蔣介石對國共內戰失敗的檢討當中，揭示了「三民主義」思想與「國語」教育互為表裡的教育目標有絕對的關係，在此之後，國語運動強調「國語」的絕對地位更甚以往，開始排斥方言、放棄「以方言學習國語」的方式，改採「直接教學法」。⁴⁰於是可以想見，國民政府以武力綏靖與清鄉行動肅清異議分子、鎮壓各地反抗勢力之後，無論是日語或台語，皆是相對於「國語」的民族精神而言，帶有反動意識而必須被剷除的語言。「國語運動」作為國民政府推動中國化、鞏固「三民主義意識形態」的載體，也就開始透過教育、行政體制以及社會教育、大眾傳播，展開一連串強化國語、禁用方言的文化殺戮，甚至連教會都被禁止使用方言傳教，也不得以羅馬字作為傳教文字、拼寫原住民語言。⁴¹所以，對台灣本土語言來說，1950 年代至 1980 年代間被貶抑為「方言」的族群經驗，已不單純只是溝通層面或語言學術的範疇，而是一道道「語言政治」的「處罰」所留下的歷史傷痕，至今仍難以抹滅。

³⁸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77。

³⁹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1999.08），頁 109。

⁴⁰ 森田健嗣，〈反共抗俄下台灣之國語教育—排斥「方言」與意識型態的灌輸〉，收錄於若林正文等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續集》（台北：稻鄉，2009.07），頁 383-404。

⁴¹ 可參考國立台灣文學館台語文學展《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1895~2007)》整理，網址：

http://nmtldig.nmtl.gov.tw/taigi/02sp/04_list.html，使用日期：2013.04.10。

三、在有聲無聲之間：語言政治中的「雜訊」

誠如霍布斯邦的觀察，從各種通行語言當中選擇其一訂為民族語言，是相當政治化的，而通常被選為民族語言的優勢語，多是「極少數的精英份子平日用來處理政務、鑽研學術或進行公開辯論之用」⁴²的語言。國民政府以「中國化」為目標對台灣所進行的各種文化重建工程，不啻是要將已在中國通行的，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建構為台灣的「高級文化」，並透過國家機器將北京話的溝通體系創造為葛爾納所謂的「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作為「中華民國」統治「台灣」的權力基礎。這一方面是國民政府在「反共抗俄」的情境中亟欲掌握「中國」詮釋權的表現，另一方面則是要讓台灣人透過此一民族語言，認同國民黨的中國正統。在這個過程中，無法支撐中華民國的中國民族想像，甚至有可能干擾台灣人認同中華民國的日語，自一開始就被視為肅清的目標，台灣的本土語言也逐步被「國語」以政治與文化的從屬論述收編，導致戰前台灣作家在官方政策的影響下的文學場域內，不得不放棄熟悉的日文，選擇在自我辯護與游移之間以國語為目標，舉步維艱地嘗試走出「跨語」的困境。只不過，我們在「戰後的台灣文壇為何『不需要』台語文學？」⁴³的提問之下，可以深入思考，也必須注意到的是：身處戰後初期困厄的政治與文化環境下，繼承日治時期以來曖昧的漢文化認同以及「鄉土文學」認識的台灣作家，為什麼仍舊需要台灣話／方言作為表現形式，但卻又沒有萌生建構「台語文學」、完成「台灣話文」未竟的目標？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我們才能重新思考台語甚或其他本土語言到了戰後，為什麼無法發展成各自獨立的母語文學，而必須選擇依附在以華語為主的「鄉土文學」文體形式當中才能被看見。而這樣的文體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下出現？有什麼樣的時代需求？同時又有哪些限制？

先從台灣話文的書寫技術談起。日治時期減授、虛化公學校漢文課並廢止報刊漢文欄，國語運動由緩轉急，使得中國白話文，或者是摻雜「台灣話文」基因，不中不台卻又亦中亦台的「台灣式白話文」，都因此面臨發展的鈍挫。雖然在此無法細緻地梳理「台灣式」或「台語式」白話文所呈現的「台灣話文」是否有程度上的差別（例如語法差異、台語詞彙使用多寡……等），但是從日治末期停格的階段性成果中可以發現，無論是台灣話的用字問題，或者是以台灣話文表現的作品內容與文學技巧，全部以台灣話寫成的作品相對而言，在當時的台灣文壇尚未形成書寫技術與審美觀的共識。在這種狀況下，不管是台灣話文在發展過程中，持續受到中國北京話的浸染而「華語化」，或者是中國白話文的支持者在對話當中使用台灣話文的折衷作法，「行文以中國白話文表現，對話採用台灣話文」的書寫形式，成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操作台灣話文的極限與默契。雖然不乏有積極嘗試台灣話文者如賴和、楊逵、蔡秋桐、賴賢穎等人，但既有的障礙在政治緊縮

⁴²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72-75。

⁴³ 呂焜霖，《戰後台語歌詩的成因與發展——兼論向陽與路寒袖的創作》，頁 91。

的情勢之下雪上加霜，終究難以有更進一步的發展。

再者，日治時期台灣話文論戰的「鄉土」其實有兩個層次，一層是文學意義上的「鄉土」，另一層則是語言意義上的「台灣話文」。⁴⁴關於「鄉土文學」的演繹，論戰前期黃石輝所提出的「鄉土文學」，很明顯著重於語言意義的台灣話文字化問題，對於文學意義上的「鄉土」則較少觸及，所以我們可以看見的是，一方面台灣話文反對者提出「鄉土」內涵的質問，另一方面是黃石輝迅速把戰線自「鄉土文學」的辯證當中抽離，轉而證成「台灣話文學」本身的正當性。當然，台灣話的建設仍舊是一大焦點，而且逐漸取得共識，深化為對民間文學的採集與建構，但由於論戰後期，台灣的文學語言隨著作家日益熟練中國白話文，而後又逐漸被日文取代，台灣作家從不同的語言條件下所定義的「鄉土」，為「鄉土」的文學及語言意義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例如清葉將「台灣」視為「鄉土」，而在台灣的氣候、風俗習慣、人情風味和地理關係等種種因素影響下所產生的文學，自然就是「鄉土文學」⁴⁵；劉捷則認為，鄉土文學紛擾的同時，「從去年開始用日文來創作極具台灣地方色彩的作品」廣義來看是台灣文學的大收穫，可見劉捷也認為鄉土文學無關語言，而相對重視文學表現的內涵。⁴⁶吳坤煌雖然批判清葉、劉捷是不切實際的浪漫想像，「鄉土」應該從台灣過半農工無產階級的「現實」出發，但有趣的是，在語言的觀點上，吳卻引用藏原惟人所舉的蘇維埃同盟烏克蘭運動為例，認為「用哪一個文化統一」的爭議可以在「帝國主義」之後廢止文化性統治、擁護民族文化來達成，一如烏克蘭語只是作為共通語言，而其他一切民族的形式都可獲尊重。吳坤煌甚至從馬列主義出發，以史達林的話來回應語言問題：「民族文化是首先要擁有一種共通的語言，並且為了製造出讓一種統一的文化來統一的條件，必須給予發展、進步和表現出力量的機會。」⁴⁷所以，當「日語」替代「漢文」成為台灣的共通語言之後，「鄉土文學」的語言意義逐漸被削弱，成為「台灣」、「地方色」、「特殊性」的文化符碼。

到了戰後，來台的中國作家多能包容這種經歷日本殖民統治後，雜揉了台語、日語的「國語」創作。不過他們也都一再警示，台灣話只能縮用於表現對話或少量穿插，不得以台灣話為主體，更不能逾越「分離主義」的界線。所以，當中、台作家又再次觸及台灣文學語言問題之時，殘餘的台灣話文並沒有再次喚起「鄉土文學」的語言意義。例如在「橋」副刊的方言文學論爭當中，面對來台中國作

⁴⁴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頁 113。

⁴⁵ 清葉，吳玫芳譯，〈具有獨特性的台灣文學之建設——我的鄉土文學觀〉，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28-329。

⁴⁶ 劉捷作，吳玫芳譯，〈一九三三年的台灣文學界〉，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92。

⁴⁷ 吳坤煌，彭萱譯，〈論台灣的鄉土文學〉，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88-490。另收錄於吳坤煌著，吳燕和、陳淑容編，《吳坤煌詩文集》（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3.04），頁 123-135。

家陳大禹以台、日、華語完成的多語作品〈台北酒家〉，台灣作家其實多半給予肯定，並認為這是對台灣作家的鼓舞，但中國作家卻一方面認為台灣文學必須為中國服務，二方面指陳台灣話粗鄙不夠文明。在台中國作家面對台灣話文所表現的分離焦慮，無疑證成了台灣語文的「雜訊」具備無法為國語霸權完全收編的主體性與自主性。

又對台灣作家而言，台灣話文雖然是一種可以召喚台灣特殊性的文化造物，抵抗在台中國作家全面以中國意識涵括台灣的特殊經驗⁴⁸，但是在技術的侷限⁴⁹以及二二八事件後國民政府加強打壓台灣本土語言的影響下，為了在多為中國來台人士所掌控的文學場域當中獲得發言權，戰後初期的台灣作家於是不得不以國語為目標進行一場「跨語」的苦鬥。相對於前述台灣作家對台灣話文的認同，此時期的本省籍作家如鍾肇政、鍾理和、陳火泉、廖清秀、許炳成（文心）等人，雖然在自主建立台灣文學的意向上對台灣話有所期待，但卻已泰半不贊成方言文學，嘗試的限度也僅止於「國語為主，方言為輔」，甚至「方言文學實屬多餘」，「以國語取代方言似無不可」⁵⁰。可見，「跨語」作為體制內抗爭的唯一手段，日治時期停格的台灣話文，到了戰後初期幾乎沒有機會再重新轉動，「鄉土」的內涵，也逐漸被殖民情境下妥協於語言的文學象徵意義所壟斷。台灣作家的語言挫傷，著實在 1950 年代《文友通訊》的討論當中表露無遺。

如果以後設的台語文學定義來看，這些主張固然是不得不服膺於國語政策的結果，但如果考量到技術與政治的限制，自戰前跨越至戰後的台灣作家面對語言衝擊的同時，不時透露出想要以方言為作品增添「鄉土味」的嘗試，或許已誠屬可貴。如研究者陳志瑋所指，戰後初期台灣作家的語文混雜現象，是一種既挪用「國語」，使「國語」使用者產生被干擾、威脅的焦慮感，又使本土語言文化得以「借屍還魂」的解殖文化策略。⁵¹以後殖民研究的觀點來看，面對殖民體制所加諸的語言與文化壓迫，方言的使用以及詈言、髒話或罵語等等「語言暴力」(linguistic violence)的展現，通常是被殖民者用以表達國族認同的言說策略。⁵²可是問題在於：當戰後經歷由國家主導的反共文藝與懷鄉文潮，國語政策造成語族（群）與民族之內／之間不公平的語文資本分配與再生產的台灣文壇⁵³，在對「黨化」、「復古」的反動下，台灣作家展開西方現代主義無根漂泊的旅途而終於抵達了「鄉土文學」文體之後，在以華語為主的文學場域之中，台語與其他本土語言

⁴⁸ 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文學界》10期，1984.04。

⁴⁹ 例如楊逵雖曾於日治末期創作台灣話文小說，但由於假借字過多而終告放棄。戰後初期的台灣話文嘗試，最多亦以詩歌童謠為其極限，無法進行長篇寫作。

⁵⁰ 〈文友通訊〉第四次，《文學界》5期，1983.01，頁135-136。

⁵¹ 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頁126。

⁵² Ismail S. Talib，李勤岸譯，《後殖民文學的語言》（台北：書林，2011.08），頁57。

⁵³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40-41。

的「騷動」，是否還保有干擾、抵抗，甚至顛覆國語霸權的作用？在戰後喧騰的中國民族主義氛圍當中，「鄉土」的文學及語言意義是否還是一種維護台灣主體性的表意？

四、在政治屋頂下建構「中國」文學：「鄉土文學」不是「方言文學」

時間來到 1970 年代，台灣經歷釣魚台事件、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台日斷交等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引起學生與知識份子不分省籍地，對台灣社會與政治提出改革要求，在創傷事件的衝擊下，中國國族教育成為形塑集體記憶的骨幹，也因此形成了跨越省籍界線，又與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密不可分的世代認同。⁵⁴知識份子根著於台灣社會現實的改革意識，在文學場域遂轉化為對現代詩、現代主義小說的嚴厲評論。現代主義被認為是耽溺個人情感、流於形式堆砌的文學實踐，尤其是「詩人的欠缺對自己民族的過去與現在的關聯之認識」，以及小說方面「需求民族性與社會性的呼聲響徹雲霄」。⁵⁵故主張回歸現實的《文季》雜誌舉起了「社會寫實主義」的大旗，培養出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本省籍的鄉土文學作家，帶動了台灣文壇關於「鄉土」、「寫實」的實踐與討論。

鄉土文學以小說為主，在對台灣現實的關注之下，以描寫鄉下人和小鎮居民在經濟困頓下的艱難處境為主，故事場景多為工廠、農村、漁港或鄉鎮，主角出身卑微，而這些作品也企圖以「國語化」的福佬話如實反映社會下層民眾的生命。⁵⁶因為這些特色，鄉土文學在論戰當中，時常被攻擊為左傾、具有共產思想的工農兵文學，又因為其方言的表現而被誤讀為「方言文學」，更被視為是狹隘的地域主義、分離主義之展現。雖然蕭阿勤認為 1970 年代鄉土文學真正無法見容於國民黨與批評者之處，是透過這些作品的社會寫實主義技巧對當時社會經濟體制的尖銳批判，而不是一種與中國民族主義對立的分離主義⁵⁷，如此一說或多或少低估了潛隱的台灣意識，但就表面上而言，由於官方意識（如余光中、彭歌、朱西甯）與民間的中華／中國意識（如陳映真、尉天聰、胡秋原）有共同的中國民族立場，台灣意識不得不以葉石濤的「三民主義文學」或鍾肇政的「國民文學」

⁵⁴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66-139。

⁵⁵ 陳正醒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上）〉，《暖流》2 卷 2 期，1982.08，頁 27。

⁵⁶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 145。

⁵⁷ 同註 54，頁 221-224。雖然在此筆者比較鄉土文學作家若干民族主義的說法及方言觀點後，認同蕭阿勤的詮釋，但我們必須斟酌張茂桂、吳介民兩人與蕭阿勤的對話，來預設另外一種可能性。張茂桂認為，蕭阿勤以公開文本來檢視當代可歸類於「台灣意識」作家群，是否忽略了白色恐怖之高壓言論政策對文本書寫者可能產生的自我限制與壓抑？而吳介民則認為蕭阿勤對本土派作家帶有中國民族主義元素的表態賦予過多真確性(authenticity)，而提出 Scott「隱蔽文本」的觀念來解釋認同的轉折，實為敘事認同由隱蔽至公開的過程。參見張茂桂，〈評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及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9 期，2001，頁 293-299；吳介民，〈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收錄於李丁讚等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頁 299-355。

來避免政治上的迫害。因此，鄉土文學所強調的「鄉土」，仍一致以「作為中國一省」的「現實台灣」，不脫以「民族中國」為終極回歸的論述範式。那麼，鄉土文學文體又是否真如朱西甯的嚴詞指正：「回歸民間而動用方言是必須的，而發展為方言文學便是本末倒置」？⁵⁸而混用「方言」究竟發揮什麼樣的功能？

陳映真認為，日治時期與後的鄉土文學在反經濟、文化帝國主義的精神上是相同的，但是「由於中國普通話和閩南話之間的差異，由於日治時代台灣和大陸祖國的斷絕，當時，傷時憂國之士，乃有主張以在台灣普遍使用的閩南話從事文學創作，以保中華文化於殖民地。」而戰後鄉土文學作為在台灣文學作為中國近代新文學的一部分，並不同於日治時期中、台分離的狀態。⁵⁹所以陳映真強調：日治時期台灣在與祖國斷絕的歷史經驗中，因為語言差異過大而使用閩南語，與戰後台灣在中國脈絡下，使用附屬於「國語」的「方言」是不同的情境。王拓則是早已和黃春明、王禎和⁶⁰一樣否定「鄉土文學」，而改以「現實主義」對其文學實踐的內容與形式進行釐清與定義，認為鄉土文學是「反抗外來文化／建設民族文學」和「社會不公的心理和感情」所滋養出來的，所以鄉土文學不應侷限於鄉村，也不能太過強調台語方言的模擬運用而流於地方主義（但卻有助於豐富國語的詞彙），應「逝者如斯」，不能過度懷抱於現代衝擊下必然沒落、消失的鄉村社會。⁶¹對此，黃春明亦有一番針對方言使用的說明：

方言是一種極富力量的語言。假使一個國家要統一與茁長，當然需要一種統一的國語。但是這並不表示要排除地方方言。對我們本地人來說，官方語言是一種國內的外來語。方言才是表達我們的感情、思想和觀點的一種最精確、最親切的語言工具。當然你不可能全篇作品都充斥方言而讓人家看不懂。不過，藉著一點台灣話的韻味，有助於中文成為一種更富表情的語言。然而，以方言寫作，並非一定就是鄉土派人士。⁶²

⁵⁸ 朱西甯，〈回歸何處？如何回歸？〉，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0.10），頁 220。

⁵⁹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65-66。

⁶⁰ 邱貴芬曾以王禎和《玫瑰玫瑰我愛你》的語言雜燴為例，認為其文體混雜了台灣國語、福佬語、客語、英語、日語、台灣化日語、英語化國語，呈現了台灣幾百年來被殖民的縮影，同時也展現了一種政治姿態，打破以國語為本位的語言階級，解放了各種階層人民的生活語言，據此認為「福佬話」企圖以「台語」、「台灣語」，反而是另一個欲取代國語權威正統性的「殖民壓迫」。筆者認為，《玫瑰》比起其他鄉土文學作品，確實呈現更混雜的時代語言，但是回到鄉土文學的民族想像與文化習癖(habitus)的脈絡下，王禎和的多語文體並不能就此證明台灣社會的語言階級瓦解，或國語對本土語言的壓迫已經消除，而鄉土文學作家於作品中挪用本土語言的方言觀，更無法支持邱貴芬的後殖民觀點。施俊州亦借用社會語言學的分析，說明王禎和的方言使用並無法達到威脅／破壞華語文學(史)的效果，反而藉台語創造華語文學的「變體」來豐富華語的使用。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頁 169-191；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55-74。

⁶¹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116-117。其他如楊青矗也呈現類似的主張，參見〈什麼是健康的文學〉，頁 297-299。

⁶² Linda Javin 訪問，陳川流譯，〈文學不能脫離現實－訪問黃春明〉，《暖流》1 卷 3 期，1982.03，

相較於陳映真與王拓，黃春明顯然意識到當前的「國語」是「國內外來語」背後的政治性，黃春明甚至也認為這是一種「說語言的大國主義思想」，有消滅方言之虞。⁶³但從「豐富中文的表情」，以及「並非就是鄉土派人士」這些多少有意要廓清使用方言的意識形態的說法當中，結合陳映真、王拓對鄉土文學的界定，可以說無論作家自覺與否，鄉土文學文體的方言使用，幾乎都是在承認語言政治賦予華文體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當中追求在地語言的混用。

《逆寫帝國》作者群對於文學作品中使用殖民地語言，以及語言之間權力分配、交涉的現象，有相當精闢的看法，認為「這些「邊界」的語言，塑形於權力的壓抑性話語之下，但他們也曾成為現代時期，某些最為激勵人心及創意澎湃的文學作品的顯現之地。這亦部份拜規範性語碼(normative code)，跟形形色色的地方用法之間的政治張力所帶來的動力。」⁶⁴以上述觀點觀察戰後鄉土文學的方言使用，筆者所要提出的看法是：正因為在國民黨的語言政治之下，台語被收編、壓抑為政治意義上的「方言」用以支撐中國民族主義，而「方言」附屬在以華語為主的鄉土文學文體當中，不但能藉由挑動、逾越方言與國語的位階規範的姿態召喚出「政治張力」，更能藉此深化社會寫實主義的文學技巧對社會經濟體制的批判力道。所以，鄉土文學文體之所以能透過方言的混用而受到讀者青睞甚至政治影響，正是現實主義技巧利用台語作為「方言」相對於國語的邊陲位置所產生的政治張力而造成的「副作用」，至於再現並保留台語（語族）的文化體系，嚴格說來並不是鄉土文學的要旨。

也因此，致力於台語文運動的林央敏甚至曾以華語本位批評鄉土文學文體，說：「中文除了受文白夾雜與惡性西化兩大災難之外，近幾年來又增加了一種暴動，那就是方言的蹂躪。」他強調並非反對用方言寫作或不讓方言摻入國語，而是主張使用方言必須朝「方言國語化」的方向適當調整，而不是叫「國語方言化」。⁶⁵向陽也曾對鄉土文學文體提出反省，認為「嚴肅誠懇的鄉土文學作品忽然少見了，但不少披著或沒有自覺地使用鄉土方言的作品大量出籠。我們很難在徒具鄉土表態的作品中看到或感到人性的真正光澤，只能聽到某些『牙牙學語』者缺乏深刻關注與視景的假聲。」⁶⁶暫且不論個人的「轉向」，但林央敏和向陽都指出了鄉土文學混用方言的文體，著實缺乏對語言文化主體性的思考與關注。

可見，從戰後初期的方言文學到 1970 年代鄉土文學，華語／北京話在中國

頁 19。

⁶³ 鄭清文、洪醒夫，〈從生命的悲憫到社會的關切－黃春明訪問記〉，《台灣文藝》60 期，1978.10，頁 23。

⁶⁴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9。

⁶⁵ 轉引自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154。

⁶⁶ 向陽，〈走向堂堂大道〉，《康莊有待》（台北：東大，1985.05），頁 8-9。

民族主義的政治屋頂之下，逐漸壟斷文學體制的合法性與正當性。所謂的「鄉土文學」儘管經常被誤認或指控為「方言文學」，但無論從作者創作或讀者接受來看，鄉土文學都不是以「方言」文化為主體的文學實踐，「國語」至上的語際支配昭然若揭。作為台灣文學前身的「鄉土文學」，縱然在此邁開建構台灣文學主體性的步伐，但是外在的、結構上的侷限，卻縮限了台灣作家對本土語言及文化的想像，台灣文學雖然得以透過殖民政治所形成的統一語言展現「反帝」、「反封建」的主體性，可是對「內」卻延續著國語政策的「方言」位階，壓抑了台灣本土語言、文化的發展，也為不久後的台語文學運動埋下了伏筆。

第二節 行向「本土」：《笠》kap《台灣文藝》ê 台語文學討論⁶⁷

戰後國民黨政府 ê 國語政策 tī 台灣人 ê 國語經驗 kap 祖國意識之下，真簡單著將台灣 ê 本土文化 kap 語言收編入去，成做中國民族主義 ê 楹梁(énn-niù)，另外 koh 透過國家機器一步一步來起造華語中心 ê 文化／文化場域。本土語言 ê 建置 kap 復振，不但無法度得著國家 ê 力量來建置，顛倒 tī 國民黨使用華語背後 ê 政治 kap 文化歧視之下漸漸來消聲。尤其是二二八了後，日語 kap 台語攏予國民黨看做是反動 ê 語言，致使戰後台語文運動 kap 追求民主、反對國民黨極權統治 ê 政治運動合流，來到海外生炭。方耀乾認為，二二八發生了後逃亡轉去日本繼續修業 ê 王育德，tī 1960 年創設 kap 日本時代東京留學生所發起 ê 《台灣青年》全名 ê 社團 kap 機關刊物，來提倡以漢羅台語文建構台灣文化民族主義，進一步推廣獨立建國，是戰後台語文運動 ê 頭一聲放(pàng)。海外台語文雜誌 kap 運動，也以 1975 年《台語通訊》(後來改名《台灣語文月報》)雙月刊 tī 美國紐約創刊起鼓，到 1991 年專業 ê 《台文通訊》有 khah 穩定 ê 發展，才 tī 台灣本土「霜降」之下 ê 政治、社會環境 kap 華語主流之外，牽出一條文化 ê 脈動(mèh-tāng)。⁶⁸但是講到底，台灣本土才是主戰場，海外運動所開出來 ê 花葉，落尾猶是欲轉來 kap 台灣土地接枝。所以，tī 海外台語文運動接合轉來台灣進前，戰後島內以華語為主 ê 文學生態，除了鄉土文學文體 ê 語言思考以外，又 koh 按怎出現「前」台語文運動 ê 氣候，來 kap 海外互相呼應？

戰後島內猶未有台語文刊物出版 ê 時陣，主要是透過《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新文化》、《笠》⁶⁹、《台灣文藝》等等 ê 雜誌刊物，kap《自立晚報》、《民眾日報》、《台灣時報》這寡報紙媒體 teh 協力、參與台語文議題。但是《笠》kap《台灣文藝》在華語文學 ê 場域內底，倚(khiā) tī khah 倚近(uá-kīn)台灣本土 ê 立場頂面對「方言」文學 ê 討論，koh 有這兩份刊物成做袂少台語文作家發表作品、理論 ê 時代 kap 論述意義，kap 台灣文學正名、台語文學論戰 ê 關係，猶 koh 無

⁶⁷ 對本節開始，筆者使用漢羅台語文標注台羅拼音來書寫論文，原因參見第一章第五節說明。

⁶⁸ 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頁 74-81。

⁶⁹ 以下用「笠」代稱詩社，《笠》稱詩刊。

相對深入 ê 討論。所以 tī 遮，筆者以《笠》kap《台灣文藝》這兩份時間相對 khah 早、維持時間 khah 久、又 koh 是 tī 華語主流 ê 台灣文學場域當中難得出現母語文學創作 kap 論述 ê 刊物，來觀察 tī 華語主流 ê 文藝體制之中，島內台語文學作家、運動者是按怎「出世」，成做 1980 年代台語文運動「前脈絡」ê 蕃薯頭？台語文運動欲復振台灣本土語言、建立台灣民族文學 ê 努力，又 koh 按怎 tī「台灣民族主義」tāuh-tāuh-á 在台灣文學場域內底發穎(huat-inn)ê 過程當中，顛倒引起台灣本土文學論者之間 ê 衝突？這又 koh 參「鄉土文學」有啥物關係？

一、對「台灣」文學走揣政治厝頂：《笠》kap《台灣文藝》ê 本土想像

1964 年 3 月，由吳瀛濤、詹冰、陳千武、林亨泰、錦連、趙天儀、白萩、黃荷生……等等總共 12 位本土詩人，tī 詹冰 ê 故鄉——客家庄「卓蘭」成立「笠」詩社，6 月開始發行《笠》詩刊。但是，「笠」其實 kap 日治時代尾期由張彥勳所成立 ê 同人社團「銀鈴會」有真密切 ê 關係。1942 年，彼當陣猶是台中一中學生 ê 張彥勳 kap 朱實、許世清，因為對新詩 ê 寫作有興趣，suah 來組織文藝社團，並且家已發行刊物《邊緣草》(うちぐさ)，林亨泰、詹冰、錦連攏是早期著加入 ê 成員，後來社團正式成立，號做「銀鈴會」，吸引著愈來愈濟(tse)文學有志。這期間，《邊緣草》經過台灣「光復」，改名《潮流》，但是猶原無法度克服日文版報紙停刊了後，koh 愛重新學習「國語」ê 障礙。所以《潮流》干焦(kan-na)維持五期，1949 年著因為跨語 ê 困境猶未克服⁷⁰，另外 koh 受著四六事件 ê 牽連來廢刊。

一直等到十五年後，全款是對日本時代行過來 ê 小說家、漢詩人吳濁流，大病險死了後，為著欲聚合本省作家來改變台灣文壇「還呆滯在五四時代的堅殼中，沒有進展」、「不是落於新八股的窠臼，就是沒有個性的同一類型」⁷¹ê 現象，另外是欲挽救 1950 年代以來，像《文藝創作》、《文星》等等重要刊物停刊，本省作家發表空間減少 ê 危機，所以伊家已出錢，也毋驚彼當陣掛上「台灣」兩字可能引起 ê 爭議，堅心辦《台灣文藝》來提供青年作家發表 ê 空間。《台灣文藝》籌備會後，受著鼓勵 ê 本省詩人贊成吳瀛濤 ê 建議，認為需要一本純 ê 詩刊，來彌補綜合性質 ê 《台灣文藝》⁷²，再加上本土詩人已經重新掌握華文成功跨語，全款想欲 tī 以外省作家為中心 ê 文學場域當中開始走揣落筆發表 ê 空間，「笠」才繼承「銀鈴會」以來 ê 筆陣(tīn)，kap《台灣文藝》齊向前行。

《笠》kap《台灣文藝》成做戰後台灣本省作家重新出發 ê 車頭，確實有幾項重要 ê 原因。首先，兩片(pîng) ê 筆陣 kap 日治時期 ê 文學傳統攏有真強烈 ê 連

⁷⁰ 張彥勳，〈從「銀鈴會」到「笠」〉，《笠》詩刊 100 期，1980.12，頁 30-33。

⁷¹ 吳濁流，〈台灣文藝雜誌的誕生〉，《台灣文藝》1 期，1964.04.01，頁 46。

⁷² 陳千武，〈吳濁流十年祭——談《笠》的創刊〉，《台灣文藝》102 期，1986.09，頁 12-15。

結，除了成員當中攏有跨越到戰後 ê 頭一代作家，而且作家之間也有跨刊物 ê 交流以外，吳濁流也 tī 鍾肇政 ê 建議之下，有意識欲用「台灣」kap 戰前三代 ê 《台灣文藝》有所傳承⁷³，認為「我們要推動的是台灣本土文藝，若非冠有『台灣』二字即失去辦雜誌的意義。」⁷⁴顯見《台灣文藝》毋但是這 ê 集團直接繼承歷史經驗 ê 符碼，也是戰後台灣文學行出二二八以來 ê 驚惶(kiann-hiänn)，「本土意識」koh 再覺醒 ê 宣言。⁷⁵也當因為按呢，《台灣文藝》ê 活動不時受著警總派人來監視。⁷⁶

另外，雖然在威權政治 ê 禁忌之下，雙方攏有對政治議題「噤聲」，避免犯著禁忌 ê 共識，但是遮 ê 本土作家攏 tī 中國文學 ê 大敘事之下，將反官方 ê 立場 kap 認同本土 ê 意識，轉化做「純」文學 ê 實踐 kap 討論。所以，咱會當理解吳濁流 kap 警總交涉使用《台灣文藝》來堅持台灣文學 ê 本土性，但是伊 ê 論述又 koh 無法度將台灣文學 kap 中國文學割 kah 傷過清氣，迫使《台灣文藝》用名釘根本土了後，必須用台灣文學 ê 「特殊性」來 kap 中國文學保持一種曖昧 ê 牽連，伊講：

台灣文藝，要根據台灣的特殊環境而產生一個個性，這個性又要合於中國的普遍性，同時具備世界的普遍性，才有價值可言。……現在中國文學，具有另一種特殊性質，現在我們在台灣特殊環境下掙扎，其文學也在這樣環境苦悶，若是不承認這樣特殊環境，也無法創造有生命的作品……所以現在的中國文學須要認清楚台灣的特殊環境，才有實在性，根據實在的特殊性，才能產生優秀作品……⁷⁷

但是這種曖昧性，也 kap 吳濁流創辦《台灣文藝》想欲復興「漢詩」有真大 ê 關係。吳濁流本身是客家人，再加上師範學校時代 kap 台南詩社「南社」社長趙雲石 ê 後生趙雅佑全窗，客家山歌 ê 文化素質 kap 漢詩創作 ê 啟蒙，予吳濁流日後對漢詩產生一種特別 ê 感情 kap 堅持：漢詩毋但是吳濁流文學生命當中最主要 ê 學識 kap 書寫方式，更加是 tī 日本時代對抗殖民體制，到戰後對抗西方文化 ê 漢文化主體。⁷⁸另外，吳濁流有提起「漢詩」這 ê 名稱所引起 ê 爭論，講有一寡人

⁷³ 第一代是 1931 年留日學生吳坤煌所創，第二代是「台灣文藝聯盟」機關誌，第三代是「皇民奉公會」接收《文藝台灣》kap 《台灣文藝》了後另外 koh 辦。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外文學》34 卷 10 期，2006.03，頁 125-165。

⁷⁴ 張彥勳，〈從「銀鈴會」到「笠」〉，《笠》詩刊 100 期，1980.12，頁 32。

⁷⁵ 陳鴻森，〈台灣精神的回歸—《笠》詩刊前一百二十期景印本後記〉，笠詩刊編輯委員會，《時代的眼·現實之花：《笠》詩刊一～一二〇期景印本（一）》（台北：學生書局，2000.09），頁 34。

⁷⁶ 林鍾隆，〈台灣文藝與吳濁流〉，《台灣月刊》238 期，2002.10，頁 12-14。

⁷⁷ 吳濁流，〈漫談台灣文學的使命—答鄭穗影君的詢問—〉，《台灣文藝》1 卷 4 期，1964.07，頁 74。

⁷⁸ 黃美娥，〈鐵血與鐵血之外：閱讀「詩人吳濁流」〉，收錄 tī 林柏燕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頁 28-36。

kap 中國文藝界聯誼會反對使用「漢詩」，認為這是日本人所號，「光復」了後應該毋通 koh 用，愛改做「舊詩」。但是吳濁流認為舊詩是相對西洋 ê 新詩來講，若是就詩 ê 發展 kap「國格」ê 層次，一定愛稱做「漢」詩才有法度對同(tui-tàng)。79可見，吳濁流對「漢詩」ê 認知，並無排除中國文學 ê 傳統，也包容日本時代台灣文學 ê 特殊經驗在內，甚至是拒絕「光復」ê 政治觀點對文學 ê 介入。所以，咱會當講吳濁流 ê 漢詩觀，以及《台灣文藝》對遮所延伸出 ê 曖昧立場，應該是 khah 倚近文化認同 ê 層次，用游勝冠 ê 講法，至少是一種「中國—台灣」重疊(ting-thah)意識 ê 典型，無一定完全攏是中國民族主義 ê 意識。

「純」文學 ê 策略 tī《笠》尤其明顯。「笠」這 ê 名專工欲 kap「皇冠」對比，強烈表現 in 欲追求台灣本土民間 ê、樸實 ê 風格，koh 再看林亨泰所寫 ê 刊頭講：「我們所渴望的是：把呼吸在這一個時代的這一個「世代」(Generation)的詩，以適合於這個時代以及世代的感覺痛快地去談論。」80看起來是真單純 ê「詩學」討論，但是後面 ê 聲明內底，又 koh 浮現出「笠」ê 詩觀內底對「本土」ê 想像：

五四對我們來說，已不再意味著什麼意義了。我們可以將五四看成過去的，正如我們將唐、宋視為過去的一樣！這是我們敢斷言的，因為我們以有了與前時代完全相異的詩的緣故。⁸¹

對頂面 ê 宣言來看，向陽認為《笠》所行 ê 詩路，是欲追求詩 ê「時代性」kap「世代性」：強調詩愛合「時代性」，繼承現代主義 ê 詩學，但是又 koh 會通反省超現實流派脫離社會現實 ê 毛病；自戰前跨越到戰後，也跨越外來統治者語言霸權 ê「跨越語言的一代」，成做「笠」另外一種「世代性」，除了予 in ê 語言選擇 kap 詩學主張，偏向主張明朗素樸 ê 生活語言以外，in 所承擔 ê 歷史經驗，也是「笠」傳承日本時代 ê 文學傳統 kap 集體記憶 ê 意義所在。這兩種性格毋但是「笠」集團 ê 本土意識 kap 詩學論述 ê 基礎，透過這兩種性格，將 in 所欲追求 ê「台灣現代詩」自中國古典 kap 五四新文學 ê 系譜當中割出來，也是《笠》kap《台灣文藝》立場相倚、互相支援，tī 干證台灣本土性 ê 過程當中內外呼應 ê 證明。⁸²

就《笠》kap《台灣文藝》ê 成立 kap 發展來看，這兩份刊物 kap 文學集團相對來講，確實無親像吳介民對鄉土文學論戰 ê 觀察。吳介民認為，鄉土文學論戰已經發展做「公共論壇」ê 形式，也是一場各種社會身份認同表意 ê「文化鬥爭」，更是「各種論述主體在摸索與重塑集團認同，也是原來潛藏在各個社會角落的

79 吳濁流，〈關於漢詩壇的幾個問題—我的管見—〉，《台灣文藝》1卷3期，1964.06，頁77。

80 林亨泰，〈古剝的竹掃〉，《笠》1期，1964.06，頁3。

81 林亨泰，〈本社啟事〉，《笠》1期，1964.06。

82 向陽，〈「現代」與「現實」的辯證——論《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新地文學》1卷2期，2007.12，頁44-46。

不滿邁向公開反抗的前聲。」⁸³「文學」是跟綴(kin-tuè)在「鄉土」——這ê牽涉著政治、社會、歷史等等複雜論題ê後壁，甚至引起官方ê介入，王拓、楊青矗兩位作家也因為美麗島事件入獄。所以《笠》無積極介入，顛倒透過文學技巧ê暗喻來介入社會現實⁸⁴，拄好(tú-hó)也顯示鄉土文學論戰背後所指向ê政治性。

只不過需要說明ê是，筆者使用「對台灣文學走揣政治厝頂」ê修辭，並毋是講《笠》kap《台灣文藝》自開始著完全無向望(ng-bāng)、預設某一種政治ê想像，事實上，咱ê後設立場也無法度完全定論在政治壓迫之下ê認同表意到底是「抵抗」抑是「轉向」。這款ê修辭只是欲強調在「回歸現實」ê文化潮流之下，這陣本土作家選擇倚tī避免直接沐(bák)著政治，也無欲kap官方以中國文學做中心ê文藝政策有所區別、對抗ê立場頂面，直接用inê文學實踐確立本土ê、台灣ê主體性，間接成做一種有政治意義ê回應。這方面，《笠》、《台灣文藝》其實kap鄉土文學論戰當中ê「鄉土派」(包括中國kap台灣意識)有相仝ê，對「本土」、「現實」ê關懷。譬論講「笠」自創社初期原本是行「詩學批判」ê路線，但是tī1970年代ê社會kap文壇氣氛之中，仝款也進入「鄉土現實」時期來追求「鄉土性」⁸⁵，也就是李魁賢ê講法：「笠本來就走現實主義路線，關心生活，凝視現實。鄉土文學論戰以前，笠就是走著這種路。」⁸⁶另外，《台灣文藝》雖然像李喬所表示：「對於所謂「鄉土文學論戰」，我個人始終沒有特別感受，因為從作品可以證明「鄉土文學論戰」之前，我早就在寫「論戰之後」那種作品了，而且佔了迄今為止產品的一半左右。」⁸⁷但是《台灣文藝》也無分論戰立場，專題介紹、評論鄉土文學作品kap作家。所以，延續頂面咱對鄉土文學文體使用方言ê分析，《笠》kap《台灣文藝》在這方面，敢(kám)有展現kap鄉土文學仝款ê問題？以下咱來看《笠》、《台灣文藝》這兩份刊物kap方言創作ê關係，進行分析kap比較。

二、對「詩ê語言」發見「母語ê詩」：林宗源kap「笠」ê對話

「笠」ê詩觀，會當講是對陳千武所講ê「兩ê球根」發芽(puh-gê)出來，一ê是日治時期台灣文學ê現代kap寫實傳統，來kap戰後紀弦所掖(iā)ê現代主義接枝。事實上，像白萩、林亨泰、黃荷生、林宗源遮ê笠詩人，頭先也有捌參與現代派、藍星、創世紀詩社，成做「笠」初期包納現代主義ê風格。但是，in後來

⁸³ 吳介民，〈鄉土文學論戰中的社會想像——文化界公共領域之集體認同的形塑與衝突〉，收錄於李丁讚等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頁315-316。

⁸⁴ 向陽，〈「現代」與「現實」的辯證——論《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新地文學》1卷2期，2007.12，頁52。

⁸⁵ 解昆樺，《台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台北：威秀，2013.01)，頁55。

⁸⁶ 〈鄉土與自由——台灣詩文學的展望〉，《笠》87期，1978.10，頁42-43。

⁸⁷ 李喬，〈我的文學行程與思考〉，《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頁341。

攏轉向修正現代主義，普遍反對創世紀 ê 超現實主義。親像趙天儀對現代主義 ê 幾項批判，包括「流行調的風行」、「文言詩的復辟」、「偽現代的氾濫」、「真實性的失落」，其中對「抽象」、「超現實」、「存在」鬮洗(khau-sé) kah 特別厲害。⁸⁸所以，為著欲反抗已經行人舞弄文字、講究鋪排形式 ê 現代 kap 超現實主義，「笠」漸漸向寫實主義、新即物主義返轉(huán-tng)，重新思考「詩是啥物」？啥物是「詩 ê 語言」？欲按怎寫，才有法度寫出有「時代性」koh 合「世代性」ê「現代詩」？

丁威仁將「笠」ê 詩觀分做「本質論」、「語言論」kap「意象論」，認為「詩」對「笠」詩人來講，毋是詩人干焦用文字將心中 ê 感受寫落來 niā-niā，「詩」ê 本質必須是詩人用「日常語言」思考「現實經驗」得著超現實 ê「感受」，繼(suà)落來才將這種意象(image)——也就是「詩想」，用文字 kā 表現出來。詩人若是無 kap「現實」對話，著無法度產生「語言」，若無「語言」著無法度產生「詩」。所以，「笠」將語言 kap 文字分開，認為詩不只是文字 ê 修辭，語言「先起」、「頭一手」ê 機能才是追求詩 ê 手路，文字是後屬語言做紀錄用 ê。⁸⁹所以，「笠」詩人透過反省現代主義，尤其是超現實主義喪失精神、浮冇(phû-phann) ê 文字技巧所確立詩 ê「時代性」，是透過「語言」重新建立詩人 kap 現實世界之間 ê 牽連。

另外，「笠」自銀鈴會 ê 前身跨越到戰後 ê「世代性」，反應 tī 第一代詩人重新適應語言 ê 經驗頂面。經歷過重新學習語言 ê 痛苦，這種「跨越語言」ê 特質，予「笠」詩人初期使用語言 ê 侷限，最後變成 in 明朗 ê 詩語風格。⁹⁰像陳千武特別講著伊自開始寫日文詩，有一部份是先用台語思考才 koh 轉換做日文；欲寫華語 ê 時陣，原來用日語思考 ê 物件著愛先轉換做台語，才 koh 再翻譯做華語，到尾才有法度毋免轉譯，直接翻做華語。⁹¹所以解昆樺 ê 觀察大概無毋著：「笠」對「詩 ê 語言」ê 思考，以及詩人本身 ê 跨語經驗，確實是「笠」相對來講 khah 會當接受母語創作 ê 機緣。但是詳細來看，這其中並毋是全然無衝突 ê。

咱以上早開始寫母語詩 ê 林宗源 kap「笠」ê 對話來看衝突發生 ê 所在。林宗源 ê 文學生涯在早也是對現代主義來出發，但是 tī「笠」創立全年加入詩社以後，林宗源毋但慢慢綴著「笠」關心現實 ê 大方向 teh 轉幹(tng-uat)，甚至是開始試驗「方言入詩」ê 寫作，慢慢開始引起「笠」同人 ê 討論。不過，林宗源 tī《笠》第 7 期發表 ê 詩作〈我是神〉suah 引起袂少穉(bái)評，像葉泥認為這欸表現方式是一擺失敗 ê 試驗；李篤恭直接講「太土了」，無需要用方言 ê 所在 suah 用落去是無適當 ê；杜國清 ê 看法是，欲表現地方色彩，主要 tī 精神方面，無一定愛透

⁸⁸ 趙天儀，〈現代詩的暗礁〉，《笠》3 期，1964.10，頁 9-11。

⁸⁹ 丁威仁，〈「本土現實詩學」的啟航——70 年代《笠》詩論初探〉，收錄於《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8.06），頁 89-116。

⁹⁰ 解昆樺，〈台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頁 312。

⁹¹ 施懿琳、鍾美芳、楊翠等編，〈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豐原：中縣文化，1993），頁 226。自頂註轉引。

過語言；趙天儀、洛夫雖然認為方言 ê 寫作有試驗 ê 價值，但是愛「有技巧地吸納於國語，豐富國語的語彙」。⁹²林宗源得著這款評價了後，tī「笠」ê 詩觀 kap 語言觀頂面進一步探問：「我們為什麼不從生活中對事物所形成的思維的秩序，作為詩的形式呢？」⁹³因為對林宗源來講，「詩，是用語言具象地表現其精神的活動。」⁹⁴語言全款是林宗源身為詩人 ê 思維運動 ê 媒介符號，更加是建築詩 ê 基礎，只是林宗源 ê 「日常語言」kap 其他同人無全，是在「國語」之外 hōng 譬相(phi-siunn) ê 「方言」。林宗源 koh 進一步申論伊 ê 詩觀所延伸出來 ê 語言觀：

假如以一種語言思考，而又以另一種語言表現，這種作品，必然是脫線的作品，不鄉不土的作品，不是發自內心直接產生的詩，不是自己的詩，自己的文化。……因此有人建議我，不得不用台語時才用，給我很重的感嘆。

95

所以講，「笠」雖然比較 khah 會當接受用生活語言寫詩，不過在 in ê 評判背後所欲遮閘(jia-tsáh)、閃避 ê 真命題是：方言 ê 使用受著華文體制 ê 宰制。「笠」ê 詩觀 kap 語言觀 ê 斷裂，已經無意中暴現(phòk-hián)這款「國語」中心 ê 語言暴力。

經過〈我是神〉ê 評論以後，林宗源「方言入詩」ê 路線愈來愈顯明，而且向陽也自 1976 年開始 tī《笠》kap《台灣文藝》試驗用台語創作⁹⁶，「方言詩」慢慢毋是意外 ê 「個案」，予「笠」在幾落場座談會當中若像有心無意來磕(kháp)著使用方言 ê 問題。譬論 1978 年 9 月 ê 座談會論著林宗源 kap 向陽 ê 方言詩，喬林、林煥彰認為「沒有必要的話，不宜用方言入詩」、「方言比較有地域限制」，猶原是典型鄉土文學 ê 「魔神仔」teh 變鬼(pinn-kuí)，m̄-koh 相較〈我是神〉ê 評論，其他 ê 人對方言詩 ê 看法漸漸有改變。像李魁賢確認林宗源 ê 思考語言了後，開始對教育 ê 層次來思考林宗源 ê 詩語表達 kap 讀者接受之間 ê 坑坎(khenn-khàm)；李勇吉進一步提出林煥彰 ê 看法是以「國語文」寫作為主，摸(giú)出台語 kap 華語語際之間 ê 主從關係⁹⁷；林亨泰雖然認為語言 ê 統一是近代民族國家袂當欠缺 ê 條件，政策性 ê 選擇予國語得著優勢，但是每一種語言攏有地方 ê 風俗特色 kap 鄉土情感，並無好穰懸低 ê 差別，「方言是國語的根，如果沒有方言，也就沒有國語可言。」⁹⁸；在 1982 年「笠的語言問題」座談會頂面，李魁賢特別補充講：

⁹² 《笠》7 期，1965.06，頁 68-70。

⁹³ 《笠》20 期，1967.08，頁 23。

⁹⁴ 〈詩的問答〉，《笠》20 期，1967.08，頁 48。

⁹⁵ 林宗源，〈以自己的語言、文字、創造自己的文化〉，《笠》93 期，1979.10，頁 39-41。

⁹⁶ 向陽（林淇瀆）ê 創作動機主要是「代替父親說話、探尋父親的生命」，但是伊回應鄉土文學 kap 方言創作 ê 時陣講：「今天從事鄉土文學的作者，不管知或不知，其終極仍是為國語文學做磚石甚至只是沙土的奠基，將來是不得不犧牲的。悲哀，但是直得。」這時陣向陽 ê 方言觀猶是以「增益國語文學」，向陽，〈江湖夜雨〉，《銀杏的仰望》（台北：林淇瀆，1980.07），頁 199-206。

⁹⁷ 〈鄉土與自由—台灣詩文學的展望〉，《笠》87 期，1978.10，頁 51-54。

⁹⁸ 林亨泰，〈國語與方言——林宗源詩集「根」序——〉，《笠》107 期，1982.02，頁 42-43。

「以方言說話的人，從思考到寫作，不知不覺當中會有一種語言的轉化過程，這
是用國語說話的人不易理解的地方，也可能造成彼此對語言追求的方式不同。」⁹⁹
所以，這ê時陣已經有袂少「笠」詩人 tī 共同ê詩觀基礎頂面，會當理解、接
受林宗源 kap 向陽ê方言詩路，並且 koh 有踏著語際之間彼條權力無對等ê「政
治」界線，m̄-koh「笠」並無 koh 再進一步挑戰華語ê文化霸權，用趙天儀ê觀
點來代表：「我們不懷疑使用國語的正統性，但為了充實語言，必要的話也容納
台語，這也是生活經驗的擴大化。」¹⁰⁰

其實咱看上早開始用方言創作ê林宗源，一開始也並毋是欲向倒(ann-tò)華語。
伊認為建立共同語 kap 提倡台語並無衝突，tī 接受華語成做共同語ê前提之下，
伊講：「假如能好好地運用方言，是可以為國語注入精彩的神髓，豐富國語，使
國語與台語融洽，成為一種文學創作的語言。」¹⁰¹這種看法對照趙天儀承認「國
語正統性」ê立場，其實差無外濟。但是比較後來ê「台語文學之父」，林宗源到
底是 tī 啥物款ê機緣之下拍開「台語文學」ê轉機，無法度接受國語正統性之下
ê「方言文學」？咱看伊 tī 《台灣文藝》第 104 期發表第五篇〈沉思及反省〉，針
對母語文學一直以來面對ê打壓所提出ê看法：

我想，身為台灣的作家，為何不愛惜家治的話，活在現時現地，講一款不
是咱平常講的話，所寫的文學，麥(要)安(按)怎稱為台灣文學列(咧)。
母語是生產文學的語言，也是台灣文化的命脈，一個作家連即款自覺，即
款精神也無，所寫的作品，不知麥叫做啥貨，我叫它是半仿仔的文學。……
在我想來，寫好詩無啥物稀罕，建立新觀念，新思想，創新詩藝，者(才)
是咱現時必須自覺、認識、抱負、實踐的代誌，若無安呢！台灣作家就是
寫萬首，萬篇，也無啥物(什麼)定位可談。¹⁰²

kap 林宗源過去相對溫馴(un-sûn)，對詩ê文學語言來證成母語書寫正當性ê純文
學理論相比較，這時陣伊已經開始對台灣文學ê文化、歷史 kap 政治層面，申論
母語文學所受著ê壓迫。這種提法ê變化，也 kap 伊特別提出「台灣文學定義」
以及「台灣作家定位」這兩ê問題意識真有關係：因為這篇「反省」雖然表面上
無明講，但其實著是針對 1986 年李昂 kap 鄭愁予參加國際文學會議受著歧視，
引起台灣文壇震盪ê「台灣作家定位論」所做ê回應。

為啥物愛特別指出台灣作家ê定位問題？因為這ê問題毋但表示頭先「台灣
文學」正名ê論爭根本猶未結束，而且更加是對「台灣文學」正名ê挑戰：已經

⁹⁹ 〈「笠」的語言問題〉，《笠》110 期，1982.08，頁 15。

¹⁰⁰ 〈鄉土與自由—台灣詩文學的展望〉，《笠》87 期，1978.10，頁 51-54。

¹⁰¹ 林宗源，〈方言與詩〉，《笠》123 期，1984.10，頁 18-21。

¹⁰²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台灣文藝》104 期，1987.01，頁 13-14。

有「台灣意識」ê 台灣文學，猶 koh 無法度展現家己 ê 主體性來 kap 中國文學有所區別，島內 ê 中國文學論者也因為台灣 ê 孤兒外交，得袂著國際承認。林宗源對台語文學 ê 立場出發，認為這是台灣作家無使用母語創作所致，繼承這 ê 觀念，林宗源 tī 伊 ê 詩選內底隔空回應「邊疆文學」kap「中國文學」ê 爭論：

台灣文學予人看做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看作是邊疆文學，甚至講是鄉土文學，深深阿想，攏是台灣作家家己惹的罪孽。台灣作家語言不在家，精神有兮也無佇厝，吃阿七老八老猶不斷乳，無自信無覺悟無反省，講的攏是三天地外的中國遺產，寫的攏是半仿仔的北京話，莫怪予人安呢講。……現時台灣的文學，最重要的課題，是建立家己的語言與文字……假設你用台灣北京話來寫真順手，你已經不是咧寫台灣文學了。你豈是中國文學的作家咧？不是，人不承認，因為你的北京話是假包的。你愛知影北京話與閩南話，是兩個無同的語言，你用台灣北京話，不知麥歸在啥語系，文學歸類所屬也真曖昧，勉強算是中國文學，若安呢莫怪人講是邊疆文學了。

103

Hobsbawm 有捌提醒：日常通用 ê 或者是文學頂面慣稱囡兒對毋捌字 ê 父母身上所學來 ê 「母語」(mother language)，其實無等於是「民族語言」¹⁰⁴，語言也毋是決定一 ê 民族上主要 ê 條件。但是林宗源這時將「語言」(甚至文字)當作一項界定台灣民族主義 kap 台灣(民族)文學 ê 條件，除了激進以外敢無伊 ê 道理？咱暫時按下這 ê 問題來看後續 ê 發展，會得著 khah 清楚 ê 問題意識，而且也不只是林宗源一人提出類似 ê 觀點。

林宗源詩集出版無外久，陳千武寫一篇〈台灣國語詩的創作〉，雖然動機無清楚，但是林宗源認為這篇文章是針對伊出版詩選所寫 ê。陳千武在這篇文章進前已經有寫一篇〈我的母語〉，特別強調家己是用母語河洛語思考，「以河洛話的文法套上國語發音，用來講話或寫詩，形成了台灣國語」。¹⁰⁵所以，陳千武 ê 詩以及伊所講 ê 「台灣國語」究竟是台語或者是華語？伊 tī 〈台灣國語詩的創作〉內底講，台語、客語、原住民語攏應該叫做台語(詩)，又講「事實，台語詩就是台灣國語詩的簡稱，而台灣國語詩是容納河洛語音、客家語音、原住民語音，均能表現的共同語體。」¹⁰⁶針對陳千武表面上支持台語，實際上 suah 否定台語做文學語言 ê 可能性，袂輸 teh 「搶旗」ê 作法，林宗源用強烈 ê 氣口提出批評，

¹⁰³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1988.08，收錄 tī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台南：首都詩報，2011.12)，頁 129-130。

¹⁰⁴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71。

¹⁰⁵ 陳千武，〈我的母語(代序一)〉，網址：

<http://dcc.ndhu.edu.tw/poemroad/chen-chianwu/2006/12/14/%E6%88%91%E7%9A%84%E6%AF%8D%E8%AA%9E%EF%BC%88%E4%BB%A3%E5%BA%8F%E4%B8%80%EF%BC%89/>，使用日期：2013.02.17。

¹⁰⁶ 陳千武，〈台灣國語詩的創作〉，《台灣時報》，1988.10.14。

並且反駁(huán-pok)用台灣國語詩簡稱台語詩 ê 觀點，因為：

伊（陳千武）這款的講法，干乾會當假設在台灣的國語才講會通，若無是袂通的，就是算做台灣的國語，親像伊講的會當包容閩、客、原住民，成做共通的語言，但是，按母語才是文學創作的語言來講，這是無合理道理的。這是真勉強的假設，因為台灣話及台灣國語(台灣北京語)是無同的語言。

107

陳千武欲用「國語」取代、解構「台語」主體性 ê 焦慮，真緊著 koh 出現 tī 《笠》ê 討論之中。Tī 論台灣新詩 ê 討論會頂面，原本著 khah 支持方言書寫 ê 林亨泰，針對台灣文學 ê 界定問題，全款提出「語言」kap「意識」兩項標準，koh 再引起陳千武 ê 反對。陳千武 ê 回應是：雖然伊 ê 母語是台灣話，但是若日語 ê 感受 kap 台語全款，用佗(tó)一種語言攏無要緊，但是林亨泰認為袂當用個人 ê 特殊性來看這 ê 問題，因為若是跨語言一代 ê 殖民經驗無 koh 存在，suah 猶原維護殖民者語言，毋但是「笠」ê 詩論矛盾袂通，更加是「台灣文學自主性」ê 問題。¹⁰⁸

游勝冠認為，1980 年代初加入黨外民主運動 ê 作家推動台語運動 ê 發展，包括雙語教學、台語文學、客語文學、台語文字化 ê 討論，是欲達到獨立建國 ê 政治目標，建立 kap 中國文學／中華民族意識有所區別 ê 「台灣民族文學」。¹⁰⁹但是筆者認為，這款分類方式有「先入為主」ê 危險，「民族主義」ê 提法拭除台語文學自「方言入詩」以來 ê 演變過程在「文學」發展層面 ê 正當性，可能也無法度掌握「台語文學」對「方言文學」走脫出來 ê 銳角(mê-kak)，進一步同情、理解 kap 接受。對林宗源 kap 「笠」ê 對話，一直到林亨泰間接回應著台灣文學正名 ê 案外案來看，咱會當提出「笠」kap 台語文學前脈絡之間一套 khah 精確 ê 描述：台語文學前身 ê 「方言入詩」在早出現 tī 《笠》，其實也經過「承認」國語正統性 ê 「方言入詩」、「方言詩」階段。但是 tī 戰後「台灣意識」漸漸起漲(khí-tiunn)、「台灣文學」總算對「鄉土文學」正名以後，「台灣文學」在中國 kap 台灣 ê 曖昧牽連之間 suah 進一步印證，過去在中國—台灣重疊 ê 本土論式之下所完成 ê 「台灣文學」，就族群語言 ê 向度無法度證成台灣作家家己身為「人」，kap 台灣土地、文化 ê 意識。咱看著「笠」雖然對本土意識倚起，但是台語(族)上直接 ê 表現欲望，在「笠」詩人之間 suah koh 予中國意識維持「國語中心」體制正當性(legitimacy) ê 「工具理性」來排斥、壓制。這款矛盾當然會來致使「方言文學」tī 長期 ê 壓迫經驗當中，開始產生否定(hónn-tīng)、甚至進一步質疑、挑戰對「台灣文學」內部「外來 ê 華語殖民文化霸權。咱會當講：林宗源、林亨泰對方言

¹⁰⁷ 林宗源，〈讀〈我的母語〉及〈台灣國語詩的創作〉有感〉，1988.10.17，收錄 tī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台南：首都詩報，2011.12)，頁 156。

¹⁰⁸ 〈論台灣新詩的獨特性與未來開展〉，《笠》148 期，1988.12，收錄 tī 呂興昌編，《林亨泰全集九—文學論述卷 6》(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998.09)，頁 232-248。

¹⁰⁹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362-363。

論爭延伸到台灣文學正名，用基進 ê 「語言民族主義」修正台灣民族主義 kap 台灣（民族）文學猶原譬相本土語言、變相維持華語霸權 ê 矛盾，「笠」本身其實著是台灣文學本土論在台灣 kap 中國意識之間鬥爭、矛盾 ê 縮影，同時也是台灣文學史變遷 ê 重要註解。

三、「方言文學」ê 命定時機：《台灣文藝》ê 「前」鄉土文學到《浪淘沙》

若準講《笠》是對詩 ê 理論 kap 實務發見「母語 ê 詩」，《台灣文藝》以小說為主，兼有詩、論，綜合性 khah 懸(kuân) ê 風格，對方言 ê 思考 kap 態度相對來講著有 khah 濟面向通好 khe-khó。首先對作家來看，《台灣文藝》ê 筆陣會當對「戰後第一代」——也就著是戰後初期以鍾肇政為主 ê 《文友通訊》作家群講起。頭前有講過，戰後初期台灣作家原本 koh 有對台灣話文 ê 認同，但是因為台灣話自日治時期到戰後，攏陷落在「語言文化」kap「政治」雙重 ê 方言從屬關係內底，再加上二二八事件以後，國民政府加強打壓台灣本土語言，致使本省作家對方言書寫 ê 想像 kap 期待已經蔘(lian)去，認為無啥物發展方言文學 ê 必要。M-koh，這並無代表遮 ê 作家完全放棄方言入文，像鍾理和雖然直接講不贊成方言文學，但是認為「文學內底 ê 方言」kap「方言文學」應該分開討論，就方言文學來講，以台語（鍾稱「閩語」）為主 ê 台灣話文，書寫技術猶 koh 無完整，而且台灣族群複雜，若是欲化解族群之間 ê 溝通阻隔，「時在今日究非明智之舉」；若就文學內底 ê 方言來看，因為台灣 ê 客觀環境限制方言 ê 發展，方言干焦會當 tī 華文體制內底求取地位，這方面來講，鍾理和贊成方言書寫。鍾肇政也贊同鍾理和 ê 問題意識，認為「方言文學最大限度只能在文章中穿插某些方言而已，純粹方言的文學，實為事實所不許。」¹¹⁰所以《台灣文藝》初期 ê 小說語言，大概著是繼承日本時代台灣話文書寫 ê 盡磅(tsīn-pōng)原則，零星(lân-san)套用方言語法 kap 詞彙 ê 台灣式白話文，成做「文學內底 ê 方言」來發展。

雖然按呢看起來，《台灣文藝》作家好親像 tī 傳香火 ê 過程之中，有意無意來將「對話台語、地文華語」¹¹¹——這種受著強勢華語宰制所產生 ê 書寫成規繼續傳承落去，但是換一 ê 角度來看，《台灣文藝》內底願意試驗方言書寫 ê 作家，至少 tī 方言書寫普遍成做一種風氣，以及台語文刊物出現進前，就本土語言書面化 ê 努力，甚至是「佔領」華語文學體制內底所畫撥出來 ê 方言空間，也並非是完全無後殖民式 ê 貢獻。換一句話講，若是暫時返轉去台語文學猶未「覺醒」，猶 koh 暗流 tī 華語文學場域內底承認「國語正統性」ê 文學史脈絡當中，鄉土文學 ê 語言變體——「非母語文學 ê 母語書寫」，其實是值得咱觀察台語對「口語」進入「書面語」ê 創作 kap 接受情形，按怎成做台語行出「文學內底 ê 方言」這

¹¹⁰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1998.02），第7、9、11、21信。

¹¹¹ 施俊州將小說內底「敘述者講述」ê 部份稱做「地文」，筆者 tī 遮接用這 ê 名稱。

條界線，形成「方言文學」ê一項重要指標。

《台灣文藝》一開始透濫方言語彙 kap 語法 ê 比例，確實無法度 kap 日本時代像〈以其自殺，不如殺敵〉、賴和〈一個同志的批信〉、楊逵〈剝柴囡仔〉koh 其他台灣話文作品 ê 氣口相比。譬論講《台灣文藝》第 2 期刊登林鍾隆〈大屋裡偷錢的案子〉，對話主要猶 koh 是使用華語話句，透濫少量 ê 台語詞彙，後壁直接在行文內底用括號注解華語 ê 意思；第 3 期刊出廖清秀 ê 對話體小說〈宰豬的爹〉，台語使用 ê 比例也真少。雖然 tī 遮無法度用精確 ê 語言學研究來統計、分析，但是大略看會出來，方言 ê 使用大部分限制 tī 對話內底，三不五時會「越界」tī 地文內底，而且不只是台語，客家籍 ê 作家也會透濫客語。¹¹²這款文體 tī 1970 年代 hōng 追認做「鄉土文學」進前著已經存在，顯見黃春明、王拓、王禎和等等鄉土文學作家 ê 方言使用並毋是啥物新 ê 發明，筆者暫且將《台灣文藝》這種 tī 「鄉土文學」進前著出現 ê 透濫文體稱作「前」鄉土文學體。¹¹³接續咱頭前 ê 假設：若準講前鄉土文學體 tī 華語文學體制內底有「佔領」方言空間 ê 積極意義，若按呢前鄉土文學體透濫方言 ê 程度 kap 比例，按怎對閃閃爍爍(siam-siam-sih-sih) ê 方言使用，成做對話全部使用角色族語 ê 「後」文體？

咱應該會當同意將 1981 年開始 tī 《台灣文藝》連載，多語風格顯明，尤其對話完全使用台語、客語，甚至原住民語，hōng 公認超越鄉土文學真濟 ê 《浪淘沙》，當作是「後」鄉土文學體 ê 典型文本。但是一件值得注意 ê 代誌是：其實 tī 71 期《台灣文藝》刊出《浪淘沙》進前，對話以台語為主，透濫「華語」kap 使用類台語句法 ê 全台語語勢，著已經有準備欲孵(pū)出來 ê 範勢(pān-sè)，有一篇真顯頭(hiānn-thâu) ê 作品是小說家東年¹¹⁴所寫 ê 〈漁人船〉，以下摘(tiah)一段小

¹¹² 親像李喬 tī 《台灣文藝》第 9 期發表〈阿王嫂這個人〉，寫囡仔「屙屎」(o²⁴ sii³¹)；全期吳濁流發表〈牛都流淚了〉，寫著「目汁」(mug² zii^{b2})，雖然少量但攏是客語。

¹¹³ Tī 遮用「前」，除了是欲標示出華語交濫方言 ê 文體形成脈絡之外，也想欲 kap 「鄉土文學論戰」脈絡之下 ê 「鄉土文學」做區別。

¹¹⁴ 究實講，東年 kap 方言寫作有關 ê 論述無濟，不過東年 kap 屏東出身 ê 作家郭漢辰 2007 年 ê blog 對話應該會當做非正式 ê 旁證：「我們台灣文學界的作家們很喜歡爭意識型態，這無妨，但，爭自己的言論權時同時想壓制別種言論權，就有點過火…這樣，就留下了很多意識型態而沒作品…如果這樣，我們讀這樣的文學作品何用，我們去讀那些意識形態的原本不就好了？」「台灣文學家，特別是南台灣（這樣的廣義台灣）…小說中的對白，適度的或完全的方言表現，我想（我在《失蹤的太平洋三號》中的經驗）可能是需要的，因為使用什麼樣的語言——包括內容和形式——可能表現什麼樣的文化和生活…但，敘事的部份，全部使用閩南語…能被閱讀的詞彙可能就不太夠…」網址：http://blog.udn.com/highsea/guestbook?f_ORDER_BY=new&pno=44&md=，使用日期：2013.02.06。另外是 2011 年，東年因為擔任小說評審，另外寫一篇〈台語文的書寫〉，主要是 tī 「漢語」ê 基礎頂面，討論台語 ê 現代化、書面化 ê 問題。伊認為「台語文書寫，不是中文或台語文的問題，是漢語文的問題。」看文脈，東年所講 ê 「漢語文」其實是欲借重漢字 ê 表意功能來補充台語書面化不足 ê 所在，所以伊講「將漢語文定義為中文，再主張不能使用中文於台語文書寫，這邏輯當然是不通的。」總合頭前伊 kap 郭氏 ê 討論，東年雖然對台語文運動有一寡誤識，但是 tī 台語文有限 ê 敘事功能（現代化不足）ê 侷限頂面，算講是無傷過排斥台語文，而且承認台語文書寫 ê 文化正當性 kap 實用性，拍拚 tī 對話內底追求完全 ê 方言表現，但是前提是台語文應該愛包納 tī 漢語文學內底，在統一 ê 文字化方案猶未完成 ê 時陣，無應該反對中文/華

說 ê 對話用台羅譯寫：

「胡船長有在這沒？」(Ôo tsùn-tiunn ū tī tsia--bô?)

「叨一位胡船長？」(Toh tsit uī Ôo tsùn-tiunn?)

「渡即接新溢漁一號——」(Tōo tsit tsiah Sin-ik-hī it-hōo...)

「喔，在船仔——你是那位欲上船的什麼，什麼什麼林什麼是否？欲上船就要趕緊來辦手續喔，船在趕欲出港咯。」(Ooh! Tī tsùn-á, lí sī hit uī beh tsiunn-tsùn ê siánn-mih, siánn-mih siánn-mih Lím siánn-mih sī--bô? Beh tsiunn-tsùn tiòh ài kuánn-kín lài pān tshiú-siòk--ooh, tsùn teh kuánn beh tshut-káng--loh.)¹¹⁵

若先莫(mài)看用字 koh 小可仔(sió-khuá-á)借用華語漢字，頂面 ê 對話表現看起來，已經完全會當用台語來唸讀，當然著免講東方白《浪淘沙》更加用心計較，連繼(lián-suà)兩期 ê 《台灣文藝》出現對話全用台語 ê 「後」鄉土文體——「文學內底 ê 方言」ê 極限，確實使人注目。

M-koh 根據筆者 ê 觀察，《台灣文藝》內底對零星用台語詞、台語語法¹¹⁶這欸「前」鄉土文體轉換到「直接書寫台語」ê 「後」文體之間，其實無 khah 顯著 ê 階段性變化。而且無論是〈漁人船〉或者是〈浪淘沙〉，在這兩篇完全表現出台語（甚至日語、客語、原住民語）對話 ê 「後」鄉土文體刊出進前，《台灣文藝》內底其實也無啥物 kap 台語文字化方案相關 ê 討論。若按呢講，東方白是按怎想欲寫，又 koh 按怎寫出對話完全呈現角色語族／族語 ê 「後」鄉土文體？這欸「後」文體雄雄(hiông-hiông)對「前」鄉土文學使用台語詞 ê 文類成規（頻率）內底跳躍、走脫出來 ê 現象，對《台灣文藝》出現「台語文學」，甚至是對台灣文學史 ê 變遷來講，敢會當代表啥物意義？

咱自東方白寫《浪淘沙》ê 過程來走揣一寡線索。受著時任《台灣文藝》社長鍾肇政 ê 鼓勵，東方白開筆將台灣頭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女士 ê 故事寫做長篇小說，但是《浪淘沙》內底 ê 方言使用，東方白事前 kap 鍾肇政並無啥物討論，一直到《浪淘沙》第一部寫了，鍾肇政雖然認為猶 koh 有方言用字 ê 顧慮，以及大

語透濫入來。網址：<http://blog.udn.com/highsea/5287041>，使用日期：2013.02.06。

¹¹⁵ 東年，〈漁人船〉，《台灣文藝》70期，1980.12，頁183-190。

¹¹⁶ 當然這牽涉著主觀 ê 認定，筆者是以上冗(ling) ê 標準：直接用台語試讀《台灣文藝》前70期 ê 小說對話，是 khah 權宜、粗淺 ê 做法，等待後人有心 koh 進一步整理。若欲舉一 ê 「濫台語語法」ê 例，像68期楊航所寫 ê 〈最後旨意〉，有一寡透濫「華語」，實際上用台語唸讀比較 khah 順 ê 話句，譬如這句：「成仔你做童乩是沒不對，若是有神，替神行事，這也是很好的善事，不過，我們做田人，賺生活也要緊。」(Sing-á lí tò tâng-ki sī bò m-tiòh, nā-sī ū sin, thè sin hng-sū, tse iā-sī tsin hó ê siān-sū, m-koh/put-kò, lán tsò-tshân-lâng, thàn sing-uáh iā iàu-kín.)除了「我們」以外，全句差不多倚近全台語書寫。雖然這篇作品其他 ê 台語對話猶 koh 對華語借真濟漢字來表意，話句所展現 ê 台語語感有損蕩(sng-tng)著，但是例句 ê 對話內底使用 ê 台語詞彙有 khah 濟，人物講話 ê 氣口已經明顯比鄉土文學文體普遍 ê 透濫風格 koh khah 強烈。參見楊航，〈最後旨意〉，《台灣文藝》68期，1980.08，頁141-162。

量方言對閱讀 ê 影響¹¹⁷，但也姑不而將順東方白 ê 意，顯見無論是決意用方言寫作，或者是 khah 幼路 ê 用字問題，攏是東方白家己 ê 意志。大稻埕出身 ê 東方白，對伊 ê 家庭生活 kap 學習語言 ê 經驗，發見語言並無貴賤，愛定定(tīnn-tiānn)使用才會當體會著語言 ê 美感，尤其受著《紅樓夢》內底「非標準國語」ê 對話感動，激起東方白思考語言使用 ê 問題：「他們有用方言的權利，我們何不能有？」¹¹⁸

東方白 1989 年完成《浪淘沙》，隔冬 tī Cornell 大學 ê 演講詞，koh 再將伊創作 ê 背景交待 kah 真詳細：

我以前對自己小說裡的對話並不怎麼在乎，可是一開始寫《浪淘沙》，我就對自己苛求起來，用北京語來寫台灣人的對話已不能讓我滿足，因為那不像在寫「小說」，那根本就是在寫「翻譯小說」！……我常常在想，《紅樓夢》的最大成功，在於曹雪芹用他的母語寫他的對話……，而我們台灣人還苦苦以別人的母語來寫我們小說的對話……所以我從《浪淘沙》的第一頁起就讓台灣人說全套純正的台灣話，那時還冒著被人戴帽的危險呢！沒想十年後的今天，台灣話在台灣終於大大流行起來，我真慶幸遇到一個好時機。¹¹⁹

若是將東方白 kap 鍾肇政 ê 討論，參東方白 ê 演講囡(khng)做伙來看，其實咱會當發覺台灣文學對「文學內底 ê 方言」行到「方言文學」ê 線索：首先是作家 ê 「自覺」，自覺著用北京話寫作實際上無法度完全表現「台語」ê 現實，所以寫出來著親像 teh 「翻譯」。無論是東年，甚至連成做本研究反例參照 ê 黃春明在早接受鄭清文訪問 ê 時，也有捌表達類似 ê 看法：「你（鄭清文）和我都必須承認，我們雖然用漢字、用國語寫作，但都有翻譯我們的小說的感覺。」¹²⁰照按呢看起來，毋管是跨／華語作家或者是無嚴格華語創作經驗，直接進入台語書寫 ê 作家攏有這種對「翻譯」——挪用施俊州對 Ngugi Wa Thiong'o 借用 ê 觀點來解說，著是對「文化適切性」(cultural relevance)出發，追求新 ê 再現語言 ê 自覺。¹²¹但問題是：全款是對「翻譯」ê 反省，是按怎黃春明 kap 東方白所再現 ê 文化現實會差這濟？黃春明講：

國語裏，有四川話、浙江話、山東話、新疆話、或台灣話，那國語就越來越豐富。這種事，我們絕對要做。我就是做這。但如我不能做，也不必勉強加入，我就做翻譯。……雖然沒有寫出來，但能抓到台語的味道，國語

¹¹⁷ 鍾肇政、東方白著，張良澤編，《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1993.02），頁 47、59。

¹¹⁸ 全頂註，頁 49。

¹¹⁹ 東方白，〈命定——《浪淘沙》誕生的掌故〉，《浪淘沙》上（台北：前衛，2005），頁 16-17。

¹²⁰ 鄭清文、洪醒夫，〈從生命的悲憫到社會的關切——黃春明訪問記〉，《台灣文藝》60 期，1978.10，頁 21。

¹²¹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56。

裏沒有這句子，沒有這詞彙，這就是我思想發達的寫照。……我的想法是，如何來豐富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方言，經介紹入國語裏，本身也成為國語。

122

這方面，東方白著比黃春明展現出 koh khah 強烈 ê 書寫企圖：

當初決定以台語書寫全套對話(不似黃春明式的雜菜麵對話——因為一百年前的老祖母不可能說這種話)，乃是整整一年心理交戰的結果——會博得部份人的掌聲，也會挨部份人的痛罵！¹²³

東方白直接用「雜菜麵」來批判黃春明式 ê 「文學內底 ê 方言」，就提示「方言文學」ê 文學史轉機來講意義非凡。因為這證明東方白主張「方言使用權」，是針對鄉土文學「國語中心」語言成規 ê 「共時性」否定以外，koh 有伊自「大河小說」ê 「歷時性」當中，對「百年」前著在場 ê 台語，甚至是客語、原住民語族 ê 文化 kap 語言現實有所體會。

事實上，早在 1964 年 1 月，當《台灣文藝》猶未創刊進前，吳濁流著受鍾肇政建議講：「你（鍾肇政）要我用日文寫，而會話則用客語寫，這說起來似乎很容易，但實際上卻有些困難。還是用日文寫，把它全部翻譯之後，由我來修改會話部份較快。」¹²⁴雖罔是困難，但是咱也看著吳濁流試用客語來表現對話 ê 意圖，以及鍾肇政、李喬 tī 大河小說內底致重再現台灣 ê 社會語境，形成語文透濫 ê 「情感結構」。¹²⁵楊照認為，無論是參照法語 ê Roman-fleuve，或者是英語 ê Saga Novel，台灣 ê 「大河小說」在文學史頂面 ê 意義，攏毋但只是長篇 ê、歷史 ê 敘事 niā-niā，tī 「台灣文學」以外，伊更加有欲重建相對、外在中國史 ê 「台灣歷史」ê 目標，這正是跨越戰前戰後，台灣作家護持家己 ê 生命經驗，同時也傳承台灣戰前歷史經驗，欲來對抗中華民族主義本質式收編 ê 實踐。¹²⁶陳芳明也認為，東

¹²² 鄭清文、洪醒夫，〈從生命的悲憫到社會的關切—黃春明訪問記〉，《台灣文藝》60 期，1978.10，頁，頁 22。

¹²³ 東方白，〈敬答歐宗智之論《浪淘沙》〉，《台灣文學評論》2 卷 4 期，2002.10，頁 36。

¹²⁴ 錢鴻鈞編，黃玉燕譯，《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台北：九歌，2000.05），頁 73。

¹²⁵ 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是英國馬克斯主義學者 Raymond Williams 所提出 ê 關鍵字，伊用戲劇(drama)做例，認為藝術(art)作品 ê 任何部份攏有共同／公共 ê 經驗(common experience)，而且每一 ê 個別元素有可能無外部對應，這 ê 元素著是「情感結構」，而且干焦會當 tī 藝術作品整體內底來理解。Jonh Higgins 開破「情感結構」其實著是透過「社會意識」(social consciousness)來形成。參考 Jonh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頁 27。Raymond Williams 原文: To relate a work of art to any part of that observed totality may, in varying degrees, be useful, but it is a common experience, in analysis, to realize that when one has measured the work against the separable parts, there yet remains some element for which there is no external counterpart. This element, I believe, is what I have named the structure of feeling of a period and it is only realizable through experience of the work of art itself, as a whole.

¹²⁶ 楊照，〈歷史大河中的悲情——論台灣的「大河小說」〉，《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

方白寫《浪淘沙》，以及鍾肇政 1991 年加減受著東方白影響，進一步用對照閱讀來表現台灣多元語境 ê 《怒濤》，「不僅觸及歷史再建構的困難與障礙，更觸及台灣社會內部族群語言與殖民語言之間的互相干涉。」¹²⁷余昭玟進一步對大河小說 ê 語言特色做出總結，指出大河小說內抵 ê 多元語境，拍破以國語為主 ê 語言階級，成做「抵中心」(de-centring) ê 敘述策略，再現予官方單語論述長期壓迫 ê 多音化語言歷史，解放受著歧視 ê 台灣語言。¹²⁸可見，雖然《台灣文藝》自《文友通訊》ê 討論以來一直攏是 khah 軟性來主張「文學內底 ê 方言」ê 書寫方案，也無提出台語文字化 ê 討論，m̄-koh 這欸文化 ê 歷史感以及文體 ê 想像，其實早著存在 tī 《台灣文藝》繼承台灣歷史 ê 運命之中，容允作家自覺 kap 民間 ê、在野 ê 力量結合，慢慢將零散 ê 方言詞彙提煉做「印刷語言」(print-language)。

東方白在這種特殊 ê 情感結構內底，進一步將過去 ê 舊作用台語改寫，出版《雅語雅文：東方白台語文選》。雖然照林央敏對台語文學 ê 定義來看，東方白將原本用華語寫 ê 地文攏「翻譯」做台語，可能無符合林央敏對台語文學一開始著愛用台語思考、寫作 ê 要求，當然自另外一 ê 角度來看，東方白 ê 「翻譯」也有可能是「返譯」轉去家己原本 ê 思考語言(台語)。總是就「方言文學」ê 意義來講，東方白對《浪淘沙》到《雅語雅文》之間所展現 ê 語文意識 kap 跨語歷程，其實已經完成華語 kap 台語之間 ê 主客換置(displacement of subject and object)。

但是全款 tī 這種情感結構內底寫出大河小說，李喬 suah 真早著對「方言文學」注一支預防針。1975 年李喬評論《插天山之歌》，針對鍾肇政 ê 文學語言提出伊 ê 見解：

鍾先生曾多次表示希望完成一種比較陽剛、乾燥、堅硬的語言。然則，他顯然陷入三面夾谷的困境裡：1. 不甘心停留在一般所謂的行雲流水，實際是稀淡膚濫的語言裡。2. 是理解到，「方言文學」的終極，將形成根本改變的事實。3. 是自己什錦菜式的語言，也不可恃，至此，他唯一的出路是：如何在既有普通話基調上，豐富方言的內涵，採擷其菁華，同時還要獨運匠心，鎔鑄新詞，建立屬於自己的獨特風格。

本書出現的語言，就是這種已經完成的語言。¹²⁹

李喬所講 ê 「方言文學」著是「想完全以方言寫作，或抱持以方言為基調從事寫

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10)，頁 94-96。

¹²⁷ 陳芳明，〈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台灣作家的歷史記憶之再現(1987-1997)〉，《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11.02)，頁 114。

¹²⁸ 余昭玟，〈東方白大河小說《浪淘沙》研究〉(高雄：春暉，2013.02)，頁 192。

¹²⁹ 壹闡提，〈小論《插天山之歌》〉，《中華日報》，1975.12.20-22，11 版。收錄 tī 彭瑞金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4：鍾肇政》(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 258。

作」，伊也舉古文經典來印證方言其實攏「縱有繼承，橫有讀者」。但是顧慮著無全方言之間 ê 溝通問題，伊認為方言文學「根本的改變」，著是鍾肇政這種用華語為主，交濫方言所完成 ê 「這種語言」，又 koh 講「就小說家而言，自由使用語言的權利不可奪，豐富自己的母語，並多多提倡是一種責任」。

一眼看去，李喬若像是反對方言文學發展，真容易 hōng 戴一頂「華語霸權」ê 帽子，但是若倚在倚近本土 ê 歷史角度 kap 情感結構，koh 換一種提問 ê 方法來看，李喬 ê 「普通話」（共同語）kap 東方白 ê 「母語」，這兩項命題敢真正互相衝突？Ismail S. Talib 著認為，後殖民文學是指（曾經）被殖民者所寫 ê 文學，這應該包括以各種語言書寫 ê 文學，毋是干焦以殖民者 ê 語言所寫 ê 作品才算。¹³⁰作家用殖民者 ê 語言寫作，可能只是因為實際 ê 機會拄好出現，而且母語寫作充滿政治風險，但是伊強調作家無應該占便宜(pân-gi)，完全無考慮使用母語書寫 ê 可能性，因為這毋是母語本身「語言」功能不足 ê 問題，是作家無法度掌握家己 ê 母語所致。¹³¹所以，若是將李喬 kap 東方白 ê 提案「互文」來看，兩人 ê 主張所提出 ê 其實攏是後殖民 ê 語言形式，《台灣文藝》也對遮發展出一種雙語、甚至多語 ê 可能性：當《台灣文藝》自 105 期開始由「台灣筆會」接辦 ê 時，筆會針對國民黨錯誤 ê 教育政策，主張必須愛實行除了北京語之外 ê 「雙語教育」¹³²；對 107 期開始，《台灣文藝》開設台語文學專欄，刊登台語、客語文學作品 kap 論述；115 期 ê 卷頭語，趙天儀〈台語文學的出發〉等於是宣告對華文體制 ê 反省 kap 語言政策 ê 批判，並且肯定 Ho-lo 話為主 ê 努力¹³³，也因為按呢，「台灣話」、「台語」ê 名稱在各族語之間才需要形成一種「狹義」ê 共識。咱會當講：tī 本土意識 ê 歷史經驗 kap 情感結構內底，「台語文學」干證「台灣文學」自主性 kap 主體性 ê 「好時機」，在「方言文學」走脫出「文學內底 ê 方言」ê 時陣，其實早著存在。

第三節 鄉土 ê 侷限 kap 本土 ê 自限：若是「方言文學」成立？

M-koh，咱將論題徙(suá)轉來《笠》，看林宗源、林亨泰兩人 kap 陳千武之間 ê 「準」論戰，koh 再詳細想看覓(khuànn-mái)：林央敏 tī 1982 年批評鄉土文學 ê 前啟蒙言論，認為必須愛以華語為中心追求「方言國語化」；林宗源 tī 1984 年猶 koh 承認「國語正統性」，希望運用方言來豐富國語，「使國語與台語融洽，成為一種文學創作的語言。」照按呢看來，林央敏、林宗源 tī 「前」運動時期 ê 論點，kap 李喬所主張 ê 「後殖民華語」其實非常類似，但是為啥物短短四年了後，1988 年「台語文學之父」林宗源 suah 來挑戰「國語正統性」，提出「台語文學才是台

¹³⁰ Ismail S. Talib，李勤岸譯，《後殖民文學的語言》，頁 57。

¹³¹ 全頂註，頁 156-157。

¹³² 楊青矗，〈台灣筆會要做些什麼？〉，《台灣文藝》105 期，1987.07，頁 27。

¹³³ 趙天儀，〈台語文學的出發〉，《台灣文藝》115 期，1989.01-02，頁 4-5。

灣文學」激進主張？「方言文學」ê 後殖民線路又 koh 按怎成做「台語文運動」？

咱會當大膽假設：假使先莫論書面化 ê 技術問題，台灣以華語為主 ê 文學體制若是會當接受、鼓勵「方言文學」ê 創作，林央敏、林宗源敢會「轉向」？李喬敢會 koh 顧慮溝通問題？「方言文學」若成立，今仔日敢會 koh 有「台語文學」正名？Hobsbawm 面對弱勢民族 ê 語言 kap 文化 tī 民族國家之內欲按怎傳承 ê 問題，是抱 khah 悲觀 ê 看法。但是伊認為：

倘若該國的主要民族和國語的優越性不致引起爭議，倘若主要民族能珍惜並促進其國境內的方言和少數族群的語言，那麼各族群的語言文化反倒可得到保存，各少數民族的歷史傳統與風土民情也可獲得延續，從而使該國的民族精神呈現多采多姿、多元傳統的新氣象。¹³⁴

戰後 ê 台灣文壇，窮實有太濟機會用 Hobsbawm 這款「理想國」ê 想像來回應咱對「方言文學」ê 假設，m̄-koh 咱若轉去看台灣文學「正名」——同時也是 tī 中國邊陲之下，台灣意識 kap 中國意識雙方論者爭奪「台灣」詮釋權 ê 鬥爭過程，應該著會當發見：「台語」成做「民族意識」ê 文化加工品¹³⁵，自「母語」變成「民族語言」，這究竟毋是單純欲回應中國意識 ê 攻擊 kap 收編 niā-niā，因為真正 ê 問題是：方言文學 tī 台灣意識 ê 本土論式內底所受著 ê 對待，其實 kap 中國意識 ê 觀點差不多。

咱承認在多元族群 ê 台灣社會當中，一套會當互相溝通 ê 「共同語」確實真重要，但是看「方言文學」ê 相關討論，主張方言寫作 ê 作家一開始根本也無否認成做「共同語」ê 「華語」，也無欲強迫其他語族一定愛參與台語 ê 方言書寫。但是因何「台灣意識」面對甚至猶未成氣候 ê 「方言文學」，會 kap 「中國意識」有類似 ê 焦慮來自我設限？台灣 ê 本土語言是按怎無法度成做「台灣的國語」，顛倒比日治時期受著 koh khah 大 ê 壓迫？本章咱對日本時代台灣 ê 社會語境開始講起。受著日本「政治國語」kap 中國「文化國語」ê 雙言(diglossia)影響，台灣話陷落 tī 政治國語／日語 kap 文化國語／北京話 ê 雙重邊陲，台灣文化人除了台灣話文運動 ê 支持者以外，可能攏無將「台灣話」囿在 khah 懸 ê 文化位階頂面。這種暗藏民族想像、無割分文化認同 kap 政治認同 ê 誤識(misrecognize)，毋但予台灣話文（甚至白話字）ê 發展受著濟濟限制，tī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實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ê 文化重建過程中，長期欠缺國家力量來建設 ê 台灣話自然無法度介入新、舊國語之間 ê 鬥爭，甚至因為按呢，台灣人理所當然來接受從來毋捌在台灣社會「發聲」ê 北京話來做國語，koh 引起一陣「疇國語」ê 風潮。

¹³⁴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43-44。

¹³⁵ 全頂註，頁 150。

不過，國民政府將受日本教育、猶無法度改正日本化、改用北京話 ê 台灣人攏看做是「愚民」、「奴化」，必須愛透過「國語教育」來加強民族意識。在這種情形下，「國語」不只是檢驗「國民精神」ê 標準，更加是「政治參與」ê 條件，除了無將台灣人重新學習國語 ê 困境看在眼內以外，根本上著是對台灣人無公平 ê 文化壓迫 kap 政治歧視。所以，雖然國民政府接收台灣無外久，著趕緊欲將台灣話背後 ê 漢文化認同收編到「中華民國」民族想像內底，m̄-koh 因為官方／民眾、本省／外省之間 ê 衝突愈來愈嚴重，hông 看做是「奴化」ê 台灣人感受著國語問題背後 ê 政治歧視，加上貪污腐敗、文化差異等等 ê 因素，民間 ê 怨怒 suah 因為掠賣私煙，爆發二二八事件，日語 kap 台語也 tī 這時陣成做台灣人反抗 ê 文化符碼。所以國民政府派軍隊來台灣鎮壓各地二二八 ê 反抗以後，台灣人 ê 語言 kap 文化隨時面對更加苦苛 ê 壓迫，免講日語當然是禁用，就連一開始為著欲配合國語教育來恢復 ê 台灣話，也受著 kap 日本話全款 ê 命運。對遮，咱看著國民黨 ê 國語運動對「收編」方言到「消滅」方言之間 ê 轉變，確實 kap 民族想像 ê 目的，以及統治、殖民力頭 ê 加強有關。

台灣文學 ê 發展受著戰前、後殖民者獨尊單語 ê 「語言政治」影響，本土語言攏受著壓制，無法度成做完整 ê 文學語言。日本時代 ê 台灣作家，因為技術 ê 限制 kap 民族認同 ê 爭論，台灣作家慢慢妥協出「台灣式白話文」ê 透濫書寫，雖然猶是有少部份全台灣話文 ê 試驗者，但是在皇民化政策加強國語、禁用漢文 ê 情勢之下，台灣話文到底是暫時消聲。這 ê 時陣，也因為日語成做台灣 ê 共同語 kap 文學語言，「鄉土」文學原本 ê 語文意義 tsuânn 漸漸失去，成做文學意義上指向「台灣」、「地方」、「特殊性」ê 文化符碼。致使戰後 ê 台灣作家雖然猶 koh 有方言書寫 ê 企圖，但是若欲 tī 中國統治階級所掌握 ê 文學場域內底出聲，考量著技術 kap 政治 ê 限制，台灣作家顛倒無欲繼續建設台灣本土語言，選擇在外來 ê 殖民語言內底干擾、抵抗，甚至顛覆國語霸權 ê 作用，另外爭取本土語言、文化存活 ê 時間 kap 空間。只不過，這種對抗再殖民 ê 策略，真緊著因為國民黨 ê 中國民族想像 kap 國族、語文教育，配合戒嚴 ê 政治情勢 kap 社會氛圍，造成台灣文壇無公平 ê 語文資本分配 kap 再生產 suah 來失去效果。1970 年代，台灣作家開始使用「國語化」ê 台語描寫台灣社會下層民眾生命，成做一種特殊 ê 「鄉土文學」文體，表面上袂輸是長久以來 hông 禁制 ê 方言總算解禁，但是成做官方 v.s 民間、中國 v.s 台灣「政治語言」之間 ê 「三棚鬥」，「鄉土文學」ê 「鄉土」基本上猶 koh 是中國民族主義 ê 表意。另外，因為在國民黨 ê 語言政策之下，台灣 ê 本土語言攏 hông 貶低、收編做政治上 ê 「方言」，用來接載(tsih-tsài)中國民族主義，但是「方言」附屬 tī 華語為主 ê 鄉土文學文體內底，猶未超出「國語」ê 位階規範，著來引起一寡人對方言文學 ê 焦慮，甚至連作家也自清家己所寫 ê 毋是方言文學，這種「政治張力」顛倒加強寫實主義技巧對社會經濟體制 ê 批判。所以，鄉土文學文體引起官方關注 kap 讀者共鳴，窮實是使用方言加強寫實效果 ê 「副作用」，但無論是有自覺抑無，鄉土文學作家書寫台語，其實攏是在國民黨

語言政治壓迫本土語言 ê 華語霸權 kap 透濫方言 ê 文類成規當中，追求在地語言 ê 透濫 nīa-nīa。再現、保留本土語言 kap 文化，並毋是鄉土文學上重要 ê 目的，「方言」也未嘗 tī 中國意識政治厝頂之下 ê 鄉土文學內底得著解放。

另外一種對台灣文學走揣政治厝頂 ê 「回歸現實」潮流，是《笠》 kap 《台灣文藝》這兩份本土刊物。在威權政治 ê 禁忌之下，雙方雖然攏避免直接沐(bak)著政治，也無欲 kap 官方以中國文學做中心 ê 文藝政策有所區別、對抗 ê 立場，但是遮 ê 本土作家攏 tī 中國文學 ê 大敘事之下，繼承日治時期 ê 文學傳統 kap 歷史、文化經驗，將反官方 ê 立場 kap 認同本土 ê 意識，轉化做「純」文學 ê 實踐 kap 討論，所以才會在「鄉土文學論戰」進前，著先行 tī 追求「鄉土性」ê 「現實主義」路上。甚至因為本土詩人過往受著壓迫 ê 語言書寫記持(ki-tī)，所以「笠」想欲建構本土語言書寫 ê 系統，透過台灣語言書寫內底所隱含 ê 文化性，批判國民黨所代表 ê 中國文化。這自然是對國民黨政府當初推行 ê 國語（北京話）政策 ê 反動 kap 修正。¹³⁶

《台灣文藝》方面，雖然受著客觀情勢來限制，方言 ê 書面化一直無法度得著發展，對戰後初期《文友通訊》ê 討論來看，本省作家對方言書寫 ê 想法也真縮限，m̄-koh in 猶是在華文 ê 體制內底，繼承日本時代套用方言語法 kap 詞彙 ê 台灣式白話文，建設「文學內底 ê 方言」。因為歷史 ê 傳承，《台灣文藝》除了是大河小說家 ê 產房以外，東方白《浪淘沙》也真緊著對鄉土文學「國語中心」語言成規 ê 「共時性」否定，以及對「百年」前著在場 ê 台灣各語族文化 kap 語言現實 ê 「歷時性」體會內底，走脫出多語對話全寫實 ê 「後」鄉土文體，甚至 koh 轉入台語文學 ê 寫／譯作。雖然施俊州認為，《笠》 kap 《台灣文藝》無質疑華語 kap 本土語言之間 ê 階層制度(hierarchy)，無論是自覺抑無自覺，攏是 tī 外來華語 ê 遊戲規則之下，維護台語 kap 華語 ê 功能使用 kap 場域畫撥，suah 掠準是競爭、抵抗，尤其忽略日本時代漢字台語運動 kap 白話字文學 ê 歷史。¹³⁷但是咱無法度，應該也無需要否認(hónn-jīn)：自開始倚 tiàm 本土 ê 《笠》 kap 《台灣文藝》，確實是為戰後島內 ê 台語文運動提供相對友善 ê 討論場域，若無，林宗源、向陽個人自發 ê 方言詩寫作成做一種文學史變遷 ê 「症頭」(symptoms)，應該也無可能在華語中心 ê 文學史拜物論內底頂面夯(giâ)起來，koh 變做台語文學 ê 「抗體」。因為鄉土文學雖然有這種文學史變遷 ê 報頭（後來轉入研究台語 ê 鄉土文學作家楊青矗應該會當做旁證），但是在「方言」ê 成規內底，無 koh 再引起「華語文學」 kap 「台語文學」ê 區異。

只不過，若準講「台灣文學」ê 文學史書寫 kap 正名是欲追求台灣人自為「民族」ê 主體性，方言 ê 使用成做一種「本土」ê 表意，suah 無法度對殖民者 ê 語言

¹³⁶ 解昆樺，《台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頁 67。

¹³⁷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85-86。

政治內底得著真正 ê 解放。無論陳千武無自覺譬相「方言」ê 語言暴力，或者是李喬在「後殖民華語」以外對「方言文學」ê 設限，in 顛倒 kap 「中國意識」ê 文學主張有類似 ê 焦慮，甚至造成本土論自身 ê 矛盾。這相當程度是在戰後國民黨中國意識 ê 國語政策脈絡之下，無意中維護華語霸權來壓制本土語言 kap 文化主體性 ê 表現。所以，對台灣文學史 ê 發展脈絡來看，戰後島內「方言文學」必然會出現，但是「台語文學」對「方言詩」、「方言文學」正名過來，koh 發展做「台語文運動」，這並無完全是一種自然 ê 「進化」。伊除了是在反抗中國意識 ê 收編 kap 壓迫 ê 情境當中出世以外，更加是對台灣立場 ê 民族想像提出質疑、對本土論內部矛盾 ê 積極回應。

第四章 差異，對立 kap 對話：台語文學史論 ê 建構 kap 民族想像

前言：台灣文學史 ê 民族語言(gú-giân)/ 寓言(gū-giân)/ 預言(ū-giân)

「語言」雖然毋是基本群體認同(basic group identity)「上」重要 ê 條件，但是整體來講，台灣確實因為政治，使得「語言」要素相對顯著。表面上，「台灣話文」、「台語文學」這種「語言」性格特別明顯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雖然引起 ê 真濟爭論，不過筆者認為，戰後 ê 台語文運動經過一段烏暗期，在 kap 戰前斷裂 ê 文學史空縫(khang-phāng)¹內底 koh 再暴穎(pok-inn)出來 ê 原因，才是咱應該致意 ê 問題。假使講，戰後台語文運動確實印證台語(族)其實一直有家己 ê 文化場域 kap 運作邏輯，而且「台灣話」ê 爭論也一直是台灣文學史上一再出現 ê 母題(motif)，甚至是跨越戰前、戰後，暗喻「民族」想像 ê 寓言/預言，若按呢，台灣作家 kap 研究者閃避、忽略，甚至貶低(pián-kē)台灣話/台語主體性 ê 文學史觀，到底是按怎形成？欠缺語言，台灣文學又 koh 建構出啥物款 ê 民族身份？

基本上，文學史無疑是一種「知識論」(epistemology)，因為文學史 ê 概念一開始 tī 中國出現，原本著 kap 日本、歐美洲所實行 ê 近代教育學制真有牽連。清朝尾期 tī 「西學」漸漸透入 ê 潮流之下，以自然科學「歸納」(generalization) kap 「分析」(specification) ê 手路來理解人文學科 ê 科學主義，慢慢成做一種風氣²，也將中國傳統「文學流別」ê 概念，以及強調誦讀、欣賞、模仿 kap 創作 ê 技能性教學，轉向日本、西方 ê 「知識傳授」模式來發展。³所以講，「文學史」基本上著是 tī 現代「文學教育」ê 需求之下所生產出來 ê 知識體系，也是文學教育「再生產」、「再教育」ê 循環。照 Richard Fumerton ê 講法，「知識論」同時也是一種「命題知識」(propositional knowledge) —— 予命題對象「真」或者是「假」ê 性質，簡單講著是 teh 討論人講伊「知影」、「了解」對某一 ê 人、事、物「著是按呢」(so and so) ê 知識體系。⁴

另外，包括知識論 ê 生產在內，文學史另外一 ê 重要影響是形成「典律」。咱所講 ê 「典律」、「正典」或者是「經典」(canon)，原本是教會對古代希臘(Hi-liáp)文(Ancient Greek) 用做量尺 ê 「棍仔」(kanon)引申來區別「正統」kap 「異端」，成做確立經典 ê 一種「排他性」原則。John Guillory 有 khah 幼路 ê 看法，伊認為文學典律 ê 評判是透過「寫作」kap 「閱讀」ê 社會實踐來形成，這種「揀選好文

¹ 譬如林宗源講：「戰後的台語文學，我是按寫詩才來出發的，並無看著日據時代前輩的文章及作品。」〈按我的經驗講寡戰後台語詩的狀況〉，1992.06，收錄 tī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頁 79。

² 朱首獻，〈科學主義與草創期中國文學史觀建構〉，《文學評論》3 期，2010，頁 163-168。

³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25。

⁴ Richard Fumerton 著，傅浩政譯，《知識論》(台北：五南，2009)，頁 13-15。

本」(preference) ê 社會語境，同時也是社會制度 kap 機構（譬如學校，甚至各種知識傳播單位）系統性、規律性 ê 製品。⁵可見，文學史論透過批評家、作者 kap 讀者在社會制約之下 ê 歷史性回顧，揀選文本進行典律化(canonization)，生產制度化知識(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⁶ ê 過程，毋但有伊 ê 政治性，甚至有可能直接受著政治霸權為著政治目的來介入，影響著體制 ê 形成 kap 知識 ê 再生產。

質疑，並毋是欲完全否定文學史、典律 ê 功能，或者是入選作家 ê 藝術成就 kap 作品 ê 社會意義。只不過，就台灣文學史 ê 語文爭論來講，先按下白話字文學在日本時代「新」文學 ê 「漢文」、「祖國」語境內底 ê 侷限，若準日本時代已經有台灣話文 ê 「民族語言」運動，台灣文壇是按怎理解這段猶未完成 ê 志業？戰後鄉土文學透濫方言 ê 書寫方案又 koh 按怎 hōng 當做是「台語書寫」ê 典律，欲用來完全取代台語、母語文學？因何文學史 ê 書寫一直 teh 繼承、實踐以華語、漢字做中心 ê 線性史觀來看台灣文學 ê 發展，干焦對日治時期 ê 殖民現代性來理解「新」文學 ê 概念，suah 忽略台灣文學 tī 漢字以外，猶有白話字 ê 傳統？台灣文學史論「發明」出「左翼」ê 精神 kap 傳統，來將日本時代 ê 「鄉土」kap 戰後 ê 「鄉土」接枝，但是將新文化運動內底 ê 台灣話消音，貶低台灣話文論述 ê 文化主體性，這是毋是也證成 Foucault 對傳統歷史主義 ê 批判：在「左翼」ê 傳統背後，咱其實忽略戰前、後因為殖民者 ê 語文政策干擾，遮開台灣文學濟濟爭議背後 ê 歷史因由，結果造成「借用」ê 外來語顛倒來壓迫本土語言 ê 事實？

這款文學史觀，完全無法度回應 tī 戰前、後文學史斷裂 ê 條件之下，為何台灣話／台語會 koh 再引起類似爭論 ê 提問，台灣文學史甚至到今(tann)攏猶未面對台語文學論戰。所以，循用 Montrose 「歷史文本性」(the textuality of histories) ê 觀點 kap Peter Barry ê 提點⁷，咱 tī 本章著欲透過新歷史主義 ê 史學觀點來梳捋 (se-luáh)⁸成做後來者認知台灣文學 ê 歷史文本，同時也是起造文學經典 ê 知識基礎，台灣文學史論 ê 建構 kap 民族主義有啥物款 ê 關係？文學史 ê 敘事 koh 怎樣透顯出忽略、拒絕、甚至批判、拭抹母語文學 ê 意識形態？若是日本時代「民族語言」ê 寓言／預言原在，現此時台語文學又 koh 按怎走揣過去 ê 歷史經驗，來

⁵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頁 319-340。

⁶ 周英雄，〈必讀經典、主體性、比較文學〉，收錄 tī 陳東榮、陳長房編，《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台北：書林，1995.04），頁 1。

⁷ Montrose 提出「歷史文本性」，認為咱無可能接觸著全面而且真實 ê 過去，所有生活當中體驗著 ê 物質存在，也必須愛透過文本遺蹟才有法度留落來，所以「歷史」是經過物質性 ê、意識形態鬥爭 ê 文本遺蹟，未來會 hōng 建構做文獻(documents)，成做人文科學描述、詮釋作品，進一步成立學說 ê 基礎。Peter Barry 認為，使用這款文本，必須愛先了解「彼時代」ê 意識形態 kap 論述實踐(discourse practices)，才經過咱「這時代」ê 意識形態 ê 意識形態 kap 論述實踐，最後通過一張扭曲 ê 「語言」這張網。轉引自孟樊，〈新歷史主義的台灣文學史觀〉，《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頁 26。

⁸ 「梳捋」是筆者創用 ê 台語詞彙，欲表達類似華語「梳理」ê 學術語意。

回應台灣文學語言爭論背後 ê 認同隱喻 kap 政治壓迫，在「後殖民」ê 他者語境內底想像「台灣民族」、重新定義「台灣文學」，走揣理想 ê 「政治厝頂」？

第一節 遺誤「鄉土」：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再／誤現 kap 接合

1943 年，台灣文壇公認 ê 重要作家賴和牢獄二度、因病保出了後，在過身 ê 前幾日 kap 楊雲萍會面。伊倒 tī 病床頂，坐起身，按搭心頭高聲嘆講：「我們所做過的新文學運動，都等於白做了！」楊雲萍趕緊 kā 安慰「三十年後，或五十年後，一定有人會想到我們的事情的。」⁹濟濟年過去，台灣文學 ê 發展確實將賴和 kap 全時代作家 ê 努力傳承落來。不過重點是，對賴和這 ê 「人」本身，到文學史頂面 ê 「新文學之父」，甚至是規「日本時代」ê 台灣「新」文學經驗，楊雲萍家己，甚至到現此時 ê 台灣作家 kap 研究者，到底按怎理解伊對賴和所講 ê 「我們的事情」？

事實上，賴和用中國白話文寫小說 ê 藝術成就，以及伊時任《台灣民報》編輯，在引介中國白話文進入台灣這兩方面，確實攏扮演非常重要 ê 角色。但是咱攏知影，賴和小說 ê 文學語言其實經過幾層轉譯，王詩琅講賴和「總是先用文言文寫好，然後按照文言稿改成白話文，再改成接近台灣話的文章。」¹⁰而且跟綴台灣話文論戰 ê 進展，賴和 ê 文學語言所透濫 ê 台灣話語詞、語法 kap 「日式台語」ê 程度越來越懸。所以呂美親認為，賴和雖然一直無放棄中國白話文，甚至也經過兩種語文認同同時存在 ê 過渡期，但是包括過去未曾發表 ê 手稿在內，賴和「本土意識」ê 書寫取向其實越來越明顯，甚至完全轉向，留下〈一個同志的批信〉、〈富戶人的歷史〉這兩篇台語小說。¹¹

不過，咱會當發見在文學史頂面，「台語小說家」賴和 ê 文學生命 kap 作品，差不多攏予「台灣新／現代文學之父」ê 論述拭消去。雖然這可能 kap 賴和無發表 ê 手稿 khah 慢出土有關係，但是台灣文學史到今對賴和透濫台灣話 ê 白話文作品 kap 寫作經驗 ê 再現(re-presentation)，往往強調中國白話文 ê 表現 kap 貢獻，簡化伊致重台灣話文 ê 「鄉土」實踐，suah 無討論「新」文學之父最後是用「台語小說家」ê 身份來結束新文學創作 ê 文學史意義。所以，咱其實有需要重新思考：「新」文學論述所誤現(misrepresentation) ê 日本經驗，將日本時代包括台灣「新」文學之父在內 ê 這一陣「台語文學家」對台灣文學史內底排除出去。在戰後 30、50 年間，掌握 koh khah 濟史料 kap 作品以後，到底是 khah 倚近，或者顛倒是偏離史實？文學史 ê 「新」文學論述，又 koh 是在啥物款 ê 時代背景之下，將戰前、

⁹ 陳建忠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1：賴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3），頁 61。

¹⁰ 王錦江，〈賴懶雲論〉，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405。

¹¹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頁 130-134。

戰後 ê 「鄉土」接起來，拭除第二章所講 ê 「戰前台語文運動」？本節，咱著先針對戰後台灣文壇幾 ê 重要時期對日本時代文學經驗 ê 回顧，來討論文學史論「新」文學運動 ê 再／誤現，按怎遺誤語言意義 ê 「鄉土」，予「台語文學家」集體失蹤。

一、1970 年代以前對「新」文學 ê 回顧

根據許俊雅 ê 整理¹²，日本時代文學經驗 ê 回顧大部分攏對戰後開始，但是對當時台灣文壇普遍肯定賴和是「培育了台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ê 時陣，顯然彼當陣已經有一套對「新」文學 ê 認識論所搭起來 ê 戲棚。比如講，上早有「文學史意識」ê 劉捷¹³在對 1933 年台灣文壇 ê 回顧內底，雖罔暫時按下台灣話文論爭，將日語文學納入鄉土文學 ê 討論¹⁴，不過在〈台灣文學鳥瞰〉、〈續台灣文學鳥瞰〉所整理 ê 議論 kap 文學作品篇目當中，伊對賴和、楊雲萍所開創 ê 「新文學」白話文 ê 認知，猶是有包納台灣話文 ê 問題¹⁵，以及關係著建設台灣話 kap 收集民間歌謠 ê 論述在內。¹⁶Koh 看將賴和扛做「新」文學之父 ê 王詩琅，伊所理解 ê 台灣「新」文學是「日本文學和中國文學的交流」，台灣作家免不得受雙方面文學 ê 影響，但是伊認為「新」文學之父賴和是「由中國文學培養長大的作家」，面對台灣話文 ê 問題，賴和也真早著避開作品內底使用台灣話 ê 困境，「在實踐上卻尚無人出於賴懶雲之右者。」¹⁷所以整體來看，王詩琅 ê 評論是 khah 倚近中國文學 ê 立場來肯定賴和 ê 白話文成就，總是也無擦消(tshat-siau)賴和對台灣話文 ê 思考 kap 實踐。但是過後，討論賴和 kap 「新」文學關係 ê 機會著比較 khah 少，親像《台灣文學》在賴和過身所做 ê 「賴和先生悼念特輯」，大多是感念之言；另外，為著欲對抗島田謹二、西川滿在戰時體制之下，將台灣當做「外地文學」、有「異國情調」ê 殖民地文學觀，黃得時 tī 《台灣文學》頂面所發表 ê 系列文學史論之一——〈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¹⁸，著比較 khah 強調「台灣文藝聯盟」成立、《台灣文藝》發刊，進入戰爭期以後 ê 動態。對賴和 kap 「新」文學無外濟介紹，其實著是簡單敘述王詩琅以來對「新」文學之父 ê 共識 niā-niā。

¹² 許俊雅，〈日劇時期台灣文學〉研究概況，《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1994.12），頁 1-36。

¹³ 蔡美俐，《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頁 39。

¹⁴ 劉捷作，吳玫芳譯，〈一九三三年的台灣文學界〉，收錄 tī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92。

¹⁵ 劉捷作，涂翠花譯，〈台灣文學鳥瞰〉，收錄 tī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 113。

¹⁶ 劉捷最後除了強調黃呈聰〈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黃朝琴〈漢文改革論〉以外，koh 特別提起張洪南〈被誤解的羅馬字〉對「白話文」的提倡，可見伊對鄉土文學 ê 認識，同時兼顧日語、中國白話文 kap 台灣話文 ê 建設，參見劉捷作，涂翠花譯，〈續台灣文學鳥瞰〉，收錄 tī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10），頁 214-216。

¹⁷ 王錦江，〈賴懶雲論〉，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402-404。

¹⁸ 黃得時作，葉石濤譯〈輓近台灣文學運動史〉，收錄 tī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2)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1996），頁 93-110。

來到戰後，王詩琅過去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 kap 日本文學交流產生 ê 觀點，suah 開始產生變化。雖然在伊戰後幾篇回顧台灣新文學 ê 文章內底，全款有提起台灣話文 kap 鄉土文學 ê 論爭，不過咱開始看見文學史論內底 ê 「祖國」形影越來越大，漸漸來拭消日本文學 ê 影響。¹⁹另外，楊雲萍在「台灣文化協進會」ê 機關誌《台灣文化》發表〈台灣新文學的回顧〉，這篇文章雖然是寫 tī 賴和過身進前，原本是李獻璋所編，但後來予日本政府查禁 ê 《台灣小說選》序文，不過相當程度也會當來看伊是按怎理解當初安慰賴和所講 ê 「我們的事情」。楊雲萍一開始著講「台灣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的運動與成就所影響，所促進」²⁰，全篇特別強調黃呈聰、黃朝琴、張我軍紹介中國白話文，引起新舊文學論戰，比王詩琅 ê 「新」文學觀更加注重中國文學 ê 系譜。雖然楊雲萍強調賴和是「台灣創作界的領袖」，但是針對賴和 kap 「新」文學運動「保持了多少的台灣的特色」suah 無提出啥物具體 ê 論述。楊雲萍這篇戰前 ê 稿可能因為戰後 ê 情勢來做修改，也無的確是伊真正 ê 看法，總是伊對這篇文章對「新」文學，甚至是對賴和 ê 詮釋，確實有 eh-kheh、淺薄 ê 情形。²¹

一直到 1954 年，台灣文壇突然間興起一陣回顧日本時代 ê 潮流，著是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台北文物》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ê 座談紀錄 kap 論述。在座談當中，關係著台灣新文學運動 ê 形成，大部分與談者攏無否認中國五四運動 ê 影響，不過也有更加強調五四傳統 ê 論點，像楊雲萍講：

我想，台灣新文學的發聲是受五·四的影響，大概是沒有疑問的，如最致力這一方面的發動人張我軍是在北平受過教育回來的，如蔣渭水沒有去過日本始終是在台灣的，懶雲也曾說過，日文小說沒有味道，中文才有興趣。我則初是受舊文學的影響，後來是受五·四的刺激的。²²

相對楊雲萍自 1940 年以來著對賴和 kap 「新」文學偏重「中國白話文」ê 理解，有捌參與台灣話文論戰 ê 廖漢臣（毓文）雖然是反對方，但是伊顛倒提出 khah 全面 ê 看法，指(ki)出賴和在「新」文學運動內底 kap 張我軍 ê 無全線路：

¹⁹ 參見王詩琅〈台灣新文學運動史料〉、〈台灣的新文學問題〉、〈台灣文學的重建問題〉、〈半世紀來台灣文學運動〉等文，收錄 tī 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九《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台灣文教》（高雄：德馨室，1979.11）。

²⁰ 楊雲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回顧〉，《台灣文化》1 卷 1 期，1946.09.15，頁 20。收錄 tī 楊雲萍著，許雪姬、林瑞明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 178-187。

²¹ 必須愛強調，楊雲萍毋是無 teh 關注台灣 ê 語言問題。除了〈奪還我們的語言〉ê 宣言以外，伊有一篇文章用「等路」(tán-lōo)來形容台灣「回歸」中國 ê 文藝 kap 學術關係，也收袂少 kap 台灣話、歌謠相關 ê 文獻。但是對伊來講，台灣「新」文學想欲兼顧台灣文化主體性 kap 台灣話書面化 ê 論戰滾絞(kún-ká)，可能無絕對必要。參見〈台灣語文小記〉，《民俗台灣》4 卷 5 號，1944.05，收錄 tī 楊雲萍著，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 6 歷史之部（四）》（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02），頁 515-522；〈我們的「等路」——台灣的文藝與學術〉，《民報》54、55 號，1945.12.02-03，收錄 tī 楊雲萍著，許雪姬、林瑞明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頁 229-231。

²² 〈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08.20，頁 5。

新舊文學論爭之後，張我軍就着手寫新詩，寫小說，〈買彩票〉就是第一篇的小說，後來再有賴和〈一桿秤仔〉。……這兩個人的作品，代表了兩個傾向，大概張我軍的文章是純粹北平白話文，賴和的文章夾有台灣土語。再後來守愚、一村等才在《台灣民報》陸續發表作品。²³

所以咱會當發見：楊雲萍 kap 廖漢臣在 1950 年代再現 ê「賴和」其實已經產生差別，這干證台灣文壇 ê「新」文學概念 koh teh 浮動，對賴和 ê 文學語言「漢文」——精確來講是透濫、甚至趨向台灣話 ê「白話文」認識，也有慢慢予「中文」ê 指稱消磨去 ê 現象。而且在這場座談會內底，就連發表過台灣話論述 ê 連溫卿也開始產生對「中文」ê 誤認²⁴，koh 看全場 ê 林快青、林克夫甚至開始提出「民族感情」、「民族意識」這寡 ê 關鍵字，來建立「愛讀中文」ê 論述。綜合遮 ê 線索，咱其實會當知影這時對台灣文學經驗 ê 梳捋，尤其是對文學語言 ê「中文」理解，已經開始出現「民族主義」ê 修辭 kap 作用。

《台北文物》全一期 koh 有幾篇文章值得咱詳細觀察。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將台灣「新」文學園在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跟綴弱勢民族追求解放、爭取自由 ê 民族運動潮流之下開展 ê 新文化運動內底，受著中國新文學運動 kap 歐美文藝思潮來進發，會當講黃得時認為台灣「新」文學無完全是中國五四傳統 ê 產物。而且，黃得時雖然認同中國文學革命以來 ê 白話文建設，但是針對張我軍欲用中國國語改造台灣土語 ê 論點，黃得時認為「要改造台灣語統一於國語一項，實在談何容易？」²⁵來提出懷疑。雖然黃得時因為台灣話文 ê 討論到今猶未得到結論，所以無傷過明顯 ê 表態，但是伊寫這篇文學史論 suah 有幾點值得注意：首先，伊特別強調收一篇毋是文學作品，但是 kap 台灣文學離袂開，「以現代眼光分析台灣話最初的論文」，著是連溫卿 ê〈將來之台灣語〉²⁶；第二，黃得時對新詩 ê 創作兼論台灣文壇整理歌謠、民間故事 kap 傳說 ê 運動，認為這對保存民族文化貢獻真大；第三，伊對台灣話文論爭 ê 看法並毋提著任何反對方 ê 論點，列出「屈文就話」、「屈話就文」kap「創造新字」三點²⁷，攏是對台灣話文運動本身 ê 正當性出發來介紹這擺爭論。最後，黃得時對 1927 年到 1932 年之間 ê「新」文學運動做出結論，其中一點講：「『歌謠』的徵集和『台灣話文的討論』，

²³ 〈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08.20，頁 7。

²⁴ 譬論連溫卿講：「一般民眾本是沒有甚麼所謂思想色彩，那時候讀中文的人很多，他們只需要好的看得懂的白話文而已，沒有意識的。」Tī 遮咱無清楚連溫卿用「中文」這 ê 詞背後，到底是「漢文」ê 同義詞，或者已經是「中國白話文」kap「中國北京話」ê「中文」，但是連溫卿這時無就語言 ê 問題表態，kap 伊過去對台灣話 ê 注心之間，讀來難免會感受著落差。〈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座談會〉，《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08.20，頁 6。

²⁵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284。

²⁶ 全頂註，頁 287。

²⁷ 全頂註，頁 297。

提醒民眾要用新的眼光來重新估計民族遺產並且加以整理保存。」²⁸可見，黃得時認為「台灣話」本身，以及在「言文斷裂」ê 困境之下關係著台灣文學語言 ê 爭論，攏是台灣「新」文學重要 ê 內涵 kap 意義。

其後，吳瀛濤〈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講著台灣「新」文學兼用中文、日文，中文又 koh 拄著對新舊文學，以及地方性 ê 台灣話文 kap 新字問題，這款表現 ê 困難「竟阻礙台灣新文學早日的成就」²⁹；黃師樵〈新文學運動與白話字運動〉³⁰，以及廖漢臣後來發表 ê 〈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³¹，更加是台灣文學史上少數關注蔡培火 ê 羅馬字運動 kap 台灣「新」文學發展關係 ê 論文。廖漢臣雖然反對台灣話文，但伊 ê 觀念其實是「以台灣話文為表現形式寫的詩歌小說，固然可以成立台灣鄉土文學，然而以台灣話文寫的詩歌小說，未必全是台灣鄉土文學。」³²一方面躊躇「台灣話 ê 文學」kap「台灣文學」ê 界定問題，另外一方面是對台灣話文欠缺國家力量支持 khah 無樂觀所致。所以，廖漢臣 ê 台灣「新」文學觀念強調保留台灣語言 ê 正當性，顯見台灣話文運動背後所反映 ê 殖民地文化困境，猶是伊所致重 ê 問題。

不過，《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三期 tī 出刊進前著予官方查禁，這擺意外 ê 回顧也受著政治 ê 壓迫隨時來噤聲。1950 到 1970 年代之間，大概只賻(tshun)王詩琅、葉石濤、吳瀛濤、黃得時有幾篇文章 teh 回顧。1964 年，王詩琅發表〈日據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比起在早 ê 論述，王詩琅顯然因為掌握著資料，所以對民間歌謠以及台灣話文運動攏有 khah 濟說明，伊認為歌謠對「民族遺產的保存整理，民族文化的提倡，具有重大的貢獻和意義」，台灣話文「是文學表現工具的重要問題，顯示這些在異族統治下的青年知識份子對自己的『台灣話文』處理的困惑苦悶，以及如何解決的熱忱。」³³但是這篇文章最後，同時也加強將台灣文學當做中國文學支流 ê 力頭，欲「循著中國文學的路線，建設台灣『地方文學』，建設台灣『鄉土文學』。」³⁴吳瀛濤甚至認為日據時期 ê 台灣文學雖然對日本來講是殖民地文學，但是以淪陷區 ê 台灣來看，suah 是「嚮往祖國，與異族的統治抵抗，發揮了民族正氣的中國文學的一環。」³⁵雖然伊有特別強調在殖民政府 ê 禁

²⁸ 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298-299。

²⁹ 吳瀛濤，〈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台北文物》3 卷 2 期，1954.08.20，頁 80。

³⁰ 黃師樵，〈新文學運動與白話字運動〉，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406-409。

³¹ 廖漢臣，〈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收錄 tī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頁 458-496。

³² 毓文，〈鄉土文學雜駁〉，收錄 tī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00。

³³ 王錦江，〈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台灣文獻》1 卷 3 期，1964.06，頁 52。

³⁴ 仝頂註，頁 56。

³⁵ 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一）〉，《幼獅文藝》216 期，1971.12，頁 275。

用之下，台語一直攏是民間通用 ê 語言³⁶，koh 論著《南音》「對地方語文提出嘗試」³⁷，不過對規篇文章來看，吳瀛濤所致力 ê 語言問題是欲按怎替包括伊家己在內，使用日文 ê 台灣作家辯解：

由於中文發表園地的被封禁，一部分遂走向改以日文寫作的途徑……不過雖不能用中文寫作，他們的作品仍富有民族意識，絲毫看不出被異族的文化毒素污染的痕跡，不但如此，作品中強烈的抵抗色彩比中文作家毫不遜色。³⁸

值得注意 ê 是，比較王（1908 年出世）、黃（1909 年出世）、吳（1916 年出世）這幾位算是日本時代 khah 前期 ê 代表，葉石濤 tī 1925 年出世，雖然伊 ê 父母(pē-bú)會曉講日本話，suah 有心用台灣話 hap 伊溝通³⁹，但是照葉石濤家己接受訪問所講，伊 17、8 歲去 in 姑婆受日本政府命令所開設 ê 國語講習所教「菜店查某」日語 ê 時陣，伊其實無啥會曉講台灣話⁴⁰，可能是到戰後才有機會重新「跨語」，再加上伊戰前 ê 文學經驗已經 kap 文壇 ê 語言論爭相閃身，主要 ê 文學活動攏用日語進行，會當講是後期 ê 日語世代。M-koh，戰後因為國語政策禁用日語，葉石濤 ê 日文作品必須愛透過翻譯才有法度發表，1951 年受著白色恐怖牽連入獄了後，伊在獄中自修華語，一直到 1965 年才寫出頭一篇華語小說〈青春〉 kap 第一篇論文〈台灣的鄉土文學〉。所以，咱看葉石濤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 ê 再現，窮實愛顧慮白色恐怖 ê 情境，以及伊戰前 ê 日語 kap 戰後 ê 跨語經驗。

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背後書寫「鄉土文學史」ê 企圖 kap 向望是真清楚，主要攏是欲解決包括伊個人在內，一陣戰前作家在戰後文壇「失語」ê 工具困境 kap 認同質疑。所以，咱究實咱無法度忽略薄弱 ê 論點背後，「上述這些作家除賴和以外，幾乎都是以日文寫作的，光復以後日文的羈絆，語言的障礙，使得他們不得不沉默。」⁴¹這 ê 毋成比例 ê 作家陣所透現 ê 集體焦慮，這種焦慮在後文更加明顯：

本省鄉土文學在日據時代確實有提倡的必要，藉此發揮民族精神，領導對日本人的抵抗運動，有其必須存在的歷史性，且不容否認已有了輝煌的收穫。但，現在是否可繼續存在，是否有必要特別加以珍視、培養、抑或大

³⁶ 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一）〉，《幼獅文藝》216 期，1971.12，頁 277。

³⁷ 全頂註，頁 278。

³⁸ 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一）〉，《幼獅文藝》216 期，1971.12，。

³⁹ 林玲玲，〈葉石濤及其台灣文學論的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2008），頁 139。

⁴⁰ 參見莊紫榕訪問，〈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葉石濤專訪〉，網址：

http://www.twcenter.org.tw/b01/b01_13101_1.htm，使用日期：2013.07.21；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 卷 4 期，1991.12，頁 158。

⁴¹ 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 期，1965.11，頁 71。

聲疾呼的提倡？這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年青的一代既沒有日文的羈絆，他們當然更少畛域的觀念，自然地融化在中國文學裡，更進一步的努力形成為世界文學的一翼。

然而我們是否應該丟棄鄉土文學優美的傳統呢？這個答案也是否定的。由於本省過去特殊的歷史背景，亞熱帶颱風圈內的風土，日本人留下來的語言和文化的痕跡，同大陸隔閡，在孤立的狀態下所形成的風俗習慣等，並不完全和大陸一樣，生為作家不就是豐富的題材嗎？⁴²

在壓禁「方言」ê 社會語境當中，葉石濤無 koh 像前人加減提起賴和透濫 ê 文學語言 kap 「新」文學 ê 語文論爭，顛倒雄雄轉向，強調「鄉土色彩」以及「民族意識」遮 ê 「抗日」修辭來證成，同時也擦消伊 ê 日語經驗，對文學 ê 角度（作家豐富的題材）來維持伊 ê 發言位置。無論這是毋是「中國」認同 ê 表現，tī 戰後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 ê 敘事內底，葉石濤對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再現，攏已經開始遺落、誤現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語境 kap 眾聲。

二、1970 年代「鄉土文學」論述到《台灣文學史綱》

葉石濤在作家 ê 身份以外，毋但伊對家已連結戰前本土文學系譜 ê 評論經驗有真強烈 ê 傳承使命感，tī 〈台灣的鄉土文學〉發表以後，伊在接合戰後台灣文學作家 ê 文學活動頂面所扮演 ê 「唯一」角色也愈來愈重要，愈來愈有代表性。另外，受著 1970 年代台灣外交困境影響，熱烈參與社會 kap 政治改革 ê 戰後世代，也開始走揣日本時代 ê 台灣經驗來建構「抗日」ê 集體記持。⁴³所以咱繼落去整理：這時陣比過往 koh khah sio-lòh ê 討論，甚至發生「鄉土文學論戰」，台灣文學史 ê 單本著作也陸續出現，一連繼戰前「新」文學 ê 再／誤現，以及 kap 戰後「華語」文學經驗 ê 接合，按怎成做未來「台語文學論戰」ê 戰場。

1972 年 5 月，陳少廷在《大學雜誌》發表〈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戰後世代頭一篇回顧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論文。⁴⁴面對當時台灣 ê 外交困境 kap 政治變局，陳少廷時任《大學雜誌》ê 社長，展現出比行過日本時代 ê 本省前輩作家 koh khah 強烈 ê 能動性去走揣歷史經驗、建構中國民族認同。伊講：

台灣的抗日民族運動，是認同祖國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所以，從大處着眼，台灣新文學運動可以說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環，也是五四前後的文學革命的一個支流。

⁴² 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 期，1965.11，頁 73。

⁴³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頁 66-139。

⁴⁴ 全頂註，頁 156。

顯然，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因台灣光復，重歸祖國而永遠結束了。因為台灣的文學就是中國的文學，所以再也沒有所謂「台灣文學」可言了。（「鄉土文學」應當別論）⁴⁵

陳少廷在文尾註明，伊主要參考蔡培火〈台灣民族運動史〉以及頭前咱討論過 ê 《台北文物》第三卷第二、第三期，葉榮鐘、廖漢臣、黃得時、楊雲萍、王詩琅 ê 回顧。但是經過頭前 ê 討論，咱看會出陳少廷精煉出來 ê 內容毋但將多數前輩攏有提起 ê 語文爭論攏總消音，伊更加致重「祖國」ê 影響 kap 「新」文學 ê 全面勝利，甚至在民族主義 ê 審判之下，舊文學流落「日本政府的庇護」，「抱守殘缺，苟延殘喘至台灣光復的前夕」。Tī 遮，咱也看會著幾年後出版，台灣上早 ê 文學史著作《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ê 粗坯(tshoo-phue)。

相較陳少廷 ê 立論，林載爵 1974 年發表〈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雖罔也認為台灣新文學是「受到祖國新文學運動的影響而產生」，不過這篇文章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 ê 梳捋顛倒 khah 完整。面對新舊文學論戰以後 ê 白話文問題，林載爵真清楚來指出台灣作家在被殖民 ê 情狀之下，體認著文化只是「虛偽的非文化」，以鍾理和 ê 看法證成「方言文學」是創造台灣固有特色 ê 文化抗爭手段。⁴⁶同時伊也解釋，台灣話文 ê 支持者是倚在台灣 ê 特殊環境，以及殖民地 ê 複雜性頂面來考慮；主張普及中國白話文 ê 人，是倚在理想 ê 立場，認為台灣是中國 ê 一部分，台灣袂當脫離中國，所以反對另外成立台灣特有 ê 地方性文化。⁴⁷可惜這篇文章因為《文季》休刊未見後文，咱看袂著林載爵針對這 ê 台灣文學史上 ê 懸案(hián-àn)進一步提出看法，但是看伊 1979 年對賴和 ê 討論，講「賴和一生都以中文創作，這是他堅強的民族意識的表示」⁴⁸，參照梁景峰 1976 年「不帶鄉土情緒」ê 講法：「小說中人物的對話也力求真實，符合當時狀況，所以大都用台語口氣，常用一些極幽默的古成語。」⁴⁹至少 koh 點出「台語」，林載爵頭先 ê 「新」文學論述 kap 伊後面所再現 ê 「賴和」，實在無法度對同(tui-tâng)。著像藍建春所講，「敘述賴和」就等於是「敘述台灣文學」，這背後其實是「按怎敘述民族」ê 命題。⁵⁰所以，就算對「新」文學 ê 語文問題有 khah 完整 ê 梳捋 kap 認識，當台灣文壇需要「民族化」(nationalize)賴和，以及日本時代「新」文學經驗來證成「台灣文學」ê 時陣，賴和個人 ê 生命 kap 伊 ê 作品，甚至是伊背後規台灣文學發展脈絡，包括「漢文」、「白話文」等等 ê 用詞，基本上攏總予「中

⁴⁵ 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53 期，1972.05，頁 18-24。

⁴⁶ 林載爵，〈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 期，1974.05，頁 158。

⁴⁷ 全頂註，頁 165。

⁴⁸ 林邊，〈忍看蒼生含辱——賴和的文學〉，收錄 ĩ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484。

⁴⁹ 梁景峰，〈賴和是誰？〉，收錄 ĩ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1——賴和先生全集》，頁 440。

⁵⁰ 藍建春，〈文學史與賴和：以「台灣新／現代文學之父」的論述為例〉，《台灣文學學報》2 期，2001.02，頁 14。

文」ê 華語指涉 kap 抵抗修辭收編入去。會當料想，幾篇成做後來台灣文學史著作 ê 「前文本」，情形可能 koh khah 嚴重。

1970 年代初「現代詩論戰」以來，要求文學必須愛反映民族主義 ê 「傳統」 kap 社會意識 ê 「現實」，延續到「鄉土文學論戰」ê 這波高潮，全款也牽涉著日本時代台灣文學經驗 ê 回顧。鄉土文學 ê 主流觀點，是以「現階段 ê 中國文學」來看待台灣所生產 ê 文學，不過最後成做台灣文學史重要「前文本」，顛倒是在論戰當中以「台灣」本身 ê 歷史、文化做主體 ê 葉石濤。1977 年，葉石濤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是按呢理解日本時代以來 ê 台灣文學發展：

所謂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台灣人（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所寫的文學。然而由於台灣在歷史裡曾經有過特殊遭遇——被異族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竊佔幾達一百多年的慘痛歷史，所以在這塊土地的鄉土文學史上，亦留下了使用外國語言所寫的有關台灣的作品；甚至台灣人本身也使用統治者的語言去寫作。⁵¹

葉石濤 koh 進一步補充「台灣意識」ê 概念：

儘管我們的鄉土文學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但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有一個前提條件；那便是台灣的鄉土文學應該是以「台灣為中心」寫出來的作品；換言之，他應該是站在台灣的立場上來透視整個世界的作品。⁵²

施俊州認為，葉石濤有誤用 Nadine Gordimer 定義非洲文學 ê 嫌疑⁵³，因為「南非白人作家」Gordimer 所提出 ê 「非洲文學」，是對伊自身「白人」ê 「他者」身份 kap 文化出發，kap 非洲之間所建立 ê 一種「泛非洲團結」ê 跨國地理概念。若是挪用來看葉石濤，伊身為「我者」，suah 是用被「他者化」(othering) ê 語文觀點，欲親像 Gordimer kap 非洲全款透過使用非本土語言 ê 日語來產生一種「泛台灣／日本團結」ê 關係，這確實是殖民統治 ê 語文政策之下，葉石濤 kap 部份跨語世代 ê 作家不得不「異化」ê 情境。同時也像施俊州所講，肯定外來語言對文體「殖民」ê 痕跡（比如符碼透濫、語詞借用），m̄-koh 取消語言這項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充分」定義台灣文學 ê 地位 kap 功能了後，葉石濤苦心定義台灣人 ê 身份也產生矛盾。⁵⁴所以，雖然講葉石濤加減有提起新舊文學論爭、台灣白話文運動 kap 羅馬字化運動 ê 主張，不過在伊「當時」看來，遮 ê 行動攏是台灣文壇

⁵¹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2。

⁵² 全頂註。

⁵³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8-9。

⁵⁴ 全頂註，頁 8。

對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民族自決 ê 潮流 kap 中國五四運動 ê 回應，一路「進化」到「中文」kap「日文」書寫進前 ê 陣痛 kap 拖磨 niā-niā。

全一時陣，陳少廷出版戰後頭一本台灣文學史著作《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其中討論台灣話文論戰 ê 論點、參考資料甚至部份結論，大概 kap 〈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引用王詩琅 ê 意見差無外濟。M-koh 在引用之外，伊對台灣話文爭論 ê 評論是「在當時，這種論戰自然不會有結果的，而隨著抗戰勝利，台灣重回中國版圖，此一問題也就不復有意義了。」⁵⁵葉石濤對《簡史》ê 評介，基本上延續伊家己對日本時代語文論爭 ê 看法，講「日據時代的作家本來是以北平官話為基本的白話文寫作的，後來日本殖民者採取一系列的彈壓政策，施行奴化教育的結果，中文作家失去發表的園地，以至於日文作家逐漸抬頭。」⁵⁶雖罔葉石濤有小可補充台灣文學在循(sūn)五四 ê 傳統之外，猶有家己「特殊 ê 鄉土性」，但是伊完全無針對陳少廷認為論戰「不復有意義」提出意見。顛倒是隔轉年（1978年）劉紹銘在《聯合報》發表〈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整理與出版〉，批評陳少廷用「改寫」ê 方式處理史料。陳少廷 ê 回應是：

個人認為，要研究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必須精通日文，而且也要通曉台語，因為這段時期的作品大部分是用日文寫的，雖然也有不少的作品是中文的，但那些中文與我們今日所用的文言文或白話文，都有很大的差異，可以說是「台灣漢文」，……劉紹銘先生在〈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整理與出版〉一文中，曾指出拙著《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引述原始資料時採用「大意改寫」，這是因為劉先生不了解筆者用心之良苦，如果我不加以大意改寫，而原文照錄，恐怕大部分的讀者都看不懂它的意思了。

57

咱看陳少廷前行研究 kap 引用資料 ê 基礎著會當知影，戰前、後 ê 台灣作家、評論者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經驗 ê 梳捋，其實並毋是無注意著台灣話文 ê 爭論對文學發展 kap 文本語言所造成 ê 影響，對陳少廷 ê 辯解內底，咱也完全看出伊有掌握著「台灣漢文」ê 特殊性，但是伊所再現 ê 「新」文學，卻是將遮閘、曖昧在「漢文」、「白話文」指稱背後，台灣話文運動 ê 社會基礎完全消音，誤現一 ê 「中文」語境來 kap 戰後 ê 華語文學體制完全接合。陳少廷 ê 「翻譯」kap 文學史敘事，究實無法度 kap 戒嚴體制之下，鄉土文學論戰懸漲(kuân-tiunn) ê 中國民族主義 kap 華語文學體制對「方言文學」、「分離主義」ê 指控脫離關係。

⁵⁵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頁 75。

⁵⁶ 葉石濤，〈簡介陳少廷先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書評書目》53 期，1977.09，頁 36。

⁵⁷ 陳少廷，〈歷史不容誤解——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的幾點意見〉，《聯合報》，1978.12.10，第 12 版。

所以講，正當「台灣意識」siàng-sî 是「國語正統性」當道，而且台語文學猶未對「方言文學」ê 身份醒覺過來 ê 前脈絡之下，咱會當發見《台灣文學史綱》反應葉石濤自身 ê 「國語」經驗，尤其受著戰後國民黨 ê 語言政治對伊文學史敘事接合戰前、後「鄉土文學」ê 影響，甚至比〈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ê 力頭 koh khah 強：

黃石輝和郭秋生的主張，是紮根於台灣殖民地社會的特殊環境和時代需要而萌芽的。黃石輝曾經寫過：「台灣在政治關係上不能用中國話來支配，在民族性上不能用日本話來支配，為適應台灣的現實社會情況，建設獨立的文化」起見，所以不得不提倡鄉土文學。……由此看來，他們兩人之所以提倡鄉土文學是「歷史性的權宜措施」吧？⁵⁸

既然是釘根 tī 台灣社會 ê 環境 kap 時代需要之上，為啥物葉石濤會認為台灣話文運動是「不得不」、「歷史性的權宜措施」？這欸矛盾 ê 修辭，也全款暴現在葉石濤對台灣「新」文學黃金十年（1926 年到 1936 年）ê 評論內底。伊認為「新」文學最後傷過強調階級性、社會性，所以「未能拓展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也忽略藝術性和美學性的探求」，koh 「過份使用方言，雖有效於表現強烈的本土性性格，但方言的過度使用也無可避免地造成事過境遷後，難以瞭解的困難。」⁵⁹甚至葉石濤欲將 1970 年代 ê 「鄉土文學」kap 戰前「鄉土文學」相接 ê 時陣，伊特別講：

日據時代幾達四分之一世紀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仍然順沿著鄉土文學的初期構想完成了歷史上的使命；除以台灣話文為文學表現的工具的主張外。

60

所以，在戰後必須透過「中文」進行中國民族主義表意 ê 時陣，台灣文學史回顧 ê 第一手，著是愛透過強調「抗日」、「民族精神」來證成使用「日語」ê 正當性，繼落來 tī 已經完成 ê 「中文」語境內底，取消本土語言做「必要」條件，但是將華語當作「充分」條件 ê 文學史敘事，kap 本論第三章一開始對戰後國民黨語言政治 ê 分析，以及戰後鄉土文學論戰 ê 共時性討論大概重合，也印證文學史 ê 書寫，甚至是台灣文學場域受著官方民族主義宰制 kap 政治影響 ê 現象。在這種情境之下，台灣話文 hông 消音、噤聲，確實是戰後 ê 「鄉土文學」回顧戰前「新」文學經驗 ê 歷時性實踐，目的是接載咱所熟似(sik-sāi) ê 彼種「雜菜麵」ê 閱讀口味，共謀華文體制對本土語言 ê 宰制——無論論者是真正「久慣成自然」，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⁵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頁 27。

⁵⁹ 全頂註，頁 58。

⁶⁰ 全頂註，頁 143。

第二節 (民族)「意識」v.s.「民族意識」: 台灣文學 kap 台灣民族文學

咱頭先 teh 討論「台灣意識」ê 時陣，大致上同意游勝冠 ê 提法，也就是對「社會意識」ê 自覺，意識到家已是所帶(tuà) ê 「台灣」社會所產生 ê 歷史文化傳統 ê 一部份，並且興起一種認同、繼承、發揚這種傳統 ê 「歷史、文化意識形態」，最後在這頭前這兩種認同意識 ê 基礎頂面，形成一種信仰，koh 有行動性 ê 台灣「民族主義、政治主張 ê 意識型態」。M-koh，筆者也認為伊所提出 ê 台灣「民族主義、政治主張 ê 意識型態」有閃避、忽略國民黨 ê 「中國立場」可能妨害台灣獨立自主化 ê 盲點。另外，親像蕭阿勤用「台灣(民族)文學」ê 形式，認為「台灣文學」ê 概念 teh 發展 ê 過程當中，著已經有關係著「民族想像」ê 論述，筆者也舉論黃得時、陳少廷、葉石濤 ê 文學史書寫，其實攏是在一種民族主義 ê 情境當中所做 ê 認同宣言，只不過在過去 ê 政治 kap 社會背景之下，「台灣民族」是一組無法度直接講出來 ê 禁語。所以，本論探討「民族想像」ê 時陣，認為「意識」其實著是一組婉轉、曖昧宣告身份認同 ê (民族) 論述，一直到「台灣民族文學論」正式提出「民族意識」ê 號召，毋免 koh 掩掩揜揜(ng-ng-iap-iap)。

若按呢，台灣文學本土論到底對頭前文學史 ê 積累、梳捋 kap 再／誤現、接合 ê 建構過程當中，確立出啥物款 ê 「台灣民族」身影？長久以來，台灣文學在殖民、再殖民 ê 語境當中所產生 ê 「失語」文學史觀，會對台灣文學 ê 「民族想像」造成啥物款 ê 影響或者是矛盾？以下，咱針對台灣文學本土論「台灣意識」之中 ê 「民族」指涉，以及對「台灣(民族)文學」延伸出來，成做台語文運動骨格(kut-keh)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進行討論，並且對「台語文運動」ê 成因，以及台語文學 kap 台灣意識、台灣民族文學論 ê 關係進行整理、分析。

一、葉石濤、陳芳明 kap 彭瑞金 ê 台灣文學論

在 197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尤其懸漲 ê 政治 kap 社會情境當中，咱會當不時看著鄉土文學論戰內底 ê 「鄉土文學」kap 「(中國) 民族文學」抽換、互文 ê 論述方式，在這般 ê 語境當中，葉石濤雖然無法度直接將「台灣立場」ê 「民族文學」講出喙，但是這時陣本土作家 teh 定位家己 ê 文學意識，應當著像彭瑞金所講，只是欠缺一 ê 「民族文學」ê 口號，事實上已經有民族文學 ê 實質意義，⁶¹葉石濤抵抗、批判官方中國民族主義 ê 文學史書寫，也確實是一種台灣民間 ê 國族論述。⁶²不過咱頭前也講過，葉石濤 tī 〈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針對「台灣人」提出身份論 ê 定義，也就是「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及原住種族」，透過「台灣在歷史裡曾經有過特殊遭遇——被異族如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竊佔幾達一百

⁶¹ 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2003.04)，頁 28。

⁶² 陳芳明，〈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觀之建構〉，《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頁 56。

多年的慘痛歷史」⁶³來形成 ê 共同意識，suah 因為伊承認統治者 ê 語言做充分條件，同時取消台灣語（族）言這項必要條件來破功，台灣「人」當中各語族 ê 文化主體性變 kah 無要無緊。

失效 ê 身份論，暗示咱必須轉去葉石濤 ê 情境思考伊 ê 限制。若是葉石濤無先將「新」文學 ê 日語經驗正當化，這段包括伊家己在內 ê 文學經驗基本上著直接予國民黨語言政治 ê 認同操作擦消去，為著欲 tī 國民黨起造 ê 華語文學體制內底發言，葉石濤「必須」愛閃避對再／殖民語言 ê 批判，才有法度將日本時代 ê 文學經驗轉換做戰後論述 ê 資本。所以，咱必須愛體認著：「台灣意識」窮實是經過殖民、再殖民 ê 扭曲環境，tī 一種不得不承認，並且無法度反抗殖民語言 ê 邏輯基礎之上來起造 ê 意識形態。

跟綴鄉土文學論戰 teh 進行，台灣社會 siàng-sī 也面對政治上 ê 激烈變革 kap 徙動(suá-tāng)。因為「中壢事件」以後，黨外運動訴求人權、爭取民主 ê 改革意識漸漸壯大，尤其經過 1979 年 12 月「美麗島事件」ê 刺激以後，部份關心社會現實 ê 文學作家對政治本土化運動 ê 參與，以及原本著沐入認同 kap 政治因素 ê 台灣文學運動，到 1980 年代展現 koh khah 強烈 ê 「台灣意識」立場。只不過，這時陣台灣文學史論 ê 敘事當中對「台灣意識」ê 繼承 kap 深化，敢有 koh 進一步理解著「台灣意識」ê 侷限，針對國民黨再殖民 ê 語言政治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造成 ê 誤識，以及戰後文學體制 ê 建造進行全面 ê 解殖(de-colonization)？譬論 1982 年，葉石濤揣鄭炯明、曾貴海、陳坤侖、施明元等等有志在高雄創辦《文學界》雜誌，彭瑞金著 tī 《文學界》頂面提出「台灣意識」ê 檢視網，是「只要在作品裡真誠地反映在台灣這個地域上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是根植於這塊土地的作品，我們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⁶⁴；1983 年，陳永興醫師接手改組《台灣文藝》，標舉 kap 1934 年「台灣文藝聯盟」機關誌《台灣文藝》之間 ê 承繼，陳芳明用「預告民族文學的誕生」來形容《文學界》kap 《台灣文藝》ê 地位，伊認為這兩份刊物攏是台灣作家以作品來表現、追求「自主性」ê 實踐，「經過這種長期的實踐，台灣民族文學的孕育誕生乃是必然的。」⁶⁵繼落來，宋冬陽在台灣意識論戰當中，結合彭瑞金、宋澤萊 kap 陳樹鴻 ê 意見，認為「台灣意識」是台灣人受著一定社會經濟條件 ê 靜態、被動制約，加上主觀對偏差社會經濟條件 ê 動態、主動反抗，雙方交互作用形成 ê 「台灣本土意識」。⁶⁶雖然宋冬陽也強調「反帝、反封建」ê 抵抗經驗「台灣意識」這時 kap 鄉土文學論戰以來 ê 中國意識割

⁶³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頁 72。

⁶⁴ 彭瑞金，〈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2 期，1982.04，頁 3。

⁶⁵ 陳芳明，〈擁抱台灣的心靈——《文學界》和《台灣文藝》出版的意義〉，《鞭傷之島》（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07），頁 13。

⁶⁶ 宋冬陽（陳芳明），〈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收錄 tī 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9.02），頁 130。

分、對抗 ê 立場也愈來愈堅定，但是對應 siàng-sî 「國語正統性」koh 猶未受著挑戰 ê 「方言文學」前脈絡，「台灣意識」對文學語言 ê 後殖民思考猶未出現。

不過，經過「台灣作家定位論」ê 風波以後，咱 tī 彭瑞金 kap 陳芳明在 1987 年 7 月 ê 對談當中，確實感受著國際上中華人民共和國 ê 「中國」對台灣意識 ê 收編 kap 歧視焦慮，特別是台語文運動對台灣意識論爭所造成 ê 影響。In 兩人除了再次強調台灣文學對鄉土文學論戰以來所建立 ê 本土意識，拒絕使用「中文」ê 收編修辭以外，彭瑞金對台語文運動 ê 意見是「應整個社會變局的機緣而生的成份居多，嚴肅地從語文的因素思考較少。」過去有真濟作家對無仝 ê 角度恬恬仔(tiām-tiām-á) teh 努力台灣話文 ê 寫作，但是「今日突然喊出口號來，反而成為問題。」因為台灣語文在濟濟移民 kap 被殖民 ê 經驗當中已經無純，現此時欲創一套全新 ê 語言來取代原本 ê 語言，非常困難。⁶⁷陳芳明對殖民地 ê 語言問題出發，指出日本總督府 kap 國民政府仝款攏是透過語言政治壓迫被統治者母語 ê 殖民者，但是伊 suah 先對「台灣話」來解構戰後台語文學運動對語言政治 ê 反抗：

講到「台灣語」的時候，不要忘了台語本身涵蓋的各種語言存在，別再出現我族中心主義，以為台灣話只是福佬話、閩南話，忘記了客家以及原住民的語言也是台灣話。否則，提倡台語也將造成緊張。當前的課題是，對外要如何爭取台語納入語言政策，對內如何協調各種不同的語系。⁶⁸

日本時代以來「台灣話」、「台語」在文化、文學運動當中 ê 指涉，後面咱會 koh 討論，但是陳芳明 tī 遮其實並無真正了解戰後台語文學運動 ê 理論 kap 實踐 ê 困境。更加矛盾 ê 所在是，陳芳明也提出「爭取台語納入語言政策」ê 政治意見，但是伊 suah 認為「用母語寫作，根本不是作家向統治者爭取寫作權利，而是作家如何表達的問題。不管統治者如何壓制，你能用母語寫出優秀的作品。獲得承認，你的母語寫作目標便達成了」⁶⁹，既然母語文學只要一直寫著會當達成目標，為啥物陳芳明頭前 koh 強調語言政策 ê 問題？這 ê 過份樂觀 ê 矛盾，顯示主流 ê 台灣本土文學論對台語文運動 ê 問題意識認識不足，認為台語 kap 其他本土語文 ê 書寫只是表達、工具性 ê 問題 niā-niā, suah 完全忽略、閃避台灣各語族到底欲按怎 tī 統治者 ê 政治 kap 文化迫害原在 ê 結構當中，重新建構文化主體性 ê 困境。陳芳明面對華語現實所提出 ê 看法，可能會當看做是在葉石濤 ê 失語經驗過後，「台灣意識」koh 再承認統治語言合法性 ê 宣言：

我們的祖先來自中國，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的祖先使用漢語，也是事實，所以，我們不可能為了反對統治者，不用統治者的語言、文字，而創

⁶⁷ 〈台灣文學的侷限與延長——與彭瑞金對談文學史的撰寫〉，《鞭傷之島》，頁 362。

⁶⁸ 全頂註，頁 363。

⁶⁹ 全頂註。

出一套自己的語言來，我們還是在使用祖先的語言。否則，拼音也好、創字也好，一定帶來大混亂。⁷⁰

在「大混亂」ê 工具理性 kap 實用主義背後，陳芳明並無發見家己頭先才講「我們絕不能霸道的宣佈作家都是使用中文的，所以這些作品都朝向中國」⁷¹，後來竟然比葉石濤 koh khah 強力，kap 中國意識論者全款挪用「中國」、「漢族」本質論來強化現此時 ê 統治者語言——也就是「華語」文學體制 ê 合法性 kap 正當性，壓制本土語言 ê 書寫。而且這款論述 teh 論證華語，同時將台語、客語收編入「漢語」ê 時陣，也暗示一種「反動 ê 修辭」，予日後台語文運動在「原住民」ê 面前，因為漢人壓迫 ê 殖民「原罪」來失效。

彭瑞金比較有 khah 關心本土語言當前滅無 ê 危機，也強調必須愛對文學創作當中精緻台灣語言，甚至對台語文學運動有 khah 精確、友善 ê 評論：

一如台灣人意識運動的基礎衍生的，台灣人的語言運動也是謙卑、寬容的雙語運動，僅要求在官話之外，也肯定媽媽的話的使用權利，以及文化發展上的價值，……一樣沒有「取而代之」「消滅國語」「有礙團結」這些被羅織的罪狀。⁷²

但是彭瑞金過無外久 kap 陳芳明 ê 對話，也認為台語文學「現在要創出一套全新的語言和以創新的語言取代舊有、原有的語言一樣困難……」⁷³，對遮，咱看出台語文學已經展現相對強烈 ê 運動性格，但是陳、彭兩人攏無發覺家己 ê 矛：承認母語問題 kap 政治有關係，m̄-koh 攏提出「雙語政策訂不訂在統治者手裡，但是台語振興與否卻在我們自己手上」⁷⁴這款無欲追究戰後國民黨壓禁方言，甚至現在 koh 猶未改革 ê 語言政治，suah 將恢復母語 ê 責任攏揀(sak)轉來作家身上 ê 去政治論述。

所以「台灣意識」討論到遮，咱會當了解「台語文學之父」林宗源以及濟濟跨華語作家 ê 轉向處境，同時也是「台語文學」對「方言詩」正名過來 ê 歷史情境，並毋干焦是彭瑞金所認知 ê 「將母語文學運動建立在純粹反官方語言政策的情緒基礎上」⁷⁵。台語文學運動 ê 激化若欲講是「統派」ê 使弄(sái-lōng)、中國意

⁷⁰ 〈台灣文學的侷限與延長——與彭瑞金對談文學史的撰寫〉，《鞭傷之島》，頁 364。

⁷¹ 全頂註，頁 353。

⁷² 彭瑞金，〈台灣人的悲願：回應《一個中國人的想法》〉，《新台灣》總號 23，1987.05.31，頁 31。轉引自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150。

⁷³ 全註 70，頁 362。

⁷⁴ 全頂註，頁 365。

⁷⁵ 全頂註。

識 ê 壓逼，窮實無夠精確，因為主流 ê 「台灣意識」內化華語文學體制、壓制本土語言 ê 民族想像，同意、接受、甚至複製「中國意識」語言政治 ê 壓迫，才是台語文學運動對「台灣文學」上大 ê 質疑 kap 回應。

二、胡民祥、宋澤萊 kap 林央敏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

謝春馨認為在「《1943 台灣詩選》」事件過後，「台灣文學」ê 正名已經大致完成。但是若準講台灣文學 ê 正名是以葉石濤 tī 鄉土文學論戰 ê 過程當中，為著欲抵抗中國民族主義 ê 收編所提出 ê 「台灣（民族）意識」成做基礎，謝春馨認為正名以後 ê 爭論「可視為本土派的內部分歧，但並不意味著觀點的相異，只是步伐的快慢、表達方式的顯隱之別」⁷⁶敢有法度詳細解說為啥物 tī 台灣（民族）文學正名以後，會 koh 出現「台灣民族文學」ê 主張 kap 「台語文學」ê 運動？謝春馨無講明或者無發覺 ê 問題是，台灣文學正名過後 ê 「後續發展」窮實毋是一件一件單獨 ê 「個案」，對「老弱文學」ê 批判開始，宋澤萊個人其實著已經是人權文學、台灣民族文學、台語文學之間互相牽連 ê 重要線索。

另外，游勝冠對林央敏 ê 台灣新民族文學論當中，結論出「台灣民族文學論是台灣民族論者為獨立建國的政治目標而提出的」⁷⁷，同時強調台灣民族 ê 概念是「因為台灣漢人的漢族意識易為統派所用，轉化為中華民族意識，台灣文學要代之以台灣民族文學，也是為了與中國文學劃清界限，避免中國文學論者利用兩岸共有的漢文化關係，將台灣文學收編在中國文學的下位。」⁷⁸並且明確指出「台灣民族文學」kap 「台灣文學」上大 ê 差別是「將台灣文學反抗的對象明確指向國民黨和中共」。⁷⁹事實上，游勝冠確實點出台灣民族文學論欲對抗中國／中華意識收編 ê 立場 kap 論點，m̄-koh 若換一種提問 ê 方式，台灣民族文學論敢毋是暴現「台灣（民族）文學」無法度面對「統派」或者是「中國文學論者」透過「漢文化」、「中華民族」本質論 ê 收編？甚至經過頭先 ê 討論了後，咱也會當發見「台灣（民族）文學」內化這種「漢文化」ê 本質論欲處理台灣文學語言問題 ê 現象。所以，除了欲突破「台灣意識」kap 「中國意識」之間 ê 曖昧以外，台灣民族文學論按怎成做台語文學 ê 發展基礎，來面對「台灣意識」不得不承認，也無法度反抗殖民、再殖民 ê 去／政治眼界，包藏(pau-tshàng)「漢文化」本質論 ê 華語論述？咱必須轉來台灣民族文學論對文化 kap 語言 ê 思考脈絡之中，走揣答案。

對戰前到戰後，台灣文壇濟少攏有 tshiau-tshuē 日本時代「新」文學經驗 ê 努力，但是按「語言」ê 觀點研究日本時代 ê 台灣文學，提出「台語文學」ê 重要

⁷⁶ 謝春馨，《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正名論》，頁 145。

⁷⁷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頁 362。

⁷⁸ 全頂註，頁 363。

⁷⁹ 全頂註，頁 365。

kap 必要性，胡民祥確實是頭一人⁸⁰，也是真早著將台語（語言）kap 民族（nation-state）牽做伙 ê 文學論者之一。⁸¹若是欲理解台灣民族文學論 kap 台語文學 ê 關係，咱有需要將眼界先放到海外，看伊 1981 年用筆名「高青峰」所發表 ê〈戰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是按怎講。胡民祥這篇文章特別強調「台灣話文運動」是因為台灣「新」文學「借用」中國白話文，kap 台灣話之間「言文無一致」ê 社會背景所致，所以「台灣話文運動」成做反帝反封建 ê 解放運動之一，tī「文學大眾化」ê 意義頂面會當證成台灣民族 ê 主體性：

事實上，台灣民族有別於中國漢民族；台灣語是台灣民族的語言。一個民族的語言是無法由另一民族的語言所取代的；一個民族的文學，自然要以該民族的語言來建設。這是可以從歐洲各民族國的形成，民族文學的發展看出來的。……台灣民族自是不同於中國漢民族，台灣文學自然有別於中國文學，正如同，大和民族不同於漢民族，日本文學當然不是中國文學的一支。⁸²

對應 1980 年代台灣島內「國語正統性」猶未受著挑戰 ê「方言文學」前脈絡，咱看著胡民祥是一開始著 teh 思考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文學 ê 社會 kap 文化基礎，伊梳捋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文學語言」史觀，認為「新文學運動者終於抓緊了這個必然的歸向：使用台灣話語，為台灣民族文學灌注台灣民族語言的質素」⁸³，也 tī 戰後 ê 鄉土文學文體當中看見「台灣民族文學試圖在重重的荊棘中殺開出路」。⁸⁴在這篇論文了後，胡民祥開始針對台灣文學史拭抹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提出批判，也對伊 ê 名作〈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繼落去論證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話」文學 kap 台灣民族文學論 ê 關係。

包括胡民祥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在內，海外 ê 政治 kap 文學論述透過《台灣新文化》ê 轉載，也開始在 1980 年代尾期 ê 台灣島上釘根。主持《台灣新文化》ê 宋澤萊、林央敏也因為按呢，繼續踏出走揣「台灣民族文學」ê 跤步。宋澤萊對葉石濤、陳千武 kap「笠」ê「老弱文學」批判 kap 指控（宋澤萊事件）雖然傷過情緒化，但是其中對文學牽涉政治 ê 討論，以及後來台灣民族文學論 ê 形成，確

⁸⁰ 呂美親，〈八〇年代後台語文學 ê 突圍：以《台灣新文化》作觀察對象〉，收錄 tī《第三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07），頁 148。

⁸¹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81。

⁸² 高青峰，〈戰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民族文學的成長〉，《台灣時代》12 期，1981.07，頁 52。參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網址：<http://da.lib.nccu.edu.tw/tadm/?m=2302&wsn=0102>，使用日期：2013.04.19。

⁸³ 全頂註，頁 53。

⁸⁴ 全頂註，頁 17。只是像施俊州所講，這時陣胡民祥 ê 看法是將台語看做是台灣（華語）文學 ê 外部條件，並無注意著鄉土文學文體猶是華語文學內部語言變體 ê 問題。參見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7。

實有真大 ê 影響。在分析宋澤萊 ê 人權文學 kap 台灣民族文學論進前，咱有需要注意著伊早先定義「台灣文學」ê 具體內容：

台灣文學並不是自主性很強的文學，這是晚近第三世界文學的宿命。一方面他的語言文字不是原來就有的，他方面，在社會、經濟、文化的構成方面，他甚至都受到外民族的操縱。台灣人無疑的大半是漢民族，那麼以使用多數人之語言（漢語）為主是台灣文學的特色。但漢語文學只是一個部份，在更早時期，外國傳教士為了傳教的方便，曾用山地話、閩南語翻譯聖經，對於神學來說，也許並沒有特別的意義，但對文學而言，意義則非比尋常。⁸⁵

宋澤萊認定台灣文學「是在記載台灣人之特殊歷史經驗和感受的文學」，雖然看來 kap 鄉土文學論戰以後，繼續發揚葉石濤「台灣意識」ê 本土文學論主張差無外濟，但是咱對宋澤萊舉出外國傳教士用山地話、閩南語翻譯聖經 ê 眼界著會當看出，伊提出「台灣民族文學」進前，對「台灣文學」ê 認識窮實已經注意著多語族 ê 台灣「人」之間，有無全款 ê 殖民語境 kap 文學經驗。宋澤萊也認為，殖民地若欲自立自主，感受著被殖民 ê 台灣「人」著必須愛行上「抵抗—反抗—解放」ê 路 nih，將「抵抗」看做是「人」存在 ê 一種基本態勢，而且伊認為這種傳統對日本時代 ê 楊達著已經開始。所以，倚在 kap 葉石濤全款 ê 本土立場，宋澤萊面對「執政者有意把台灣文學者看成政權的敵手」ê 壓力，鼓吹「讓台灣作家像個人」⁸⁶，認為台灣「人」無法度脫離台灣社會長期受著殖民者宰制 ê 「政治」關係，是感受殖民壓迫，同時也是實踐「台灣意識」ê 主體，台灣作家若欲追求無受政治壓迫、反映台灣「人」現實 ê 「台灣文學」，著必須愛將台灣作家 ê 人權自由，對統治者 ê 手頭完全解放出來，也正是因為比葉石濤 koh khah 強調台灣作家身為「人」，必須積極解脫被政治壓迫 ê 社會狀態，宋澤萊才會在「政治」觀念上，對葉石濤發出「逆退」、「老弱文學」ê 批判。

對應黨外民主化運動 ê 進展，台灣社會 kap 政治慢慢有解嚴 ê 氣候，宋澤萊這種對「人」ê 關心經過台灣意識論戰了後，開始提昇到「民族」ê 層次。因為伊認為台灣作家 ê 「台灣意識」受著國民黨 kap 統派 ê 影響，無法度界定台灣文化 kap 漢文化 ê 關係，也無發見漢文化當中無全 ê 漢人族群，以及漢文化以外 ê 原住民族群身影，所以才無法度解決「台灣作家定位論」ê 國家地位 kap 認同問題。宋澤萊詳細舉論「台灣民族」ê 實質內涵，來證成台灣文學 ê 主體性：

基本上，台灣文化有部份是漢人文化，但不見得勢因為漢文化就須要說是「中國(華)文化」。台灣漢人文化可以冠冕堂皇地說是「台灣民族文化」，

⁸⁵ 宋澤萊，〈台灣文學論〉，《暖流》1卷4期，1982.04，頁63。

⁸⁶ 宋澤萊，〈致台灣文學界七封信〉，《深耕》15期，1982.08.10，頁48-49。

以「台灣民族文化」來涵攝山地文化、福佬文化、客家文化、外省文化，就可以和「中華文化」「漢文化」劃開，而找到自己的主体。⁸⁷

對頂面看來，宋澤萊 ê 「人權文學論」 kap 葉石濤 「台灣意識」 ê 「本省人」、「台灣人」經驗比起來，除了全款強調「文學」對被殖民經驗 ê 反映以外，伊對台灣「人」ê 身份 kap 台灣文化 ê 成份，究實有 khah 深層 ê 認識。也因為按呢，咱才會當了解宋澤萊定義 ê 「台灣文學」為啥物會浮顯台灣各語族 ê 文化主體性，結合人權 kap 民族 ê 台灣文學論，又 koh 按怎提示台灣作家必須超越浮有(phû-phann) ê 「台灣意識」：因為多語多族 ê 台灣「人」追求身為「人」ê 基本權利，對文化保存、文學創作 ê 形式層面，「抵抗」統治者壓迫 ê 方式攏無全款。伊家已轉向台語文學創作，窮實也是直接面對台灣文學長期以來語文問題 ê 抽疼(thiu-thiann)，這款台灣民族文學論 ê 思路，全款也出現在林央敏對台灣文學 ê 思考當中。

林央敏對中國文化／漢文化 ê 檢討全款也是對「人」開始，伊比較中國文化 kap 西方文化對「人」ê 定義了後，對台灣人過去「毋成人」ê 歷史經驗當中，批判統治台灣 ê 外來政權，尤其是為著欲證成代表「中國」ê 正統性，tī 台灣實施獨裁統治，並且以「復興中華文化」來完成「中國化」目標 ê 國民黨。而且，林央敏 kap 宋澤萊全款，並無完全否認台灣文化 kap 漢文化之間 ê 關係，但是強調漢文化來到台灣經過三百外年 ê 獨立發展，kap 台灣原在 ê 先住民文化，以及殖民時代 ê 日本經驗融合，究實已經 kap 中國母文化無全，但是這種本土意識 suah 因為受著戰後國民黨欲復興中國文化，無法度生炭(senn-thuàn)致使死失。所以，林央敏實在是欲討論包括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在內 ê 「台灣人」，欲按怎抵抗 kap 獨裁政治共謀來壓迫本土文化 ê 中國文化，真正對個人、族群出發，做伙來建構台灣民族 ê 新文化、新文學。⁸⁸

林央敏講：「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她獨自的屬地，獨自的語言文化與社會制度，這個民族的文學自然是在反映該民族的種種共性。因此凡是反映民族真貌的都是民族文學。」⁸⁹但是文化 ê 傳承、交流，甚至是創造，攏 kap 語言、文字有真密切 ê 關係，所以伊強調台灣新文化運動頭一步必須愛先思考語言 kap 文字問題，建立本土化 ê 語文系統。在伊 ê 認捌當中，台灣 ê 語言有「福佬話」、「客家話」、「各族山地話」等等 ê 本土語言，也包括外來 ê 「北京話」，但是林央敏認為，外來 ê 北京語雖然會當算是一種「台灣話」，m̄-koh 伊無法度 kap 台灣四百年來 ê 文化遺產接合，所以北京話會當是溝通用 ê 語言，但毋是傳承台灣文化 ê 理想工具。⁹⁰面對「不見得一定要用台語、台灣文來表現才是新民族文學」ê 提

⁸⁷ 宋澤萊，〈台灣民族三講〉，《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88.01），頁 123。

⁸⁸ 林央敏，〈從中國文化到台灣新文化〉，《台灣人的蓮花再生》（台北：前衛，1988.08），頁 15-40。

⁸⁹ 林央敏，〈台灣新民族文學的誕生〉，《台灣人的蓮花再生》，頁 176。

⁹⁰ 林央敏，〈改造台灣文化的關節骨〉，《台灣人的蓮花再生》，頁 61-62。

問，而且林央敏也是跨華語作家 ê 背景，伊在台語文學前運動期 ê 發言，非常清楚來界定台語文學 kap 台灣文學、台灣民族文學之間 ê 關係：

對，沒錯。所以我並沒有把語言、台灣文寫作列為台灣新民族文學的主要特質，畢竟語言最主要的功能是當媒介，我們不能說台語作品就是台灣新民族文學，這個就像把剛去世不久的中國作家沈從文的鄉土小說《邊城》翻譯成台灣文，或用台灣文改寫，也不可能是台灣文學，更不可能成為台灣新民族文學。相反的，用英文寫作也可能創造出台灣新民族文學……我所以提出台灣文創作，只是希望將來能如此，這除了文化因素之外，還有表現媒介的完整性與適當性問題……⁹¹

李靜玫認為，「台灣民族文學」並非是單純為著欲干證台灣民族建國運動，無具體內容 ê 理論，伊顛倒是一種以台灣文學傳統內涵建構出來 ê，真有本土性 ê 社會寫實文學。⁹² 咱對胡民祥、宋澤萊 kap 林央敏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 kap 語文主張內底，也確實看著台語文學一開始著母是欲完全顛覆北京語，只是欲追求對應台語經過歷史自然發展，「在表現台語文化、台語社會方面，比任何語言完整、貼切和生動」⁹³，tī 台灣社會流通所形成 ê 文化場域 niā-niā。在林央敏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邏輯當中，外來 ê 北京語當然會當書寫台灣文學，但是對台灣民族文學論 ê 形構，以及台語文學前運動期 ê 主張來看，自頭到尾「沉默」ê 北京語才是上大 ê 問題，也是後來發生「台語文學論戰」ê 原因。因為這種「外來」ê 語言是透過政治優勢取得「國語」ê 合法性，透過干涉台灣本土語言對文化適切性 ê 追求來形成「共同語」，綴著「方言文學」ê 壯大，華語文學體制 ê 焦慮才會越來越深，台灣文學到尾猶是無法度避免日本時代以來，殖民地必然會出現語文鬥爭 ê 歷史宿命，發生一場在文學史上被「噤聲」ê 論爭——台語文學論戰。

三、對台語文學論戰看 1990 年代 ê 台灣文學爭論

究實，咱無法度否認黨外運動為著欲對抗戰後國民黨以北京話建構中國性 ê 威權統治，所以本土語言當中使用人口上濟 ê 「台語」、「台灣話」，真自然著變成共識動員(consensus mobilization) ê 重要媒介⁹⁴，用台語發言也等於是一種抵抗強權 ê 實踐。⁹⁵ M-koh tī 政治以外，台灣文學本土論者對文學場域當中「台語

⁹¹ 林央敏，〈台灣新民族文學補遺——台灣文學答客問〉，《台灣人的蓮花再生》，頁 210。

⁹² 李靜玫《〈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新文化〉雜誌研究（1986.6~1990.12）：以新文化運動及台語文學、政治文學論述為討論主軸》，頁 187。

⁹³ 林央敏，〈改造台灣文化的關節骨〉，《台灣人的蓮花再生》，頁 61-62。

⁹⁴ 參見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 期，1996.07，頁 183-185。

⁹⁵ 松永正義，何世雄譯，〈台灣的日語文學及台語文學〉，《中外文學》31 卷 10 期，2003.03，頁 25。

文學」正名 ê 脈絡 kap 「台灣民族文學論」內涵 ê 了解，確實非常有限。回顧戰後島內台語文學 ê 發展，無論是林宗源「方言入詩」ê 試驗引起「笠」社同人 ê 正反評論，然後慢慢摸拖出《笠》詩觀 ê 矛盾；或者是《台灣文藝》突然間出現對「鄉土文學」ê 文類成規當中走脫出來，對話完全寫實角色族語 ê 「後」鄉土文體，尤其東方白對《浪淘沙》跨越「文學內底 ê 方言」這條界線，開始追求伊 ê 「台語文學」，以及台灣筆會「雙語教育」ê 主張……等等，對這條戰後以來 ê 本土線路當中，咱必須把握著華語 kap 本土語言 ê 後殖民發展，是兩 ê 雖然有重疊，但是完全無衝突 ê 命題：外來 ê 華語為著欲寫實台灣，開始 kap 本土語言產生透濫；本土語言對殖民 kap 再殖民 ê 傷痕當中 koh 再發穎，保存族群文化。

但問題是，為啥物這兩條後殖民線路會在本土論內底發生衝突，致使「方言文學」開始批判過去所承認 ê 「國語正統性」，出現「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ê 基進(radical)性格？這 kap 「鄉土文學」所確立 ê 文類成規 kap 語言、文化位階有啥物款 ê 關係？「台語」、「台灣話」跨越戰前、後斷裂 ê 空縫來承載「台灣民族」想像 ê 歷史，又 koh 按怎 tī 台灣後解嚴、後殖民 ê 語境當中掀起風波？戰前戰後「國語」ê 惡夢，中國白話文／北京語 kap 台灣話文／台灣話在文化 kap 政治上纏繞(inn-tinn)袂清，中國意識 kap 台灣意識 ê 對立，以及台灣意識內部 ê 矛盾，總算因為政治解嚴 kap 社會解放，尤其族群意識擡頭(giáh-thâu)，koh 再因為台灣文學 ê 語言論爭，進入台灣人走揣身份 kap 民族認同 ê 戰國時代。

(一) 台語文學論戰之一：「鄉土文學」是「方言文學」？

台語文學論戰 ê 頭一聲銃，是廖咸浩原本為著《台大評論》所寫，應邀先 tī 1989 年 6 月 17 日在淡江大學所舉辦 ê 「文學與美學研討會」所發表 ê 論文〈「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與盲點的囿限〉，tī 前一日先予主辦單位送去《自立晚報》副刊刊出，內容經過刪節、錯置，篇名 hông 改做〈需要更多養分的革命——「台語文學」運動理論的盲點與囿限〉，批判台語文學來引起真大 ê 爭論。雖罔廖咸浩是轉載事件 ê 受害者，不過在引起論戰以前，伊早著寫一篇〈媽媽的話〉來替伊 ê 方言論述造橋鋪路，一系列文章欲 kap 台語文運動「對話」ê 意圖其實早著見光。〈媽媽的話〉這篇文章肯定語言是文化傳承 ê 命脈，若是一種語言成做愈濟人使用 ê 第一語，也就是「母語」(mother language)，這種語言 ê 文化傳承功能著愈強。M-koh 為著溝通 ê 需要，任何社會攏會有原本通行 ê 普通話或者是方言，經過標準化了後「升格」變做「官方語言」。所以，廖咸浩強調「官方語言」簡單容易學，是適合文化創造 ê 「工具」，但是需要「方言」來凝聚文化、維持民俗傳統，「不只要有普及易學的普通話作為文化先鋒，還要有蓬勃強韌的方言做為提供基礎與養分的文化後盾。」⁹⁶廖咸浩 ê 「工具理性」看來非常中立，

⁹⁶ 廖咸浩，〈媽媽的話〉，《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聯經，1995.10)，頁 110。

也非常巧妙透過「母語」ê 情感訴求來安置「方言」ê 社會位置，建構「國語」（官方語言）kap「方言」ê 從屬關係，但是伊這篇論述將語言 ê 雅俗歸因是語言本身 ê 機能優劣 teh 自由競爭，暫時 koh 無討論國家機器運作「語言政治」ê 問題：究竟為啥物某一種語言會當成做「官方語言」，定定在正式場合使用？某一種語言著干焦會停留在口說 ê 階段，甚至被看做是粗俗無內涵 ê 語言？更何況台灣本土語言 ê 方言位階經過戰前、後兩擺國語政策 ê 壓制？

轉來看廖咸浩正式開始伊對台語文學運動 ê 批判，引起論戰 ê 〈「台語文學」的商榷〉這篇文章。廖認為台語文學是台灣在特殊 ê 政治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之下必然會發生 ê 「文學革命」，而且是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 ê 「台灣話文論戰」 kap 戰後 1977 年「鄉土文學論戰」過後，第三擺 ê 文學改良運動。面對以北京話做基礎 ê 中華文化展現愈來愈強 ê 「中原」中心、「北方」中心，造成頂層是貧血無根 ê 普通話文化，下層是慢慢流失 ê 各地地方文化，廖咸浩肯定以「閩南語」寫作 ê 試驗「一方面固然是對於普通話文化霸權過度伸張的反彈」，但是「另一方面則更足以肯定地方文化的中樞地位，突顯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台語文學會當「使得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新文化傳統有了更周延的意義」。⁹⁷

廖咸浩對日本時代台灣話文論戰 ê 理解大概無毋著，但是伊將台灣受著五四白話文運動影響 ê 「新」文學運動、戰後 ê 鄉土文學論戰 kap 台語文學運動攏看做是欲以中華文化為中心 ê 努力，引起林央敏反駁廖咸浩是「尚持中華情節的台灣人」ê 中華本位觀點。⁹⁸後續 ê 研究者大部分攏認為這是中國意識對台灣意識 ê 壓制，呂興昌尤其指出這是受國民黨教育成長 ê 知識份子普遍 ê 史觀立場⁹⁹，不過，咱若跨越中國意識 kap 台灣意識來看這場論戰 ê 論述 kap 回應結構，著會當發見：無論台灣意識或者是台灣民族論者，只要是台灣立場，應該攏「袂同意」廖咸浩講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是欲豐富五四運動 ê 論點。但是除了台語文學論者以外，所謂「台灣意識」ê 本土論者可能攏「同意」戰後 ê 鄉土文學也是一擺台語文學運動。結果，著是台語文學必須愛 tī 台灣文學承認、內化殖民語言霸權，同意「鄉土文學」文類成規 ê 限制 kap 干擾當中，全款提出一套歷史敘事來抵抗華語文學體制 ê 攻擊 kap 收編。

廖咸浩「商榷」台語文學 ê 謬誤有兩點，頭先是台語文學繼承、深化白話文運動「言文合一」ê 盲點。伊苦心挪用 Derrida 對「聲音中心論」ê 批評，認為書寫文 kap 口說語攏是意識「存在」ê 模式，所以伊認知「台語文學」對口說語文

⁹⁷ 廖咸浩，〈「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與盲點的囿限〉，《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78。

⁹⁸ 林央敏，〈不可扭曲台語文學運動〉，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台北：前衛，1999.01），頁 100。

⁹⁹ 呂興昌，〈台語文學的邊緣戰鬥---以 1989 年台灣文學論爭為中心〉，收錄 tī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頁 291-305

字化 ê 追求，應該只是重新調整口說語（台語）kap 書寫文（華語漢字）之間 ê 邊界，否定語言必須透過文字承載才有法度保留，但是另外穩固華語獨佔書寫文「漢字」ê 地位。筆者 tī 遮欲來用頭前所提出 ê 「言文斷裂」概念，澄清廖咸浩「言文一致」ê 問題意識：台語文學運動所追求 ê 是欲突破「語言無法透過文字書面化」ê 困境，毋是一種語言 tī 已經有文字符號通好承載 ê 狀況之下，追求「口語」kap「書面語」之間 ê 「言文一致」。等於是講，無論台語、客語甚至是原住民語，逐種語言攏應該愛有家己 ê 「口語文」kap「書面語」系統，「言文一致」kap「言文斷裂」是無仝層次 ê 問題，毋是像廖咸浩攪濫袂清，用「言文一致」掩埃(am-khàm)華語統一文體 ê 正當性問題，限制台語袂當有書面語。

不過，「言文一致」究竟也只是廖咸浩 ê 障眼法，伊真正欲批判 ê 是第二項謬誤，也就是對台語文學接收台灣意識 ê 「準民族主義」產生「正統心態」或者是「霸權心態」ê 指控。¹⁰⁰經過頭前 ê 討論，咱會當看著廖咸浩其實對台語文學運動有非常嚴重 ê 誤識，伊毋但認為台灣意識 ê 提倡袂輸是「法西斯」或者是「共產國家」指導文學 ê 做法，更加認為用「台語」來界定，甚至等同「台灣文學」是 koh khah êh-kheh ê 定義方式。但是反過來講，廖咸浩就算是一 ê 對「中國」、「台灣」民族主義攏充滿戒心 ê 解構論者¹⁰¹，伊解構「準民族主義」ê 批判，著敢毋是 Hobsbawm 「所謂與語言無關的民族認同，其實是戴著獨尊一語的假面。」¹⁰²利劍批判 ê 對象？廖咸浩提出各種壓制台語文學 ê 論證，洪惟仁有一套非常精彩 ê 解破 kap 掠包，只不過廖巧妙 ê 所在是利用台灣文學 ê 內部矛盾，提出台灣意識接受殖民者語言所同意 ê 「鄉土文學」文類成規 ê 規範，來「懷柔」台語文學、混亂戰場：

以漢語方言間關係之接近，閩南語書寫文對文言文及其他漢語方言採取門戶開放政策之後，其文學文體很可能除了少數基本詞彙外，不會與近年的鄉土文學文體有太大的差距。¹⁰³

猶會記得鄉土文學論戰 ê 時，作家一直自清「鄉土文學毋是方言文學」，但是為啥物鄉土文學文體 tī 遮，會當成做「方言文學」、「台語文學」ê 替代方案？甚至在論戰當中，除了直接受著攻擊 ê 台語文學論者以外，全款是台灣立場 ê 作家並無發出外濟論述來反對廖咸浩對宋冬陽 ê 批評，以及鄉土文學文體對台語文學 ê 收編。這窮實證明「台灣意識」已經將華語文學體制所限定 ê 語際關係、透濫方言 ê 文類成規，誤認、內化做本土語言 ê 「後殖民」邏輯。

¹⁰⁰ 廖咸浩，〈「台語文學」的商榷：其理論與盲點的囿限〉，《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頁 78。

¹⁰¹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3。

¹⁰²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頁 130。

¹⁰³ 全註 100，頁 84。

另外一位予林央敏看做是中國立場 ê 對手是主張「台語寫作要不得」ê 陳若曦，但是至少 tī 這擺論戰 ê 行文當中，咱會當發見陳若曦 ê 論點 khah 濟攏是偏倚台語書面化、教育傳播等等技術性 ê 問題，並無表現 kap 廖咸浩類似 ê 中國立場以及民族主義 ê 焦慮。而且 kap 廖咸浩無全款 ê 所在是，陳若曦承認「過去台語受歧視是事實」，「外省照說各種方言，會說奉化腔的浙江話甚至還「高人一等」似的」，不過面對國民政府強逼本省人學國語 ê 歷史錯誤，伊 suah 認為「糾正歷史不必非要『負負』得正不可，貴在汲取教訓。」¹⁰⁴

研究者陳慕真認為，陳若曦這款論點基本上是受著殖民教育養成 ê 中國文化價值觀影響，所以才來內化、認同殖民統治者對本土文化 ê 詮釋 kap 貶低¹⁰⁵，但是陳若曦 ê 「工具理性」，事實上著是台灣社會 ê 大多數人接受戰後國民黨中國化 ê 國語政策，將獨尊華語、譬相方言 ê 價值觀所造成 ê 方言弱勢，顛倒因果成做反駁台語文學 ê 理由，陳慕真所認定 ê 「台灣本位」陣營其實也接近這款意見。¹⁰⁶借用施俊州 ê 話，「中國民族主義 vs. 台灣民族論往往造成文化建構論 kap 本質論 ê 理論 kuah 纏」¹⁰⁷，筆者也認為這時 kap 中國意識對立 ê 「台灣意識」，已經毋是台語文學論戰內底 ê 絕對價值。但是在民族主義 ê 表述、交疊 kap 衝突之間，佢一種觀點相對 khah 符合「台灣民族」ê 現實，以及「台灣文學」追求主體性、自主性 ê 向望，才是咱應該愛討論、掌握 ê 部份。所以，了解廖咸浩對台灣意識、台語文學 ê 「商榷」，招出台灣意識深底 ê 「鄉土文學」幽魂了後，繼落來，咱看台語文學按怎回應「鄉土文學」ê 收編，又 koh 因何引起其他本土論者 ê 反對。

(二) 台語文學論戰之二：「民族」kap「族群」ê 邊界徙動

廖咸浩 ê 批判主要引起洪惟仁、林央敏 kap 宋澤萊 ê 回應，M-koh 針對廖咸浩破題所定義 ê 「台語（閩南語）文學」，洪、林、宋三人 ê 看法其實無講非常一致。譬論洪惟仁認為廖將「台語」定義做「閩南語」是無合史實 ê 講法，澄清林宗源 ê 「台語」是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山地語 ê 「母語」概念，所以「『台語運動』者從來沒有人狹隘到認為只有閩南語才是『台語』」¹⁰⁸；但是對林央敏來講，「台語」著有廣義（北京話以外 ê 各種本土語言）kap 狹義（專指閩南語）ê 分別¹⁰⁹；宋澤萊是倚在 khah 中立 ê 立場反對林宗源將「台灣文學」定義做「台語

¹⁰⁴ 陳若曦，〈台語寫作要不得〉，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201。

¹⁰⁵ 陳慕真〈走向台灣民族的文學革命——論八、九〇年代的台語文學論爭〉，《台灣文學評論》6 卷 1 期，2006.01，頁 149。

¹⁰⁶ 陳政彥，〈台語文學論戰重探—過程與意義的再思考〉，收錄 tī 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台灣語言學系主辦「第五屆台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會議」研討會論文集，2008.11.23，頁 8。

¹⁰⁷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47。

¹⁰⁸ 洪惟仁，〈一篇台語文學評論的盲點與圍限——評廖文《台語文學的商榷》〉，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92。

¹⁰⁹ 林央敏，〈不可扭曲台語文學運動〉，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99。

文學」ê「唯有說」，但是伊也無同意廖咸浩 ê「悲觀」。¹¹⁰為啥物洪惟仁、林央敏 kap 宋澤萊會對廖咸浩 ê「台語」提法有無全款 ê 定義 kap 修正？或者是 in 所講 ê 其實是全一件代誌？三人 ê 講法在這場回應中國意識 ê 論戰內底，按怎勾出第二波針對台灣意識內部矛盾 ê 論爭？值得咱 koh 詳細討論。

關係著「台語」、「台灣話」ê 政治敏感 kap 實質指稱，台灣文化、文學界在台語文學論戰爆發進前，其實當 teh 對「這種稱呼」ê 內涵，以及「這種語言」ê 名稱產生共識。親像《台灣文藝》對 107 期開始開設「台語文學」專欄，刊登 ê 作品包括 Ho-lo 話、客家語 ê 文學作品 kap 論述；趙天儀寫在 115 期 ê 卷頭語〈台語文學的出發〉，是按呢界定「台語」：

以台灣目前日常語言的範圍來說，有原住民各族的語言、鶴佬話（河洛話、閩南語）、客家話以及北京話四大系統。北京話是官話，也就是所謂的國語。而台灣話通常以鶴佬話為代表。因此，台語文學便以鶴佬話來寫作的較多，不過，不前也有逐漸地嘗試使用客家話來寫做的詩人或作家了。¹¹¹

《台灣文藝》ê「台語」專欄 kap 趙天儀 ê 解說，是就事實來呈現 Ho-lo 話在「台語」文學運動當中 ê 代表性 kap 參與程度，不過並無完全束縛(sok-pák)「台」ê 意涵。林宗源回應廖咸浩 ê 指控，也講「我提倡用母語來創作咱的文學，咱的母語也會使講是台語，台語包括閩客、原住民的語言，所以我講用台語寫的才會當算做台灣文學。」¹¹²所以對林宗源來講，「台語」其實 kap「台灣文學」這 ê 名稱全款，也是一 ê 透過各「本土語族」各自表述來產生意義 ê 曖昧集合，主要 ê 目的是欲 kap「外來」ê 北京話有所區別，本土語言之間並無需要畫撥出清楚 ê 界線，「台語」在 Ho-lo 語族 ê 語境當中，又 koh 會使經由 khah êh-kheh ê 意義來保持伊 ê 主體性，算講是一種大家心肝內互相知影，交付各本土語族宣稱來形構「台(灣)認同」ê 權宜做法。

洪惟仁對語言學 ê 立場出發，khah 強調「族群政治」ê 思考，甚至認為「台灣民族」其實是虛幻 ê 觀念，Ho-lo 族、客家族、原住民族、戰後來台灣 ê 外省族群之間，猶未形成具體 ê「台灣民族」意識。¹¹³所以，面對 Ho-lo 話予國民黨貶做「方言」、「閩南語」，以及「台灣話」按怎重新定義 ê 問題，伊 ê 看法是：

我以為對外可以把台灣鶴佬話稱為「台灣話」，但對內，為了表示對少數

¹¹⁰ 宋澤萊，〈何必悲觀－評廖咸浩的台語文學觀〉，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11。

¹¹¹ 趙天儀，〈台語文學的出發〉，《台灣文藝》115 期，1989.01-02，頁 4-5。

¹¹² 林宗源，〈詩創作的意識及藝術性的表現〉，1989.08.06-07，收錄 tī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頁 52。

¹¹³ 洪惟仁，〈台灣話就是國語？〉，《台灣語言危機》，頁 159。

民族的尊重，就應該避免這種狹義的稱呼，廣義地把客家話、山地話包括在「台灣話」的意義之內，甚至把外省人的「台北國語」也包括在內。¹¹⁴

洪惟仁提出廣／狹義、對內／外 ê 寸尺，致重按怎維持「台灣話」指稱 ê 平衡，將 Ho-lo 話、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 ê 本土語言對低位 e「方言」位置擡懸(giáh-kuân)，koh 降低「國語」ê 位階，平在「語言」ê 層次頂面討論台灣文學 ê 語言問題。

但是，為著欲對抗廖咸浩對中國五四白話文傳統以降接合鄉土文學文體 ê 文學史敘事，另外一位身兼台語文學作家、理論者、民族運動者，同時也會當講是穿貫(tshng-kuân)論戰三擺高峰 ê 主要參與者林央敏，tī 頭先「台灣民族文學論」ê 基礎頂面，開始重新梳捋並且接合 1930 年代 kap 1980 年代 ê 台語文學運動，來抵抗廖咸浩 ê 收編。Kap 廖咸浩將戰後鄉土文學論戰算做是台語文學「第二擺」ê 文學改良運動無全，林央敏認為頭一擺台語文學運動是在 1930 年代發生，但是第二擺運動 suah 是發生 tī 1980 年代，間接否定廖咸浩版本 ê 「台語文學史」，並且指出戰前台灣話文 kap 戰後台語文學運動 ê 台灣立場：

不管是三〇年代或八〇年代的台語文學運動，都不是為發揚中國文化而努力的，那些主張用台語白話文寫作並積極參與耕耘的人，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不把台語文學放在中華文化的旗幟下，不僅如此，還進一步要為建立非中國文化體系的台灣文化而努力。¹¹⁵

在頂面 ê 文脈當中，林央敏所召喚 ê 歷史符碼，當然是日本時代喝(huah)出「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鼓吹台灣作家應該用台灣語創作台灣文學 ê 黃石輝、郭秋生等人 ê 「遺產」。M-koh，林央敏這款提法，除了小可閃避台灣話文本身對「漢文化」ê 認同以外，當時這波看來非常整齊，甚至超越新舊文學分野 ê 「台灣話」民族主義，敢有一寡過去無解決 ê 理論破空(phuà-khang)會來 tī 1980 年代 ê 台灣現實當中崩盤？Tī 遮，咱有需要 koh 再回顧台灣話文反對者針對黃石輝「一地方有一地方的話，所以要鄉土文學」ê 幾種議論：

台灣的話有好幾種，如廣東人的廣東話、福建人的泉州人及漳州人、福州話……等等，……倘若採用這二州的話來做單位，那麼他省他縣的人就不能懂了。¹¹⁶

台灣可以分做中、南、北部而散在中部的所謂廣東人（客人），他們所說

¹¹⁴ 洪惟仁，〈台灣話就是國語？〉，《台灣語言危機》，頁 158。

¹¹⁵ 林央敏，〈不可扭曲台語文學運動〉，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00-101。

¹¹⁶ 克夫，〈「鄉土文學」的檢討——讀黃石輝君的高論〉，收錄於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77。

的話和南北部所說的話就有天地之別了！¹¹⁷

對林克夫 kap 朱點人 ê 意見看來，in 兩人攏將「地方」ê 指涉轉化做中國、台灣「對內」，一種倚近「族群」、「族語」層次 ê 意義（也就是越峰所講 ê 「族派文學」¹¹⁸），kap 黃石輝所致重 ê 定義：台灣「對外」是相對中國 kap 日本 ê 「地方」概念，已經是兩種無全層次 ê 論題，所以林克夫、朱點人 ê 「地方」提問一開始並無引起黃石輝 ê 正面回應。同時，像黃純青、郭秋生所討論 ê 「台灣話改造論」，也確實是將 Ho-lo 話當做是「台灣人的標準語」teh 思考¹¹⁹，也因為按呢，莊垂勝在論戰中期，才會就「台灣話文」ê 指稱可能無啥圓滿 ê 掛慮提出伊 ê 意見：

對客話問題，客話與福老話用漢字寫出來，兩者的慣用字面和語法相差多少？有無融化的可能？萬一不能融化，可否單以漳泉土話白話文，標榜「台灣話文」的名稱？現在福老話差不多可以說是台灣的普通話，然而客話是否可以置於方言地位？——如閩粵方言之於中國國語文，客人同胞對這一層有甚麼意見，這是必須領教的。¹²⁰

事實上，這時陣反對方提出客家話敢是一種多元族群 ê 主體意識來覺醒，這點是需要斟酌 ê。因為在遮 ê 「客家」實際上並毋是主張使用客家話，顛倒是中國意識論者欲反對台灣話文，但是 suah 接受中國白話文 ê 假議題。另外，黃石輝也並毋是無顧慮台灣「地方」ê 「族群」問題，伊討論言文一致 ê 時陣，總是也有思考著欲按怎透過「漢字」予中國人、Ho-lo 人 kap 客家人攏會當通達。¹²¹只不過在論戰過程當中，因為「台灣話」ê 內涵不斷在「台灣標準語」kap 「Ho-lo 話」ê 邊界之間 teh 徙動，漳泉語為主 ê Ho-lo 話是毋是會當「代表」台灣標準語，更加是台灣話文支持者無法度閃避 ê 質問。所以，面對問題意識 ê 混亂 kap 論戰 ê 情緒焦慮，黃石輝 ê 論述策略可能著無講非常嬌氣(suí-khui)：

這麼說來，我們把福老話來做台灣話（漳泉語），好像對客人兄弟很不住，但是這亦就是像先生所說的「不得已」罷了。尚且客人不通福老話的，亦很少數，就像貴莊裡吧，除了先生之外，恐怕都是會曉得福老話的了。總而言之，漳泉語已漸有統一台灣的趨勢（也許是交通發達的所致），我們

¹¹⁷ 點人，〈檢討「再談鄉土文學」〉，收錄 ũ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82。

¹¹⁸ 越峰，〈對「建設台灣鄉土文學的形式的芻議」的異議〉，收錄 ũ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335。

¹¹⁹ 郭秋生，〈讀黃純青先生的〈台灣話改造論〉〉，收錄 ũ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62。

¹²⁰ 負人，〈台灣話文雜駁〉，收錄 ũ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197。

¹²¹ 黃石輝，〈言文一致的零星問題〉，收錄 ũ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279。

如果實行了台灣話的文學，對於台灣話的統一上，還有促進的作用啦！這樣你還在說什麼海陸豐、饒平……的理由嗎？這還算得是理論嗎？¹²²

對黃石輝、郭秋生，甚至台灣多數人來講，Ho-lo 話成做日本時代台灣 ê 「普通話」是一項既然 ê 事實，這也是台灣話文運動以 Ho-lo 話為主 ê 社會基礎。M-koh 無法度否認，Ho-lo 話一時之間欲 tī 中國 kap 日本之間，以及台灣本身多族多語 ê 社會情境當中成做「民族語言」、走揣「台灣民族」ê 主體性，確實有一寡礙虐 (gāi-giòh) ê 「負債」，使得「台」語這項民族「遺產」來到戰後台語文學論戰 ê 脈絡當中，顛倒引起本土論者之間「繼承權」ê 爭論。

Koh 轉來台語文學論戰，廖咸浩主要欲「商榷」ê 對象是狹義 ê 「台語（閩南語）文學」，也就是講，戰後「方言文學」以來 ê 語文爭論，主要是 Ho-lo 語族 teh 承受華語文學體制 kap 文學史敘事 ê 攻擊 kap 收編¹²³，但是 Ho-lo 語族一方面愛避免壟斷「台語」ê 詮釋權，一方面 koh 愛擔負「台語」ê 廣義論述責任，使得這場論戰真正 ê 「受害者」毋但無法度出聲，而且否定「台灣話」ê 歷史經驗，也等於是 Ho-lo 話 ê 歷史 kap 主體性 ê 失喪，無法度抵抗華語文學體制 ê 收編。在這 ê 情形下，林央敏為欲挑戰「台灣文學」實際上是「台灣華語文學」ê 同義詞，伊才會提出「以多代全」ê 邏輯，想欲維持 Ho-lo 話在歷史上稱做狹義「台語」ê 主體性 kap 能動性，同時 koh 兼顧其他語族 kap 廣義「台語」之間 ê 連結。對遮看來，林央敏講「『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這種主張是正確的，而且無論「台語」這箇詞所指的意思是廣義或是狹義，仍然是正確的。」¹²⁴其實有伊 ê 道理在得。

只不過，林央敏 ê 主張隨時引起客家籍作家李喬、彭瑞金 kap 鍾肇政 koh khah 強烈 ê 反對，掀起台語文學論戰第二波 ê 討論。李喬首先反對無論廣義狹義攆排除「北京話」ê 「台語」，因為「『不幸』得很，它（北京語、福佬話、客家語）是同一個語系的東西……你埋葬了北京語，並未能因而切掉那有害的『伊底沃羅基』的『癌細胞』」用漢文化 teh 維護殖民者 ê 原生本質論在遮 koh 再版一回，伊也反對 Ho-lo 話獨佔頂位階 ê 「台灣話」，最後當然反駁「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ê 講法，堅持「台灣文學」是倚在台灣人立場，寫台灣人經驗 ê 作品便是，不過李喬其實同意台灣各語系 ê 母語創作，只是「不宜排斥其他，或擅作正統、螟蛉的歧視主張」¹²⁵；彭瑞金以客家文學做例，認為「如果有人以客語文學作為客家

¹²² 黃石輝，〈所謂「運動狂」的喊聲——給春榮克夫二先生〉，收錄 tī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407。

¹²³ 像林宗源所講：「今日母語的問題，不再是閩南語的問題，而是台灣話（指河洛語系）的問題。」，〈方言與詩〉，《笠》123 期，1984.10，頁 21。

¹²⁴ 林央敏，〈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56。

¹²⁵ 李喬，〈寬廣的語言大道〉，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61-167。

文學的振興指標，無異為客家文學自掘墳墓。」¹²⁶強調語言文字只是工具性 ê 問題，傷過強調文字化，或者是意圖欲區別語族，對台灣文學 ê 發展並無幫贊，甚至是一種拖累。¹²⁷鍾肇政 ê 意見 kap 李、彭類似，但是三位客家籍 ê 作家在技術上，其實攏無轉去討論一開始廖咸浩「商榷」Ho-lo 話 ê 因端，也無掌握著戰後台語文運動原本只是欲爭取書寫正當性 ê 前脈絡，所以 tī 論戰過程當中，才會誤認 Ho-lo 語族接合戰前、後歷史來繼承「台」語 ê 民族想像，是欲取代、排斥包括北京語在內 ê 其他語族 ê 霸權，無顧慮著 Ho-lo 語族一開始受著華語文學體制特別強烈、針對 ê 收編 kap 壓制。

鄉土文學 ê 文類成規予人看做是兼顧母語／族語／本土語言 kap 共同語 ê 替代方案，但實際上並無去除語言之間 ê 殖民關係，無將華語 kap 台語，以及其他本土語言看做是「語言」kap「語言」ê 平準地位，維護華語 ê 權力配置 kap 論述構成 ê 華語拜物論述¹²⁸，結果華語 kap 本土語言個別 ê 後殖民線路，suah 因為鄉土文學 ê 收編 kap 干擾，無法度無意識著華語 kap 本土語言 ê 發展之間原本著無互相衝突 ê 事實，甚至發生衝突。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ê 民族想像隱隱存在 ê 空喙(khang-tshui)，也因為 kap 戰後族群主體意識之間無法度完全重合，在「民族」ê 身影 kap「族群」ê 界線不斷伸縮、徙動 ê 振動之間，「台語」、「台灣話」無法度召喚抵抗 tī 殖民統治之下，台灣追求主體性、自主性 ê 歷史經驗 kap 積極意義，「負債」大過「遺產」。只不過筆者最後想欲以問代論 ê 觀念是：否定「台語」在歷史過程中自然指涉 Ho-lo 話 ê 現實，到底是一種多元中心／無中心 ê 實踐？抑是無自覺也同意，甚至陷落國民黨將「台語」改作「閩南語」ê 中國化史觀當中？¹²⁹

論真來講，歷史重演 ê 台語文學論戰又 koh 是一擺文學史 ê 懸案，而且比戰前 ê 台灣話文論戰 koh khah 容易 tī 台灣文學史頂面 hông 抹消(erasure)，但是若將眼界放予 khah 闊，時間摸予 khah 長來看，台語文學論戰 ê 意義究竟毋是台語文學 ê 困境 niā-niā。因為在 1990 年代 ê 後殖民語境當中，台灣文學 ê 語言問題窮實是台灣人走揣身份認同 ê 線頭，華語 kap 本土語言 ê 語際關係繼續暗示中國立場 kap 台灣立場 ê 史觀差異。台灣文學 kap 台語文學 ê 定義問題，猶原暴現 tī 反本土論 ê 挑戰 kap 後殖民情境 ê 文史論戰當中，並無因為台語文學論戰在文學史上 hông「噤聲」了後著無 koh 陣疼。在這 ê 脈絡之下，台語文學運動 kap 論戰 ê 台灣民族論述，對後來 ê 文學、歷史論戰來講，著有非常重要 ê 先行意義。

(三) 真正 ê 對敵是 siáng? ——反本土論 ê 挑戰 kap「台灣意識」ê 矛盾

¹²⁶ 彭瑞金，〈請勿點燃語言炸彈〉，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70。

¹²⁷ 彭瑞金，〈語、文、文學〉，收錄 t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頁 172-175。

¹²⁸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60。

¹²⁹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6.10)，頁 30。

無論是支持抑是反對，台語文學論戰攏會當講是「台灣意識」上強 ê 共同表述，1990 年代 ê 台灣現實 kap 愈來愈顯頭 ê 「台灣民族主義」，同時也予中國意識 ê 反本土論感受著壓力，欲來 kap 包括台語文學在內 ê 本土論「對話」。比如早著開始批評台灣意識 ê 呂正惠，採取 kap 廖咸浩差不多 ê 跛步手路，攏承認白話文運動並無達到「言文一致」ê 欠點，因為：

只要想像一下，閩南人只講閩南話、只寫閩南話，客家人只講客家話、只寫客家話，廣東人只講廣東話、只寫廣東話，就可以知道，這樣的「中國」不可能還是「一個」國家，而是分裂成好「幾個」國家。而且，也不再有所謂的「中華文化」，而會變成「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廣東文化」等等。這樣的方式完全違反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和文化的重「統一」的發展模式。¹³⁰

對呂正惠來講，「官話」、「書同文」是「中華文化」ê 「統一」傳統，但是伊強調普通話透過方言來成長、擴大，方言經過普通話來吸收「中心文明」，兩者之間是「互相交往」ê 辯證關係，這其實又 koh 是鄉土文學文體對本土語言 ê 功能區別 kap 場域畫撥。不過，呂正惠認為台灣無了解中國 ê 「五四」理念，是因為國民黨為著欲建構「反共」ê 意識形態，完全禁絕「非法」ê 「方言」來防止台灣人產生「本土意識」ê 政治態度，所以「台語文學」才會來出現。¹³¹

呂正惠 ê 觀點就去殖民 ê 角度來看，甚至比部份本土論觀點 koh khah 同理台語文學 ê 運動情緒，但是伊講台語文學作家應用普通話有相當 ê 困難，不免是對台語文學理論者 kap 作家濟濟攏是跨華語過來 ê 事實無知所致，甚至因為「在漢文化的範圍內，講任何地方話的人都是透過學習官話（或雅言）去獲取知識，並以官話來思考、來表達的。」¹³²所以台語文學確實無法度脫離漢族使用官話、追求統一 ê 「宿命」。比起黃石輝、林央敏論證「台灣話」ê 社會 kap 歷史基礎，這欸粗魯 ê 漢文化、漢語本質論並無 khah 合理、周至，但是咱在台灣文學 ê 本土論當中，suah 處處看著挪用這欸論述來處理語言問題 ê 影跡，tī 遮著無 koh 再一一舉證。過後，呂正惠全欸將眼界徒轉去台語文學運動 ê 歷史源頭，評議 ê 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主張 1930 年代台灣話文論者 ê 意識形態，kap 1980 年代台灣文學論者建立「自主性」ê 目標無全。伊認為，台灣因為中日戰爭戰敗割予日本，加上日本殖民 ê 語文干預，台灣知識份子才無法度掌握中國白話文。為著欲保存族群 ê 特色，又 koh 無愛 kap 漢文化完全斷絕，「台灣話文」suah 成做殖民地台灣不得不 ê 選擇。呂正惠 koh 提出當時台灣話文論者 kap 反對者攏全欸有「中

¹³⁰ 呂正惠，〈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方言和普通話的辯證關係〉，《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5.07），頁 70。

¹³¹ 全頂註，頁 110-116。

¹³² 全頂註，頁 118。

國意識」，提醒其他論者毋通「以今律古」，「把被動的『不得不』的行為，說成是主動的、有意識的行動，這不能不說是把歷史加以扭曲了。」¹³³

究實，「漢文化」對當時ê台灣人來講確實是一種認同ê符碼，m̄-koh 呂正惠ê講法忽略台灣作家發動台灣話文ê真正訴求，是欲追求中國白話文 kap 台灣文化之間ê適切性問題，並毋是 in 無法度掌握中國白話文ê書面語，才來選擇台灣話文。日本時代ê台灣話文運動並無欲完全脫離中國文學是真確ê，因為彼當陣上大ê敵人是日本，中國文學是台灣文學主體性來源ê一部分，對五四白話文運動ê接受、拒絕 kap 協商也是自由ê；不過戰後受著國民黨ê中國化政策影響，中國文學ê傳統 suah 成做台灣文學ê支配者，台灣文學失去自由選擇ê主體性。對遮看來，「自主性」ê問題，以及中國文學 kap 台灣文學ê關係轉化，是呂正惠無願意承認ê盲點所在。

繼落來，有幾場關係著統獨 kap 後殖民情境ê「對話」會當 koh khah 詳細呈現台灣（華語）文學體制ê矛盾。親像馬森面對中國意識 kap 台灣意識ê歧路，認為台灣意識針對外省人ê排他性是一種政治化ê結果，必須愛就文學論文學。不過，無論是鍾肇政、楊逵、鍾理和等等使用華語寫作ê台灣作家，抑是上「離經叛道」ê台語文學，全部攏予馬森ê「右翼中國」反本土論述，收編入去「中華民國法統」ê中國文學系譜當中¹³⁴，因為：

如果用語言與文字來界定小說的屬性，可以說：凡是用中文寫成的小說，都是「中國小說」。那麼「台語小說」，如果用的不是羅馬字，而是中文，可歸入「中國小說」中的「方言小說」一類。¹³⁵

面對馬森先自清一種去政治ê立場批判本土論，才 koh 利用文學、文化，甚至語言 kap 文字條件來接載中國意識 kap 政治立場ê論法，彭瑞金強力反駁：

台灣文學裡，除了漢文寫的，還有日文寫的，現在更有福佬語、客語、泰雅語、雅美語……寫的作品，「文學決定論者」即使把日文文學從台灣文學裡面分割出去，又有什麼藉口去排斥福佬語、客語……的台灣文學呢？這裡，似乎更突顯了堅持以自己的族語創作的作家們的先見之明了，他們好像早已料到持馬森這樣的論調的人要把他們的作品以使用漢語的理由歸化為中國文學而拒絕使用漢語。¹³⁶

¹³³ 呂正惠，〈日據時代「台灣話文」運動平議〉，收錄 ti 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東大，1995.11），頁 11-25。

¹³⁴ 游勝冠，〈國家認同與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收錄 ti 施正峰主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11），頁 481-482。

¹³⁵ 馬森，〈「台灣文學」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以小說為例〉，《聯合文學》89 期，1992.03，頁 188。

¹³⁶ 彭瑞金，〈台灣文學定位的過去和未來〉，《文學台灣》9 期，1994.01，頁 107。

Ti 遮，咱看著彭瑞金在中國意識 ê 迫倚之下承認本土語言 ê 存在，講堅持用族語創作 ê 作家有「先見之明」，也等於是間接肯定頭先台語文學論戰 ê 意義。只不過，這段話 kap 彭瑞金頭先回應馬森所講：「包括一些花盡吃奶的力氣在推動『母語文學』的本土文學論者在內，都掉入了語文說的陷阱。」¹³⁷又 koh 互相矛盾，值得「商榷」：陷落「語文說」陷阱 ê 人，到底是反對中國意識收編，也反對台灣意識內化國民黨中國民族主義壓迫本土語文 ê 台語文學論者？抑是 kap 馬森全款挪用漢文化來穩固殖民者語言，抹消母語文學 ê 本土論者？

另外，邱貴芬 kap 廖朝陽 ê 後殖民對話，也牽涉著華語 kap 本土語言之間 ê 宰制關係猶未消除 ê 問題。邱貴芬「進口」後殖民理論來反對提倡「回歸殖民前文化」ê「抵殖民(de-colonization)文化運動者」(請台語文學來「對號入座」)，伊認為若準台灣史是一部被殖民史，台灣 ê 文化著是在無仝文化對立、妥協、再生 ê 過程中演進出來 ê「跨文化」，所以並無存在一種「純」鄉土、「純」台灣本土 ê 文化。所以邱貴芬舉王禎和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ê 多語表現做例，認為這種透濫已經將國語變 kah 無純正，國語也因為按呢失去權威，過去予國語所壓迫 ê 語言也會當得著解放，形成「抵中心」(de-centering) ê 局面。¹³⁸但是廖朝陽認為，若是小說 ê 多語現象本身已經呈現語言 ê 解放，那按呢何需 koh 再強調多語 ê 使用是一種抵抗？更何況王禎和 ê 小說語言猶是以北京話為主，「我們不能因此就說，台灣的閩南語與北京話已經不具被閩南話與北京話的本質，變成另一種混血的「台灣語」。台灣文化的跨文化特質是「鎔鑄」還是拼湊，恐怕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¹³⁹

事實上，面對廖朝陽 ê 反問，邱貴芬 ê 後殖民操演確實點出「台灣抵殖民運動者要抵抗的不是北京話，而是北京話的權威性」¹⁴⁰ ê 重點，伊對台語文學論戰當中欲取代「北京話」權威、成做「國語」ê 過激論點有可能再一次複製「中國思考」ê 危機，也算是提出苦勸(khóo-khng)，m̄-koh 在邱貴芬搬演真濟後殖民理論對語言問題 ê 討論，認為抗爭團體攏已經傾向「為抗爭而妥協，借用壓迫團體的語言做為抗爭訴求工具」¹⁴¹ ê 論述內底，咱看出邱貴芬可能無考量著台語 tī 台灣社會當中會當講是「準共同語」ê 現實，猶未到完全衰微 ê 時陣，西方文化調和 ê 語境條件對台灣來講無一定合軀(háh-su)，也無看著對台語文學運動 ê 全盤梳捋，無把握著台語文運動爭論 ê 情境 kap 台語文學論者對「台」語 ê 複雜定義，結果著是誤判出「福佬話＝台灣話＝台灣人講台灣話」ê「倒因為果」邏輯，是

¹³⁷ 彭瑞金，〈當前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化——兼論有關台灣文學的一些異說〉，《文學台灣》4 期，1992.09，頁 28。

¹³⁸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 卷 2 期，1992.07，頁 151-167。

¹³⁹ 邱貴芬，〈「咱攏是台灣人」——答廖朝陽有關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問題〉，《中外文學》21 卷 3 期，1992.08，頁 45。

¹⁴⁰ 全頂註，頁 36。

¹⁴¹ 全頂註，《中外文學》21 卷 3 期，1992.08，頁 32。

殖民壓迫 ê 再次複製，所以也無法度回應廖朝陽 ê 提問：「為抗爭而妥協，是抗爭到什麼程度才不會引起對方倒彈？是妥協到什麼程度才未熟等於投降？」¹⁴²

邱貴芬承認伊 ê 論述有「淡化了殖民歷史情境裡語言和文化的殖民暴力問題」ê 缺失¹⁴³，tī 融合 kap 抗爭之間，也留下這項猶未揣著解答 ê 問題，但是若借用廖朝陽 ê 話句來 kap 邱貴芬對話，筆者認為台語文學正是對 Ho-lo 話到客家語、原住民語等等本土語言出發，追求各別 ê 「自體」來定義「台灣文學」ê 運動，有「自體」才有法度「複化」、雜入包括華語在內 ê 「異質」，走揣一條共生跨文化特質 ê 出路¹⁴⁴，按呢才符合台灣文學追求「主體性」、「自主性」ê 精神。

最後，是陳芳明提出後殖民史觀 ê 台灣文學史，引起一場 kap 陳映真 ê 世紀論戰。陳映真借 Karl Heinrich Marx ê 歷史唯物論 kap 社會性質論，批評陳芳明濫用「殖民」來解說台灣 ê 歷史經驗 kap 社會現實，主張台灣有 kap 中國相接 ê 經濟模式 kap 封建性格，自日本時代到戰後，台灣文學 ê 發展也一直 kap 中國左翼思潮有非常密切 ê 關係，所以對陳映真來講，1980 年代暴穎 ê 「台灣意識」根本著是主張 kap 中國文學割離 ê 「台獨文學」意識形態。¹⁴⁵但是陳芳明否定陳映真純就經濟層面，忽略政治 kap 文化現實 ê 論法，國語政策尤其是檢證殖民統治 ê 一項標準：

僅就文化的層面來看，台灣新文學運動者自始就是以日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三種語言從事文學創作。其中除了白話文是受中國五四運動的影響之外，日文書寫與台灣話文書寫都與中國社會有了極大的隔閡。¹⁴⁶

日本殖民者對台灣社會內部的語言文化進行高度壓制與排斥，特別在太平洋戰爭期間，思想統制與語言控制更是加倍嚴厲。但是，國民政府來台後，不僅繼承這種荒謬的國語政策，甚至還予以系統化、制度化。¹⁴⁷

包括語文問題在內，戰後國民黨所施行 ê 經濟政策、社會制度 kap 強制性 ê 民族教育，攏是陳芳明融合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kap Said《東方主義》提出「再

¹⁴² 廖朝陽，〈是四不像，還是虎豹獅象？——再與邱貴芬談台灣文化〉，《中外文學》21 卷 3 期，1992.08，頁 50。

¹⁴³ 邱貴芬，〈「後殖民」的台灣演繹〉，《後殖民及其外》，頁 266-267。

¹⁴⁴ 廖朝陽，〈是四不像，還是虎豹獅象？——再與邱貴芬談台灣文化〉，《中外文學》21 卷 3 期，1992.08，頁 57。

¹⁴⁵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89 期，2000.07，頁 138-160。

¹⁴⁶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190 期，2000.08，頁 59。

¹⁴⁷ 全頂註，頁 61。

殖民」ê 憑準。¹⁴⁸只是陳映真認為，陳芳明將日本時代 ê 台灣文學講做是多語言文學，目的是欲對立「中國的／白話文」kap「台灣的／台灣話語」，證成台灣是 kap 中國分離 ê 獨立國家，伊也無認同台灣作家使用台灣話文寫作 ê 歷史：

日據時代基本不存在完全以「台灣話文書寫」的文學創作。這是因為作為中國中古漢語和中國方言的閩南語，一直沒有獨自的表記符號，至少沒有可以流暢、優美地成為文學作品的閩南語表記符號。¹⁴⁹

陳映真 ê 看法，當然無符合台灣話文確實有作品 ê 現實，陳芳明也反控陳映真是「印象派」ê 閱讀方式，凡是看著漢文（精確來講是「漢字」）著判定是（中國）白話文，既然是中國白話文著一定是中國文學 ê 影響。¹⁵⁰事實上，早在「中外文學論戰」當中，陳昭瑛著用 kap 陳映真無仝 ê 提法來解構台灣話文：「很明顯的，在主張台灣語文的先生們心中，台灣語事實上指閩南語，客語不包括在內，更不論原住民語言了。」利便伊用「漢民族意識」來切入。¹⁵¹只不過 ti 遮欲強調 ê 重點是，既然對陳芳明 ê 後殖民文學史觀來講，台灣話文 ê 實踐是台灣在殖民統治之下追求文化主體性 kap 自主性 ê 證據（猶未出土 ê 白話字文學更加是台語語族文化實存 ê 旁證），那按呢，目前台灣文學史普遍承認日治時期台灣話文 ê 歷史，結果 suah 否認、拭抹戰後台語文學運動發展 ê 論述，敢毋是後殖民史觀 ê 斷裂 kap 矛盾？

後殖民文學、文化理論關懷「自殖民行動(colonization)開始到今，所有予帝國化過程(imperial process)影響 ê 文化」¹⁵²面對帝國主義 ê 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按怎取代殖民地 ê 文化主體，進一步起造被殖民者國族認同 ê 問題，Frantz Fanon 著非常致重被殖民者 ê 語言使用，伊認為殖民者 ê 語言會割斷被殖民者 kap 當地文化 ê 牽連，最後對殖民母國 ê 文化產生認同感：

所有被殖民者——換句話說，所有因為當地文化的原初性被埋葬而產生自卑情結的人——都得面對開化者國家的語言，也就是母國的文化。隨著學習母國文化價值，被殖民者將更加遠離他的叢林。當他拒絕他的黑，拒絕

¹⁴⁸ 陳芳明後殖民史觀所承繼 ê 思想系譜，參考藍士博，〈隱蔽的系譜－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幾個側面觀察（一）〉，《極光》電子報 288 期，2012.02.14，網址：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8937852.html#6>，使用日期：2012.11.17。

¹⁴⁹ 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91 期，2000.09，頁 145。

¹⁵⁰ 陳芳明，〈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192 期，2000.10，頁 173。

¹⁵¹ 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23 卷 9 期，1995.02，頁 15。

¹⁵²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頁 1-2。

他的叢林，他會更加的白。¹⁵³

在殖民地 àu-kha 法語(petit-nègre) kap 正統法語之間，Fanon 指出法國 ê 烏人已經開始警相、失喪 in ê 鄉土語言，並且想欲成做歐洲人 ê 異化過程。面對這款異化（無論是強迫烏人講 àu-kha 法語或者是將透濫 ê Creole 語放袂記），Fanon 認為烏人攏愛對遮 ê 定義行為展開反抗(réaction)，追求烏人 ê 「去異化」，才會當脫離被殖民 ê 狀態。¹⁵⁴

另外一位出名 ê 後殖民論者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是關心被殖民 ê 從屬階級／賤民(subaltern)，按怎臣服 tī 殖民者，以及 kap 殖民者勾結 ê 本土政治勢力，甚至這寡代表從屬階級講話，但是予 in 永遠喪失主體 ê 本土文化菁英。Spivak 認為從屬階級毋是袂當說話，是因為 in 使用「有歷史 ê 語言」¹⁵⁵——「母語」來發聲，菁英階級無法度理解從屬階級 ê 意識，所以從屬階級全款無法度表達 in ê 意見。¹⁵⁶也因為按呢，Spivak 認為第三世界國家攏應該用「本土語言」來表述，行向中心，並且 kap 主流話語之間形成對等位階，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ê 基礎頂面，才會當予少數者話語(minority discourse)成做多語眾聲 ê 一部份，從屬階級才有法度「講話」。¹⁵⁷

台灣文學場域挪／誤用後殖民理論開展論戰，雖然有較積極面對台灣 ê 殖民經驗，但是其中上大 ê 問題，著是用殖民語言 ê 透濫來消磨本土語言保留 ê 正當性，來形成一種「工具理性」、「功利主義」ê 價值觀。就「台灣語言」ê 角度來講，華語當然會當成做共同語 ê 選項，華語也會當 kap 台灣本土語言透濫，不過華語文學體制 ê 壓迫 kap 無公平 ê 資本分配原在，tī 台灣本土語言長期所受著 ê 壓迫無解放，展出反抗 ê 姿態 kap 外來語「華語」對立 ê 過程當中，後殖民史觀無意識著「華語文學」kap「母語文學」雖然是兩 ê 部份相疊，但事實上根本無衝突 ê 命題。結果，後殖民成做一種維護工具理性 ê 工具，顛倒延續殖民、再殖民體制對本土語言 ê 抹消 kap 禁制。到今，台語、客語、原住民語 ê 本土教育 kap 文學書寫猶原受著質疑、忽略，台灣歷史、語言 kap 文化 ê 後殖民，窮實 koh 有一段真長 ê 路愛行。

第三節 對噤聲到發聲：台語文學史論 ê 建構

¹⁵³ Frantz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7.02），頁 89。

¹⁵⁴ 全頂註，頁 108-109。

¹⁵⁵ “A mother-tongue is a language with histor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頁 69。參考陳淑華，〈台灣鄉土語言政策沿革的後殖民展望〉，《教育學誌》21 期，2009.05，頁 61。

¹⁵⁶ Landry, D., & Maclean, G. *The Spivak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頁 5。全頂註。

¹⁵⁷ 全頂註，頁 62。

最後，咱在前先 ê 梳捋基礎頂面，欲來回應本研究所致重 ê 問題：若準講用「語言」界定台灣文學，甚至證成民族認同 ê 「台語文學」，是經過殖民、再殖民 ê 扭曲經驗，tī 一種不得不承認，並且無法度反抗殖民語言 ê 邏輯基礎當中所 gàn 出來 ê 「台灣意識」ê 鏡像，台語文學運動所欲追求 ê 語際關係，到底有啥物款 ê 「民族想像」在得，是值得全台灣文學作家、研究者深深思考 ê 價值 kap 反思？經過激烈 ê 論戰了後，台語文學運動又 koh 做出啥物款 ê 修正 kap 理論 ê 深化？後殖民語境之下 ê 華語 kap 本土語言，應該呈現啥物款 ê 語際關係，才真正是符合台灣人、台灣文學，甚至台灣民族追求主體性 kap 自主性 ê 向望？

一、眾聲喧嘩 ê 基石：台灣文學「語言」史

無論什麼語言都有文學的價值。內山的生蕃話亦有文學的價值，只可惜他們沒有文字好建設他們的文學呢。¹⁵⁸

語言綴人，亦就是講有啥物種族，着有啥物款的語言，蹣佇台灣的各語族，愛認同台灣才有資格成做台灣人……¹⁵⁹

無論是戰前 ê 台灣話文運動或者是戰後 ê 台語文運動，對頂面黃石輝 kap 林宗源 ê 文字當中，咱會當看著台語文學上重要 ê 關懷，其實是對「語言」來走揣「人」、「族群」ê 主體性，重新畫撥殖民語言 kap 本土語言 ê 語際關係，並且提出一種共同語「台灣話」ê 方案，來建立抵殖民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述。但是戰前 ê 台灣話文論述難免有伊無夠精緻 kap 傷過急進 ê 所在，到戰後海外 ê 胡民祥手頭，台語文學 ê 理論才得著 khah 詳細 ê 論證 kap 深化。胡民祥 1967 年出國了後隨時接觸著海外獨立運動，伊讀過 Edgar Snow ê 作品《紅星照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 kap George H. Kerr 所寫 ê 《被出賣 ê 台灣》(*Foemosa Betrayed*)，尤其受著台灣島內發生「美麗島事件」ê 刺激，伊 ê 政治立場突變，也開始致重研究台灣民族解放運動 ê 文學路線。透過《笠》、《台灣文藝》、《文學界》，掌握著當時台灣本土文學 ê 動態，同時也讀李南衡所編 ê 《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以及《台灣青年》、《台灣》、《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ê 影本，胡民祥受著日本時代台灣話文論戰 ê 啟發，才落手討論日本時代 ê 台灣「新」文學運動，開展伊 ê 社會主義 kap 台灣民族解放理論¹⁶⁰，梳捋彼當陣 ê 台灣文學史（主要是唯一 ê 見本《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並且開始提出伊 ê 文學史論。

雖然胡民祥初入台灣文學研究，並無詳細區別戰後鄉土文學文體 kap 台灣民族意識表意 ê 問題，某種程度忽略戰後語言政治之下華語文學體制 ê 宰制，講「台

¹⁵⁸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收錄 tī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頁 2。

¹⁵⁹ 林宗源，〈建立有尊嚴的新台灣文學〉，1994.02，收錄 tī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頁 68。

¹⁶⁰ 陳金順，〈Üi 胡厝寮飛向萊里鄉的渡鳥：胡民祥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132-133。

灣鄉土文學又開始抬頭，台灣民族語言（台灣話語）又開始頻繁地出現在文學作品裡。」¹⁶¹間接造成伊錯接日本時代ê台灣話文運動 kap 戰後宰制方言、將台灣話消音ê「台灣意識」，但是伊致重語言ê文學史觀，已經掌握著每一時期台灣文學ê可能性¹⁶²。來到1990年代台灣文學定義論爭ê時陣，胡民祥認為：

到底甚麼是台灣文學？無共款的定義引起論戰，有社會意識落手的定義，有題材落手的，也有語言落手的，攏自成一家之言，攏有伊的道理，唔拘，攏是斷代史的觀點，是片面的看法，是靜態的講法。甚麼是台灣文學？我認為着愛用動態的民族發展史的觀點來看甚麼是台灣文學。事實上，若是無台灣民族國家就無台灣文學。¹⁶³

在民族發展史ê視野當中，胡民祥舉中古英國有法語、拉丁語 kap 中古英語ê競爭 kap 消長做旁證，對政治、經濟 kap 文化ê外部條件來確立台灣民族文學ê語言發展史，認為「南島語口傳文學是台灣文學，外來者用外國文創作的過客文學是台灣文學的遺產，戰前的日文及中文創作的文學作品，戰後的北京語，福佬語，客家語抑是南島語作品，攏是多采多姿的台灣文學。」胡民祥也主張，無論是反帝作品、皇民文學、反共懷鄉、現代主義、鄉土寫實，台灣意識，甚至是中國意識，攏是在台灣土地頂面創作ê作品，也攏是無仝階段ê台灣文學。M-koh，胡民祥強調1990年代開始，用母語創作是真自然ê趨勢，因為文學創作無需要koh再強制翻譯做華語，作家在四大語言當中有選擇ê自由，所以伊舉鍾肇政ê《怒濤》寫出人物母語做例，認為母語文學解決伊「創作著是翻譯」ê問題¹⁶⁴，也暫時閃避狹義ê「台」語名實之爭，khah 柔性來論述台語文學解脫「方言文學」ê頭箍仔，欲tī「台灣文學」ê語文層次頂面追求主體性 kap 自主性ê問題意識。

照頂面看來，胡民祥並無否認台灣華語文學ê積累，不過，這也無表示伊放棄論證佢一種語言才是「民族母語」。¹⁶⁵伊在1993年〈演變中兮台灣文學語言〉提出「台灣文學語言史」ê概念，並且在1994年發表〈賴和的文學語言〉這篇論文當中用語言做標準，將台灣歷史上ê書面語歷史梳捋出來，包括有南島語文學、西歐語文學（荷蘭文、西班牙文、德文等等）、漢語書面文學（漢詩、賦文）、

¹⁶¹ 高青峰，〈戰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台灣民族文學的成長〉，《台灣時代》12期，1981.07，頁17。參考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網址：<http://da.lib.nccu.edu.tw/tadm/?m=2302&wsn=0102>，使用日期：2013.04.19。

¹⁶² 胡民祥，〈台灣文學發展史的探討〉，《走探台灣文學痕跡》（台南：開朗雜誌，2009.10），頁52-77。

¹⁶³ 胡民祥，〈動態看待台灣文學語言〉，蕃薯詩刊3《抱着咱的夢》（台北：台笠出版，1992.10.22），頁17。

¹⁶⁴ 胡民祥，〈動態看待台灣文學語言〉，蕃薯詩刊3《抱着咱的夢》，頁19-20。

¹⁶⁵ 胡民祥：「我有一個基本的論點是台灣民族的理論，設使若有台灣民族的存在，就應該愛使用多數者的語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用多數者的語言創作文學，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定律。」陳金順訪問，《Ûi 胡厝寮飛向菜里鄉的渡鳥：胡民祥台語文學研究》，頁122。

台語民間文學（Ho-lo、客家 ê 歌謠戲曲、民間傳說）、日語文學（包括台灣 kap 日本作家）、北京語文學、台語（書面）文學、客家語（書面）文學、南島語（書面）文學等等。在這款多元平等 ê 語言史觀頂面，胡民祥提出賴和文學語言經過「中國白話文」、「北京語 kap 台語共生」、「台語白話文」三階段 ê 演變來干證台灣民族使用民族母語寫作¹⁶⁶，尤其是 Ho-lo 話在台灣民族文學當中曾經透過多數人來完成台灣話文共識 ê 歷史，是一種經濟語言。最後，借重歐洲文藝復興 ê 經驗，以民族語言 ê 正當性對外來 ê 政治優勢語「華語」提出呼告 kah 向望：

華文的台灣文學在民間抗爭五十年，總是抗爭有成，登堂入室，進入學院，行夠鐘鼎殿堂之尊……共款，台語文學嘛有一工會進入鐘鼎學術殿堂。所以，聽好勿做一位擋路者，勿享受著抗爭的甜果之後，煞翻身參當年的官虎及 in ê 爪耙仔來阻擋另外一波的台灣文學運動：台語文學。¹⁶⁷

胡民祥認同台灣華語文學在戰後國民黨 ê 語言政治之下也是一種「抗爭」，但是提醒華語文學毋通像「當年的官虎」來阻擋台語文學。伊 tī 遮指出華語 kap 其他本土語言（廣義 ê 「台語文學」）之間 ê 關係，其實也就是筆者所強調 ê 台語文學運動最初 ê 命題：華語 kap 本土語言是有重疊，不過完全無衝突 ê 後殖民情境。若是作家、論者無意識著華語是殖民語文，無去除華語壓迫民族母語 ê 殖民關係，也無重視民族語言書寫 ê 歷史正當性，台灣文學會猶原失足佇台灣文學語言——台語、客語、南島語系當中¹⁶⁸，台灣文學 ê 語言論爭也一定會 tī 歷史上不斷重演。對遮看來，胡民祥 ê 民族文學論確實像施俊州所講，khah 偏重文化、文學（語言）ê 解放角色¹⁶⁹，文學「語言」史 ê 提法毋但是台灣文學史 ê 創見，窮實也對日後台語文學提出多元中心 ê 理論，有非常重要 ê 影響 kap 貢獻。

二、Tī「左翼」精神以外：戰前、後「台灣話」文學經驗 ê 重建

根據蔡瑋芬 ê 看法，戰後上早開始用「台語詩」替「方言詩」正名 ê 人應該是羊子喬。羊子喬雖罔論著日本時代台語詩 kap 台灣話文論爭 ê 源頭，suah 無傷過強調戰後台語文學 kap 日本時代台灣話文 ê 關係，因為「戰後的『台語詩』作者，在創作時，可能還沒讀過戰前詩人賴和、楊華、吳新榮、蘇維熊……等人的台語詩。」¹⁷⁰羊子喬 ê 推論有林宗源親喙印證，但是這無法度解說為啥物戰前 kap 戰後會全款是「台語」來引起台灣文學 ê 語文革命。所以轉來看胡民祥以台灣文學語言史 ê 基礎，辯證賴和 ê 文學語言是民族母語 ê 實踐進前，伊早在也指

¹⁶⁶ 胡民祥，〈賴和的文學語言〉，《走探台灣文學痕跡》，頁 180-209。

¹⁶⁷ 胡民祥，〈台灣文學的語文辯證〉，《海翁台語文學》48 期，2005.12，頁 13。

¹⁶⁸ 胡民祥，〈台灣文學史書寫的民族母語文學論〉，《台語文學史書寫理論與實踐》，收錄 tī 方耀乾編，《台語文學史書寫理論與實踐》，頁 27。

¹⁶⁹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80。

¹⁷⁰ 蔡瑋芬，《戰後台語文學運動 ê 開展：1986-1991》，頁 3。

出台語文學運動另外一條重要 ê 脈絡，著是重建日本時代「台灣語」ê 文學經驗，kap 戰後台語文學運動原在 ê 文化場域來接合。正當胡民祥梳捋彼當陣台灣文學史唯一 ê 見本——《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ê 時陣，伊隨時發表評論反對陳少廷 ê 中國五四傳統，認為「台灣社會內部的反帝與反封建運動才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產生的根源。」上重要 ê 是，胡民祥主張台灣新文學運動猶未結束，台灣文學猶 koh teh 繼承日本時代 ê 遺產，親像「台灣本土化」、「文學大眾階級化」、「台灣語文學口語化」、「反帝與反封建的文學主題」等等。¹⁷¹其中，伊對「台灣語文學口語化」ê 論點 koh 再延伸，批評陳少廷無掠著黃石輝引起鄉土文學論戰 ê 要點。胡民祥認為，在文學題材方面主張台灣文學本土化，是民族 ê 問題；在文學作品 ê 對象方面，主張勞苦群眾 ê 大眾文學，是階級 ê 問題；在文學語言形式方面，主張使用台灣語，是民族 kap 階級問題 ê 共同體現。¹⁷²所以，胡民祥重新論證賴和「舌頭和筆尖的合一」ê 主張，恢復賴和在「台灣新文學之父」以外另外 ê 「台語文學家」身份來 kap 戰後「台語文學之父」林宗源做連結，將戰後 ê 台語文學 kap 陳少廷所消音 ê 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倒幹」（左傾）思潮 kap 語文運動重新接合，牽出一條有社會主義精神 ê 「『台灣語』文學史」ê 脈絡。

這篇評論對胡民祥來講，毋但是發展出台灣文學「語言」史 ê 重要過門，對黨外雜誌《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到《台灣 e 文藝》這條後解嚴台語文學運動史 ê 線索當中¹⁷³，咱也會當看出伊後來 ê 名作〈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台灣話」文學化發展的探討〉改名做〈舌尖與筆尖合一〉轉刊對《台灣新文化》第 15 期去了後，確實掀起一波重新起造日本時代「台灣語」文學經驗，進一步 kap 戰後台語文學接合 ê 趨向，有關日本時代台語文學經驗 ê 討論也愈來愈濟。比如 17 期刊出林旺〈植下那語文的大樹深根〉對語文政策 ê 角度回顧台灣話文論戰，除了指出論戰 ê 民族認同問題、文言白話之爭，以及漢字 kap 羅馬字 ê 取捨以外，林旺肯定賴和是倚在台灣民族立場 ê 白話文實踐者，「他可說是第一個以福佬話為基礎而從事寫作的台灣人」¹⁷⁴，面對國民黨將語文問題變做政治問題 ê 語文壓迫政策，林旺也認為必須愛先透過語言調查、擬定語文政策，koh 需要反省日本時代 ê 經驗，對民間開始推動：

如果日據時代的台灣，我們有更多的賴和（或更多以羅馬拼音寫作的）而奠定福佬白話文（或羅馬拼音）的寫作基礎的話，國民黨神通再廣大也無法如此順利的推動它的「國語政策」。¹⁷⁵

¹⁷¹ 許水綠，〈評《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上）〉，《新潮流》4 期，1984.07.02，頁 53。

¹⁷² 許水綠，〈評《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下）〉，《新潮流》5 期，1984.09.01，頁 63。

¹⁷³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1。

¹⁷⁴ 林旺，〈植下那語文的大樹深根——台灣語文之歷史探討與比較研究〉，《台灣新文化》17 期，1988.02，頁 31。

¹⁷⁵ 林旺，〈植下那語文的大樹深根——台灣語文之歷史探討與比較研究〉，《台灣新文化》17 期，1988.02，頁 37。

不過，林旺對賴和 ê 肯定，siàng-sî 也暴現除了蔡培火以外，基督教 ê 白話字文學攏猶未出現在台灣文化 kap 文學 ê 歷史眼界當中。《台灣新文化》第 17 期，胡民祥 koh 再批評陳少廷 ê 文學簡史，但主要是針對伊取消左翼運動 kap 社會主義 ê 史觀，無磕著語文 ê 問題，後來 koh 一波日本時代 ê 台語文學回顧，著愛等到《台灣新文學》才有 khah 大量 ê 討論。

《台灣新文學》ê 走向雖然 kap 頭前階段 ê 參與者宋澤萊、林央敏，以及胡民祥有真密切 ê 關係¹⁷⁶，但是筆者認為在《台灣新文化》（1986 年到 1988 年）至《台灣新文學》（1995 年到 2000 年）ê 空白期間，koh 有一項客觀條件，著是這中間拄好經過台語文學論戰 ê 坎站(khám-tsām)。在論戰當中，台語文學論者除了林央敏針對廖咸浩「被動」回應 1930 年代 ê 台灣話文運動以外，其他 ê 論述其實著無 koh 去爭奪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 ê 詮釋權。照林央敏對〈舌尖與筆尖合一〉這篇文章高度 ê 文學史評價，講是「國民黨據台後第一篇站在台灣主體性的立場來看待日治時代的鄉土文學論戰（或稱台灣白話文論戰），並且比較完整和比較深入的論述當時台灣話文運動的文章」¹⁷⁷來看，台語文學論戰爆發 ê 時陣，今才(tann-tsiah)起步 ê 台語文學史論，koh 無法度面對過去在台灣文學史 ê 傳承過程中，不斷 hông 減損、消磨，最後被當做干證台語文學「失敗」ê 台灣話文。所以，《台灣新文學》第 5 期刊出康原〈台語新詩的奠基者——兼談賴和的台語詩歌〉¹⁷⁸，這篇文章 tī 胡民祥探討賴和文學語言 ê 論述基礎頂面，繼續整理日本時代 ê 台灣話文經驗來接合戰後台語文學運動，會當講是論戰過後真自然 ê 趨向。

《台灣新文學》ê 論述 koh 有幾 ê 所在值得討論。頭先是第 6 期刊出呂興昌在第二屆台灣本土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所發表 ê 論文〈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論黃石輝台語文學兮觀念和實踐〉，宣告黃石輝 ê 台語小說〈以其自殺，不如殺敵〉出土。¹⁷⁹在台語文學史 ê 意義上，毋但是拍破空有理論無作品 ê 講法，呂興昌同時借這篇台語小說 ê 論戰語境來干證戰後台語文學 ê 問題：

反對伊（台灣話文）兮人，其中有一個理由是：中國人看無台灣話文，所以主張普及中國白話文，期待逐個攏識（bat）中國語，而且會曉寫中國語文，溝通兩地兮文化，che 不是乾礁黃石輝彼個時代兮問題，亦是咱現此時的問題。¹⁸⁰

¹⁷⁶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26。

¹⁷⁷ 林央敏，〈簡述早期的台灣話文理論——台語文學運動之二〉，《台語文學運動史論》，頁 30。

¹⁷⁸ 康原，〈台語新詩的奠基者——兼談賴和的台語詩歌〉，《台灣新文學》5 期，1996.08，頁 296-304。

¹⁷⁹ 〈以其自殺，不如殺敵〉ê 作者，研究者陳淑容認為是蘇得興，相關討論參見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頁 136-140。

¹⁸⁰ 呂興昌，〈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論黃石輝台語文學兮觀念和實踐〉，《台灣新文學》6 期，1996.12，頁 304。

面對「現此時」反對台語文學 ê 工具理性 kap 民族認同問題，呂興昌用「望洋失海兮『事大主義者』」來類比當然是 khah 粗淺淡薄，但是這篇論文 teh 翻案台灣話文 ê 文學史敘事以外，想欲進一步接合戰後台語文學 ê 發展來穿破(tshng-puà) 華語文學體制 ê 企圖，已經非常明顯。尤其是第 9 期刊出葉笛全年 8 月 ê 演講稿〈戰後台語詩的發展〉，更加會當透過林亨泰以外 koh 一位跨語詩人 ê 見證，接合戰前後來台語文學 ê 發展。葉笛對台灣語文 ê 看法 kap 林亨泰類似：「在認同大台灣的前提下，台灣語文的推廣是建立獨立自主的文化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¹⁸¹也就是講，比起外來 ê、政治 ê 日語 kap 華語，葉笛 kap 林亨泰攏認為本土語言才是台灣族群文化 ê 根本，而且猶未達到會當獨立自主發展 ê 程度。而且葉笛踏話頭講「既然談戰後的發展，便必然有戰前『台語詩』的發生。文化現象是不會發聲遺傳學上的突然變異的，它必定有前行的地下水潛流……」¹⁸²這段話毋但點出台語（族）ê 文化場域一直存在，也印證 tī 戰前、後 ê 強勢語言壓迫之下，Ho-lo 話帶領「台」語文運動 ê 現實 kap 共識。

除了頂面這兩篇來稿以外，宋澤萊擔任主編，siàng-sî 也非常認真透過紹介 kap 論述來確立日本時代以來台語文學 ê 文學史位置。因為伊在早著認為「由鄉土文學變成台灣文學，再閣變做『台語文學』，這是真自然个一條路矣！」¹⁸³所以伊特別規劃「戰後第二波鄉土文學運動」ê 專欄，大量評論、介紹戰後 ê 台語文學。相關 ê 論文有第 8 期〈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第 9 期〈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第 10 期〈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第 12 期〈試介李勤岸、胡民祥、莊柏林、路寒袖、林沉默、謝安通、陳金順、藍淑貞的台語詩——九〇年代台語詩的一般現象〉 kap 第 13 期〈從仿古的鄉土到實在的鄉土——特論蕭麗紅台語小說的高度成就〉等等。這幾篇文章 ê 共同點，對宋澤萊將林央敏 kap 黃石輝、葉榮鐘並列 ê 篇名著知影，攏是將戰後台語文學 kap 戰前台灣話文接合 ê 工程。親像宋澤萊認為林央敏克服黃石輝 ê 用字問題，是「戰後另外一位黃石輝」，又 koh 將葉榮鐘主張建構台灣集體性文學 ê 「第三世界」論延伸做「台灣民族文學」，是「另一個理論上的葉榮鐘」¹⁸⁴；「黃石輝路線的鄉土文學的台語詩」來到 1980 年代，發展做台語自由體 ê 現代詩 kap 童謠、民歌、流行歌形式 ê 韻文詩，到 1990 年代更加活潑。¹⁸⁵

¹⁸¹ 葉笛，〈戰後台語詩的發展〉，《台灣新文學》9 期，1997.12，頁 237。

¹⁸² 全頂註，頁 227。

¹⁸³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台灣新文化》5 期，1987.01，頁 40。

¹⁸⁴ 宋澤萊，〈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台灣新文化》8 期，1997.08，頁 231。

¹⁸⁵ 宋澤萊，〈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台灣新文化》9 期，1997.12，頁 280。

戰前台灣話文 kap 戰後台語文學 ê 關係，在宋澤萊第 10 期 ê 論文對台語文學 ê 嚴格定義當中更加清楚。雖然後設看來，宋澤萊對黃石輝台灣話文 ê 解讀有需要斟酌 ê 所在，比如伊認為黃石輝「指出用「白話文」（北京語文）創作是「貴族式」的。明顯地是指出全部的創作都應該用台語創作。」，對照黃石輝將台灣話文 kap 鄉土文學切割 ê 論述，宋澤萊 ê 講法某種程度也是一種再／誤現。不過伊猶是有提出戰前台灣話文 kap 戰後台語文學 ê 連結：

只有揭掉了壟罩在母語上頭的那層外來語的遮羞布，單純只用台語來敘述，單純只用台語來對白，單純只用台語來思考，單純只用台語來表意，完全不受外語支配，如此的文學才是台語文學。¹⁸⁶

宋澤萊其實無 koh 去討論啥物語言是「台語」，對伊來講，「台語恰咱台灣文學個問題，嘸是爭論個問題，是『實踐個問題』。」¹⁸⁷所以在遮 ê 「台語文學」，是一種實踐本土語言 kap 文化認同所形成 ê 自然指涉，重點是按怎對「殖民者強加的有形及無形的壓力關係」當中解放受壓迫 ê 母語，這也是伊認知台灣文學包括日本皇民文學、外省人文學，但是台語文學才應該是核心性文學 ê 原因。¹⁸⁸

總講一句，雖然在這階段 ê 台語文學史論主要是前期跨語作家 ê 個人致重，但是在多元 ê 語言文學史頂面，透過日本時代台灣話文經驗 ê 重建，並且 kap 戰後台語文學運動接合，胡民祥、宋澤萊提出理論 kap 作品來論證 Ho-lo 話／語族在台灣（民族）文學 ê 解放角色，在這層意義頂面，「台語」、「台語文學」ê 名稱干證 Ho-lo 話、台灣話文 ê 歷史積累，不斷突顯到戰後猶未解除 ê 文化壓迫，敢 koh 是所謂 ê 「福佬沙文主義」？「台語」爭論背後真正愛面對 ê 敵人是 siàng，《台灣 e 文藝》ê 〈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已經予咱真清楚 ê 提示：「平等尊重、鼓勵參與各族母語創作，將任何打壓母語文學的人視為敵人。」¹⁸⁹

三、有唐山內公，koh 有西洋外媽：白話字文學 ê 眼界

呂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是戰後提示白話字文獻整理，以及《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的研究空白，展開台語文學史視野，也預告台灣文學史改寫 ê 重要論文。不過，台語文學白話字史觀 ê 建構，也一直愛等到 2004 年才算初步完成。咱會當以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以及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

¹⁸⁶ 宋澤萊，〈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台灣新文學》10 期，1998.06，頁 263。

¹⁸⁷ 宋澤萊，〈咱來湊陣用台語念詩〉，《台灣新文化》2 期，1986.10，頁 69。

¹⁸⁸ 宋澤萊，〈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台灣新文化》9 期，1997.12，頁 289。

¹⁸⁹ 台灣新本土社，〈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台灣 e 文藝》創刊號，2001.01，頁 69

忽去 ê 存在〉這兩篇在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所發表，正式對台灣「新」文學提出質疑 ê 論文做代表。¹⁹⁰

面對學界研究通常將 1920 年代算做是「新」文學受著中國五四運動 kap 日本現代文學 ê 起點，但是全然忽略白話字文學 ê 文學史認識論，蔣為文主張用羅馬字書寫 ê 「新港文」 kap 「白話字」才是台灣上早 ê 書面語。因為台灣社會受著「漢字主宰」ê 社會化影響，誤解「漢語」必然適合用「漢字」來表達，尤其戰後國民黨嚴禁使用羅馬字 ê 語言政治干涉之下，白話字文學 suah 予「漢字」ê 文學史觀排斥在外，所以伊對世界文學 ê 角度來強調台灣文學 ê 多元脈絡：

台灣書面語一開始就是受世界文學 ê 影響，tī 歐洲 ê 國民文學 ê 刺激之下所發展出來 ê 。所謂 ê 中國五四運動或者日本現代文學，不過是台灣受世界文學影響一段時間了，另外 koh 出現 ê 2 個影響台灣文學 ê 支流 niá。¹⁹¹

究實，基督教將《聖經》ê 歐洲文學經驗傳來東亞、入台開教，對台灣書面語產生外濟「刺激」是會當討論 ê 問題。至少在台灣社會當中，白話字若無倚靠教會 ê 力量，並毋是一項會當普遍 ê 讀寫能力。但是蔣為文對世界文學 ê 觀點，強調 ê 時間點 kap 影響，提示台灣接受並且實踐語言現代性、追求「言文一致」ê 白話字文學史實，也印證台灣「新」文學史觀偏倚 ê 所在：擦消各語族使用羅馬字 ê 經驗 kap 可能性。這也是蔣為文強調台灣文學研究必須重視歐洲 ê 母語白話文學按怎影響台灣 ê 原因。

方耀乾 khah 偏倚直接對台灣 kap 中國 ê 台灣文學史 ê 檢討落手，全款是就白話字文學 ê 文字史來反覆(ping-hok)漢字 ê 文言、文化傳統，並且提出台灣 ê 白話文總共四擺 ê 運動史：第一擺是對 1885 年《TÂI-OÂN HÚ-SIÁⁿ KÀU-HOĒ-PÒ》發刊，並且舉辦徵文比賽起算；第二擺是進入日本殖民統治了後，台灣知識份子選擇徙栽(suá-tsai)中國／祖國 ê 五四運動經驗，欲透過北京話漢字來欲提昇文化、振興民族，但是並無顧慮台灣無通北京話來追求白話文 ê 一擺「轉越」；第三擺 ê 白話文運動是黃石輝所引起 ê 台灣話文論戰，同時也是「回頭」思考台語文 ê 第二擺運動；在戰後國民黨 ê 國語政策當中，第四擺白話文運動跟綴「台灣意識」ê 成長，對 1960、1970 年代 ê 寧靜革命 tauh-tauh-á 轉向狂飆運動，並且引起 1989 年到 1991 年 ê 台語文學論戰，是戰後抵殖民思維 ê 實踐。¹⁹²另外，李勤岸在〈白話字小說呈現 ê 台灣人形象 kap 文化面貌〉當中也有回應白話字文學 ê 文學史困

¹⁹⁰ 蔣為文 kap 方耀乾分別 koh 有〈台灣白話文學 ê 源頭是世界文學〉、〈是意識形態抑是不學無術？——台語文學 Tī 「台灣文學史」缺席的原因探討〉等文，攏是集中在 2004 年發表。

¹⁹¹ 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收錄 tī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成大，2005.01)，頁 35。

¹⁹² 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 ê 起源 kah 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 ê 存在〉，收錄 tī 《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頁 9 之 3-9 之 10。

境，伊認為無論是伊主張以 1916 年巴克禮出版白話字聖經開始算，或者是像蔣為文、方耀乾將時間提早到《TÂI-OÂN HÚ-SIÂⁿ KÀU-HOĒ-PÒ》發刊起頭，「若是台灣文學有包括台語文學，巴克禮影響之下產生 ê 白話字文學應該是上早 ê 台灣文學，m̄是賴和 ê 漢字華語文學。」¹⁹³

這幾篇用白話字文學 ê 眼界建構台語文學史，以及強烈展現 kap 主流台灣文學史對話姿態 ê 論文，在口頭語進入書面語 ê 「白話文」文學意義頂面，其實 kap 台灣文學史建構過程中 ê 「新」文學意義無全，咱 tī 第二章著已經針對這 ê 問題進行開破。但是台語文學 ê 白話字源頭，到底會當呈現啥物款 ê 文化、文學，以及民族認同 ê 思考？蔣為文 ê 「脫漢論」可能會當替咱呈現一 ê khah 完整 ê 論述圖像：

「脫漢」是指脫離漢字文化共同體的想像以建立政治及文化獨立的台灣民族國家。脫漢的基本原則是跳脫漢字的迷思以建立在地語言文化的主體性。譬如，對於台灣母語的書寫方式，要揚棄「漢字本字」的迷思才可能替台灣母語文學開創出一條寬闊的大道。脫漢並不是排斥所有的中國文化，而是拒絕以中國為主體的文化思考模式。中國文化和日本文化、歐美文化一樣，可以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但絕不是她的主體。推廣原住民語、客家台語、及 Ho-lo 台語就是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的最佳方法之一。¹⁹⁴

雖然在「蔣黃事件」爆發了後，蔣為文對「台灣語文」kap「中國語」語際關係 ê 想法，以及參考越南經驗主張脫離漢字 ê 思考值得斟酌討論，但是在頂面 ê 引文當中會當確定 ê 是：台灣文學體制對華語 ê 過份維護，加上白話字文學 ê 抹消，其實再度暴現台灣文學史論當中以中國文化為中心 ê 「漢字」kap「漢文化」認同，究實猶未去除華語外來 ê、殖民 ê、政治 ê 性格。重點是，白話字文學的意義，除了干證台灣各語族其實有漢字 kap 漢文化之外 ê 經驗，台語文運動經由多元 ê 語言史觀、日本時代台灣話文 ê 主體性重建，以及白話字所展現 ê 文化關懷，早著已經超脫漢人內部殖民 ê 問題，甚至觀照著原住民族在全球化視野之下所實踐 ê 在地現代性。所以，若欲起造有台灣民族主體性 ê 國家認同，歐洲透過母語書寫形成民族國家認同 ê 經驗毋但是一項重要 ê 參照，流傳到今 ê 白話字文學成做台灣文化經驗 ê 一部分，咱欲按怎看待這種遺產？對照日語文學 ê 情形，台灣文學面對白話字顯然是熱情不足。

著像論者對蔣為文 ê 善意回應：「後殖民台灣所面對的挑戰不是華語正當化或合法化為「台灣語言」的一支，而是台灣內部語言平權的問題與如何面對中國

¹⁹³ 李勤岸，〈白話字小說呈現 ê 台灣人形象 kap 文化面貌〉，全頂註，頁 10 之 1-10 之 2。

¹⁹⁴ 蔣為文，〈從漢字文化圈看語言文字與國家認同之關係〉，《語言、文學 kap 國家再想像》（台南：成大，2007.06），頁 348。

殖民化壓迫的問題。」¹⁹⁵總是台灣華語文學體制欲按怎回應白話字文學 ê 史實？如何意識著「漢字」、「漢文化」無可能完全適切所有台灣語族文化 ê 現實？若準講「台語文學是台灣文學」這件代誌根本無需要懷疑，那按呢，台灣文學史論猶未有任何回應，又 koh 代表啥物？面對新興 ê 華語語系、華文文學，「台灣」文學 kap 「華語」文學之間按怎劃分界線？台灣文學 ê 語言問題，窮實是一項主體性危機。¹⁹⁶

四、見證如喙 ê 健筆掘紙生花：台語文學史 ê 豐收

掌握台語文學史論幾項重要 ê 論述階段以後，台語文學透過史料重建語文經驗，kap 寧靜革命過後重新發聲 ê 現貌，siàng-si 也是文學史觀漸漸成熟 ê 表徵。事實上，對 2011 年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拍響台灣文學史觀 ê 一聲驚雷了後，方耀乾、林央敏 ê 文學史冊前後出版，加上施俊州 ê 導論，咱也確實見證台語文學有史為證 ê 天年。所以 tī 遮，筆者對回應台語文學爭論 ê 立場出發，來梳捋這幾本台語文學史冊 ê 出版 kap 論述情形。

首先是 2011 年宋澤萊 ê 《台灣文學三百年》，伊化用 Hayden White ê 「後設歷史學」kap 文本分類，結合 Northrop Frye ê 「神話原型文學批評論」，為台灣文學 ê 發展加入四季風景（春—傳奇；夏—喜劇、田園詩、牧歌；秋—悲劇、輓歌；冬—諷刺）。若是 kap 全年出版 ê 《台灣新文學史》並列，咱會當講看著台灣文學史 ê 轉向已經出現，因為這毋但是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對台語文學運動 ê 友善評論以後，正式將台語文學作家園 tī 台灣文學史內底品評、定位 ê 台灣文學史論，宋澤萊比較台華文學 ê 文學史觀 kap 藝術審美 ê 眼光，也暗示《台灣新文學史》完全抹消台語、母語文學 ê 後殖民史觀有所欠缺，一種台灣文學史

¹⁹⁵ 蕭安凱，〈「華語」作為一種遺毒／（資）產？——思索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燕土吾民：2012 年文化研究會議論文，2012.01.07-08。網址：

http://www.csat.org.tw/paper/B-1-2_%E8%95%AD%E5%AE%89%E5%87%B1.pdf，使用日期：2012.05.16。頁 11。

¹⁹⁶ 比如蕭安凱提出史書美(Shu-mei Shih)ê 華語語系論述來積極面對華語已經是「台灣語言」ê 現實，但是愛注意 ê 所在是：雖然史書美 ê 論述有發見華語 ê 前殖民意涵，針對流離出世界各地 ê 「華語」族群按怎面對中國「漢族中心主義」離散論述 ê 收編，提出華語 kap 在地語言、文化「同化」ê 反離散論述。m̄-koh 華語語系究竟是以華語為中心，這可能會當處理台灣 kap 中國之間 ê 華語問題，但是敢有法度對台灣內部國民黨起造 ê 華語文學體制進行批判、解決語言平權 ê 壓迫？參看史書美對台灣語言問題 ê 一寡描述：「在台灣原本由國民黨政權強加在人民身上的大一統中國的認同，逐漸被本土化的新臺灣人認同取代，現在國語只是多語言的台灣社會裡，眾多官方語言中的其一，實際上大多數人使用的是閩南語，其餘人等則使用客家話或多種原住民語言。」「從九七前香港的民主黨人士或台灣獨立派人士的角度來看，華語語系表述更是具有反殖民、反中國霸權的意義。」頭一段是偏離台灣社會現實 ê 認識論，第二段是證成台灣華語 ê 後殖民意義，但是顯然無掌握著台灣後殖民情境當中有華語 kap 本土語言 ê 衝突，挪用時行 ê 「華語語系」論述，台灣猶原是一 ê 特殊個案。台灣文學、華語文學 kap 台語文運動 ê 關係暫時點到為止，筆者留待日後在這 ê 基礎頂面，kap 後進繼續探討。參見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台北：聯經，2013.04），頁 54-56。

學方法論 ê 實踐，當 teh 開花結實。

宋澤萊三百冬 ê 台灣文學史當中並無包括荷蘭 kap 明鄭時期 ê 文學，因為伊認為「族群的存在具有完整的連續性」，所以伊 ê 史觀也對清朝前期客家人 kap 閩南人 ê 搬徙(puann-suá) kap 土斷開始，同時獨立出外省族群 60 年以來 ê 文學過程，也保留原住民文學 ê 討論空間。¹⁹⁷對遮，咱也會當看著宋澤萊成做跨語 ê 作家 kap 研究者 teh 考察台灣（民族）文學 ê 時陣，已經磕著「族群」成做台灣文學分析項 ê 論題，特別致重各族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主體經驗，這正是台語文學所發展出來 ê 多元中心論述。所以在這層意義上，《台灣文學三百年》可能會當講是台語文學所欲建構 ê 一種台灣文學史 ê 典型。

只不過，tī 多元中心 ê 台灣文學史論當中，宋澤萊選擇用本省／外省 ê 衝突來批判朱西甯、林耀德 ê 「外省·中國意識」，先將 Ho-lo 人／客家人、原住民／漢人 ê 族群衝突困一邊，伊顯然是欲透過外省族群 ê 政治 kap 文化優勢，強調國民黨集權政治脈絡之下 ê 族群經驗。在這 ê 前提之下，宋澤萊透過跨語 ê 文學史觀介紹林宗源〈講一句罰一箍〉，隨時著用台語文學 ê 創傷書寫呈現並置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所產生 ê 「矛盾」，形成一種批判華語 kap 本土語言之間無公平 ê 權力分配 ê 文學史敘事結構。

在這本應該會當講是台灣頭一冊跨語文學史論 ê 書寫當中，宋澤萊 ê 安排拄好點出主流台灣文學史無法度予台語文學出聲 ê 原因。因為台語文學 ê 消音 kap 華語文學 ê 發展是衝突 ê，對台灣（華語）文學來講，台語文學強烈 ê 運動性格，拄好是對華語文學史觀 ê 批判 kap 挑戰，而且強度是成正比。所以，若欲對宋澤萊多元 ê 族群邏輯 kap 承認華語書寫 ê 史觀基礎來思考台灣文學 ê 語文問題，咱首先欲討論 ê 著絕對毋是「台語文學是／代表／就是台灣文學」ê 次命題。因為無論「台語」是啥物語言，台灣文學體制攏必須愛思考到底欲按怎化解政治壓迫 ê 遺害，解決當前以華語為主 ê、收編式 ê 語際關係，予本土語言得著健康 ê 論述 kap 發展空間。這 ê 問題窮實無法度用華語是「台灣語言」，直接將華語變成「受惠的遺產」¹⁹⁸來逃避、解構，甚至轉移「台語文學」ê 定義 kap 正當性來解決。

確認華語在台灣文學體制當中猶袂去再／殖民 ê 屬性了後，繼落來 ê 問題才是重新討論台語文學 ê 主張到底是毋是「福佬沙文主義」或者是「次霸權」。事實上，在「台語」、「台灣話」ê 爭論當中，上大 ê 問題並毋是欲將「台語」做廣義 ê 解說，顛倒是論者無法度忽略台灣社會長期以來，著是將「台語」kap「Ho-lo 話」連結做伙 ê 現實，才會產生無法度放棄 eh-kheh 義 ê 困擾。台語文學運動者

¹⁹⁷ 宋澤萊，〈（自序）另一種台灣文學史的新觀念〉，《台灣文學三百年》，頁 9。

¹⁹⁸ 「真正的後殖民文學，在於消化歷史上所有的美與醜，把受害的經驗轉化成受惠的遺產。」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頁 9。

當中，屬洪惟仁對這 ê 問題 khah 注心，伊認為並無需要否認 Ho-lo 話在台灣是上有優勢 ê 傳統語言，「俗稱鶴佬話為『台灣話』，這也是可以理解的。」¹⁹⁹不過，「這種習慣是歷史累積的錯誤，歷史上留下的錯誤稱呼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過來的。」²⁰⁰李勤岸過去也是主張「台語就是台語」，但是經過論戰 kap 討論，考量著族群之間 ê 和諧，伊改換「台灣 Holo 話」ê 方案²⁰¹，或者是借華語語音稱做「和樂話」來避免爭議。²⁰²當然，tī 戰後尤其 1980 年代族群意識起興 ê 情境，這種社會語言學 ê 檢討 kap 反省有伊建構、協調集體認同 ê 積極意義，但是若換一 ê 角度思考：「台灣話文」kap「台語」（文學）這寡「歷史上留下的錯誤稱呼」，其實也見證台灣人 tī 戰前 kap 戰後斷裂、無傳承關係 ê 情境當中，以 Ho-lo 話充實「台語」ê 社會語境來進行「語言自衛」、「語文革命」，對抗、替代殖民語言 ê 現實。親像筆者頭前 ê 提問：否定「台語」在歷史過程中自然指涉 Ho-lo 話 ê 現實，到底是一種多元中心／無中心 ê 實踐？抑是無自覺陷落國民黨將「台灣話」、「台語」改作「閩南語」ê 污名化、中國化史觀當中？²⁰³

所以，就台語文學史 ê 書寫來講，欲按怎維持台語 ê 歷史能動性來 kap 其他本土語言形構一種團結 ê 母語文學論述，其實是比爭論「台語」到底是啥物／包括啥物語言 koh khah 務實 ê 策略。真早著有決心欲寫台語文學史 ê 方耀乾，運用複數系統(polysystem) ê 觀念 kap 多元脈絡理論(multi-contextualism)，將台灣文學語言史 ê 概念 kap 台語文學定義伸縮背後對弱勢、少數族群（客家、原住民）ê 關懷理論化²⁰⁴，提出策略性本質論(strategic essentialism)來思考台灣文化、語言所有可能 ê 歷史成員²⁰⁵，來解構華語／漢文文化霸權。在這款多元中心 ê 基礎頂面，方耀乾提出 kap 李勤岸「中華台灣文學」(Sino-Taiwan Literature)²⁰⁶類似 ê 分類，將目前以華語為主流 ê 台灣文學看做是「台灣華語文學」(Sino-Taiwanese Literature)，其他 koh 有「台灣客語文學」(Hakka-Taiwanese Literature)、「台灣南

¹⁹⁹ 洪惟仁，〈台灣話就是國語？〉，《台灣語言危機》，頁 159。

²⁰⁰ 洪惟仁，〈尊重客家人的母語情懷〉，《台灣語言危機》，頁 238。

²⁰¹ 雖然李勤岸 kap 洪惟仁攏認為「台語」容易產生爭議，但是 in 兩人對「閩南語」ê 接受態度，以及其他提法 ê 思考無相仝。李勤岸認為，台灣毋是中國 ê 閩南地區，台灣所講 ê 這款語言 kap 閩南語已經差真濟，而且「閩」有歧視 ê 意涵，所以無採取「閩南語」。但是洪惟仁認為閩南語原本就是學術上 ê 名稱，這 ê 稱呼是予戰後國民黨 ê 語言政治污名化，所以在字義、語意 ê 考量之下，洪惟仁提出「台灣閩南語」、「閩南語族」ê 意見。參見李勤岸、洪惟仁，〈沒有名字的語言？「台灣話」、「閩南話」還是 Hòh-ló 話？〉，《台灣文學館通訊》15 期，2007.05，頁 36-41。

²⁰² 李勤岸教授 tī 筆者學位口試 ê 時陣直接補充「和樂話」ê 提案，網路文獻參見李教授〈沒有名字的語言？〉刊出了後最近 ê 補充：「如果非寫漢字不可，那我建議借用華語音的『和樂』兩字」，網址：<http://tw01.org/profiles/blogs/1970702:BlogPost:2170575>，使用日期：2013.07.28。

²⁰³ 當然除了閩南語以外，福佬語、河洛話、Ho-lo 話也攏會使當作一種新 ê 提案。但是 tī 遮，筆者欲強調 ê 是否認「台語」這 ê 名稱形成 ê 歷史條件 kap 去殖民目的，無顧慮「台語」這種多數族群 ê 少數論述在實踐上 ê 困難。

²⁰⁴ 方耀乾，〈Ü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頁 14。

²⁰⁵ 全頂註，頁 24。

²⁰⁶ 李勤岸，〈台灣文學的正名——從英語後殖民文學看台灣文學〉，《台灣文學正名》（台南：開朗雜誌，2006.03），頁 26。

島語文學」(Austronesian-Taiwanese Literature)、「台灣日語文學」(Japanese-Taiwanese Literature)等等。其中，借用《大英百科全書》對英國文學、美國文學、法國文學 kap 中國文學 ê 定義，各國攏以大多數人 ê 母語所書寫 ê 文學做代表，所以台灣文學(Taiwanese)在定義上應該是台灣人以台語(Taiwanese)書寫 ê 文學，「是最符合歷史演進的法則的」。²⁰⁷

Ti「台語」濟濟 ê 爭議當中，本研究會當講是 khah 致重 Ho-lo 話在戰前、後語言政治當中 ê 相對位置、反抗能動性 kap 文學史意義來成立「台語文學」。在目前全語族 ê 大眾 kap 學者多數攏是母語「文盲」ê 實踐困境當中，「代表論」成做一種「多數族群 ê 少數論述」²⁰⁸，敢會當突破林央敏「以多表全」ê 提法所引起 ê 衝突？咱目前看著針對代表論 ê 一寡新回應，除了來自客家族群 ê 反彈猶未得著消解以外²⁰⁹，khah 值得討論 ê 是張錦忠所「描述」ê「複系統」方案。張錦忠基本上同意方耀乾 ê 提案，甚至替台語文學畫撥出中國、新加坡 kap 馬來西亞 ê 文學市場 ê 可能性。另外，伊也對「代表論」或者是「中華台灣文學」提出一寡無全 ê 提問 kap 看法：

不過，既然台灣文學的內涵誠如方耀乾所說也包含「華語文學」、「客語文學」、「南島語文學」等，不知道台灣的華語、客語、南島語文學是否也可以「直接就稱為台灣文學」？²¹⁰

根據文學系統的運作規律，由於台灣的國語／華文／漢文文學的構成元素最為完善，故位居主流或中央，稱之為台灣文學、台華文學或「中華台灣文學」並不會改變什麼現狀。同樣地，閩南語文學目前雖然有政府機制運作（文化計畫）與資源當後盾，但是文學系統構成機制或元素（尤其是市場）仍不足，故屬於「擴散力弱」文學(literature of lesser diffusion)。²¹¹

²⁰⁷ 方耀乾，〈台灣文學再正名〉，《台灣文學正名》，頁 136-137。

²⁰⁸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137。

²⁰⁹ 比如 2007 年有王幼華〈客家族群的定位與文學史撰述〉以及劉煥雲等〈台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兩篇論文回應。王幼華借羅錦肇對代表論 ê 批判猶原是「只認定用閩南語寫的閩南文學是台灣文學，從來不曾把客家話作品或客家先祖作品包含進去」；後文對代表論 ê 理解有非常嚴重 ê 誤見：「在台灣文學或台語文學興起的氛圍中，是有一部分台灣閩南籍作家，並不認同台灣有所謂的客家文學存在。」不過，本文也有講出客家族群對台語爭議 ê 心內話：「客家人認為以福佬話（即臺語）建構台灣文學，客家人並不反對；但是把福佬話狹隘化為『台語』，又把福佬人獨佔為『台灣人』是不周圓的。」參見王幼華，〈客家族群的定位與文學史撰述〉，《考辨與詮說——清代台灣論述》（台北：文津，2008.08），頁 294；劉煥雲、黃尚燿、張民光，〈台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文學新論》5 期，2007.06，頁 62-63。

²¹⁰ 張錦忠，〈「台灣文學」：一個「台灣文學複系統」方案〉，收錄 ti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2007.09），頁 65。

²¹¹ 張錦忠，〈「台灣文學」：一個「台灣文學複系統」方案〉，收錄 ti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頁 74-75。

張錦忠對「代表論」、「中華台灣文學」ê 提問，是就現實層面來思考這種扭轉華語文學優勢位置 ê 宣稱，並無法度改變台語文學 ê 弱勢困境，而且對「原住民」來講，「日語、國語／漢語、閩南語與客語，甚至英語、荷蘭語、西班牙語都是殖民者的語言。」²¹²但是 tī 遮，筆者猶是想欲指出張錦忠「去政治脈絡」ê 「描述」，究實用一種市場邏輯來閃避華語文學 ê 構成元素「最為完善」背後隱藏 ê 政治權力，所以也無法度說明「台語文學」自為現象 ê 根本原因，更無力提出一套改變台語文學弱勢 ê 辦法。對林央敏到方耀乾，台語文學強調「代表」ê 論述，在台灣文學 ê 語境當中窮實是一種對華語進行內部殖民(internal colonization)積極反動 ê 副作用，若暫且按下對「代表論」ê 提問，張錦忠無意中所發動 ê 原住民本質論，召喚漢人壓迫 ê 殖民「原罪」，又 koh 犯著彭瑞金、陳芳明頭前 ê 毛病，移轉殖民政權 ê 政治 kap 歷史責任，更加抹烏台語文運動提出策略性本質論背後對包括原住民在內所有本土語言文學 ê 關心，尤其是去華文、漢語、漢字中心對原住民族群 ê 意義攏總失效。

台語文學按怎在中國、台灣雙重 ê 華語壓迫結構當中，帶領台灣母語文學出頭天？像施俊州所言：做一種救貧、濟弱，甚至聯盟 ê 一項差異範疇²¹³，在台灣文學 ê 多元表意基礎頂面，kap 「華語」這 ê 可能猶是中國中心 ê 表述保持「安全距離」，對語言平權 ê 角度去建構台灣文學 ê 主體性，這可能是「代表論」未來會當發展 ê 方向。若是掌握著這 ê 文學史轉／危機，最後咱看《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ê 史觀 kap 理論建構針對台灣文學後殖民語境 ê 回應，應該著會當整理出自林宗源提出「台語文學就是台灣文學」以降，台語文學真正欲 kap 台灣（民族）文學「對話」ê 重點。

首先，在林央敏對台語小說／文學 ê 定義當中，伊特別加上台灣 ê 「地理範圍」來界定「所有在台灣生長的具台灣地籍的人」著是「台灣人」，台灣人以「台語」（也就是國民黨官方 ê 閩南語或者是客家人稱 ê 福佬話）思考、以台語敘述 ê 小說才是台語小說／文學。咱會當發見這款「先」加上地理條件 ê 身份論定義，其實已經對過去「Ho-lo 話＝台灣話＝台灣人」ê 邏輯背後用「語言」界定身份 ê 誤見進行初步 ê 開破，繼落來討論台語文學，著無需要 koh 再面對台語（族）以外 ê 族群毋是台灣人 ê 質疑。另外，以台灣這片土地為中心 ê 台灣認同，事實上也就是葉石濤以「台灣為中心」ê 提法，不過 kap 「台灣意識」強調「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無全款 ê 所在是，林央敏認為「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至少母語是台語的族群理所當然應該用台語來寫作。」²¹⁴在台灣文學 ê 範疇當中，將台語文學定義做 Ho-lo 語族 ê 實踐，按呢其實也解構是毋是客家人、原住民族攏愛 koh

²¹² 張錦忠，〈「台灣文學」：一個「台灣文學複系統」方案〉，收錄 tī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頁 72。

²¹³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頁 199。

²¹⁴ 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頁 295。

承受一擺「台語」浩劫ê「莫須有」罪名。繼落來ê問題，就是端看各族群對台灣話成做一項共同語、大眾語言，甚至民族語言ê現實有共識抑無。

雖然林央敏ê論述是規氣(kui-khi)無欲 koh 討論「台語」kap「台灣語言」這款纏絞絆手ê問題，筆者在當下使用「台語文學=Ho-lo 話文學」ê定義，也攏有無一定穩在ê自覺。但是林央敏換一種角度，透過強調華語文學體制當中後殖民文本 kap 論述ê歪斜(uai-tshuah)來體現「台」語ê實踐意義：

1. 半調子的後殖民性(Post-coloniality)作品及理論，這類作品及作者的中文寫作，不排斥挪用台語詞，甚至積極使用台語詞彙。
2. 偽裝及失根的後殖民性作品及理論。……台灣有一些作家及後殖民論者同樣認為中文寫作也可以表現台灣精神、抒寫台灣特色……，也是不同於中國文學的文學獨立體。他們與印英文學的維護者之差別，大概在於印英文學的維護者並不反對印度母語文學的復興，但他們卻反對台語寫作及反對發揚台灣的母語文學……這樣的觀點要不是投降於中國殖民主義，就是筆者前述的「參入部份後殖民表象的新殖民主義的偽裝」，這種新殖民主義的作品只能算是「殖民後(after)文學」。
3. 完整的後殖民性及理論。這是指台灣的母語文學，其中尤以台語文學的作品及理論，可說完整具備後殖民文學的內涵。……²¹⁵

咱對林央敏所列ê三種後殖民狀態，會當了解伊認為台語文學才是完整ê後殖民文本ê理由。因為部份台灣作家 kap 理論家主張華語也會當表現台灣精神，但是 suah 嚟台灣母語文學ê聲，這究實是一種經過扭曲了後，完全失喪理論精神ê「假」後殖民，也是欲檢討台語」kap「台灣語言」進前，論者必須愛先回應ê問題。因為「母語書寫ê正當性」kap 族群、民族認同之間，是非常倚近、部份重疊但是無全ê論題層次²¹⁶，若是「方言文學」在台灣文學當中會當成立，林宗源、向陽兩位先鋒繼續寫「方言詩」，無「台灣國語詩」ê爭議……總講一句，就是壓迫本土語言書寫ê「偽裝及失根的後殖民性」無 koh 存在，「台語文學」ê定義 kap 爭議所暗喻ê被壓迫ê「台灣」經驗主體，在這ê設案頂面可能著 khah 無關宏旨。究竟，台語文學成做一種被壓迫經驗ê「共同語」，若是一直在台灣文學ê邊墘位置，「台語文學」ê「爭議」本身，可能猶是一種必要ê堅持。

第四節 「台語」成做認同ê方法：台語文學史論ê民族想像

²¹⁵ 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頁 284-285。

²¹⁶ 「或者說，即便台語文運動與台灣獨立建國在戰略層次上存在著一定程度的關連性，也應該在戰術層次上保持距離。」參見王俐茹，〈黃蔣爭議背後隱藏的語言、認同邏輯〉，《自由時報》，2011.06.06，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8.htm>，使用日期：2013.05.19。

所以，若是咱返轉日本時代，koh 再一擺來到賴和先 ê 病床邊，面對伊 ê 高嘆「咱所做過 ê 新文學運動，都等於白了工 ah！」咱欲按怎向賴和先應答？

賴和不幸無法度活過日本 ê 殖民統治，但是伊可能無法度想像，「光復」了後台灣人竟然 koh 再受著一擺殖民 ê 凌遲；賴和先可能也無法度理解，為啥物伊 ê 作品流傳到戰後會漸漸「無聲」去。透過新歷史主義 ê 史學觀點來梳捋成做後來者認知台灣文學 ê 歷史文本，同時也是起造文學經典 ê 知識基礎，本章所欲探問 ê 問題，就是設使台灣文學 ê 主體性建構是一種民族認同 ê 表意，因何台灣文學史 ê 積累，會慢慢形成一種將新文化運動內底 ê 台灣話消音，貶低台灣話文論述 ê 文化主體性，形成忽略、拒絕、甚至批判、拭抹母語文學 ê 意識形態？台語文學又 koh 按怎走揣過去 ê 歷史經驗，來回應台灣文學語言爭論背後 ê 認同隱喻 kap 政治壓迫，在「後殖民」ê 他者語境內底想像「台灣民族」、重新定義「台灣文學」，走揣理想 ê 「政治厝頂」？

以賴和「新文學之父」ê 論述當做考察對象，在 1970 年代以前，咱會當發現戰前台灣文壇對日本時代台灣話文經驗 ê 回顧大概是一半一半，建設台灣話 kap 收集民間歌謠普遍猶是台灣文學論者所致意 ê 代誌。但是來到戰後，文學史論內底 ê 「祖國」形影越來越大，漸漸來拭消日本文學 ê 影響。對賴和 ê 文學語言趨向台灣話 ê 「白話文」認識，也有慢慢予「中文」ê 指稱消磨去 ê 現象。這時陣對台灣文學經驗 ê 梳捋，尤其是對文學語言 ê 「中文」理解，已經開始出現「民族主義」ê 修辭作用。

相較日本時代 khah 前期 ê 代表作家加減有強調台灣話 ê 社會語境，後日語世代 ê 葉石濤全然 kap 語言論爭相閃身，甚至袂通台灣話，伊主要 ê 文學活動也攏用日語進行。所以在戰後包括伊個人在內，一陣戰前作家集體「失語」ê 工具困境 kap 認同質疑 ê 情境中，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選擇列舉毋成比例 ê 日文作家陣來透現一種集體焦慮，強調「鄉土色彩」以及「民族意識」遮 ê 「抗日」修辭來證成，同時也擦消伊 ê 日語經驗，對文學 ê 角度（作家豐富的題材）來維持伊 ê 發言位置。尤其來到 1970 年代「鄉土文學」時期，伴著中國民族主義 ê 呼聲愈來愈強，台灣文學史 ê 建構無不強調「抗日」、「民族精神」來證成使用「日語」ê 正當性，台灣本土語言、文化在「中文」語境內底不斷予「國語」拆食落腹 ê 現實，對應鄉土文學 ê 文類規範確實無要無緊。在這種情境之下，台灣話文 hông 消音、噤聲，會當講是戰後 ê 「鄉土文學」回顧戰前「新」文學經驗 ê 歷時性實踐，葉石濤強調「台灣人本身也使用統治者的語言去寫作」、「不受膚色和語言的束縛」ê 自我異化所得出 ê 「台灣意識」，也無形中接載咱所熟似(sik-sāi) ê 彼種「雜菜麵」ê 閱讀口味，共謀華文體制對本土語言 ê 宰制。

葉石濤承認統治者 ê 語言做充分條件，同時取消台灣語（族）言這項必要條件，致使台灣「人」當中各語族 ê 文化主體性失喪。但若葉石濤無先將「新」文學 ê 日語經驗正當化，這段包括伊家已在內 ê 文學經驗基本上著直接予國民黨語言政治 ê 認同操作擦消去，為著欲 tī 國民黨起造 ê 華語文學體制內底發言，伊必須愛閃避對再／殖民語言 ê 批判，才有法度將日本時代 ê 文學經驗轉換做戰後論述 ê 資本。所以，咱必須愛體認著：「台灣意識」窮實是經過殖民、再殖民 ê 扭曲環境，tī 一種不得不承認，並且無法度反抗殖民語言 ê 邏輯基礎之上來起造 ê 意識形態。

不過到 1980 年代，koh khah 強烈 ê 「台灣意識」立場 ê 台灣文學史敘事，並無進一步理解著「台灣意識」ê 侷限，面對國民黨再殖民 ê 語言政治影響之下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 ê 誤識，以及戰後台灣華語文學體制 ê 建造，攏欠缺全面 ê 解殖(de-colonization)。彭瑞金 kap 陳芳明 ê 對談，顯示主流 ê 台灣本土文學論對台語文運動 ê 問題意識認識不足，認為台語 kap 其他本土語文 ê 書寫只是表達、工具性 ê 問題 niā-niā，suah 完全忽略、閃避台灣各語族到底欲按怎 tī 統治者 ê 政治 kap 文化迫害原在 ê 結構當中，重新建構文化主體性 ê 困境，甚至 kap 中國意識論者全款挪用「中國」、「漢族」本質論來強化現此時 ê 統治者語言——也就是「華語」文學體制 ê 合法性 kap 正當性，壓制本土語言 ê 書寫。

端看另外一種台灣民族意識 ê 對照組，siāng-sî 也是台語文學 ê 論述基礎，胡民祥一開始著 teh 思考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文學 ê 社會 kap 文化關係，伊梳捋日本時代台灣「新」文學 ê 「文學語言」史觀，也針對台灣文學史拭抹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提出批判；宋澤萊對人權文學走揣台灣民族主義 ê 可能性，但是伊 ê 文學史眼界一開始著比其他 ê 人 koh khah 闊大，對「台灣文學」ê 認識窮實已經注意著多語族 ê 台灣「人」之間，有無全款 ê 殖民語境 kap 文學經驗。所以伊結合人權 kap 民族 ê 台灣文學論所定義出來 ê 「台灣文學」，觀照著多語多族 ê 台灣「人」追求身為「人」ê 基本權利，對文化保存、文學創作 ê 形式層面，「抵抗」統治者壓迫會有無全 ê 可能性；林央敏對中國文化／漢文化 ê 檢討全款也是對「人」開始，伊 ê 思考是包括原住民、本省人、外省人在內 ê 「台灣人」，欲按怎抵抗 kap 獨裁政治共謀來壓迫本土文化 ê 中國文化，真正對個人、族群出發，做伙來建構台灣民族 ê 新文化、新文學。在伊 ê 認捌當中，台灣 ê 語言有「福佬話」、「客家話」、「各族山地話」等等 ê 本土語言，也包括外來 ê 「北京話」，只不過外來 ê 北京語無法度 kap 台灣四百年來 ê 文化遺產接合，所以伊主張認為袂當講台語文學就是台灣民族文學，但是在表現媒介 ê 完整性 kap 適當性頂面，追求台語文學是一種趨勢。咱對胡民祥、宋澤萊 kap 林央敏 ê 台灣民族文學論 kap 語文主張內底，也確實看著台語文學一開始著毋是欲完全顛覆北京語，只是欲追求對應台語經過歷史自然發展 ê 事實。

但是對台語文學論戰到 1990 年代 ê 台灣文學爭論，咱發見台灣文學陷落華語 kap 本土語言後殖民衝突 ê 困境。因為「台灣意識」已經將華語文學體制所限定 ê 語際關係、透濫方言 ê 文類成規，誤認、內化做本土語言 ê 「後殖民」邏輯，所以反對台語文學 ê 本土論者 suah 展現出 kap 中國／中華意識類似 ê 意見，將鄉土文學 ê 文類成規看做是兼顧母語／族語／本土語言 kap 共同語 ê 替代方案，但實際上並無去除語言之間無平等 ê 殖民關係，維護華語 ê 權力配置 kap 論述構成 ê 華語拜物論述。另外，為著欲對抗五四白話文傳統 ê 收編，台語文學論者挪用日本時代「台灣話文運動」ê 民族想像，也因為 kap 戰後族群主體意識之間無法度完全接合，在「民族」ê 身影 kap 「族群」ê 界線之間徙動。

總是「台灣意識」內部 ê 矛盾原在。面對中國意識論者用語文 ê 關係進行收編，「台灣意識」反駁中文、漢語、漢民族本質論，但是無自覺家己也全款挪用漢文化來穩固殖民者語言，抹消母語文學。台灣 ê 後殖民對話牽涉著華語 kap 本土語言之間 ê 宰制關係猶未消除 ê 問題，不過在理論 ê 操演當中，論者無考量著台語 tī 台灣社會當中會當講是「準共同語」ê 現實，西方文化調和 ê 語境條件對台灣來講無一定合軀。因為欠缺對台語文學運動 ê 全盤梳捋，無把握著台語文運動爭論 ê 情境 kap 台語文學論者對「台」語 ê 複雜定義，結果著是誤判出「福佬話＝台灣話＝台灣人講台灣話」ê 「倒因為果」邏輯。台灣文學研究挪／誤用後殖民理論，suah 產生一種「工具理性」、「功利主義」ê 價值觀，用殖民語言 ê 透濫來消磨本土語言保留 ê 正當性。在台灣本土語言因為長期受著華語文學體制 ê 壓迫 kap 無公平 ê 資本分配，展出反抗 ê 姿態 kap 外來語「華語」對立 ê 過程當中，後殖民史觀無意識著「華語文學」kap 「母語文學」雖然是兩 ê 部份相疊，但事實上根本無衝突 ê 命題，後殖民成做一種維護工具理性 ê 工具，顛倒延續殖民、再殖民體制對本土語言 ê 抹消。

在這 ê 困境當中，台語文學經由台灣文學「語言」史 ê 梳捋走揣台灣多元多心 ê 歷史基礎，重建日本時代「台灣語」ê 文學經驗，kap 戰後台語文學運動原在 ê 文化場域來接合，拍開白話字文學 ê 眼界，重新界定台灣文學 ê 多元本質，來抵抗過去以中國文化為中心 ê 「漢字」kap 「漢文化」認同所形構 ê 華語文學體制。咱對宋澤萊跨語際 ê 台灣文學史冊、方耀乾 ê 多元中心，以及林央敏重新確認一種台灣人 ê 身份論，咱會當看見台語文學一路行來，總算會當 tī 台灣文學史 ê 單音以外，重新建構家己斷裂、邊墘、hông 他者化 ê 歷史，並且回應台灣文學史猶未完全「去『再殖民』」ê 大敘事，追求每一 ê 族群對「自在」到「自為」，在台灣文學 ê 範疇當中走揣使用族語寫作，並且得著承認 ê 自由。在這 ê 層次頂面，未來是毋是有需要斟酌台語 kap 台灣語言 ê 問題，著 koh 愛留待歷史去做見證。不過眼前咱看著 ê 是，台語文學 kap 台灣文學 ê 爭論，究實毋是欲將台語(族) ê 文化主體完全等同是台灣文學 ê 本質，台語文學所欲追求 ê 是一種方法、一種

眼界，看待包括台語在內，各族群形成台灣文學的多元本質，重新建構多元、互為主體的台灣民族想像。

第五章 結論

台灣文學現時仍用中國白話文(華文)去創作,然而隨著台灣歷史的改變,有一天,台灣文學的創作語文一定以各種族的母語為主才對:這取決於台灣人自主的確立與否。¹

舊約《聖經》〈創世紀〉第十一章有一 ê 關於語言 ê 故事,講人類原本有共同 ê 語言,為著欲展現家己 ê 團結力量, in 集合起來欲來起一座城 kap 直通天庭 ê 塔。耶和華認為人類傷過自信,所以著來變亂 in ê 口音,予 in 語言袂通、分散全地,高塔 tsuânn 來停工,這座塔著叫做巴別(The Tower of Babel)。後殖民神學 ê 觀點認為,這 ê 故事是上帝反對「巴別帝國」一民一語 ê 統合,所以才來將語言分化,恢復多語多國 ê 天下,避免帝國主義危害人間。²然者,殖民主義、帝國主義 ê 侵略,毋但是台灣這 ê 島嶼以及予歷史牽引來 ê 住人無法度閃避 ê 共同命運,在多元 ê 族群語言互相影響,以及殖民語言 ê 強力浸透之間,這陣人也不時 teh 逼問家己纒纏袂清 ê 身份。只不過,對巴別塔離散了後,只有台灣人猶未建立家己 ê 國家,敢講在歷史頂面不斷重演 ê 語文運動 kap 論爭,猶 koh 無法度叫喚語言意識遲醒(甚至猶未醒) ê 認同意義,只是再一擺成做沉落歷史烏暗 ê 回聲?

多元 ê 族群文化,苦難 ê 歷史經驗,成就「台灣文學」ê 主體性,也是台灣人成做「人」ê 淬鍊 kap 考驗。但是「台語」這 ê 名,以「這種語言」所建構出來 ê 文學、文化理論,透過漢字 kap 羅馬字所完成 ê 書面語文學,為啥物變成台灣文學無在場 ê 「他者」?因何在歷史斷裂 ê 情境當中,「台語文學」會 koh 再發穎?「台語」透過語言 kap 文字(羅馬字)所欲強調 ê 「台灣意識」有什麼款特別 ê 內涵與意義欲參「台灣文學」對話,但是直直予人抹消,結果成做一種無法度發言,被「台灣意識」噤聲 ê 「台灣意識」?

對文學史、語言、民族主義遮 ê 關鍵字出發,筆者採取後設歷史學 ê 觀點,又 koh 借重民族主義研究當中對族群語言、文化 ê 看法,重新梳捋台灣文學史 kap 「台灣意識」ê 內容,來理解「語言」這項「非必要」ê 認同條件,經過統治者認為「必要」ê 語言政治了後,「國語 v.s. 方言」轉換做「華語 v.s. 本土語言」,但是文學語言之間無公平 ê 語際關係原在,造成台灣認同主體崩歹(pang-pháinn) ê

¹ 葉石濤,〈戰後台灣文學的自主意識〉,《台灣新聞報·西子灣》1995.08.12。

² 羅光喜,〈尊母語反帝國的神:後殖民神學眼中的巴別塔事件〉,《新使者》125 期,2011.08,頁 55-59。網址:

<http://newmsggr.pct.org.tw/Magazine.aspx?strTID=1&strISID=125&strMAGID=M2011081602913>, 使用日期:2013.03.04。

現象，進一步針對台語文學在台灣文學脈絡當中 ê 發展、衝突，甚至被抹消 ê 情形，來走揣對話 ê 可能性。

本研究 ê 主要論點 kap 學術貢獻有四項：

一、對現代性 ê 角度論證白話字文學 ê 文學史地位，深化台語文學研究並且提出台灣文學史殖民現代性 ê 侷限。

筆者首先提出「戰前台語文學」ê 觀點，替台灣文學史拍開無全款 ê 歷史眼界，也希望會當深化部份台語白話字文學 ê 研究觀點。在過程中，咱會當發現台灣「新」文學 ê 斷代 kap 現代性 ê 指涉有非常強烈 ê 「殖民」、「漢文化」ê 暗喻，所以在西方半殖民情境中經由傳教來台 ê 基督教 kap 白話字文學，尤其白話字詩干證西方文學 ê 台灣化，白話字散文建構台灣人「前」現代 ê 知識域。這寡 kap 漢文化傳統無全 ê 經驗往往消失在「新」文學 ê 論述當中，但是，若對蔡培火所留落來 ê 《THE TÂI-OÂN CHHENG-LIÂN》這條歷史訊息重新思考日本時代 ê 新文化、新文學運動，咱會當在全球化 ê 情境之中，發現台灣對西方現代性 ê 受容、揉入 kap 實踐，甚至也在台灣 kap 日本殖民現代性接載 ê 時陣，扮演相當重要 ê 角色。來自西方 ê 異質文化，透濫入台灣 ê 文化主體當中，siàng-sî 也證成台灣文化、文學 ê 特殊性 kap 獨立性。戰前台語文學毋但是另外一種觀看台灣文學、現代性 ê 角度，更加是台灣話文在殖民語境當中起造民族想像 ê 見證。

二、透過後設歷史學 kap 民族主義 ê 手路，重新考證台灣文學史 ê 建構 kap 台灣意識生炭 ê 「語言」變項

Tī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實行去日本化、再中國化 ê 文化重建過程當中，長期欠缺國家力量來建設 ê 台灣話無法度介入新、舊國語之間 ê 鬥爭，台灣作家在書寫技術 ê 限制 kap 民族認同 ê 爭論當中，形成「台灣式白話文」ê 透濫書寫，替爭取本土語言、文化存活 ê 時間 kap 空間，m̄-koh，這種對抗再殖民 ê 策略，真緊著因為國民黨 ê 中國民族想像 kap 國族、語文教育，配合戒嚴 ê 政治情勢 kap 社會氛圍，造成台灣文壇無公平 ê 語文資本分配 kap 再生產 suah 來失去效果。

1970 年代，台灣作家開始使用「國語化」ê 台語描寫台灣社會下層民眾生命，成做一種特殊 ê 「鄉土文學」文體，表面上袂輸是長久以來 hōng 禁制 ê 方言總算解禁，但是在國民黨 ê 語言政策之下，台灣 ê 本土語言攏 hōng 貶低、收編做政治上 ê 「方言」，用來接載(tsih-tsài)中國民族主義，「方言」附屬 tī 華語為主 ê 鄉土文學文體內底，猶未超出「國語」ê 位階規範，「方言」也未曾 tī 中國意識政治厝頂之下 ê 鄉土文學內底得著解放。

《笠》kap《台灣文藝》恬恬(tiām-tiām)開出「方言文學」ê花蕊。雖然遮ê本土作家陣反官方ê立場kap認同本土ê意識，一開始並無完全接納方言書寫，但林宗源kap向陽ê方言入詩所實踐ê「笠」詩觀kap「語言觀」，也慢慢得著詩社同人趙天儀、林亨泰ê認同。《台灣文藝》除了是大河小說家ê產房以外，東方白《浪淘沙》真緊著對鄉土文學「國語中心」語言成規ê「共時性」否定，走脫出多語對話全寫實ê「後」鄉土文體，甚至koh轉入台語文學ê寫／譯作。這毋但干證「百年」前著在場ê台灣各語族文化域kap語言現實，「後」鄉土文體無漸次形成ê規律，突然間出現ê多語、母語書寫，也代表台灣作家其實有寫「方言文學」ê意圖kap能力。

只不過，無論是陳千武無自覺譬相「方言」ê語言暴力，或者是李喬在「後殖民華語」以外對「方言文學」ê設限，in顛倒kap「中國意識」ê文學主張有類似ê焦慮，甚至造成本土論自身ê矛盾。方言ê使用成做一種「本土」ê表意，suah無法度對殖民者ê語言政治內底得著真正ê解放，這相當程度是在戰後國民黨中國意識ê國語政策脈絡之下，無意中維護華語霸權來壓制本土語言kap文化主體性ê表現。所以，對台灣文學史ê發展脈絡來看，戰後島內「方言文學」必然會出現，但是「台語文學」對「方言詩」、「方言文學」正名過來，koh發展做「台語文運動」，這並無完全是一種自然ê「進化」。伊除了是在反抗中國意識ê收編kap壓迫ê情境當中出世以外，更加是對台灣立場ê民族想像提出質疑、對本土論內部矛盾ê積極回應。

三、提出「台灣意識」面對語言問題ê盲點，以及台灣民族文學論ê補足

經過梳捋了後，咱掌握著台灣話文ê文學史敘事在華語文學體制對應中國民族主義ê起興當中，漸漸消音ê趨向。尤其是葉石濤kap日本時代話文爭論閃身而過，在戰後ê跨語困境，尤其是統治者將語言當作是絕對ê認同條件ê時陣，伊kap一陣跨語作家不得不先強調「抗日」、「民族精神」來證成使用「日語」ê正當性，伊自我異化所起造ê「台灣意識」，無形中接載咱所熟似(sik-sāi)ê彼種「雜菜麵」ê閱讀口味，被逼迫共謀華文體制對本土語言ê宰制。

但是來到1980年代，koh khah強烈ê「台灣意識」立場ê台灣文學史敘事，並無進一步理解著「台灣意識」ê侷限，面對國民黨再殖民ê語言政治影響之下對日本時代台灣文學ê誤識，以及戰後台灣華語文學體制ê建造，攏欠缺全面ê解殖(de-colonization)，所以也無法度解決台灣文學ê語文論爭，甚至面對中國意識用語文收編ê時陣，也無自覺著台灣意識全款是挪用漢文化本質論，維護殖民語言體制ê矛盾。

端看另外一組台灣民族意識 ê 提案，siàng-sî 也是台語文學 ê 論述基礎，胡民祥思考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民族文學 ê 社會 kap 文化關係，提出「文學語言」史觀，成做多元中心 ê 重要基礎；宋澤萊、林央敏也攏對台灣「人」ê 主體出發，強調多語多族 ê 台灣「人」應該愛抵抗 kap 獨裁政治共謀來壓迫本土文化 ê 中國文化，真正對個人、族群出發，做伙來建構台灣民族 ê 新文化、新文學。在這 ê 提論頂面，咱也確實看著台語文學一開始著毋是欲完全顛覆北京語，只是欲追求對應台語經過歷史自然發展 ê 事實。

四、重新討論台灣民族文學論 kap 台語文學 ê 文學史意義

在台灣文學、台灣意識陷落華語 kap 本土語言後殖民衝突 ê 困境當中，台語文學經由台灣文學「語言」史 ê 梳捋走揣台灣多元多心 ê 歷史基礎，重建日本時代「台灣語」ê 文學經驗，kap 戰後台語文學運動原在 ê 文化場域來接合，拍開白話字文學 ê 眼界，重新界定台灣文學 ê 多元本質，更加積極鼓吹復振各族群 ê 語言文化，來抵抗過去以中國文化為中心 ê 「漢字」kap 「漢文化」認同所形構 ê 華語文學體制。

所以，著親像使用「華文」ê 筆者一開始所強調 ê 概念：討論台灣文學 ê 語言問題，無一定愛完全肯定，同意台語文學 ê 運動策略，或者是毋免顧慮台語、母語文學書寫技術 ê 困境。但是若真正倚在多元 ê 立場，真正注重族群之間 ê 主體性，真正了解台灣文化 ê 內涵，咱返看台灣文學場域忽略台語文 ê 現實，重新思考「台灣話」ê 名稱所欲回應 ê 歷史情境，koh 再重新認識白話字文學 ê 出土，這時應該已經牽出一條解決台灣文學語言問題 ê 線索——解除無平等 ê 語際關係、歪斜 ê 文學史書寫背後的政治殘餘權力。先對起造族群 ê 主體性做起，才有追求台灣民族主體性 ê 可能性。總是對社會語言學 ê 角度來看，本研究 khah 欠缺客家、原住民對台灣文學語言問題 ê 看法，以及文學實踐 ê 體現，是未來會當延伸 ê 主題。未來，咱是毋是 koh 有需要斟酌台語 kap 台灣語言 ê 問題，或者是「台語」會慢慢形成另外一種共識，著 koh 愛留待歷史去做見證。

參考資料

一、主要文獻史料

(一) 戰前

《TÂI-OÂN HŪ-SIÂⁿ KÀU-HOĒ-PÒ》，收入《台灣教會公報全覽》，台南：教會公報，2004。

《台灣青年》複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台灣》複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台灣民報》複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台灣新民報》複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

《台灣文藝》複刊，台北：東方文化書局複刊，1981。

(二) 戰後

《文友通訊》，全文重刊於《文學界》5期，1983.01。

《台灣文藝》，台中：臺灣文藝雜誌社，1964-1993。

笠詩刊編輯委員會編，《時代的眼·現實之花：《笠》詩刊一～一二〇期景印本》，台北：台灣學生，2000。

二、專冊

Âng 洪惟仁，《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1992。

Bīng 孟樊，《文學史如何可能：台灣新文學史論》，台北：揚智文化，2006。

Hā 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海峽學術，1999。

Hiòng 向陽，《銀杏的仰望》，台北：林淇養，1980。

Hiòng 向陽，《康莊有待》，台北：東大，1985。

Hô 何群雄，《漢字在日本》，香港：商務，2001。

Iáp 葉石濤編譯，《台灣文學集(2)日文作品選集》，高雄：春暉，1996。

Iá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2007。

Iû 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

Iûnn 楊雲萍，許雪姬、林瑞明編，《楊雲萍全集 2 文學之部(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Iûnn 楊雲萍，許雪姬編，《楊雲萍全集 6 歷史之部(四)》，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Iûnn 楊彥杰，《荷據時代台灣史》，台北：聯經，2000。

Iûnn 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聲》，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Iûnn 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

- Kang 江玉玲,《聖詩歌：台灣第一本教會聖詩的歷史溯源》，台北：台灣基督教文藝，2004。
- Kang 江玉玲,《台語聖詩與韻文詩篇》，台北：道聲，2005。
- Khu 邱貴芬,《後殖民及其外》，台北：麥田，2003。
- Khóo 許長安等編,《廈門話文》，中國廈門：鷺江，1993。
- Khóo 許俊雅,《台灣文學散論》，台北：文史哲，1994。
- Khóo 許俊雅,《見樹又見林——文學看台灣》，台北：渤海堂，2005。
- King 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東大，1995。
- King 龔顯宗等編,《移居、國家與族群》，高雄：中山大學人社科學研究中心，2010。
- King 經典雜誌編,《台灣醫療四百年》，台北：經典雜誌，2006。
- Kueh 郭秀娟,《認識聖經文學》，台北：校園書房，2003。
- Láu 劉登翰等編,《台灣文學史》下卷，中國福建：海峽文藝，1993。
- Lí 李育霖,《翻譯闖境：主體、倫理、美學》，台北：書林，2008。
- Lí 李喬,《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1992。
- Lí 李勤岸,《白話字文學—台灣文化 kap 語言、文學 ê 互動》，台南：開朗雜誌，2010。
- Lí 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 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1979。
- Lí 李南衡、葉芸芸編,《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晨星，1995。
- Lí 李丁讚等編,《公共領域在台灣：困境與契機》，台北：桂冠，2004。
- Lí 李靜玫,《《台灣文化》、《台灣新文化》、《新文化》雜誌研究(1986.6~1990.12)：以新文化運動及台語文學、政治文學論述為討論主軸》，台北：國立編譯館，2008。
- Lī 呂興昌,《台灣詩人研究論文集》，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1995。
- Lī 呂興昌編,《林亨泰全集九—文學論述卷 6》，彰化：彰化縣文化局，1998。
- Lī 呂興昌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台北：前衛，1999。
- Lī 呂正惠,《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1995。
- Liāu 廖咸浩,《愛與解構：當代台灣文學評論與文化觀察》，台北：聯經，1995。
- Lîm 林央敏,《台灣人的蓮花再生》，台北：前衛，1988。
- Lîm 林央敏,《台語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前衛，1997。
- Lîm 林央敏,《台語小說史及作品總評》，台北：印刻：2012。
- Lîm 林淇養,《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2001。
- Lîm 林柏燕編,《吳濁流百年誕辰紀念專刊》，新竹：新竹縣文化局，2000。
- Lîm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台北：允晨，1993。
- Lîm 林宗源,《林宗源台語詩選》，台北：自立晚報，1988。
- Lîm 林宗源,《沉思及反省》，台南：首都詩報，2011。
- Liân 聯合報副刊編,《台灣新文學發展重大事件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

- Luā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1990。
- Luā 賴永祥，《教會史話》第四輯，台南：人光，1997。
- Masahiro 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
- Masahiro 若林正文等編，《跨域青年學者台灣史研究續集》，台北：稻鄉，2009。
- Nakashima 中島利郎編，《一九三〇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2003。
- Ng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語文學想像》，台北：麥田，2009。
- Ng 黃英哲編，《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
- Ng 黃英哲，《「去日本化」「再中國化」：戰後台灣文化重建（1945-1947）》，台北：麥田，2007。
- Ng 黃勁連等，蕃薯詩刊3《抱着咱的夢》，台北：台笠出版，1992。
- Ng 黃宜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1999。
- Ng 黃瑞祺編，《現代性、後現代性、全球化》，台北：左岸文化，2003。
- Ngô 吳文星，《日治時期台灣的社會領導階層》，台北：五南，2009。
- Ngô 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台北：左岸文化，2012。
- Ngô 吳長能，《台語文學論爭及其相關發展 1987~1996》，新竹：時行台語文會，2012。
- Ông 王美秀，《中國基督教史話》，台北：國家，2004。
- Ông 王甫昌，《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群學，2006。
- Ông 王幼華，《考辨與詮說——清代台灣論述》，台北：文津，2008。
- Ôo 胡民祥，《走探台灣文學痕跡》，台南：開朗雜誌，2009。
- Phênn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
- Phênn 彭瑞金，《台灣文學探索》，台北：前衛，2003。
- Phênn 彭瑞金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14：鍾肇政》，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 Png 方耀乾編，《台語文學史書寫理論與實踐》，高雄：台文戰線雜誌，2009。
- Png 方耀乾，《台語文學史暨書目彙編》，高雄：台灣文薈，2012。
- Shu-mai Shih 史書美，《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台北：聯經，2013。
- Si 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9。
- Si 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1996。
- Si 施正峰編，《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6。
- Si 施俊州，《台語文學導論》，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
- Siā 解昆樺，《台灣現代詩典律與知識地層的推移：以創世紀、笠詩社為觀察核心》，台北：威秀，2013。

- Siau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 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研院社會所，2008 年。
- Siau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
- Sing 盛寧，《新歷史主義》，台北：揚智文化，1995。
- Sòng 宋澤萊，《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北：前衛，1988。
- Sòng 宋澤萊，《台灣文學三百年》，台北：印刻，2011。
- Tài 台灣文學研究會編，《先人之血·土地之花：台灣文學研究會論文集》，台北：前衛，1989 年。
- Tài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歷史委員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台南：新樓書房，2000。
- Tân 陳鳴鐘、陳興唐編，《台灣光復和光復後五年省情》上，中國南京：南京，1989。
- Tân 陳義芝編，《台灣現代小說史綜論》，台北：聯經，1998。
- Tân 陳芳明，《鞭傷之島》，台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
- Tân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2004。
- Tân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11。
- Tân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
- Tân 陳建忠，《書寫台灣·台灣書寫：賴和的文學與思想研究》，高雄：春暉，2004。
- Tân 陳建忠等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
- Tân 陳建忠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1：賴和》，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1。
- Tân 陳平原，《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 Tân 陳培豐，《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2009。
- Tân 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台北：聯經，1981。
- Tân 陳東榮、陳長房編，《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台北：書林，1995。
- Tang 東方白，《浪淘沙》上，台北：前衛，2005。
- Tè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中國北京：北京大學，2002。
- Tēnn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台北：大安，1988。
- Tēnn 鄭明嫻，《現代散文構成論》，台北：大安，1989。
- Tēnn 鄭錦全等編，《語言政策的多元文化思考》，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研究所，2007。
- Tiong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主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4) 教案與反西教》，台北：台灣商務，1986。
- Tiunn 張炎憲、曾秋美、陳朝海編，《邁向 21 世紀的台灣民族與國家論文集》，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2002。
- Tiunn 張君玖，《後殖民的陰性情境：語文、翻譯和欲望》，台北：群學，2012。

- Tiunn 張錦忠、黃錦樹編，《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2007。
- Tiunn 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2007。
- Tiunn 張力、劉鑿唐，《中國教案史》，中國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7。
- Tiunn 張良澤編，王詩琅全集卷九《台灣文學重建的問題：台灣文教》，高雄：德馨室，1979。
- Tiunn 張春鳳等著，《台語文學概論》，台北：前衛，2002。
- Tiō 趙遐秋、呂正惠，《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台北：人間，2002。
- Tsan 曾慶瑞、趙遐秋，《台獨派的台灣文學論批判》，台北：人間，2003。
- Tshuà 蔡金安主編，《台灣文學正名》，台南：開朗雜誌，2006。
- Tshuà 蔡蔚群，《教案：清季台灣的傳教與外交》，台北：博揚文化，2000。
- Tsing 鍾理和、鍾肇政著，錢鴻鈞編，《台灣文學兩鍾書》，台北：草根，1998。
- Tsing 鍾肇政、東方白著，張良澤編，《台灣文學兩地書》，台北：前衛，1993。
- Tsînn 錢鴻鈞編，黃玉燕譯，《吳濁流致鍾肇政書簡》，台北：九歌，2000。
- Tsiu 周英雄、劉紀蕙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2000。
- Tsiu 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台灣史論集》，台北：允晨，2003。
- Tsiunn 蔣為文，《語言、文學 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台南：國立成功大學，2007。
- Tsiunn 蔣為文，《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成大，2005。
- Tsiunn 蔣為文，《語言、文學 kap 國家再想像》，台南：成大，2007。
- Tsiunn 蔣為文總編，《台語白話字文學選集》，台南：台灣文學館，2011。
- Tsng 莊萬壽等編，《台灣的文學》，台北：群策會李登輝學校，2004。
- Tsu 朱惠足，《「現代」的移植與翻譯：日治時期台灣小說的後殖民思考》，台北：麥田，2009。
- Ut 尉天聰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0。
- Yokoji 橫路啟子，《文學的流離與回歸——三〇年代鄉土文學論戰》，台北：聯合文學，2009。

三、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照台羅、英文、日文拼音字頭 kap 發表年度排列）

- Âng 洪惟仁，〈台語文學個分類與分期（上）（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1 期，2010.05，頁 4-22。
- Âng 洪惟仁，〈台語文學個分類與分期（下）（自開台至 1995 年）〉，《海翁台語文學》102 期，2010.06，頁 4-35。
- Hiòng 向陽，〈「現代」與「現實」的辯證——論《笠》詩刊本土論述的雙軸延伸〉，《新地文學》1 卷 2 期，2007.12，頁 43-63。
- Hō 賀安娟，〈荷蘭統治之下的台灣教會語言學——荷蘭語言政策語原住民識字能力的引進（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台北文獻》直字 125 期，1998.09，頁 81-119。
- Iàp 葉笛，〈戰後台語詩的發展〉，《台灣新文學》9 期，1997.12，頁 227-237。

- láp 葉石濤，〈簡介陳少廷先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書評書目》53期，1977.09，頁34-37。
- láp 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文星》97期，1965.11，頁70-73。
- J.J.A.M. Kuepers (柯博識)，查忻譯，〈荷蘭改革宗台灣教會殖民背景下的宣教(1627-1662)〉，《台灣文獻》58卷1期，2007.03，頁1-53。
- Khng 康原，〈台語新詩的奠基者——兼談賴和的台語詩歌〉，《台灣新文學》5期，1996.08，頁296-304。
- Khóo 許雪姬，〈台灣光復初期的語文問題〉，《思與言》29卷4期，1991.12，頁155-184。
- Khóo 許水綠，〈評《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上)〉，《新潮流》4期，1984.07，頁50-53。
- Khóo 許水綠，〈評《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下)〉，《新潮流》5期，1984.09，頁62-64。
- Khóo 許達然，〈日據時期台灣散文〉，收入《賴和及其同時代作家：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主辦，1994.11。
- Khu 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卷2期，1992.07，頁151-167。
- Khu 邱貴芬，〈「咱攏是台灣人」——答廖朝陽有關台灣後殖民論述的問題〉，《中外文學》21卷3期，1992.08，頁29-46。
- Khu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成：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03，頁125-154。
- Lâu 劉煥雲等，〈台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文學新論》5期，2007.06，頁51-80。
- Lí 李勤岸、洪惟仁，〈沒有名字的語言？「台灣話」、「閩南話」還是 Hóh-ló 話？〉，《台灣文學館通訊》15期，2007.05，頁36-41。
- Lī 呂興昌，〈頭戴台灣天·腳踏台灣地——論黃石輝台語文學兮觀念和實踐〉，《台灣新文學》6期，1996.12，頁286-305。
- Lī 呂美親，〈八〇年代後台語文學 ê 突圍：以《台灣新文化》作觀察對象〉，收入《第三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6.07，頁139-164。
- Liāu 廖朝陽，〈評邱貴芬〈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中外文學》21卷3期，1992.08，頁43-46。
- Liāu 廖朝陽，〈是四不像，還是虎豹獅象？——再與邱貴芬談台灣文化〉，《中外文學》21卷3期，1992.08，頁48-58。
- Līm 林載爵，〈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回顧〉，《文季》3期，1974.05，頁133-165。
- Līm 林央敏，〈台語小說的發展及作品總評(一)〉，《海翁台語文學》114期，2011.06，頁4-20。
- Līm 林旺，〈植下那語文的大樹深根——台灣語文之歷史探討與比較研究〉，《台灣

- 新文化》17期，1988.02，頁27-37。
- Lîm 林鍾隆，〈台灣文藝與吳濁流〉，《台灣月刊》238期，2002.10，頁12-14。
- Má 馬森，〈「台灣文學」的中國結與台灣結——以小說為例〉，《聯合文學》89期，1992.03，頁172-193。
- Matsunaga 松永正義，何世雄譯，〈台灣的日語文學及台語文學〉，《中外文學》31卷10期，2003.03，頁11-28。
- Nâ 藍建春，〈文學史與賴和：以「台灣新／現代文學之父」的論述為例〉，《台灣文學學報》2期，2001.02，頁1-31。
- Nakashima 中島利郎著，彭萱譯，〈日治時期台灣研究的問題點——根據台灣總督府的漢文禁止以及日本統治末期的台語禁止為例〉，《文學台灣》46期，2003.04，頁298-317。
- Ngô 吳瀛濤，〈台灣新文學的第一階段〉，《台北文物》3卷2期，1954.08，頁80-82。
- Ngô 吳瀛濤，〈概述光復前的台灣文學（一）〉，《幼獅文藝》216期，1971.12，頁274-282。
- Ngô 吳智偉，〈評《史元：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意象》(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Century Europe)〉，《史耘》7期，2001.07，頁173-184。
- Ngô 吳叡人，〈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1919-1937)〉，《新史學》17卷2期，2006.06，頁127-218。
- Ông 王錦江，〈日據時期的台灣文學〉，《台灣文獻》1卷3期，1964.06，頁49-58。
- Ông 王甫昌，〈台灣反對運動的共識動員：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九年兩次挑戰高峰的比較〉，《台灣政治學刊》1期，1996.07，頁129-209。
- Ông 王順隆，〈日治時期台灣人「漢文教育」的時代意義〉，《台灣風物》49卷4期，1999.12，頁107-127。
- Ông 王昭文，〈羅馬字與「文明化」——台灣文化協會時代的白話字運動〉，收入《2004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2，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12。
- Ông 王愛云，〈陳獨秀與文字改革〉，《安徽史學》4期，2012年，頁90-98。
- Ôo 胡民祥，〈台灣文學的語文辯證〉，《海翁台語文學》48期，2005.12，頁4-14。
- Png 方孝謙，〈殖民地民族主義與1920年代的日治台灣——以「治警事件」及土語運動為例〉，《東吳社會學報》3期，1994.03，頁161-197。
- Png 方耀乾〈台語白話文學ê起源kah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ê存在〉，收入《2004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12。
- Phênn 彭瑞金，〈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2期，1982.04，頁1-3。
- Phênn 彭瑞金，〈記一九四八年前後的一場台灣文學論戰〉，《文學界》10期，

- 1984.05，頁 2-15。
- Phènn 彭瑞金，〈當前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與多元化——兼論有關台灣文學的一些異說〉，《文學台灣》4 期，1992.09，頁 11-36。
- Phènn 彭瑞金，〈台灣文學定位的過去和未來〉，《文學台灣》9 期，1994.01。頁 93-117。
- Sòng 宋澤萊，〈台灣文學論〉，《暖流》1 卷 4 期，1982.04，頁 63-64。
- Sòng 宋澤萊，〈致台灣文學界七封信〉，《深耕》15 期，1982.08，頁 47-53。
- Sòng 宋澤萊，〈咱來湊陣用台語念詩〉，《台灣新文化》2 期，1986，頁 69。
- Sòng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的問題〉，《台灣新文化》5 期，1987.01，頁 38-41。
- Sòng 宋澤萊，〈論林央敏文學的重要性——繼黃石輝、葉榮鐘之後又一深化台灣文學的旗手〉，《台灣新文化》8 期，1997.08，頁 213-232。
- Sòng 宋澤萊，〈林宗源、向陽、宋澤萊、林央敏、黃樹根、黃勁連影響下的兩條台語詩路線——閱讀「台語詩六家選」有感〉，《台灣新文化》9 期，1997.12，頁 272-280。
- Sòng 宋澤萊，〈論台語小說中驚人的前衛性與民族性——試介賴和、黃石輝、宋澤萊、陳雷、王貞文的台語小說〉，《台灣新文學》10 期，1998.06，頁 262-290。
- Tài 台灣新本土社，〈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台灣 e 文藝》創刊號，2001.02，頁 30-89。
- Tân 陳少廷，〈五四與台灣新文學運動〉，《大學雜誌》53 期，1972.05，頁 18-25。
- Tân 陳正靨著，路人譯，〈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上〉〉，《暖流》2 卷 2 期，1982.08，頁 22-33。
- Tân 陳昭瑛，〈論台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中外文學》23 卷 9 期，1995.02，頁 6-43。
- Tân 陳映真，〈以意識形態代替科學知識的災難——批評陳芳明先生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189 期，2000.07，頁 138-160。
- Tân 陳映真，〈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191 期，2000.09，頁 138-161。
- Tân 陳芳明，〈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回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190 期，2000.08，頁 156-165。
- Tân 陳芳明，〈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再答陳映真的科學發明與知識創見〉，《聯合文學》192 期，2000.10，頁 166-179。
- Tân 陳翠蓮，〈去殖民與再殖民的對抗：以 1946 年「台人奴化」論戰為焦點〉，《台灣史研究》9 卷 2 期，2002.12，頁 145-201。
- Tân 陳建忠，〈先知的獨白：賴和散文論〉，收入「時代與世代：台灣現代散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2003.12。
- Tân 陳慕真，〈走向台灣民族的文學革命——論八、九〇年代的台語文學論爭〉，《台灣文學評論》6 卷 1 期，2006.01，頁 145-160。

- Tân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 1930 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收入邱貴芬、柳書琴編，《台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第三期台灣號》，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4，頁 83-110。
- Tân 陳培豐，〈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收入陳芳明編，《台灣文學的東亞思考：台灣文學藝術與東亞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07，頁 190-237。
- Tân 陳培豐，〈日治時期台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台灣話文〉，《台灣史研究》15 卷 4 期，2008.12，頁 31-86。
- Tân 陳政彥，〈台語文學論戰重探—過程與意義的再思考〉，收入《第五屆台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台南：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台灣語言學系主辦，2008.11。
- Tân 陳淑華，〈台灣鄉土語言政策沿革的後殖民展望〉，《教育學誌》21 期，2009.05，頁 51-90。
- Tân 陳少明，〈近代閩南基督教會的白話字教育〉，《教育評論》11 卷 6 期，2010 年，頁 132-134。
- Tang 東方白，〈敬答歐宗智之論《浪淘沙》〉，《台灣文學評論》2 卷 4 期，2002.10，頁 36。
- Táng 董芳苑，〈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55 卷 2 期，2004.06，頁 289-324。
- Ting 丁威仁，〈「本土現實詩學」的啟航——70 年代《笠》詩論初探〉，收入《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8.06。
- Tiunn 張茂桂，〈評蕭阿勤《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及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刊》29 期，2001.02，頁 293-299。
- Tiunn 張學謙，〈白話字 ê 活力(1885-1970 年)〉，收入《活力白話字(Peh-oe-ji=POJ)在台灣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2006.02。
- Tshuà 蔡瑋芬，〈從一九八〇年代的「台灣民族論」看其後的兩次台語文學論爭〉，《台灣人文》10 卷，2005.12，頁 31-42。
- Tsiunn 蔣為文，〈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收入《2004 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籌備處，2004.12。
- Tsu 朱真一，〈早期歐美的醫界人士與台灣語言〉，《台灣醫界》51 期，2008.11，頁 50-54。
- Tsu 朱首獻，〈科學主義與草創期中國文學史觀建構〉，《文學評論》3 期，2010 年，頁 163-168。

Yasuda 安田敏朗著，呂美親譯，〈日本「國語」的近代〉，《東亞觀念史集刊》3期，2012.12，頁 71-117。

四、學位論文（照台羅字頭、英文、日文拼音字頭 kap 畢業年度排列）

Âng 洪辭惠，《台灣政教關係之研究－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三大宣言為中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Iap 葉祚樑，《台灣九〇年代的身分建構與國族修辭——以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論戰為主要的考察範圍》，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Nà 藍建春，《台灣文學史觀念的歷史考察》，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2。

Ng 黃佳惠，《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Lī 呂美親，《日本時代台語小說研究》，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Lī 呂焜霖，《戰後台語歌詩的成因與發展——兼論向陽與路寒袖的創作》，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Līm 林中力，《鄉土的尋索：台灣文學場域中的「鄉土」論述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Līm 林玲玲，《葉石濤及其台灣文學論的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論，2008。

Png 方耀乾，《Ûi 邊緣 kàu 多元中心：台語文學 ê 主體建構》，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8。

Si 施俊州，《語言、體制、象徵暴力：前運動期台語文學 kap 華語文學關係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0。

Siā 謝春馨，《八〇年代「台灣文學」正名論》，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Tân 陳淑容，《一九三〇年代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爭及其餘波》，台南：國立台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Tân 陳慕真，《台語白話字書寫中 ê 文明觀——以《台灣府城教會報》(1885-1942)為中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Tân 陳志瑋，《戰後初期台灣的語文政策與意識形構（1945.8.15-1949.12.7）——以跨時代台灣文化人的書寫為考察對象》，台北：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論，2006。

Tân 陳金順，《Ûi 胡厝寮飛向菜里鄉的渡鳥：胡民祥台語文學研究》，台南：國立台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

Tshuà 蔡瑋芬，《戰後台語文學運動 e 開展：1986-1991》，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Tshuà 蔡美俐，《未竟的志業：日治世代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五、譯冊、外文冊（照台羅、英文、日文拼音字頭排列）

Anthony Giddens 著，趙旭東、方文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2002。

Benedict Anderson 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台北：時報文化，2010。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著，劉自荃譯，《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台北：駱駝，1998。

Edward W.Said 著，蔡源林譯，《文化與帝國主義》，台北：立緒文化，2010。

Eric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台北：麥田，1998。

Eric Hobsbawm 等著，陳思文等譯，《被發明的傳統》，台北：貓頭鷹，2002。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1。

Ernest Gellner 著，李金梅譯，《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6。

Frank Lentricchia &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Frantz Fanon 著，陳瑞樺譯，《黑皮膚，白面具》，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7。

Harold R. Issacs 著，鄧伯宸譯，《族群》，台北：立緒文化，2009。

Ismail S. Talib，李勤岸譯，《後殖民文學的語言》，台北：書林，2011。

Keith Jenkins 著，賈士蘅譯，《歷史的再思考》，台北：麥田，2011。

Kenneth S. Latourette 著，雷立柏等譯，《基督教在華傳教史》，香港：道風書社，2009。

Matsunaga 松永正義，《台灣文学のおもしろさ》，日本東京都：研文，2006。

Michel Foucault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1993。

Ông 王育德著，黃國彥譯，《王育德全集3 台灣話講座》，台北：前衛，2000。

Philip Spencer, Howard Wollman 著，何景榮、楊濟鶴譯，《民族主義：一個批判性的觀點》，台北：韋伯文化，2012。

Raman Selden 等著，林志忠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第四版）》，台北：巨流，2009。

Rev.George Leslie Mackay 著，林昌華等譯，《馬偕日記：1871-1901》，台北：玉山社，2012。

Richard Fumerton 著，傅浩政譯，《知識論》，台北：五南，2009。

Steven Roger Fischer 著，呂建忠譯，《文字書寫的歷史》，台北：博雅書屋，2009。

Hayden White,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19th-Century Europ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nh Higgins, Raymond Williams : literature, Marx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9.

六、報刊文章

- Iap 葉石濤，〈戰後台灣文學的自主意識〉，《台灣新聞報·西子灣》，1995年。
- Linda Javin 訪問，魏如風譯，〈論權力與人民—訪問陳映真〉，《暖流》1卷3期，1982.03，頁18-19。
- Linda Javin 訪問，陳川流譯，〈文學不能脫離現實—訪問黃春明〉，《暖流》1卷3期，1982.03，頁19-21。
- Tân 陳千武，〈台灣國語詩的創作〉，《台灣時報》，1988.10.14。
- Tân 陳少廷，〈歷史不容誤解——對日據時代台灣文學史的幾點意見〉，《聯合報》，1978.12.10，第12版。

七、資料庫

- Lí 李勤岸，台灣教會公報（1895-1969）白話字文獻數位典藏計劃，「台灣白話字文獻館」資料庫，網址：
<http://www.tcll.ntnu.edu.tw/pojbh/script/about-2.htm>，使用日期：2012.02.26。
- Ting 丁鳳珍，日治時期台語文學資料庫，網址：<http://www.ntcu.edu.tw/hongtin/>，使用日期：2012.11.02。
- Tiong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資料庫，〈1915年第二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資料〉，網址：
<http://www.rchss.sinica.edu.tw/popu/>，使用日期：2012.09.08。
- Kok 國立台灣文學館台語文學展《台灣語言政策大事紀(1895~2007)》，網址：
http://nmtldig.nmtl.gov.tw/taigi/02sp/04_list.html，使用日期：2013.04.10。
- Kok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政治與社會發展海外史料資料庫，網址：
<http://da.lib.nccu.edu.tw/tdm/?m=2301>，使用日期：2013.04.19。

八、網路資料

- Lí 李勤岸，〈沒有名字的語言〉，網址：
<http://tw01.org/profiles/blogs/1970702:BlogPost:2170575>，使用日期：2013.07.28。
- Lô 羅光喜，〈尊母語反帝國的神：後殖民神學眼中的巴別塔事件〉，《新使者》125期，2011.08。網址：
<http://newmsggr.pct.org.tw/Magazine.aspx?strTID=1&strISID=125&strMAGID=M2011081602913>，使用日期：2013.03.04。
- Nâ 藍士博，〈隱蔽的系譜—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幾個側面觀察（一）〉，《極光》電子報288期，2012.02，網址：

-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8937852.html#6>，使用日期：2012.11.17。
- Ông 王俐茹，〈黃蔣爭議背後隱藏的語言、認同邏輯〉，《自由時報》，2011.06.06，網址：<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11/new/jun/6/today-o8.htm>，使用日期：2013.05.19。
- Si 施瑋，〈華文基督教文學淺議〉，《舉目》28期，2007.11，網址：<http://behold.oc.org/?p=5208>，使用日期：2013.07.24。
- Siau 蕭安凱，〈「華語」作為一種遺毒／(資)產？——思索台灣文學的語言問題〉，《蕪土吾民：2012年文化研究會議論文》，2012.01.07-08。網址：http://www.csat.org.tw/paper/B-1-2_%E8%95%AD%E5%AE%89%E5%87%B1.pdf，使用日期：2012.05.16。
- Tân 陳千武，〈我的母語（代序一）〉，網址：<http://dcc.ndhu.edu.tw/poemroad/chen-chianwu/2006/12/14/%E6%88%91%E7%9A%84%E6%AF%8D%E8%AA%9E%EF%BC%88%E4%BB%A3%E5%BA%8F%E4%B8%80%EF%BC%89/>，使用日期：2013.02.17。
- Tong 東年部落格，網址：<http://blog.udn.com/highsea/5287041>，使用日期：2013.02.06
- Tsng 莊紫榕訪問，〈自己和自己格鬥的寂寞作家——葉石濤專訪〉，網址：http://www.twcenter.org.tw/b01/b01_13101_1.htm，使用日期：2013.07.21